敦煌历史文化艺术



聂锋 祁淑虹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敦煌历史文化艺术

聂锋　祁淑虹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9.1
7th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敦煌历史文化艺术

聂锋 祁淑虹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123号）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0 插页2 字数270 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26—01736—9/K·279 定价：16.80元

前　言

敦煌，有着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这一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特别的自然生态面貌及其演变，奠定了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别具一格的重要历史地位。

敦煌，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之一；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发展地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中西交通交流枢纽地之一；是中国古代及当时世界文化最重要的交流汇合扩散地之一；是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佛教艺术中心之一。

敦煌，现今地域面积虽仅 31200 平方公里，但她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曾有过特殊的历史贡献。因为，她孕育出了敦煌莫高窟这一随着历史发展变化时隐时现，不断显示其博大精深，至今仍折射着夺目历史光辉的文化艺术圣地，这一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中国古代敦煌地区的历史演变发展，同中华民族历史演变发展相一致，有自己的普遍性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原王朝统治巩固、稳定发展时，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事业也蓬勃向前，蒸蒸日上，成为中西交通交流融会贯通，再进而东进西出的桥梁和纽带，从而使各民族间团结融合，共同发展和进步。在中原王朝衰落、崩坏，内地战乱、分裂、分割时，敦煌地区要么为少数民族所占领统治，而一般则成为小环境较为安定的“福地”，成为中原各地人民和文生儒士逃避战祸、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的较稳定地区。我们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此种时期，敦煌地区

较为松散的政治统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曾做出了特别的历史贡献。

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极其光辉灿烂的一章；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艺术的辉煌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是中西历史、文化与艺术相互撞击、相互吸收而结合的结果。敦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既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并向西推移的结果，又是作为中西交通交流枢纽与"咽喉"的中国西部与中亚、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交汇交融的结果。敦煌地区特别是促成了中原文化和艺术与西部文化与艺术，中亚、欧洲的文化与艺术融汇结合后，反传再进入中原地区并对中原文化与艺术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中西交汇融合后的文化与艺术也再反传进入西部、中亚和欧洲等地，对其文化与艺术的进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就现有的地质、考古资料，我们还很难确切地说明远古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面貌。但从现今敦煌及邻近地区已发现的大量的、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性质待定的原始文化遗迹遗存中，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敦煌地区的人类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甚或更早的时期。与北京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共处相同纬度的敦煌地区，远古时代有着更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况且原始社会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有丰富遗存遗物的新石器时代敦煌地区所居人类，是不可能远徙而来的。那么，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是否是人类的又一重要发源地，这有待于地质、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

古代中国的敦煌地区，无论从其历史演变、建置沿革的角度，还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交流的角度；无论从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还是从历史地理、历史地域的诸多方面去考察认识，都应当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地域概念。无论远古时期稍后的"三危"、"流沙"地，还

是文明时代的"敦煌"、"沙州"，敦煌地区大都以现今的敦煌市为中心，以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艺术紧密联系和辐射于：北面的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和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西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域）东部，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其中部地区；南面则直跨青海省，联系和影响西藏自治区及四川省的西北部；东面达宁夏自治区、陕西省北部地区；东南面直连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影响兰州及其附近地区（陇右）。自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敦煌地区的意义，又是和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边疆地区地域概念密切相关，而伸缩、变化和发展的。

进入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敦煌及附近地区的人类活动更加频繁。我们认为，就敦煌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实际情况而言，当时的敦煌地区，古籍中追记的"三危"、"流沙"、古"雍州"，地域范围是十分广大的，不能把她仅限于今天的敦煌市。她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文明发展的概念。自然，敦煌地区的原始社会时期相对于中原地区要稍为长远一些。我们研究所表明的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敦煌地区的人类活动更加频繁，一方面是这一地区考古挖掘资料的不断涌现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是我国众多的史籍都开始有了较多的记载，并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文明文化的发展同中原地区基本同步，且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系，并不断加强和密切着这种联系。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分化、改组和变革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前期的敦煌地区是相对稳定的时期，其奴隶制的开始稍晚于中原地区，延续的时间则稍长久于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中晚期，敦煌及周围地区由于匈奴等游牧性更强的民族的略带封建制的半奴隶制的推动和影响，最重要的是在战争的推动下，加速了中原地区影响的进展，开始发生较大的变革性的变化。原有的居牧民族大量迁徙，开始进入西域、中

亚等地区，进而最终影响了这些准内陆地区的居民构成，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

历史的大变革、大分化和大改组，必然带来历史的大发展。随着中国历史进入汉代，敦煌地区迎来了一个决定自己今后历史、文化与艺术历史地位的大发展时期，这是与敦煌地区地处当时西陲战略要地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的。汉代的国防，特别是在汉代的前期，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日益强大并开始影响汉代统治者政权巩固的匈奴族的南向扩展势力。为此，直接引发了中原汉王朝与西域、中亚各地区的联系的进一步加强，而敦煌地区重要的地位就显露了出来。从这一方面而言，是匈奴民族侵汉的行为这一契机客观上促成了敦煌地区历史地位的不断上升。敦煌地区从此开始成为今后中原王朝最为重要的边疆军事战略要地之一，成为中西陆上交通交流最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丝绸之路"宽泛的意义，已不仅仅是"丝绸"贸易而已，它开通之日就已经在汉代直接转化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生产和生活方式交流传播的"文明之路"。遥遥千万里的"丝绸之路"，撒满了传播人类文明进步的种子，这些饱含着各民族人民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精华的种子，从东撒向西，从西撒向东，互相交流融合，发芽生根成长壮大，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历史情形，无论是中原王朝高度集权专制统治稳固的条件下，还是中原动荡衰乱时期都是一致的，不断向前发展的，只是影响和贡献的范围及大小有所区别罢了。

随着汉王朝各种矛盾的激化，开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向覆灭，中国秦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之网，第一次被扯破。至隋王朝重新统一之前，虽有局部的统一，短暂的全国统一，但就总体而言，中原大地再没有形成坚强牢固统一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动荡混战的时期。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特殊的自我成长发展的意义，从而为敦煌历史、文化与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敦煌地区，虽也有政治统治

权的不断更替，但这种政治变革、政权更替相对来说对敦煌地区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所以，在这一大动荡的封建势力重新分化组合过程中，敦煌地区的震荡是较小的，反而促成了其间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融合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高潮。为此，准备了敦煌地区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为中西交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周王朝对北方地区的统一，为隋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隋的统一全国，又为唐王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的空前发展准备了条件。从北周时期到唐王朝前期，在原有基础和条件准备的情况下，敦煌地区较平稳地过渡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最繁荣发展的时期。唐王朝的历史，在史学界各史家而言，一般是大书特书的。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无论是其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特别是其文化艺术的发展，掀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又一个高潮，其文化艺术成就也进入了中国封建时代敦煌地区文化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唐王朝盛极一时的统治和发展，自“安史之乱”后，开始走向衰落，其后虽也出现过断续的“中兴”，但终究无法挽回其覆亡的命运。这种中心统治的危机，反映到敦煌地区自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表现。

唐王朝中后期，直至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先吐蕃后西夏先后两次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统治，进入了敦煌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次高潮。在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影响下，虽然敦煌地区一段时间里遭受了落后的“农奴制”的统治，但这一时期民族间相互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交流交往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代以后，敦煌地区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随着海路交通交流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特别是远洋航海能力的不断加

强，通过海路的贸易和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联系加强了。这种情势，特别是明代封闭嘉峪关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

20世纪之初，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遭到了空前的劫掠，对此一问题，见诸中外文字的各种论证评说很多很多。如何公正客观地评论这场空前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大浩劫，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的。作为历史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以及对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事业认识研究的客观推动方面而言，我们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一些行为是有某种客观贡献的。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拟或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强盗，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破坏、损害、劫掠是空前的，也是有罪于中国历史、文化与艺术的，同时也是有罪于世界历史、文化与艺术的。这方面留给我们国人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和惨痛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这种学者与强盗加骗子的双重性特点，正是这种双重性，一方面给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开创了认识研究的新天地、新方法、新思想，甚或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某种敬业精神、冒险精神，也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另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对民族历史、文化与艺术遗产、遗物、遗迹的保护，一定要建立在坚强的国家力量的基础之上，如若国弱民衰，还谈何保护历史、文化与艺术遗产、遗物、遗迹?!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无数历史、文化与艺术珍品珍本散落于十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有些甚至堆放于他们的地下室中，任其腐烂变质发霉，失去其昔日的永远无法找寻的光辉，这是今天敦煌学学者们所切齿痛惜的。散落于国外民间的、国内民间的，主要是国外官方、国家的敦煌历史、文化与艺术遗物不计其数。仅原苏联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德堡）就珍藏着敦煌文献12000余件，相关的极其珍贵的黑城文献9000余件。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与艺术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

史、文化与艺术重大贡献的实证资料。对此，我们相信，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事业交往交流的不断加强，随着中华民族的强盛，一定会有新的进一步的转机的。这也特别需要爱好和平、珍视友谊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它扼据玉门关、阳关，西通葱岭，东接河西走廊，地势险要，成为中国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西出阳关”在当时意味着凄怆悲凉的离别，“生还玉门”则象征着归于故里幸福重聚的欢乐。

西汉时武帝促成了中西陆路交通的畅通，是人类历史上的丰碑，为中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敦煌莫高窟的修建创造了条件。约 2 世纪前后，敦煌就开始在驰誉中原的凉州文化中初露头角，同时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为此在敦煌莫高窟创建以前，敦煌就已经成为一个封建经济与封建文化相当发达的地区。我国汉晋时期传统文化艺术，在敦煌地区早已有了极为深厚的基础，它主导着敦煌地区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佛教壁画、佛教塑像的表现形式在敦煌莫高窟的出现创造了社会生活条件。

十六国时期的战祸离乱、内煎外逼，促使人们把佛教的“众生皆苦”、“因果业报”、“轮回转世”当成了当时“人间苦海的圣光”。在敦煌莫高窟最早的洞窟遗留中，有许多反映了人们热切企盼“弥勒下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题材与形式。

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在佛教文化艺术的传播发展中，敦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莫高窟的佛教文化艺术事业也逐渐到达了自己的顶峰时期。

早在两汉三国时期，佛教文化艺术就从印度经中亚、西亚和西域进入中国。这时随政治和经济交流交往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艺术，首先在敦煌地区与中国汉晋中原文化撞击、融合，然后再逐渐进入中原地区。

信仰佛教和开窟造像是人们追求幸福平安的一种表现形式。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僧人、使者的这种宗教迷信感更为强烈，他们怀着对西部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恐惧，供养神灵佛祖，捐钱开窟造像于西去的始点敦煌，以祈求平安、祈求保佑。平民百姓则希望丰年长久，平安盛世，为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和安慰，也加入开窟造佛的行列。

为此，他们一致选择了风光秀丽，具有独特地理环境优势的敦煌鸣沙山下、宕泉河旁的清静优雅的敦煌莫高窟为他们心灵的殿堂、神灵佛祖的驻地处所。

敦煌地区是我国佛教流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但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却是因时而异。世代相传的佛教成为敦煌地区占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不仅是敦煌人民信仰的精神需要，也是周围各民族信仰的精神需要。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敦煌地方和同时期全国的封建社会一样，它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无不受到有限的较低下的封建生产力的制约。佛教只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当时的敦煌地方，但它绝非是支配一切的思想。相反是世俗的政治经济生活随时支配着佛教，不但支配着它的内容，而且支配着它的形式。

通过莫高窟的艺术形式，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那一幅幅的壁画构成了一部传统有序、跨越千年、绵延不断的古代历史画卷。它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全貌，包容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音乐、舞蹈、体育、民族、民俗以及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等极为珍贵和丰富的历史资料。

敦煌艺术，主要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三大综合艺术。在这艺术瀚海中，历经千余年，跨越十几个朝代的沧桑变迁，都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形象、变化

多样的构图、独特的艺术风格、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引起世界的瞩目。但在黑暗统治时期，它自然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遭到被帝国主义者窃掠的厄运。

莫高窟首创至今已有1630余年的历史，十六国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开凿。现有洞窟492个，现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连接起来可达25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画廊。现存彩塑2415身，历经千百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基本完好的1400余身，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宗灿烂的艺术瑰宝。

在离敦煌市区25公里处，在鸣沙山和对面三危山之间，有一条泉水河，名叫宕泉河，有了这股宕泉河的水，就有了莫高窟的存在。莫高窟就建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下。四周是荒凉的沙漠，只有这小小的一片绿洲，点缀了这荒凉的戈壁。过去的宕泉河踪迹全无，现在只剩一支细流，从石窟南方曲曲折折地流经整个莫高窟，潜入砂碛之中。有了这股泉水，构成崖上和崖下截然不同的景色。崖上是一片黄沙，荒凉满目，崖下则是绿树成荫，清泉萦回。错综在灰色崖壁上的石窟群，彩画纷披，错落有致，掩映于绿树丛中。

据说，在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名叫乐傅的和尚云游到此，这时正近黄昏，太阳快要沉落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蓦一抬头，在他眼前出现了奇景：对面的三危山一派金光耀眼，好似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和尚被这奇景眩惑了，他想：这真是一块圣地。于是他就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由于沙漠空气和洞窟墙壁极度干燥，使用的材料性能耐久，所以，莫高窟才有幸保存到现在。

莫高窟从前秦创建，以北魏为起点，一直走着上升的道路。到了唐初，已经有一千多个窟室，因此又称莫高窟为“千佛洞”。

一千多年的历史积累，形成了莫高窟艺术的丰富和复杂。只要我们一走进这艺术殿堂，就会被这四壁辉煌、神采飞扬的艺术作品

所迷住。

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自公元 366 年乐僔“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①，至北魏晚期的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和北周时期的建平公于义又继续提倡建窟造像，此后又历经隋、唐、宋、西夏而迄元代的继续修建，最盛时“计窟室一千余龛”②，保存到今天的尚有 492 窟。在敦煌东南约 25 公里处，鸣沙山崖壁上，宕泉河畔，许多洞窟经历不同时代一再重修，面目已绝非当昔；加之长时期以来的倾圮、毁损，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很难寻觅。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处，沙门乐僔开窟一龛处，已无从查考，或许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丰彩依旧，她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历时千余年，风格多样，千姿百态，反映中西交通交流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丰厚历史画卷，是人类文明史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敦煌莫高窟从十六国时期创建，经过约 11 个朝代的持续营造，陆续出现了以大乘佛教不同时期、不同宗派所崇尚的经典为根据的壁画和彩塑。仅她现存的 492 个石窟的内容，就涉及了佛藏中的经、律、论、史四大部分的绝大部分内容，由此她构成了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与佛教图像宝窟。她的题材和内容，除经籍之外，有些见诸于画史和古代笔记，更多的则不见于著录，又缺题记，由此就更加显得珍贵。这部巨大的阙文宝典，经过众多的敦煌学学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讨，已经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

亚欧历史，中国历史，中西交通交流的历史，河西与敦煌的历史，在敦煌莫高窟留下了十分清晰和深刻的烙印。可以说，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是历史的产物，她的形式与内容脉络分明地反映着

---

① 武周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
② 同上。

各个地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面貌，为我们探究人类历史的脚步提供了丰富、生动、形象的历史资料。

党项族西夏政权、蒙古族元王朝及明清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走进了她晚期的后半期。这一时期，莫高窟作为佛教圣地和佛教艺术圣地而言，已失去了往昔那种光辉与地位。作为莫高窟艺术创造和艺术发展的历史，到元代已经可以算是结束，明代是一段空白的时期，清代虽然翻修过一些洞窟，但只限于塑像。在中国西北地区腹地敦煌莫高窟，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开始，中经蒸蒸日上的发展，最终走向了自己惨淡的艺术创造的结尾。但她使我们从其色彩、线条和造型中，回顾遥远的过去，去体验那些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在莫高窟艺术力量的感染下，重返激动和震撼人心的时代。

敦煌石窟，包括今甘肃省敦煌市境内以敦煌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的西千佛洞，今安西县境内的榆林窟，东千佛洞，小千佛洞，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五个庙、一个庙等石窟。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这些石窟都在敦煌郡置范围内，其内容和艺术同属一脉，我们总称之为敦煌石窟。为此，本书中的敦煌艺术内容部分，仅以敦煌莫高窟艺术内容出现。

敦煌石窟艺术是敦煌艺术的一部分，是敦煌学研究的，由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艺术。敦煌艺术主要是指敦煌石窟艺术，还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绢画、麻布画、纸画、写本以及敦煌地区的其它文物艺术品，如古墓壁画、画像砖、汉简书法等。又此，本书中的敦煌艺术内容又仅以敦煌石窟艺术中的敦煌莫高窟建筑、雕塑、壁画艺术为主体出现。

目　　录

上编　敦煌历史

第一章　石器时代及汉以前的敦煌地区…………………………（3）
第一节　旧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3）
第二节　新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5）
第三节　敦煌地区及其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原有历史的发展和“三苗”迁敦煌的范围及其影响……………（7）
一、火烧沟文化及“三苗”迁敦煌及附近地区　……………（7）
二、夏、商、周时期　……………………………………………（9）
第四节　古文献记载中的敦煌及相关地区　………………（11）
第五节　古今学者对敦煌与“三危”的各种注释与考证　…（12）
第六节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的敦煌及其相关地区………（15）
第二章　西汉、东汉时期　敦煌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建立和发展　……………………………………（19）
第一节　西汉初年敦煌地区的历史形势　…………………（19）
第二节　汉武帝时期对敦煌地区统治权的确立和巩固　…（22）
一、汉武帝初定河西及敦煌地区……………………………（22）
二、汉武帝时期对敦煌地区的初步经营……………………（24）
西汉敦煌郡示意图…………………………………………（25）
敦煌玉门关长城分布示意图………………………………（28）
第三节　西汉王朝对敦煌地区的经营　……………………（31）
第四节　西汉时期通过敦煌地区的中西交通交流　………（36）

一、敦煌地区与匈奴及西域的初期关系……………………(36)
二、张骞出使西域……………………………………………(39)
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中西交通交流……………………(42)
第五节　东汉时期敦煌地区的基本历史状况 ……………(45)
一、东汉初期敦煌地区的形势………………………………(45)
二、东汉敦煌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时期………………………(48)
第六节　东汉时期通过敦煌地区中西交通交流
的进一步发展 ……………………………………(50)
一、班超在西域的活动………………………………………(50)
班超通西域示意图…………………………………………(52)
二、东汉通过敦煌的中西关系………………………………(54)
第三章　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　敦煌地区
的民族分割和民族融合 ………………………………(57)
第一节　魏晋十六国南北时期敦煌地区民族
分割和民族融合的基本概况 ………………………(57)
第二节　曹魏时期对敦煌地区的松散统治 ………………(61)
第三节　西晋时期对敦煌地区的短暂统治 ………………(63)
第四节　十六国时期敦煌地区的基本形势 ………………(65)
一、前凉时期的敦煌地区……………………………………(65)
二、前秦时期的敦煌地区……………………………………(68)
三、后凉时期的敦煌地区……………………………………(69)
四、西凉时期的敦煌地区……………………………………(71)
五、北凉时期的敦煌地区……………………………………(74)
东晋十六国五凉兴亡表……………………………………(77)
第五节　北魏时期的敦煌地区 ……………………………(78)
第六节　西魏北周时期敦煌地区历史状况 ………………(81)
第四章　隋、唐时期　敦煌地区走向自己封建时代
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85)

第一节　隋代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 …………………………（85）
丝绸之路示意图 ………………………………………（88）
第二节　唐初期敦煌地区形势及建置 ……………………（90）
第三节　唐前期敦煌地区与西域等的关系 ………………（94）
第四节　唐代敦煌地区经济的发展 ………………………（99）
盛唐时期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示意图……………（101）
第五节　唐代敦煌地区的商业发展与交流……………（104）
盛唐时期敦煌西部地区示意图…………………（106）
第六节　吐蕃对敦煌地区的统治…………………………（108）
第七节　张议潮领导的起义及张氏家族对敦煌
地区的统治………………………………………（113）
归义军时期敦煌西部地区示意图………………（116）
第八节　西汉金山国与甘州回鹘…………………………（118）
第五章　五代、西夏、宋元时期　敦煌地区发展的延续
和开始走向衰落…………………………………………（125）
第一节　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曹氏政权…………………（125）
曹氏归义军时期（五代）敦煌及其
附近地区示意图……………………………………（128）
第二节　党项族西夏统治敦煌地区时期…………………（132）
第三节　蒙古族元代时期的敦煌地区……………………（137）
第六章　明、清、民国时期　敦煌地区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与进一步衰落………………………………………………（143）
第一节　明王朝时期的敦煌地区…………………………（143）
第二节　清王朝时期的敦煌地区…………………………（149）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敦煌地区……………………………（157）
敦煌地区建置沿革表…………………………………………（163）

下编　敦煌文化艺术

第七章　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敦煌文化艺术……………………（169）
第一节　敦煌地区的石刻若画……………………………（169）
第二节　汉代的诗词歌赋…………………………………（170）
第三节　侯瑾的辞赋　张芝的书法………………………（174）
第四节　氾胜之的农学……………………………………（176）
第五节　秦汉时期文化的传播……………………………（177）
第六节　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初传……………（180）
一、佛教的产生和发展……………………………………（180）
二、佛教在中国的初传……………………………………（181）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文化艺术……………………（185）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文化概况…………………（185）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史地、天文、数学………（186）
一、西晋索靖的书法艺术…………………………………（186）
二、史地、天文和数学……………………………………（188）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190）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193）
第五节　敦煌莫高窟的早期石窟艺术（北凉、西凉、北魏、西魏、北周时期）…………………………………（197）
一、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艺术概况………………………（197）
二、敦煌莫高窟早期建筑艺术……………………………（199）
三、敦煌莫高窟早期彩塑艺术……………………………（201）
四、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艺术……………………………（203）
第九章　隋唐时期敦煌文化艺术……………………………（217）
第一节　隋朝时的敦煌文化………………………………（217）
一、佛教兴盛………………………………………………（217）
二、裴矩的《西域图记》…………………………………（218）

第二节　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艺术……………………（219）
一、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艺术概况 ……………………（219）
二、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建筑艺术 ……………………（221）
三、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彩塑艺术 ……………………（222）
四、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壁画艺术 ……………………（224）
第三节　唐朝时的敦煌文化……………………………（232）
一、书法艺术 ……………………………………………（232）
二、民间文学和诗词 ……………………………………（232）
三、唐代《敦煌廿咏》……………………………………（235）
四、音乐舞蹈 ……………………………………………（240）
五、吐蕃时期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241）
第四节　唐代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242）
一、唐代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概述 ……………………（242）
二、唐代敦煌莫高窟建筑艺术 …………………………（245）
三、唐代敦煌莫高窟彩塑艺术 …………………………（248）
四、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 …………………………（253）
第十章　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时期的敦煌文化与艺术……………………………（265）
第一节　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 ………………（265）
一、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概述…………………（265）
二、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建筑、彩塑艺术 …………（266）
三、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267）
第二节　党项族西夏时的敦煌文化……………………（274）
第三节　蒙元时期的敦煌文化…………………………（276）
第四节　西夏、蒙元时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 …………（278）
一、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概述………………（278）
二、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建筑艺术………………（279）
三、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彩塑、壁画艺术 ………（280）

第五节　敦煌飞天……………………………………………（284）
第六节　清代敦煌文化教育事业……………………………（287）
第七节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及文化艺术
　　　　的劫掠与破坏………………………………………（288）
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288）
二、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的劫掠与破坏 …………………（290）
敦煌莫高窟分期表…………………………………………（292）
敦煌莫高窟彩塑造像表……………………………………（298）
世界各国现存藏敦煌文献、文物统计表 …………………（299）
我国各省地市收藏敦煌文献、文物情况统计表 …………（302）
敦煌历史、文化艺术大事年表 ……………………………（303）
后　记………………………………………………………（329）

上编

敦煌历史

第一章　石器时代及汉以前的敦煌地区

第一节　旧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1922 年—1932 年，杨钟健和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陕西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采集到许多零星石器。这些石器从打制方法上看，大部分都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也都产生在黄土层的底部砾石层中。当时考古工作者认为，在这一地区很有希望找到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

193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在河西走廊西北端的酒泉北部明水地方（马鬃山麓，现为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

20 世纪 80 年代在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同时，从酒泉银达乡上沟村沿北大河岸，发现了象牙化石，从北河滩上采集到了牛角化石，从屯升乡沙山村北草沟井滩，寻觅到了珊瑚虫群体化石等古脊椎动物和古生物化石。这和 20 世纪 50 年代从嘉峪关、酒泉附近文殊山口外戈壁中的发现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及以远时期，在百万年至几万年前，河西走廊地区西北部，包括敦煌在内，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林

草植被是适合古脊椎动物和古生物生息繁衍的，其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有大象、珊瑚赖以生存的绝好条件。同时，也说明在人类的童年阶段，与“北京人”、“丁村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处于相同和相近纬度的河西走廊的西北部地区，这块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的、土沃水美林草丰茂的地域，已经有人类的活动。此后，随着气候的变化，自然生态条件的变化，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向东南迁移，随同仰韶文化的居民成为现代华北人的祖先。①

1978 年—1984 年，在对酒泉北 10 公里处的边湾遗存的调查中，在原始沉积层中发现野牛、野马、野骆驼、鹿等古脊椎动物牙齿、脊椎骨、腿骨、肋骨化石等 300 余件。这进一步证明，距今约 60 万年至 2 万年时代，河西走廊西北端，是古脊椎动物活动和栖息之地。

敦煌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在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里，与河西走廊西北部其它地区一样，甚或更加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甚至早期，人类原始群落就活动于这一地区，他们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注：

根据裴文中先生《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中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应为 60 万年前—2.5 万年前为“旧石器时代”，2.5 万年前—5000 年前为“新石器及中石器时代”。

---

①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

第二节　新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公元前 5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在中原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已经影响到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在西北各省各地都有发现，仰韶文化的陶器显示其文化直达甘肃洮河流域及内蒙古南端。

同时，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宁夏、内蒙古的有些地方也分布着不少细石器文化的遗址。其特征是陶器较少，而且制陶技术较差，陶器上常压有篦纹。石器是以用燧石、玛瑙等坚硬石料打制成的细小、精制的刮削器、刀、钻和矢镞为主。磨制石器较少。骨制工具有鱼叉、鱼钩等。出土的兽骨、鱼骨较多。显然，渔猎和牧畜在西北原始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它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 28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相毗邻的湖北、江苏、辽宁、甘肃等省区。也有很多与龙山文化相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存，特别是"玉门骟善马文化"、"平凉安国文化"，其对比的主要资料，陶器的形制、制作方法和纹饰布局与组成花纹图案的基本字母体等许多方面，都有一脉相承和继往开来、递次演变发展的线索，是具有人类文明初创时期的共性的。

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地分布着一种特殊性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石器中包含着许多打制精巧而细小的细石器，因此定名为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遍布在长城以北，在东北、内蒙古、甘肃和新疆一带都有发现。考古工作者认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地的遗址，都属于"牧畜、狩猎型"的细石器文化，因缺乏农业生产工具，当时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的。同时，在各地遗址中的细石器文化特征，出土的少量彩陶片，又说明其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是相关的或是相互影响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仰韶文化西端达到了甘肃境内渭河上游、洮河流域，甚至于个别的还远到青海民和县。其上层文化遗存还有龙山文化覆盖或交错。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掘、研究、发表了有关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黄河上游，特别是河西走廊地区的有关考古资料，使我们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过渡的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敦煌地区，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和明确地认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中后期生活着的，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而又独具地方特色的，具有发达的远古文化的居民及其当时的历史状况。

约从公元前2万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5000年至2000年左右，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人们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禾农业和畜牧业，磨制石器广泛使用，发明了陶器，氏族公社代替了原始群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是其代表。

在甘肃还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及大量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属于原始社会中、晚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所对甘肃西部及青海湟水流域的科学发掘，取得了大量资料，从而对甘肃远古文化发展的先后排列顺序、各类文化发展分期、社会性质等，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从而使我们对甘肃河西走廊西北端及相关地区远古文化中的“仰韶文化”、“甘肃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较明晰的认识。

1956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酒泉果园乡高闸沟村南侧的北大河崖壁，发现了距今3700年前后人类居住过的遗址。同年，下河清农场也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后人类活动居住的遗址。1972年—1987年文物普查过程中，各地又发现了距今4000年—5000年前后人类聚落遗址。1984年，酒泉边湾出土大量新石器晚期夹砂红陶片、陶纺轮、松绿石珠、骨珠、骨贝、石刀、石坠、石刮器等，还有两

处灰坑，内堆积灰炭、兽骨等。1963 年敦煌市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南湖古董滩以北地带采集到属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各一件。1968 年又在该地发现石刀一件。1975 年，敦煌杨家桥又出土石器一件，表面磨制十分精细，为骨器加工器。1979 年在古玉门关的马圈湾烽燧遗址中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红褐色平底夹砂陶罐和陶钵各一件。

大量的文化遗存、遗物的发现、发掘充分证明，中国河西走廊地区西北端，包括敦煌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大量的人类分布和定居，是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人类生息繁衍的必然结果。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期，人类使用了经过磨制的有各种形状和用途的生产工具；已经开始了陶器的烧制；开始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了原始的纺织、冶金等。这些散布于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存、遗物，说明其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虽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完全是同属于一个共同的体系的。

第三节　敦煌地区及其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原有历史的发展和“三苗”迁敦煌的范围及其影响

一、火烧沟文化及“三苗”迁敦煌及附近地区

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玉门清泉火烧沟发现了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石器、铜器和金银器。铜器种类有斧、镢、镰、凿、刀、匕首、矛、镞、锥、针、剑、管、锤、镜等，农具、手工工具、武器、装饰物、仪仗器等一应俱全。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冶铜技术及对各种矿产的开采、冶炼和制造及使用的较高水平。遗址中有早、中、晚期发展的地层关系，表明其经历了长时期的不断发

展过程，是其原有文化的进一步向前推进。

火烧沟文化已经证明，当时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铜质农具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必然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粮食已有积蓄并开始用于酿酒。畜牧业生产极其繁荣，墓葬中普遍殉葬羊、猪、牛、狗、马等家畜。大墓中以人殉葬的出现及殉葬羊头等物品数量的悬殊差别，则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引起的贫富差距及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出现。

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普遍出现了松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说明其时与外地的交换频繁，有了原始的商品交换，出现了财富积聚，货币职能已有一定的反映。当时文字已经出现，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的山丹、民乐、酒泉、玉门、敦煌、安西等地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

同时，火烧沟文化遗存也表明在公元前 3500 年前至公元前 1600 年左右，河西走廊西北端，包括敦煌地区在内有着可与中原之华夏文化相媲美的发达的原始文化。

当时的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十分繁荣，中原华夏人民与其有着较频繁和广泛的交往。虽然阶级及阶级关系已经产生，但借其发达的社会分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人们安居乐业，生活较富足。这一时期构成了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最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

公元前 2200 年前后，即我们所熟知的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开始不断和南方地区的三苗文化发生接触和碰撞。“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① 这样，中原部族首领就根据舜的建议把三苗族强迁到了“三危”。当时“三危”，不仅仅局限于今天的敦煌三危山，而是一个范围极其广大的地域，主要是河西走廊西部、北部，青海

① 《史记·五帝本纪》。

省北部及新疆东部地区。

其后，三苗族和当地原有的民族逐渐融合，因地而异分别被称作：西戎、畎戎、氐、羌、犬戎等。史载：距今约4100—3600年的夏朝时，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是“畎戎”民族生活游牧的处所；距今约3600—3000年的商朝时期，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是氐、羌民族的居住游牧地。《诗经·商颂》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指明当时这一地区的氐羌族都向商王朝进贡和祭祀商王的祖先。在距今约3000—2500年的周朝时期，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是被称为“犬戎”族的居住游牧地，传说西周穆王发兵征伐过这里的犬戎族。这期间，中原和“三危”各民族之间有着旷日持久的频繁的大规模的交往交流，也有间或的争斗与战争。

《后汉书》说：“大禹治水周行寓内，东造绝域，西延积石，南逾赤岸，北过寒谷，迥昆仑，察六扈，脉地理，铭金石，泻流沙于西隅，决弱水于北汉(北汉似指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这里所指认为，大禹治水时，曾疏黑水，决弱水，至归于居延海，并开镇夷石硖。这里的流沙，“在敦煌(沙州)西八十里”，镇夷石硖，在“弱水经行至流沙之处”，黑水据《水经》载：源出张掖至鸡山，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南海；《文献通考》也载：沙州，又黑水所经焉。当时敦煌及周围地区是属古雍州地，九州洪水滔滔，此地亦有此情。

二、夏、商、周时期

夏、商时期，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羌戎和以远时代所迁来的“三苗”族融合为一，在共同的劳作和共同的对夏、商王朝的斗争中，进一步推动了原有耕牧养殖事业的发展。但因其地处“西地”、“西极”，故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不便，其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强大的原始军事力量和较为落后的社会生产生活是其显著的特点。

在商的四周分布着许多小国，商称其为方或邦方。在商西北方向的有土方、舌方、鬼方、羌方，是较为强大的方国，和商处于敌对

地位，成为商的劲敌。

从公元前 11 世纪末到公元前 8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从这时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出现了封建领主制国家。

周自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时，西北诸游牧部落被称为戎狄。《易经》中载武丁伐鬼方，周人也参加了，并因战功得到商的赏赐。

古公亶父死后，子季历立，周人逐渐强盛，先后打败了“西落鬼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①，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

文王时，首先发动了讨伐西北方面犬戎的战争。周武王即文王位后四年，即公元前 1027 年，发动了伐商战争，并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武王死后，经过周公东征，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开始注意西北边疆的防务问题。

当时，分布在周的北面和西北方面的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猃狁。《小盂鼎》铭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鬼方 13000 多人，酋长 3 人，还俘获车、马和很多牛羊。

《国语·周语》说，穆王时，“犬戎氏以其职来王”。穆王并强徙一部分犬戎于太原（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其犬戎可能就是猃狁。

穆王以后，猃狁日益强盛，成为周的严重威胁。《后汉书·西羌传》说：“夷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

宣王时，曾多次和猃狁发生战争，但最终没有打退猃狁和其他西北游牧部落的进攻。《竹书纪年》载宣王命秦仲伐西戎，秦仲败死。

到懿王时，周王朝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其民族矛盾也加剧

---

① 《竹书纪年》。

了。西北诸游牧部落日益加强对周的攻势，甚至开始向渭水中下游推进。厉王时，特别注重了对西北边境的防御，但收效甚微，西北诸游牧部落的侵袭更加严重，致使当时的诗人发出“百蹙国百里”的感叹。

第四节　古文献记载中的敦煌及相关地区

敦煌及河西走廊西部、北部地区，有着悠久灿烂的远古文明，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可以使我们对敦煌及河西走廊西部、北部地区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神农纪》：“炎帝之世，其地南至交趾，北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化。”指出当时唐虞疆域“西至三危”，“三危”据《括地志》：山有三峰，如危欲坠，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路史》载：“今戎虏瓜、沙等州是其处。山有三峰，俗亦曰升雨山，在敦煌南三十里。”

《黄帝纪》：“帝为天子，其土地东至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逐獯鬻，合符于釜山。”《史记》：“黄帝披山通道，西至崆峒。”崆峒在肃州（今酒泉）城东南六十里，旧属禄福县。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流沙），莫不听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传说中的高阳氏时代，其地“北至幽陵，南至于高趾，西至流沙”。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述《尚书·禹贡》指出：“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认为河西走廊西端及敦煌地区是属古雍州地的。古籍《竹书纪年》有：“周穆王五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三危”（流沙）概指敦煌至居延的广大范围。

《尧舜纪》：“西至析支、渠搜、氐羌”。《舜典》：“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按《尚书》：“析支又名赐支”。《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舜徙三危，在河关西南，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盖西边自三苗之裔及他种不一。而北边则自唐虞以上，已有獯鬻、猃狁、山戎”。

《禹贡篇》：“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古文献的一些记载虽有一定的矛盾，大概是由于当时对事物地理环境的认识和认识方法的不足，但总括而言，反映出了当时中原文明和西北文明的紧密联系，反映出了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反映了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源远流长于华夏一统的历史、文化及文明过程。同时，我们也可知，当时的敦煌（三危）其范围应当是极其广阔的。其广至于何处，现代敦煌学及地理学者均有考证论述，窃认为，就历史考古的现有资料及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言，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及晚期的“三危”，应当西包括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域）东部地区；南抄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及四川西北部地区；东达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西北部、兰州（陇右）地区、河西走廊大部；北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地区。是为“大三危”、“大敦煌”之意。

第五节　古今学者对敦煌与“三危”的各种注释与考证

关于《尚书·舜典》追记的“三危”，究竟在今天的哪里，自古及今众说不一，现有考古资料尚不能回答这一问题。现把古今学者对此进行的大量注释和考证录于其后，以备鉴别和参考。

一、西晋杜预认为：“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

州，今敦煌。”[①] 北魏郦道元又记载：“三危山在敦煌县南”[②]。唐代李泰认为：“三危山在沙州（敦煌）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③]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太平寰宇记·沙州·敦煌县》认为：“禹贡雍州之城，亦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黑水所经。书所谓舜窜三苗于三危，三苗既宅，即此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以上观点自古及今持有者甚众，皆认为“三危”为今甘肃省敦煌市东南的三危山。现代敦煌学学者大都认为《尚书》记载的“三危”就是今天敦煌市的三危山。

窦景椿先生在《古称三危与黑水之辨解》（见《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中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大三危”、“大敦煌”的观点，他认为：“古称三危，盖自敦煌三危山为起点，以迄于青海、西藏之间，山脉交错，峰峰相连，同属三危地，自无疑义。惟何以如此称谓？论者认为远在唐虞时代，这个辽阔的边陲地区，罕有人迹，其时青海、西藏尚未开发，无分畛域……乃以知名较早的三危山之名概括其地，故有斯称，理或然欤？兹阅《历代疆域表》，郑氏注曰：‘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由此可知史称三危，当系涵益广大的领域而言……非局限于敦煌之一隅也。”具此《敦煌简史》张仲先生认为：“史称‘三危’，是指三危地而言，它是以三危山而得名的一个广义的地名，应包括今新疆罗布泊以东、甘肃疏勒河以西的广大地域，不能局限于以后所称州、郡的区划范围”。

李聚宝先生在《“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见《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中，根据现代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资料考据论证了：尧、舜时代的三苗文化和齐家文化都与中原龙山文化有

① 《左传》昭公九年注。
② 《水经注》。
③ 《括地志》。

密切关系，有一定齐家文化因素的火烧沟文化是江淮一带的三苗文化居民来到河西走廊西部以后，受当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西北固有戎羌部落影响，而独立发展起来的一支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并力主“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就是今天敦煌市的三危山。

二、东汉马融的《尚书注》、《汉书·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等史籍，认为“三危”为西裔或西裔之山，但确切所指为何山何地却无终究。

三、清王朝康熙皇帝则认为，“三危”为康、藏、卫三地，即今西藏中部和东部以及四川西部地区。以后盛绳祖的《卫藏识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四、樊绰的《蛮书》、蒋廷锡的《尚书地理今释》和《尚书正义》等著作中，认为“三危”在今云南省境内。

五、《汉书》、《后汉书》、《尚书正义》、《尚书注》、《太平御览》等书中，又认为“三危”在甘肃和青海境内，但没有确定其具体的地理范围。

六、毕沅的《山海经注》认为，“三危”应在今四川省境内。

七、金履祥《尚书注》给“三危”一个更加无法确定的解释，认为“山有三峰者就是三危”。

八、马少侨先生《“窜三苗于三危”新解》一文认为，“三危”在“洞庭、彭蠡之间的山地”。

九、安应民先生在《“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考》一文中认为，“三危”在青海省东南部，并包括甘肃省西南部及四川西北部交界的西倾山、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巴颜喀喇山三山所在地区，以及三山周围的一些地区。

十、新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注解“三危”在今甘肃省陇西县西北部地区。

另还有所指“三危”在今甘肃天水、渭源和临潭地界者。

第六节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的敦煌及其相关地区

公元前770年，申侯与缯侯引西北犬戎入攻西周，杀死幽王，西周灭亡了。周平王无奈而迁都洛邑。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

据《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乌孙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我们可知，当时春秋战国前一段时间至春秋战国末至秦汉匈奴占河西以前，敦煌及河西走廊西北端是乌孙和月氏的居住游牧地。先后是乌孙族和月氏族活动于这一带，后来，月氏把乌孙逼迫西迁到今新疆地区，独占了敦煌及河西走廊。其时，羌、戎（乌孙）都是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的原有居民（三苗人、西戎人、西羌人）。当时以其位置而言被称作"雍州西境"、"西部"、"西方"、"河西"、"西裔"或"金方"，有时也以"合黎、弱水以西，三危、流沙以东"等来指谓我国当时广袤的西部地区。乌孙原居牧于张掖以西包括敦煌在内的靠近祁连山一带地区，而月氏则居牧于张掖以东的河西地区。后月氏在秦时进入奴隶社会阶段，成为一个势力较强大的边地民族，并开始扰掠其邻近的乌孙人，并杀了乌孙的首领难兜靡，迫使乌孙人北迁西避东走。敦煌及河西走廊西端各地，第一次开始了它的不安宁的历史时期。

春秋初期，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国扼住，无法向东迈进，只能致力于征服邻近的戎人，史称："自陇以西"，"西戎八国服于秦"。春秋末期，秦的国土已包括今甘肃的大多数地区。今甘肃境内的姜戎、陆浑之戎，后来被迁徙到今河南中部。稍后，从史籍中可知，秦国当时已经控制了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为此有许多如"夷吾献其河西地""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

不还"① 等记载。

《史记》认为，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75 年)是中国历史的战国时期的开端。春秋时的一百多国至此约有十几国。其时，有许多少数民族分布于北部、西北部，如林胡、楼烦、东胡和义渠。

战国时期，秦经过公元前 356 年的商鞅变法和公元前 350 年的迁都咸阳，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新型的地主封建阶级政权，国家开始强盛。秦惠王时，不断攻打义渠之戎，向西北扩大自己的领土。

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结束了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其疆域的西北已至甘青高原。

秦始皇派蒙恬率领秦军 30 万抗击分布在蒙古高原，常向南方侵犯的匈奴人。并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 年)"收河套以南地，以为三十四县，因河为塞"②。秦朝军民还连接修复了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筑起了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的万里长城，用来保护北方和西北方农业区域，免遭游牧匈奴人的侵袭。同时，又迁徙民众几万家于河套，积极地开垦边地，加强边防。

匈奴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兴起于河套阴山一带(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商朝叫鬼方、昆夷，西周时称猃狁，春秋为狄，战国时叫胡、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主要生活方式为游牧，"随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国无定界，时大时小，以强悍和骑射著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自始祖淳维括地北边起算，至头曼单于时已历千年有余。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匈奴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活跃在北方地区，并同中原互通关市，进行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

---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均作四十四县。

公元前209年，冒顿继任单于后，东征东胡，西败月氏，北灭丁零、屈射等部，南吞楼烦、白羊部落，领地空前扩大，逐渐控制了蒙古高原、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地区，包括当时的敦煌。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修筑长城，加强边疆防卫的同时，“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①]。这里的“胡”就是匈奴。秦始皇还采取移民垦田、开拓边疆等措施，有力地制止了匈奴的抢掠。但随着匈奴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的不断强盛，随着秦王朝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不断发展，匈奴贵族不断地扩地掠边，不断地把自己的势力向秦统治的中心推移。

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秦始皇，十分重视对边地的统治，曾于公元前220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②]。同时，我们从史籍中知道，蒙恬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曾“西北斥匈奴”[③]，从而最终奠定了“秦地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④]等地。这自然是秦王朝政治军事力量最为强盛时期的状况，其间在河西走廊地区一直没有间断和匈奴贵族的争夺战争。随着秦王朝的衰落，最终这一地区还是被匈奴控制了。

羌族在殷末曾有一支，在周族的统领之下，进入中原，以后继续东徙，是为诸戎。以后，于战国末年，在秦的率领下，进入中原，建立了秦王朝。这支羌族只是诸羌中的一支，其大部分族类，则仍然分布于甘肃、青海一带，分化为许多氏族。这些氏族，直至周、秦之际，还是以畜牧业为生，处于历史上的氏族社会阶段。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十二世后，相与为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前汉书·地理志》。

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者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从后来甘肃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特别是敦煌以西至罗布泊的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遗迹，关于传说中认为自黄帝下迄尧舜禹皆与西王母有往还献替之事，而传说中的西王母之邦，在昆仑之丘，流沙之濒，似有可证之机。同时，传说中黄帝时代，西羌民族已徙入敦煌以西至塔里木盆地也似为史实。随着历史的演进，在春秋时代，确有西羌之虞氏一支，已经西徙于阗（新疆于田）一带，文献中称之为西虞，又称之为禺氏。而河西走廊一带的诸羌，在战国末，也已分化为无数的氏族。到秦代，羌族占领着中国西北广大的地域，其中月氏一族，崛起于水草丰美的敦煌祁连间，最为强大。

第二章　西汉、东汉时期　敦煌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西汉初年敦煌地区的历史形势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公元前206年，建立了以刘邦为首的西汉政权。我国历史上的汉王朝，自刘邦称帝起到公元8年王莽代汉止，史称西汉或前汉。

西汉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到汉武帝刘彻时，经过了60多年的修养生息，社会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为以后西汉的政治、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也为敦煌地区最终成为汉的重要边地前哨做了准备。

汉初以来，匈奴族的领袖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①。

① 《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以至于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其右部居于西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分领。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领一定的战骑和分地。其时，匈奴在军事力量上的实力推动了它的进一步扩张欲望。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但在某些地方也建有一些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此时的匈奴社会从总体看已处于奴隶制阶段。

汉文帝以前，敦煌、祁连一带居住着月氏等少数民族，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 176 年)，匈奴冒顿单于派遣右贤王进兵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大获全胜，迫使月氏人大部分向西迁到车师(姑师)以西的伊犁河流域，并征服了那里的原居牧族塞种人，居牧了下来，史称“大月氏”。还有一小部分无法西迁的月氏族人，仍留在“敦煌、祁连间”，史称“小月氏”，最终融合于当地各民族中。

匈奴赶走月氏后，令其乌孙族人驻守河西各地。乌孙部落首领昆莫不甘屈服于匈奴，开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秣马厉兵，训练士兵，发展自己的武装之士有数万人。

公元前 126 年前后，昆莫为报月氏人杀父之仇，向匈奴老上单于请求联合进攻月氏。于是，匈奴和乌孙联合发动了对月氏的突然袭击，结果月氏战败，被迫跋涉数千里远徙到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定居。原来月氏人驻收的伊犁河流域遂被乌孙占据。以后，乌孙又逐渐脱离了匈奴的羁绊，最终建立了乌孙国。至此，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敦煌及附近地区成了匈奴的领地，分别为休屠王、昆邪王统领、驻牧于其间。这期间，敦煌是作为战争与迁徙地的，在不断的战争和迁徙过程中，一方面是各民族间较为频繁的战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暂短的战争之隙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开始。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时，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高祖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史称“白登之围”。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劫人畜，抢掠财物。

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奉遣之”，并于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①] 汉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西汉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刚建立不久的统治地位时采取“和亲”与“开关市”的做法，有利于稳定自己边疆地区的安定，也使边疆各地暂时避免了战争的破坏。当然，当时强大的匈奴贵族势力，还是不断地劫掠侵扰西汉境地的，但毕竟减少了相互摩擦，为西汉政府组织内地“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争取了时间，为以后击败匈奴，建立以后以敦煌为基地的中西大通道——丝绸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汉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显然，西汉王朝当时的势力是远离敦煌这样的边远地带的，而敦煌在这一时期，也有了一个暂时的相对和平与安定的时期。虽然当时敦煌为匈奴贵族的势力范围，但从秦王朝时延续下来的和中原地区相互联系的遗风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特别是当时居于其间的许多民族，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民族发展经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生产特点，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相互之间的融合步伐加速了。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南下，游骑逼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迁徙塞下，屯田筑城，加

---

① 《汉书·娄敬传》。

强边防。同时，在匈奴对西北边疆的严重威胁面前，晁错还倡导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鼓励对西北边疆的开垦和建设。此时西汉王朝虽无力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大规模的还击，可是所采取的移民戍边、屯田的政策，已经是一种较为积极的向匈奴边地和境内推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大量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思想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北、向西北行进。

第二节　汉武帝时期对敦煌地区统治权的确立和巩固

一、汉武帝初定河西及敦煌地区

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刘彻继位。刘彻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封建王朝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①，并开始了巩固边疆，拓展疆域，反击匈奴势力的前期准备工作。为了阻止和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合，以断“匈奴右臂”，刘彻决定遣使通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势力。他公开召募选择了当时在汉宫中担任护卫侍从的张骞出使西域。张骞，陕西城固人，为人正直，有勇有谋，又对匈奴和西域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应召的西行“勇士”还有 99 人，其中有匈奴人甘父，甘父勇敢善射，耿直诚笃，成为张骞西行的得力助手。

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武帝命马邑人聂翁壹出塞，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以汉军 30 余万埋伏近旁，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单于引骑 10 万入塞，发觉汉的诱兵计划，中途退归。从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边郡，汉军也屡次发动反击和进攻。此时西汉政

① 《前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

权全面反击匈奴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汉武帝刘彻的主要进攻目标是汉王朝北部的匈奴势力，因为解决了北部边疆的匈奴侵扰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匈奴对汉王朝的直接威胁，其它地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置朔方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王朝募民 10 万口徙于朔方。这时，匈奴对西汉王朝的直接威胁基本解除，汉武帝一方面全力经营已取得的北方各地，发展生产，巩固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在更大范围内取得对匈奴战争的全面胜利。他已筹划了待张骞回归后，联络大月氏对匈奴进行全面进攻，扩地西北各地的战略。

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张骞一行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走过许多曲折险恶的路途，回到了中原，出发时使团有 100 人，此时只有他和甘父两人了。张骞这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络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但他较详尽地了解了西域广大地区的各方面情况，也了解掌握了匈奴的许多情况。汉武帝听了张骞甘父的汇报后，更加强化了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思想，急于和西域各国交往，下定了开辟河西走廊这条中西交通要道的决心。随后，西汉王朝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汉武帝选中了年仅 20 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及骑兵万余人，做好了西进河西的准备工作。

当时，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汉军也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去完成自己多年来的梦想。

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围歼匈奴。

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

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因其固俗称为五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72万余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西汉王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以后，匈奴民族接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开始融于汉族了。

河西走廊水草肥美，匈奴失河西，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① 这时的敦煌，对西汉王朝来说，已经成为其沟通西域各地的最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同时敦煌也成为汉王朝进一步扩展自己势力的军事基地，其地位显得日益重要起来。

二、汉武帝时期对敦煌地区的初步经营

1.巩固统治，发展生产

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时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汉王朝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有效地经营西域，在占有河西走廊地区的当年（公元前121年），先设置了酒泉郡，随后又根据移民屯垦实边的具体经营条件，相继"分置武威、张掖、敦煌郡"，是为河西四郡。在设置酒泉郡的同时，又建阳关和玉门关两关，作为通西域的两个军事关隘和汉界门户，故史称"列四郡，据两关焉"。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带领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人，分别从定康、代郡出发，向漠北穷追匈奴。卫青在漠北击败单于，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走。霍去病军出塞2000余里，与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战获胜，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

① 《史记·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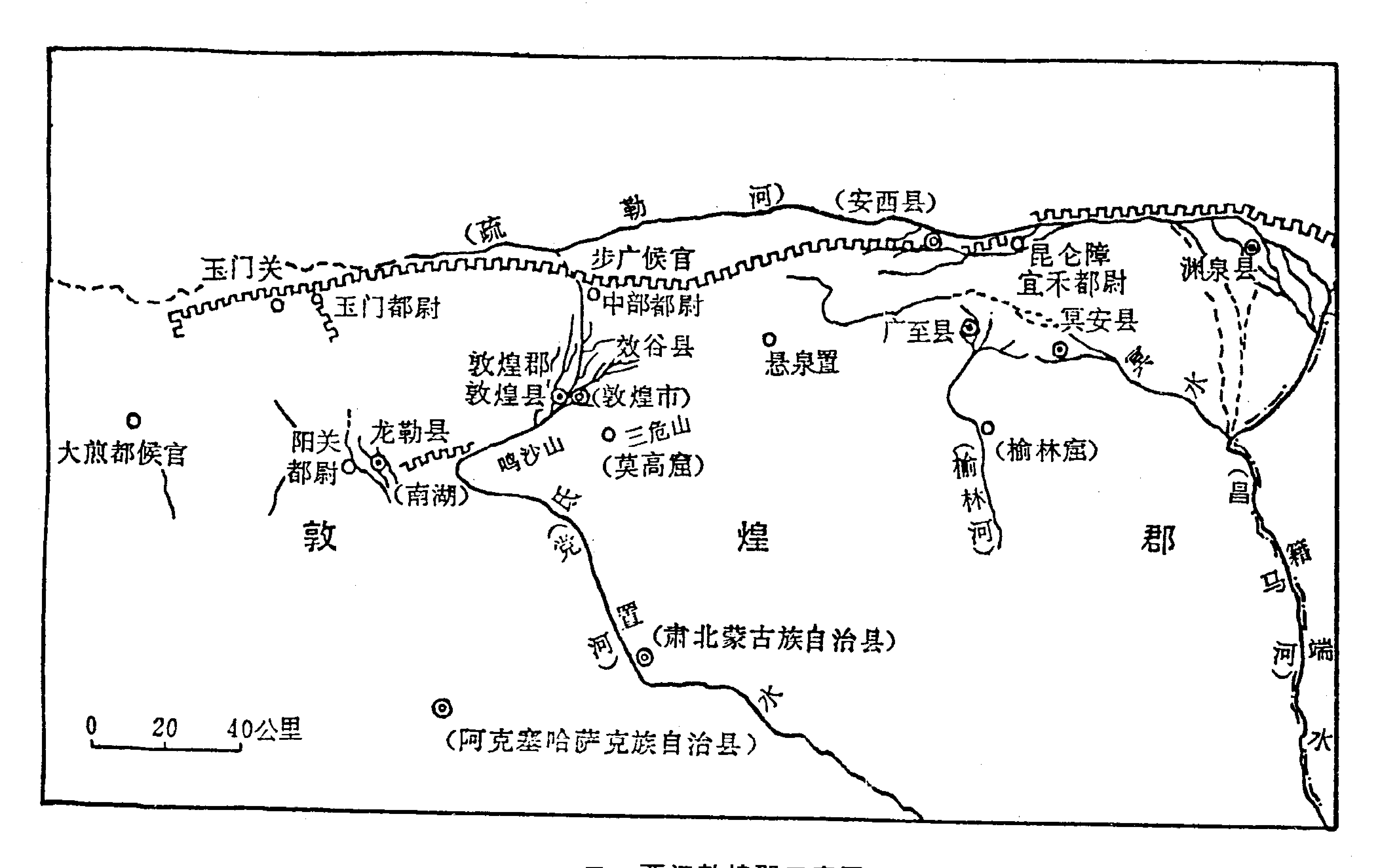

（疏勒河）
（安西县）
玉门关
步广候官
昆仑障
宜禾都尉
渊泉县
玉门都尉
中部都尉
冥安县
广至县
效谷县
悬泉置
敦煌郡
敦煌县
（敦煌市）
三危山
（莫高窟）
鸣沙山
大煎都候官
阳关
都尉
龙勒县
（南湖）
（榆林窟）
榆林河
冥水
（昌马河）
籍端水
氐置水
（党河）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敦
煌
郡
0 20 40公里

图1 西汉敦煌郡示意图

这次战役后，匈奴主力向西远徙，"幕南无王庭"。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包括敦煌在内的安全。这时，汉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①，逐渐开发了这一地域。同时解除了百余年来匈奴对北方和西北农牧业区域的威胁。

西汉王朝牢固地建立了对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地位，较有效地控制了西域地区，开始对河西走廊地区进行必要的开发和发展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技艺、文化思想也源源西来；同时，西域各地及中亚欧洲诸国的物品、文化，特别是较原始的宗教思想，也随着商业的发展开始和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接触，相互间推动着向前发展。

西汉时所设敦煌郡，下辖六个县，即敦煌、龙勒、效谷、广至、渊泉、冥安，郡治敦煌。敦煌郡的辖境范围大致是疏勒河以西，阳关、玉门关以东的广大范围，包括现今的敦煌市、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敦煌当时有户11200户，口38335口。至此，敦煌作为中国古代中原封建王朝的一个正式的行政区划单位，开始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了。敦煌开始作为中原封建王朝巩固边疆，控制经营西域，发展中西交通的重要据点，同时也是民族融合、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

2. 筑阳关、玉门关

阳关和玉门关，史称两关，均在汉敦煌郡龙勒县境内(两关遗址均属今敦煌市境地)。

阳关，位于今敦煌市区西南70公里的南湖乡境内，按中国古代"山南水北为阳"的传统方位法则，因在龙头山(今墩墩山)之南，故名阳关。今关城已湮没无存，全失当时的雄踞豪壮之势，仅存墩

① 《汉书·食货志》。

墩山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烽墩。残留遗迹高 4.7 米，底长宽 8—7.5 米，顶长宽 8—6.8 米。攀登至烽墩顶部，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悠然古代边关守士之豪情顿生，自有心旷神怡、目阔耳极之韵。

玉门关(俗称小方盘)，位于今敦煌市区西北 90 余公里的戈壁滩中。相传古代西域和阗等地的各种美玉经此关口而源源输入中原各地，故名玉门关。今关城墙垣保存基本完好，高约 10 米，皆为黄胶土版筑。城堡平面呈方形，东西长 24 米，南北宽 26.4 米，总面积 630 多平方米。西、北两面各开一门，城北坡下有东西走向一条车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和西域各国及中亚欧洲往来过乘及邮驿之通途。登城北望，断续长城自东迤逦向西，蜿蜒于平沙莽野之中，犹如龙游瀚海，极其壮观。长城内侧高峻处，烽燧土墩远近错落，遥相呼应，顿增古道肃穆悲壮之感。古代历代戍卒们就是凭借着这些防御措施，维护着中西交通的畅通，为过往的中外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保卫着中原大地，守卫着西北的门户。

阳关和玉门关，南北相距 80 余公里，成犄角之势，互制互动。自汉魏以来，它作为中原王朝通西域的重要关隘，像一对雄狮扼踞要地，虎视遥遥丝绸古道，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商旅和僧俗等，还有著名的中外学者，以及百工技艺。其间有古道繁荣时的川流不息，国盛势强时；也有战乱凋零，悲风掩道日。它们像历史的两只眼睛，神注着中国西北历史的沧桑千百年，为今人倍增凝重与使命之感触。

3. 修长城，列亭障

河西走廊及敦煌附近地区的长城，在我国史籍中有明确的记录，它是随着汉朝势力的发展及为适应汉朝与匈奴战争形势的需要而逐步修建而成的。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统辖河西走廊地区的匈奴浑邪王等归附于汉朝，汉朝政府在河西设立了郡县，同时，“筑令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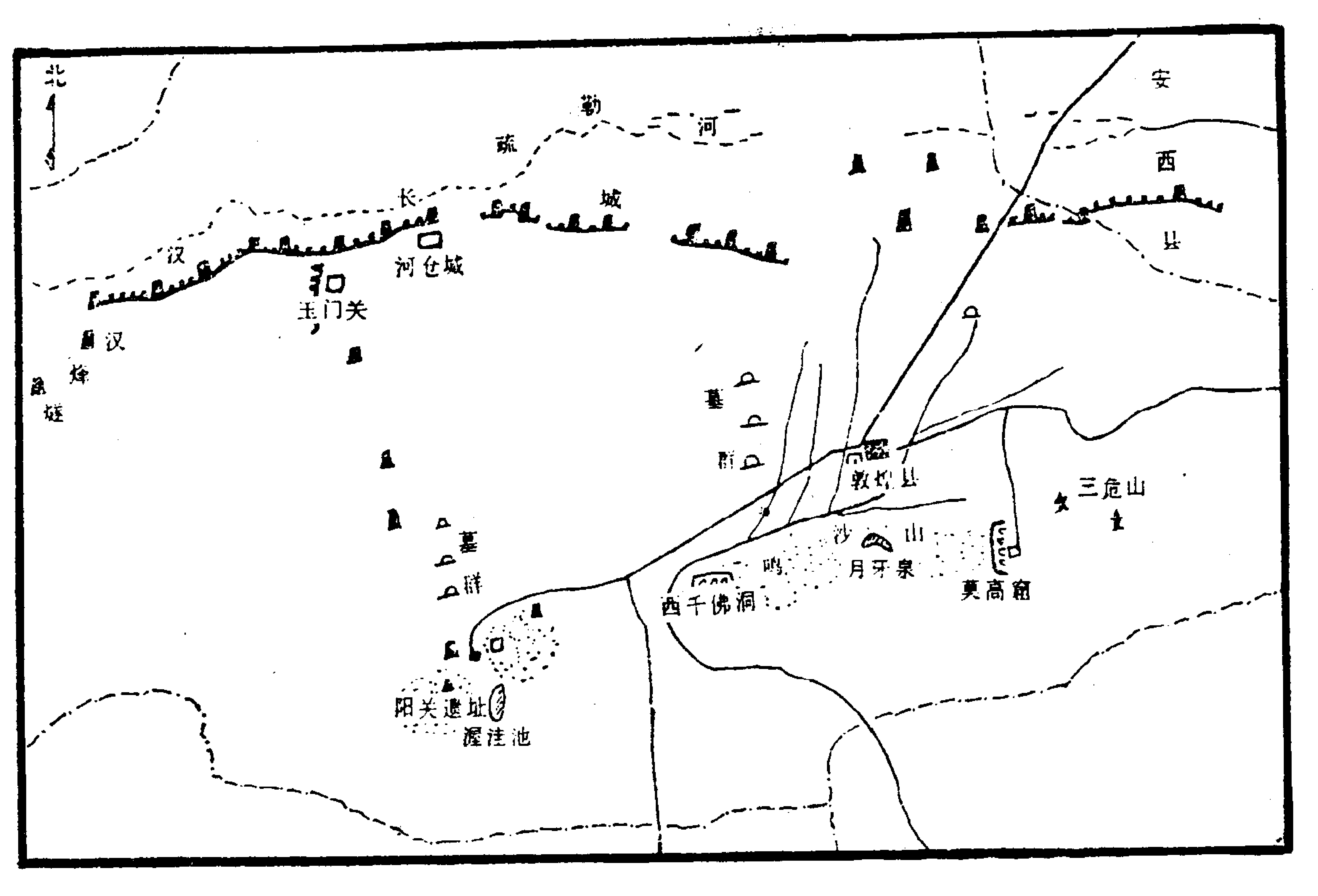


图2 敦煌玉门关长城分布示意图

塞”，开始在秦长城以西第一次修筑了大体东起甘肃永登，西至酒泉的汉长城。

汉得敦煌等河西地后，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等地，与西域各地建立了联系，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出现了东西方使者“相望于道”的局面，敦煌及河西走廊成为东西交通的咽喉要地。但匈奴贵族却不断侵扰河西，胁迫车师、楼兰，经常阻断通道，使丝绸之路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派兵击破被匈奴控制的车师和楼兰，清除了这一带的匈奴势力，又从“酒泉列亭障至于玉门”，进一步延伸了所筑河西长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又命强弩将军路博德屯军于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在此一带修筑了南至酒泉的长城。

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李广利破大宛后，汉武帝命令，“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筑塞，并与“酒泉塞”相接。至此，随着汉朝势力的发展，通过四次修筑障塞，从罗布泊经敦煌、酒泉到令居，又从居延海到酒泉，形成了一条丁字形的汉代长城。

考古工作者（包括斯坦因等国外考古工作者）在沿汉长城的许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古代遗物。在敦煌以西的长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木简，多次震动了史学界。木简上除了太始三年的年号，还有太始元年（公元前 96 年）、地节二年（公元前 68 年）、元康三年（公元前 63 年）、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等年号。木简重录、引称了关于汉代在敦煌地区建立屯田以及建亭障的诏谕，关于当时军队的组织、部队的番号以及其他报告和命令等。在长城遗址中还发现有汉朝的度量衡、盛镞的盒子，还有刻有“显明燧药函”字样的药箱盖。这说明，当时每一亭障都有名号，其军事设备及医药设备都很齐全。同时也表明，我国汉代敦煌及其周围地区有一套完整的塞防制度。

汉代施放烽燧，传警报信时，一般是“昼举烽，夜燔燧”。所谓“烽”，就是在亭障碉堡上设一桔槔，桔槔头吊一兜，内置柴草，白天

有警，即将兜内柴草点燃吊起，柴草冒烟报警通信。所谓“燧”，即将平时堆积于高地上的木柴堆点燃，晚上时火光冲天，直达下一亭障碉堡。

敦煌周围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多处举烽燧报警信的柴堆，也称积薪。一般是将芦柴捆成束，再将它们有规则地一层层十字交叉堆成，每堆六七尺见方，高一尺到六七尺。还曾发现许多已经烧成灰烬的燧堆。此外，当时在白天也采取高举有色长布条等物以示警信即所谓“举表”的方法在天气晴朗时使用以传警报信。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及其河西汉代长城沿线，还发现了大量的驿站、粮仓等遗址。可以看出，汉王朝为了维持塞防，在人力、物力上花费了很大代价，为保障东西方的交通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①。在今天敦煌市西北戈壁上，东起安西县东碱墩，沿疏勒河南岸逶迤北上，蜿蜒向西，经东泉、大方盘、哈拉淖尔、玉门关、后坑子、吐火罗、天桥墩、湾腰墩……朝正西直入盐泽（罗布泊），绵延百余里，都有汉长城遗迹和烽燧遗址。其中，保存在马圈湾的一段长城较为完整。其城垣残高 2.6 米，基地宽约 3 米，建筑结构为柴草夹砂砾，层层夯筑而成。柴草层厚度 5 厘米左右，砂砾层厚度 20 厘米左右，粘接牢固。长城内侧高峻处，烽燧土墩遥遥相望，仅东碱墩至马迷兔一段即有烽燧遗址 80 余座。墩以黄土为基，上用土坯垒砌而成，高者达 10 米以上，低者 3 米左右。玉门关西约 5 公里的当谷燧保存最为完好。距当谷燧以西约 6 公里处的马圈湾烽燧东侧坞堡建筑遗址至今清晰可见。据《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② 的详细说明：坞墙夯筑，北墙长 6.2 米，东墙长 11.1 米，南墙长 8.7 米，残高 0.84 米，坞门西开，宽 0.76 米，有双重门，坞内建筑有过道和房屋三间，用土墼砌筑，草泥涂抹，墙表草皮有的达十

① 《汉书·赵充国传》。
② 《汉简研究文集》。

数层，颜色为土红和白色等，可证是经过多次维修和粉刷的。坞堡的东南角尚存水井一口，东西长 1.12 米，宽 0.4 米，深 0.63 米，四角各立 0.11—0.16 米的木柱，似为井架。遗址附近有大量的灰烬积层，证明坞内建筑是后来被大火焚毁后废弃的。在当谷燧附近地区，遥远年代戍卒们备用的“积薪”仍然整齐有序地堆放着，俨然戍卒们今日警戒守卫着这块土地。这种“积薪”，用一层红柳一层沙土的办法堆成，点燃后既可以烟冲九天，又不至很快燃尽，从而使烽火幸通，相望不绝。另有个别烽燧遗址，当时戍卒们攀登烽顶的绳索仍高悬于烽燧旁边。在当时的敦煌及附近地区，是汉王朝的较偏远地界，有如此宏伟的建筑，可见当时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相当水平的，也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区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第三节 西汉王朝对敦煌地区的经营

汉武帝统治的 50 余年（公元前 140—公元前 87 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设期门军；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设羽林军。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准备了军事条件。

西汉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往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之后，北方和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增强。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通过屯田垦殖的兵民，在西北边郡迅速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筑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建了亭燧。边塞的烽燧遂成系统，"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①，吏卒众多。

屯田垦种，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和西北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的中原经济、文化的传播点，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时的敦煌境内，汉王朝的军士穿梭其间，守护着它的繁荣稳定，并进行着必要的生产活动，偶尔还有大小不等的军事行动；各族劳动人民安居乐业，对西北边疆这块富有色彩的土地进行着辛勤的劳作，民族间互助互利，思想文化融合汇同。

《汉书·西域传总叙》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后汉书·西域传总叙》也指出："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可见汉王朝时，敦煌在中西交通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汉王朝政治统治地位的不断加强，特别是随着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汉王朝的战略思想也开始转变，逐渐地由武力征服转移到了发展生产、加强经营上来了。匈奴人向西迁徙之后，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 53 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

① 《汉书·赵充国传》。

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对峙局面。此时的和亲已经不同于汉初时的和亲，已是一种为维护民族团结，争取长期和平安定式的和亲，同时也表明了当时各民族间是互通婚姻的。婚姻的纽带作用，既以官方的形式维系了汉匈和好，又以民间的形式促进了相互的融合，不仅汉族和匈奴间，而且少数民族间、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间都存在这种特定历史时代的婚姻关系。

西汉初至文景时的 60 多年内，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便出现了一种繁荣的景象。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武帝时传播更为迅速。今甘肃等西北地区都有西汉的铲、镬、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汉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边陲，进行屯田，牛耕技术也传到了西北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境内的甜水井和玉门关附近的卷槽、马圈湾等地，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大量汉代使用的铁铲、铁锸、铜犁等农业生产工具。1979 年 10 月，在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汉代的小麦、糜谷、大麦等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粟色如新。同时，还出土了当时守边戍卒记录农业生产、粮食收入的汉简，其中有："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右凡出穬麦(大麦)十一斛三斗士吏姜夕从玉门所禀"等记载。从敦煌出土的汉代实物和汉简记载，我们对敦煌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有了一个较明确的了解；同时也说明，汉代敦煌是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且生产多种粮食作物。

西汉王朝确立对河西走廊地区及敦煌地区的政治统治后，为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已有成果，开始了大量的移民屯垦等各方面的经营活动。

屯垦的本意是指军队在屯营的地方垦种农田，从广义上说，是指国家在国有土地或无主荒地上按编制组织人力进行一定规模的垦殖。历代的屯垦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

汉代统治着认为："移民垦殖，可以因田效谷，因地为粮，因民

为兵，因屯为守”[1]。所以，在“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2]。这种民兵结合、亦民亦兵、亦兵亦民的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屯垦方式，对汉代巩固和发展边疆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楚汉相争之际，匈奴乘机夺回原地，并进占辽宁西南部、张家口、乌兰察布盟、绥德、银川一带以北地区，一直到西汉建朝之后，仍不断进行侵扰。

西汉文帝时，匈奴骑兵曾深入到长安附近，给西汉的政治统治带来了危机，但当时汉经历了长期的楚汉战争，国力不支，不能大举使用武力。为此，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上书提出了屯垦边疆、巩固国防的建议。晁错指出：匈奴在西北边疆扰犯，如果从内地派兵防守，道路艰险，运输困难，军役劳苦，民不堪其苦，容易引起人民不满和武装暴动；匈奴逐水草游牧，乘守备薄弱而扰犯，援兵少不足以抗御，大量调集则远途赶到，匈奴已经远走；边防士兵按法度一年一换，不熟悉匈奴和边疆地势，因此不如募民往边疆垦地务农，在居住和垦种的地方筑墙挖沟，建立城邑，并采取各种防御措施以御匈奴。凡愿去者，给予解决衣食住。文帝采纳了此建议。

西汉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搜粟都尉桑弘羊向汉武帝再次提出了屯田实边的建议：“轮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迁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3]。

武帝时，不仅有移民 10 万于内蒙河套地区的大规模民屯，而且创立了军屯，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命令 60 万出击匈奴的将士屯垦于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带。以后又设军屯于新疆。至汉武帝晚年，因“戾太子事件”，又将参与其事的官吏和士卒“皆徙敦煌郡”。汉元帝初元中（公元前 48—公元前 44 年），又以“佞邪不忠，妄为巧诈”之

---

① 《河西志·汉代农业》。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通鉴·汉纪》。

罪，将西域副校尉陈汤、将作大匠解万年“皆徙敦煌郡”。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 5 年)，再把“反道惑众”的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等徙于敦煌郡。另有敦煌大姓张氏、索氏家族的祖先，也都是西汉时期因获罪而迁入敦煌的。这些获罪的各级官吏、文人和大量各民族移民、田卒及刑徒的迁入敦煌，增加了敦煌人口和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敦煌古代的早期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使中原地区和敦煌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自然其文化的影响也对当时敦煌及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重要作用，为以后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西汉时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西北。文帝时文翁在蜀郡穿湔江以溉灌繁县土地，稍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至于凿井灌溉，北方西北地区到处都有，甚至居延边地也凿井开渠，进行屯垦。

西汉王朝在实行屯垦政策的同时，必须注意水利事业的发展。敦煌地区有着大量辽阔肥沃的可耕土地，有融冰化雪汇集而成的氐置水(党河)和籍端水(疏勒河)，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极好条件，加之，当时敦煌自然生态环境较之现今要更好一些，更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种植。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写本《沙州图经》，对汉代敦煌的水利事业有较详细记载：“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汉元鼎六年依马圈山造，因山名焉”，“百姓造大堰，号为马圈口，其极南一百五十步，阔廿步，高二丈，总开五门分水以溉田”。可见，当时敦煌的水利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后备基地。公元前 101 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来二岁，“岁余出敦煌者六万人”，正是敦煌地区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好证明。

羌族作为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时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分布在我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以西海(青海)附近、甘肃河西走廊和敦煌地区为主要游牧地，南抵蜀汉，西北接西域诸国，是我国西北

民族史和敦煌民族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初年，羌人无戈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来逃回本族，被推为豪，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10万余攻令居塞，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率兵10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人开始与敦煌附近地区人民友好相处并逐渐内徙或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

第四节 西汉时期通过敦煌地区的中西交通交流

一、敦煌地区与匈奴及西域的初期关系

匈奴在秦代既已形成一个强大的种族。为了抵御匈奴，秦王朝派蒙恬以30万军士北击，逐匈奴于河套以外，然后因山筑城，因河为塞，于各要害之地，驻屯庞大的边防军，以阻止匈奴的南进，于是匈奴开始稍向北、向西北徙迁。到秦末，蒙恬死，边防军失去了统帅。同时，中原爆发了农民起义，秦王朝随即撤回全部驻屯军队，北门大开，匈奴又重新回师长城脚下，即："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①。

楚汉之际，"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

① 《史记·匈奴列传》。

强”[1]，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2]。其时，分布于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的月氏，在诸羌中最为强盛，已占领南山北麓一带地域，自凉州以西，张掖、酒泉西至敦煌，都属其势力范围。月氏拥有很多的畜群和十几万人的骑射部队，成为当时西北的一个强大势力。西汉初，随着匈奴的强盛和北徙西迁，月氏与匈奴角逐于河西走廊与敦煌地区，结果，月氏失败。大约在文帝前元八年至后元三年之间(公元前 172—公元前 161 年)，月氏由敦煌出发沿南山北麓西徙于今天新疆伊犁河一带。他们驱逐了原居民塞种人(希腊人的一支)，而尽占其地。随后，月氏又遭受到乌孙族的压迫，因而在武帝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公元前 139 年—公元前 129 年)之间，月氏又再次西徙，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妫水流域，西击大夏而臣之，分其地为五，各置总督，即所谓“五翖侯”，是为中国史上的大月氏。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即甘肃敦煌以西，今天新疆地方，被称作西域(当时也把中亚乃至更远的许多地方，包括在西域这一地理概念之内。这里所指的西域，主要是指靠近敦煌及和敦煌史地联系较为密切的新疆地方)。西汉初年，西域共有三十六国，这些国家大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业，有的还能够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原因，它们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才有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东部的天山缺口，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由车师(姑师)控制着。车师以西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是塞种人居住的地方，汉文帝时，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迁到这里，赶走了塞种人。后来，河西地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同上。

区的乌孙人又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有了这块土地。乌孙人有 12 万户，63 万口，“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从许多地理、地质及考古资料来看，当时的西域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较现今要好得多，也适合于人类的定居和生息。汉代西域地区存在着几十个国家（有三十六国说、三十国说、四十国说），有时还有大量的军队和商旅人等的战争和生活补给，其时虽有不断的较长时期的民族迁移活动，但这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有人类的大量的、大范围的活动，总是显示着繁荣与兴旺、民族争斗与团结互助相互交错的复杂的历史画面。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的意思，募使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来夹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于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率众 100 多人向西出敦煌过玉门关进入西域，去归途中两次被匈奴人俘获。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回到长安，前后达十余年。他的西行，虽未达到初始的愿望，但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的西域资料。

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遣使以求开辟一条经身毒到大夏的交通通道，未果。第二年，汉军击攻匈奴，破之，取得了河西敦煌地带，西域道可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敦煌等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同时，招引西域各国使者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以后，汉同西域的交往频繁起来，敦煌成为连接西域各国的重要中继站和交通要冲及军事战略基地。

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减除匈奴对楼兰和姑师的严密控制，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汉将王恢率轻骑出敦煌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姑师。

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王和亲，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细君死后，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细君

与解忧先后在乌孙多所活动，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敦煌的边境地位改变，成为汉通西域及东欧各国的重要补给站和枢纽。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汉血马，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出敦煌击大宛西征，迫使大宛与汉军言和。汉政府在各地驻兵数百，进行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

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西域楼兰王死后，匈奴企图趁机控制楼兰，遣质子前往，争先立为王。汉虽“遣使招新王，令入朝，天子将加厚赏”①，也被托辞未往汉朝，更受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于是汉武帝又于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军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②，以敦煌为军事和后勤基地北击匈奴，尽获全胜，巩固了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

二、张骞出使西域

言及汉代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流，当首言在汉武帝“勤远略”思想指导下，探险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张骞出使西域的一系列活动。

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等 100 名应召勇士，从长安出发，由甘父作向导，开始了漫长的探险活动，所负使命系寻找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是一个冒险性的人物，他毅然“以郎应募”，“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他们经过甘肃南部的陇西郡（今甘肃临洮），渡过黄河进入河西。因当时的河西走廊和西域广大地区为匈奴控制，为避开匈奴耳目，他们昼伏夜行，备尝

① 《汉书·鄯善传》。
② 《汉书·匈奴传》。

艰辛。不幸行至南山北麓河西走廊西部的沙漠地带，因迷失方向，遭遇匈奴大队骑兵而被扣留罚作奴隶，牧牛放羊。其间匈奴贵族百般诱降张骞，"予妻、有子"，"然持汉节不失"，熬过了整整10年的奴隶生活。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一行终于伺机逃出，毫不灰心，不忘使命，横断沙漠，继续西行。他们经过饥寒交迫的艰险道路，终于沿天山西北过伊犁河，捷径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大宛国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盛产稻米、芝麻、大蒜和胡萝卜，还有著名的大宛汗血马和苜蓿、葡萄等。大宛国王从来往商贾中早就听说汉朝很富庶，很想和汉王朝交往，只是道路遥远阻塞，未能如愿。此时张骞的到来，大宛国王喜出望外，增强了与汉王朝交往交流的信心。当他得悉张骞此次西行的目的是要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时，随即派了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经康居(今锡尔河以北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一直到大月氏。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整整13年，后来取道塔里木盆地返回中原，再次为匈奴所虏，囚居一年，逃回长安。他和甘父于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中原后，对于他所经过的西域诸国如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乃至安息、条支、身毒等国的各种情况，都详细而确实地报告了汉武帝。在此基础上，更增强了汉王朝战胜匈奴，开通西域、中亚商路的决心和信心，开始了更加积极的出击匈奴的战争。

西汉王朝通过公元前126年至公元前119年间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玉门关以西的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尽归入汉朝的版图。但西域仍然受到匈奴的控制，他们的骑兵经常从天山缺口南入楼兰一带，阻击汉王朝派往西域、中亚各国的使节和商队。同时西域各地的小国酋长也认为西汉王朝在遥远的中原，又有匈奴的势力依靠，往往拒绝供应汉朝使节和商队的给养，并且趁火打劫，进行掠夺。汉武帝为了巩固西北边疆，特别是为了建立对幅员辽阔的西域地区的有效控制，曾多次召见张骞，征询和商讨对西域问题的处理意见。"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

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①] 此议正合汉武帝的心意，于是再次起用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一个300人的使团，携带成千上万的金银、丝绸和牛羊，第二次出使西域，去完成劝说乌孙东归，并与汉朝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任务。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8年，张骞率使团向西域进发，顺利到达乌孙。

当时乌孙国正进行着王位之争，且“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匈奴）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②]。同时，老乌孙王昆莫热情地派翻译和向导，帮助张骞分派的副使到大宛、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安息（今伊朗）、身毒（古印度）等西域各国，以建立汉王朝同这些国家之间更广泛的友好联系。一年以后，这些国家都先后派使者携带各种礼品，相随张骞的副使一起来到长安，与汉王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从此，以丝绸为媒介进行中西交往交流的西北陆上交通线“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了，从而揭开了中西官方使团和商队大规模友好交往交流的序幕。“在当时，东西的文化，已经突破了大月氏与安息横亘于中亚的历史交流的障壁，像一种幽灵一样，相互拥抱着了”[③]。从此以后，汉朝各地赴西域中亚的使者、商队“相望于道”，使团“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团“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这些使者商队，来往于丝绸之路，出入于玉门关、阳关道上，那时的敦煌，商旅频繁，车水马龙，一派兴旺繁荣的面貌，为此史称当时的敦煌为“华戎所交”[④] 之一大都会。

此间，西汉王朝更加强了对敦煌的经营，促使河西四郡最西端的敦煌，既成为进军西域的前哨基地，又是中西交通交流过程中各

①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
②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
③ 翦伯赞《秦汉史・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
④ 《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志》。

国使团、商旅的重要补给基地；不仅有利于西汉王朝国家政权的巩固，也为中西交通交流要道——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

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中西交通交流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率部降汉，至此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罢”，随之西汉政府正式设立全面管辖西域各国的军政机构——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今新疆轮台附近），“汉之号令班西域”，汉王朝从此便开通了南山北麓和北山南麓的走廊，与西域诸国及中亚诸国的交通交流畅通无阻了。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足以为屯戍军队的给养之补充，日趋繁荣，不仅是汉朝往来西域、中亚的吏卒的补给站，也是国际贸易的商旅寄顿之所。

敦煌是河西走廊极西的一大都市，“敦煌沃野，东西宽约二十四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七公里，全部面积达三百五十平方公里”①，过此而西则为西域境界。这里在当时是汉军的根据地，驻屯着雄厚的边防军，屯积着大量军饷粮草，有坚固的军事设施，有大将军的行营，有太守和田官的官署，有各种商业贸易机构和商店。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都是以敦煌为根据地往返的。敦煌是汉朝西北部一个重要的地区，西域、中亚使者商旅到了敦煌，就算是踏入了汉朝的边境，如若再向东进，必须在敦煌办理所有入境手续，而且在经过了盐泽沙漠的遥远艰苦的旅程之后，敦煌为其提供略事休息的场所。同时，汉朝的使者和商旅由内地到达敦煌以后，也必须在敦煌办理出境西行的各种手续，并且为了将要开始的横断盐泽沙漠的艰苦旅程，必须在敦煌作好各种缜密充分的准备工作，如雇赁骆驼向导，购备粮食，装载饮水等。当时的敦煌城内，到处可见军队、田卒、使者、商旅、各种办事机构和一群一队的骆驼。

① 陈正祥《河西走廊·沃野与都市》。

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库鲁克塔格山（今新疆东部）麓，都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载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信号。据汉简载，汉代沿长城西筑的烽垒，布列甚密，大概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1]在今玉门关以西40余公里的地方，尚保存着一个古老的地名"都护泉"（今名榆树泉），就是当时所设的众多驿站之一。自敦煌而西，出汉朝大门玉门关，进入荒旷的盐泽，然后进入楼兰，其间这些西行的使者商旅沿途都有休息的驿站。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戍兵留下的铜箭镞、铁匕首、铁勒及建筑物上的木雕和器具，足证汉代横断盐泽，都有延续相望的堡垒驿站，驻屯着守卫丝绸之路西段的戍兵。到了楼兰，使者商旅们就要根据自己的所需选择西进的南线或北线了。

从南线而西的使者商旅，离开楼兰经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于阗、莎车到达疏勒。疏勒是南北两道使者商旅会合之地，也是东西使者商旅必须停留寄顿之地。中亚东来使者商旅人等，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之后，休息于此作继续东行的准备；由此继续西进的使者商旅人等，也稍事休息在此作好逾越帕米尔高原的必要准备。疏勒当时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国际都市。

从北线西行的使者商旅，从楼兰出发，经过艰苦的沙漠旅程，到达尉犁，在汉王朝戍兵、田官、田卒的保护帮助下北向焉耆，再入乌垒，经龟兹、姑墨、温宿、尉头，向西南到达疏勒，然后再向西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大宛及中亚各地。另外，从敦煌到大宛，还有一条险道可通，这就是取道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高原。离开敦煌西行，要经过楼兰东北荒凉的盐泽到达今吐鲁番盆地。再行至库鲁克塔格山麓，走到山中便进到《西域传》上所谓的山国（今新疆东部博斯腾湖东），获得暂短的喘息。然后经焉耆北向车师，沿着天山北坂进入准噶尔，通过卑陆（今乌鲁木齐东北）、且弥（今乌鲁木齐市），进入乌

① 《居延汉简考释》卷二。

孙地界，再向西南，到达大宛。然后分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等国，愿远者达于里海之北、波斯、阿拉伯与印度。

西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发展和加强汉族与西域各族及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汉政府在西域实行屯田，把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生产技术及穿井术带到西域，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时敦煌人索励，曾率兵士1000多人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境内）屯田，并调集鄯善、焉耆等处军民4000人，横断卡墙河，掘渠分水，改进灌溉条件，使许多贫瘠的土地变为良田，农作物连年获得丰收，三年内积粟百万石，使当地人惊服和感谢。所以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注》中言称："敦煌索励，字彦义，有方略"，"楼兰屯田"，"横断注滨河"，"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①]。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讨昆弥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把汉族先进的掘井技术由敦煌传至西域，对西城的农业生产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西域的动植物，如骆驼、毛驴等牲畜，西瓜、葡萄、大蒜、黄瓜、苜蓿、胡萝卜等植物也都传到了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从张骞第二次出使通西域，一直到西汉末的百余年历史间，汉和西域保持着良好和相对稳定的关系。

随着西汉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为此，自然也推动了西汉的对外贸易。

自河西走廊经敦煌和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着这条道路，运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物。西方人称这条道路为"丝绸之路"。

西汉时，丝织业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当时已有了提花织机，能织成各式各样的花绫。西汉的精美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

① 《续敦煌实录》索励条。

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运至中亚各国和大秦(罗马帝国)。

中原同西域的道路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敦煌作为其间的枢纽和门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通过敦煌地区，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

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经敦煌陆续向东部地区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经由敦煌地区也都向中原地区而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经敦煌地区改制加工融合了中原文化再向东传播，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封建时代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原地区则经敦煌向西域及以远地区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包括井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五节 东汉时期敦煌地区的基本历史状况

一、东汉初期敦煌地区的形势

西汉末年，王莽夺取政权，其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反抗，全国各地豪强见隙纷纷群雄割据，互相攻伐。地主豪族隗嚣乘机占据陇右地区，公孙述称雄于巴蜀地区，卢芳割据安定。他们这些割据势力都不时觊觎河西走廊，企图据其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河西及敦煌地区危机四伏。为此，当时的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在酒泉太守梁统、张掖都尉史苞、敦煌都尉辛彤等人的

支持拥戴下，被推举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窦融，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祖上累世在河西为官，故对这里的各种情况十分熟悉。他担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后，立即组织起五郡的联防组织机构，同心协力"自保河西"，并"抚结雄杰，怀柔羌虏"，较好地稳定了河西地区的局势，从而使河西地区在当时复杂的割据斗争中维持了较为平稳安定的局面。其间河西各地农业、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陈规陋习得到抵制。窦融还修兵马、习战射，加强了边塞防御，有效制止了羌胡侵扰。为此，河西稳定富庶，各地流民纷纷投奔，保护了河西人民利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公元 25 年六月，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南（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春赤眉军失败，刘秀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开始致力于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在此同时，光武帝刘秀开始率兵西征，窦融亲率河西各郡兵力积极配合，次第平息了陇、蜀割据势力，建武九年（公元 33 年），平定了割据陇西的隗嚣，次年陇右地区完全统一，河西各郡悉归东汉政权。

王莽时曾改敦煌郡为敦德郡，敦煌县改名为敦德亭，广至改为广桓。至东汉时，敦德再改为敦煌。郡的辖县与西汉时相同，只是将广桓仍改原广至，渊泉改为拼泉。

东汉时敦煌郡的人口，据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的统计，共有 7480 户、29170 口，较之西汉时有了减少，这是西汉末、东汉时西北地区"战乱相继，民无宁日"的结果，也是东汉政权统治力量削弱的表现。

当光武帝刘秀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请求内附，得到东汉的允许。

从此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北匈奴离汉边较远，他们控制着西域，常常侵扰河西、敦煌及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这种侵扰，答应与北匈奴“合市”。章帝时，北匈奴贵族驱牛马万余头，经敦煌、安西、酒泉到武威与汉人“合市”，得到郡县的隆重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

自东汉初至明帝末，汉王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近60年，不但国内中原地区的政治统治已经巩固，而且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由恢复而又有相当的发展，这就为明帝巩固边疆、出兵西域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经济条件。加之，此时北匈奴寇抄益甚，焚烧边郡城邑，杀略甚众，终至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带地区城门昼闭。东汉政府为扭转西北边疆的被动局面，开始改变原来的筑亭障以自保的退守政策，采取了在西北逐渐展开的积极前进的政策。

当时，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东南面的南匈奴的夹击，又受到西域诸国的反对，势力薄弱，部众离散。

东汉王朝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于是利用这一时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进攻。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祭彤、吴棠出高阙塞，窦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塞，来苗、文穆出平城塞，大败匈奴后，留吏士屯田于西域。随即又沿天山北麓西南，逼车师后王、前王先后内附于汉。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击北匈奴，出塞3000余里，命班固刻石而还。

永元二年(公元90年)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复取伊吾，出居延塞战败匈奴，迫使匈奴向西远徙。

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西汉末，王莽篡权后，对西域各国贬易侯王，苛敛重课，引起西域各国怨叛。匈奴在西域重新扩张势力，并于永平中胁迫西域诸国

兵进掠河西，致使各郡县在白天也不敢开城门。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秦彭、祭肜、吴棠、来苗等将从东北、朔方、河西等分道出击匈奴，敦煌再次成为军事和后勤补给基地，为汉军取胜奠定了基础。东汉遂于公元74年遣窦固、耿秉等率骑兵四万人由敦煌入天山，大败匈奴，使其势力始退出天山东部。

公元75年三月，匈奴不甘心前两年的重大失败，北单于左鹿蠡王两万余骑向东进击，杀车师后王，围金满城和柳中城。

建初元年(公元76年)，章帝即派耿恭屯兵酒泉，指挥战事，并派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西域鄯善等国兵共7000多人，大败匈奴，凯旋而返敦煌。

汉朝和匈奴在西域的争夺战中，尽管打了胜仗，但由于中原国内矛盾加深，社会出现不安，不得不暂时停设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并于公元77年撤退伊吾屯田的军队。于是车师、伊吾、鄯善又成为北匈奴的势力范围。这时，班超处在匈奴多方面的包围中，和西域各族人民一起，多次击退了匈奴贵族的进攻，保证了敦煌以东以南河西走廊地区的安定局面。

二、东汉敦煌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时期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朝为了配合班超在西域的胜利，遣窦宪、耿秉等各率4000骑，大破匈奴。永元二年(公元90年)，窦宪又遣阎槃率2000骑再击匈奴。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又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匈奴并大破之。至此，北匈奴贵族受到重创，势力削弱，开始不断向中亚细亚移徙。西域、敦煌及河西走廊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当时东汉政权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四起。即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暂时撤回西域都护及屯田军。天山北部残留的未徙北匈奴又乘机占领西域诸国，并连兵寇河西，

十余年不得安宁。

敦煌太守曹宗不堪匈奴的暴害，即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 119 年）奏准汉廷，派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出击匈奴，屯田伊吾以招抚诸国。几个月后，匈奴率车师后部攻杀索班，进逼鄯善王。鄯善王求救于曹宗，曹宗再次上书，请求出兵 5000 人北击匈奴。

当时汉王朝中有不少迂腐、惧外之辈，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坚守敦煌。只有班超之子班勇，坚决反对放弃西域。张珰做敦煌太守后，也深知弃西域对敦煌及河西走廊和整个汉王朝的危险，主张一定要出击匈奴，屯田柳中，绝患于根本。

延光二年（公元 123 年）始，一直到顺帝永建二年（公元 127 年），班勇受汉帝所遣连续五年发敦煌、酒泉、张掖及所属西域各国军士，发动了对匈奴的全面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顺帝阳嘉三年（公元 134 年），汉所属车师后王部再击匈奴，大胜于阎吾陆谷。

永和二年（公元 137 年），敦煌太守裴岑率兵 3000 人大破匈奴呼衍王于蒲类海，并在天山石人子沟竖立了胜利纪念碑。

至桓帝元嘉元年（公元 151 年），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西域属国吏士 4000 余人再次驱逐了侵入伊吾的匈奴残部。至此，汉和西域各族人民在和匈奴贵族 300 多年的争夺战中终于获得了全胜，巩固了边疆，而敦煌及河西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匈奴贵族和汉的斗争，民族间相互融合，匈奴部落也得到了发展，从而最后与蒙古草原上突厥语系的铁勒部融合而一，成为高车族。

2 世纪中叶，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他的领地西至敦煌、乌孙为西部。其“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连年寇扰幽、并、凉三州边郡。光和年间（公元 178—183 年），檀死，鲜卑分裂，力量渐衰。

东汉时，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稳定繁荣，纺织业已成为普遍的民间手工业，更加发展。据史料所载，当时凡皇帝赏赐臣民或人民赎罪，均用谷帛或缣布。赐缯之多，多者至万匹，以缯帛赎罪者，亦数十匹不等，尤以蜀布齐缣最为有名。同时在汉族人的影响帮助下，中国四周的各民族，大都已知道和学会了纺织技术。

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发明的"蔡侯纸"，也通过中外使节商旅的往来传到了西域和中亚。斯坦因曾在西北汉代古长城一座烽燧尘封堆积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书写在纸上的函件，"他们显然很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据造纸史权威故冯魏斯勒尔，用显微镜考察的结果，证明这些书函的材料，是现在所知道的最古的纸，制法是把麻织物弄成浆，然后由浆以造纸"①。造纸术的发明发展，为中原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传准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第六节　东汉时期通过敦煌地区中西交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一、班超在西域的活动

西域诸国，到哀帝、平帝时，已自相分割，分化为五十五国。公元 9 年王莽篡汉后，为了显示新莽政权，对边疆民族进行了任意的凌辱和欺压。他对西域各国"尽改其王为侯"，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单于"。1979 年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所属汉平帝到王莽时期的汉简中，就有称匈奴为"共奴"、"恭奴"，并贬"王"为"亡"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的记载。适时匈奴势力侵入塔里木盆地东北，接近匈奴的焉耆首先迫降于匈奴。新莽始建国五年(公元 13 年)，焉耆杀汉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 16 年)，王莽遣五威将王骏、西城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郭钦出西域，焉耆复杀王骏。郭钦引兵回师，李崇收余众退保龟兹。后王莽死，中原大乱，李崇死于西域，从此中西交通中断。西域各国在和匈奴的争战中，最终败北，臣服于匈奴势力，西域尽没于匈奴之手。此间先是由于王莽的骄横狂妄而导致西域各族的反对，断绝与中原交往，并不断对沿边各地进行侵扰；随后，西域为匈奴控制后，频繁侵扰劫掠边地。迫至东汉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一时间"郡县城门昼闭"①。匈奴成为东汉王朝西北边境的严重威胁。

在经过对西域地位问题的反复争议后，汉明帝出于"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通西域则必驱逐呼衍王"的战略思想，于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和次年，两次派军出击匈奴，终于保卫了边境的安全，重新开通了中西交通。此间东汉王朝随军派遣了投笔从戎的班超为假司马，他对后来中西交通的畅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是史学家班彪的幼子。"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有口辩而涉猎书传"，"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另外，班超颇通军事，很有胆气，又娴习政治，富于权谋。他到西域的目的，是招降西域诸国，仅有吏士 36 人随行。班超首先靠智勇降服鄯善，升任司马，然后率其众沿昆仑山北麓由南道进入于阗。于阗王已早闻班超在鄯善所行，乃斩杀匈奴所派监护使，投降东汉。随后又定疏勒，于是东汉王朝恢复了西汉时的西域都护，置戊己校尉。当时汉以陈睦为都护，耿忠为戊校尉，屯田车师后部金满城；关宠为己校尉，屯田

① 《后汉书·西域传》。

图3 班超通西域示意图

车师前部柳中城。

公元 75 年，匈奴动员两万多骑兵，大举反攻，值明帝崩，东汉大丧，救兵不到，匈奴摧毁了东汉刚建立的在西域的统治势力。公元 76 年（东汉章帝建初元年），罢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下诏征班超回京。明年（公元 77 年），又撤退伊吾屯田军队，西域道又不通，北道诸国复又转入匈奴之手。班超以超人的智勇，扮演了当时最主要的角色。他因西域之兵，就西域之粮，以制西域之变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成功。

班超首先在建初三年（公元 78 年），用于阗、扜弥、疏勒及康居兵一万余人攻破姑墨，解除北来之威胁。东汉章帝见到班超"平通汉道"的奏折建议，派徐干为假司马，将弛刑义众兵千人前往援应班超，重定受莎车引诱而叛的疏勒。班超再上书建议，主张连络天山以北乌孙牵制匈奴，东汉政府于元和元年（公元 84 年）再派和恭统兵 800 西赴疏勒接应班超。班超统汉兵 1800 人，平定了疏勒的再叛，击溃了龟兹援兵 5 万，征服了莎车。随后自和帝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始，东汉多次出兵进攻匈奴，匈奴被迫西徙。其间班超又击败了大月氏的进攻。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龟兹率姑墨、温宿降于班超，后三年班超又征服焉耆、危须、尉犁诸国，打通了西域北道。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前后 20 余年，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促使西域 50 余国再度和中原王朝建立了友好相处、和平交往的关系，为西北边疆发展生产，人民安居乐业，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班超与张骞，在西域人民的记忆中，在西域的历史中，是永远不磨灭的两座丰碑。

《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壮年竭忠孝于沙漠"，西域既定，年已七十，衰老被病，深恐"疲老捐死于旷野"，思归故里，乃上书请回，其书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和帝感其英雄垂暮之语，征超还。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八月，班超终于从遥远的西域回到了别离 31 年的洛阳故土，次月病卒。旧传敦煌

沙州故城西，曾有班超当年所掘大井数眼，“深不见底”。古城内还有“塞柳屯名继父风”的班勇当年驻节敦煌西域副校尉府遗址。

二、东汉通过敦煌的中西关系

班超东返病卒以后，由于继任西域都护任尚等庸劣无能，曾一度使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再次中断20余年。北匈奴的各种势力又纠合于一起，再次乘机征服了西域各国，并不时威胁敦煌。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为抑止匈奴势力的侵扰和进一步扩张，派遣长史敦煌人索班率兵千余人进屯伊吾，招抚车师前王及鄯善王降汉，暂时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关系。此时，班超之子班勇承继父亲遗志，力主设置西域副校尉驻敦煌，未及实行，匈奴与车师连兵屡寇边境，并杀敦煌长史索班等，朝廷内部闭关之议占了上风，班勇之议遂罢。公元122年，敦煌太守张珰冒死上书，苦谏不能放弃西域，封闭玉门关、阳关，认为“失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尚书陈忠也上书陈辞：“河西即危，不得不救”，“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①。汉安帝纳其议，于是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500人，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县西）。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龟兹王率同其属国姑墨、温宿来降，班勇发龟兹等国之兵万余进击匈奴伊蠡王，收复车师前部。次年，班勇再发敦煌、张掖、酒泉三郡兵6000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进攻车师后部，斩其王及匈奴使者于索班被害处。再次年，班勇进军天山以北准噶尔高原，平车师六国，追击匈奴呼衍王，俘单于从兄，降其众2万余人。第四年，班勇发诸国兵4万余人，会同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兵3000人，分南北两道进军，平定了焉耆。西域全部内附，中西交通交流再次畅通无阻。

---

① 《后汉书·班超传》。

汉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北匈奴再次东来侵扰劫掠,敦煌太守裴岑率领郡兵3000人前往西域进剿,大获全胜于蒲类海。在今日巴里坤城,还耸立着裴岑所树立的胜利纪念碑。徐松《西域水道记》载《裴岑纪功碑》文说:"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呼衍王再寇伊吾,伊吾屯兵损失惨重,敦煌太守司马达又率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4000余人前往救援,驱逐匈奴残部,使其向西远遁。此时的敦煌不仅是西域通向中原的重要门户,而且是汉王朝统辖西域、维护中西交通交流的军事政治中心。

东汉时的中西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市场,还是中原和西域的贸易,中原、西域和中亚的贸易。当时,一批一批的骆驼队,随着中原商人们的脚步,经过西北贸易基地敦煌,通过一望无际的盐泽大沙漠,通过吐鲁番盆地,沿着天山南麓和北麓,沿着昆仑山的北麓,缓慢而又坚定地西进,帕米尔高原的雪山中,中亚的原野上,到处都有贩卖中国丝绸的中原商人和西域商人。中亚的许多城市里,大月氏的商人,印度的商人,安息、罗马的商人不断地增多,一些佛教寺院也开始随商业的发展出现了。

在中原商业西进,中国的手工业制造品,特别是西方人喜好的丝织物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时,中亚和印度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根据斯坦因的报告和他在敦煌周围地区发现的许多希腊、罗马式艺术品,可以证明当时的罗马商人似已到达中国西部。

第三章　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　敦煌地区的民族分割和民族融合

第一节　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敦煌地区民族分割和民族融合的基本概况

东汉末年，既有田产、劳动力，又有武装力量的坞堡组织日益发展，成为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封建军阀势力扩大，和坞堡组织结合，进一步形成图王称霸的可能；地区性经济的发展，又提供了这些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在中原政权的经济、政治力量还不足以统一全国时，分裂割据代替了统一局面。这一时期除西晋的短期统一外，中国处于分裂割据局面 400 多年，直到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隋文帝杨坚才重新统一南北，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动荡的局面。在这段历史中敦煌地区在总的动荡中，相对地较中原平稳些。

魏晋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屏蔽中原，常常强徙住在青海、甘肃及其以外的氐、羌及其它少数民族于关中。陇右、河西的割据者，也常常引氐、羌为援。由匈奴、鲜卑、乌桓及羌人组成的军队也经常出现在北方及中原的各地战场上。为此也推动这些少数民族在西晋时，走着封建化的道路，逐渐习惯于农耕生活。随着西部、西北部各地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加快了，民族融合也相应地达到了高潮。自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及不同的政

治经济发展状况，必然带来民族间相互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各民族间的摩擦和战争也不可避免。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匈奴军攻下洛阳，晋怀帝被虏，晋军在当时荆棘成林的长安拥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 316 年），匈奴刘曜又夺得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西晋的灭亡，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各种起义斗争完成的。当时，西晋宗室诸王互相残杀，没有形成稳固的中央集权，致使兵民无辜而死伤累累。“战及杀害近十万人”①，“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②，“百姓创痍，饥饿冻馁”的惨状比比皆是。战乱大大地破坏了各项生产事业，最终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促成了西晋政权的早时崩溃。

当时，凉州存在着汉人地主建立的前凉政权。西晋灭亡之后，原西晋凉州刺史张轨的儿子张寔，子孙世守凉州，保据一方。中原混乱时凉州比较安定，中原汉人来避难者络绎不绝。汉族士人在此传授儒学，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和学说。后前凉通过敦煌控制了西域，加强了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当时中国与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这是当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较长时期里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权力争夺的中心地区在中原，敦煌虽有统属权的不断变更，甚至自立的政权存在，但斗争相对地平稳，过渡也平稳些。

后赵时徙居中原的氐族，乘后赵崩溃之际，西归关中，公元 351 年，在长安建立前秦。前秦统治者苻坚废除了一部分后赵的苛政，恢复魏晋以来的士族特权，重用汉人王猛治理国家，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其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③，可见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交往都比较发达。前

① 《太平御览》卷九七《赵王伦》。
② 《晋书》卷四《惠帝纪》。
③ 《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车频《秦书》。

秦在公元 370 年灭前燕，公元 376 年灭前凉和代，不久又夺取巴蜀，进入西域，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前秦对敦煌经营是费尽心机的，这与苻坚的“雄才大略”有一定的关系。但西北部关系的和谐顺畅，并不能挽救其中原战场的失利。淝水战后，北方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持续时间达数十年之久。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过五个短期的分裂小王国。陇西鲜卑乞伏部乞伏国仁建立西秦，都苑川（今甘肃榆中）；氐人吕光建立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与拓跋部同源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秃发乌孤建立南凉，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杂有卢水胡的匈奴沮渠部沮渠蒙逊建立北凉，都张掖；汉人李暠建立西凉，都敦煌。在西北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在这里起主导作用，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把这一地区统一起来。这些小国彼此征战吞并，混乱持续了很长时间，给西北各地，包括敦煌的生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北魏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拓跋部的杰出人物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定都平城。以后太武帝经过连年攻战，于太延二年（公元 436 年）灭北燕，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灭北凉，完成了北方及西北大部的统一。

北魏在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多方面，积极进行汉化，推动了鲜卑族本族的前进，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鲜卑族、其他民族和汉族的融合，从而推动了整个北方地区的社会进步。

柔然是东胡的苗裔，北魏太武帝改称蠕蠕，《宋书》、《南齐书》称芮芮，《隋书》称茹茹，都是同名异译，其统治者姓郁久闾。

柔然人“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①，也“无文字，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②。西晋、十六国时期，柔然社会中还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这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① 《宋书·索虏传》。
② 《北史·蠕蠕传》。

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道武帝时，拓跋部向南发展，柔然势力趁机逐步扩张，“‘西则西域之地’……。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①。这时，柔然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提高了军事战斗力。

5世纪下半叶，柔然同北魏常有来往，佛教已经敦煌传入柔然中，西域商贾也时来贸易。

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柔然内乱。北魏分裂后，柔然先后归属西魏、东魏和北齐。其时，柔然屡为北方新崛起的突厥所败，一些从属部落也屡起反抗，为此他们陆续离开蒙古高原，向西远徙。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突厥灭柔然，柔然人除原已入塞者逐渐与北方各民族融合外，主要部分转移到了中亚和欧洲去了。柔然民族对促进西北与内地交往，中国与中亚、西域交流曾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北周的统一北方和隋朝继起而统一南北，都是在民族融合的情况下进行的，反过来又促进了各族间的进一步融合。我们从敦煌户籍残卷中，看到不少姓名如白树合、令狐仙尚、卑二郎、索思礼、安游璟等，显然来自少数民族，但他们在均田制下和汉人融为一体了。还有大量的如乌丸、丁零、卢水胡、屠各、羯、匈奴等民族，隋唐时已不见他们活动的记载，显然他们已和汉人互相融合了。由于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加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而敦煌地区地处民族融合的前沿，特别是通过当时的文化融合与再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① 《北史·蠕蠕传》。

第二节 曹魏时期对敦煌地区的松散统治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的主力,当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余众依旧坚持斗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战乱频繁,各豪强集团拥兵自立,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混战,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 208 年,曹操赤壁战败后,开始了巩固后方,统一关陇的日程。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曹操命钟繇率大将夏侯渊等由洛阳向关中、陇右推进,并亲临前线指挥,两军对峙于渭水。曹操利用韩遂、马超为首联军的矛盾和相互猜忌的弱点,一举击溃了对立的关中陇右联军。到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 年),韩遂身死,马超败走,曹操基本解决了在西北地区的劲敌。同时,曹操派遣大将夏侯渊攻杀了在枹罕(今甘肃临夏)称了三十年“河首平汉王”的宋健,陇右一带从此都并入了曹操统治的势力范围之内。

建安二十五年,即魏黄初元年(公元 220 年),曹操病死,曹丕继立为魏王。十月,汉献帝让位,曹丕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曹魏政权名实俱备,河西四郡陆续并入曹魏政权统治势力之内。

当时的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名义上为曹魏政权的势力范围,属其管辖,但实际上“河右扰乱,隔绝不通”。武威颜俊、张掖张进、酒泉黄华,“各据其郡,自号将军,互相攻击”,“河西大挠”。只有敦煌信守魏地,较为安宁。其时恰遇原任敦煌太守马艾病死于职,当时敦煌又没有副职继任,于是敦煌人推郡功曹张恭代行长史职务,统领敦煌。张恭为敦煌世族,平时为人练达持重,恪守信渝,品学端

庄，受人尊重。他执掌敦煌郡事后，开始和曹魏朝廷取得联系。他派自己的儿子张就亲自去觐见魏王曹操，为敦煌请求太守。张就东行至酒泉，被割据酒泉的黄华扣留，并胁逼其投降。张就拒不屈从，并遣使密信于其父张恭，要求以大局为重，出兵酒泉，讨伐叛逆黄华，且不要顾及父子之间的小爱而延误国家之大计。于是张恭一方面派他的从弟张华率兵攻取酒泉的沙头、乾齐（今玉门市境内地）二县，并亲率一支劲旅“寻继华后，为首尾之援”。另一方面，他又选派精骑二百悄然沿长城一线绕道酒泉北塞，由间道进入张掖，对割据张掖的张进给予突然袭击。果然张进措手不及无法应付，急忙向酒泉黄华求援。此时，黄华也精疲力竭，穷于应付。欲东救张进，又怕张恭抄其后路，腹背受敌，在恐惧之际进退维谷，无奈败局已定，张进、黄华只好东走金城向魏投降。河西走廊一带正式归于曹魏一统。魏又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维持这一地区的统治。河西走廊地区和敦煌及西域的道路畅通了。

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曹丕特下诏书，表彰张恭护境平乱的功绩，赐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进驻西域。张就随后也被提升为金城太守。张氏父子为曹魏时期边地的平安和通畅做出了贡献，为后人所传赞。

从东汉（公元 25—220 年）到三国时期（公元 220—265 年），屯垦的范围日益扩大。其中有著名的青海、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屯垦区。

特别是曹魏时期大兴屯田，军队就地实行军屯以充粮饷；招募迁徙农民组织起来民屯，并设置了屯田官。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河西及敦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曹魏时，还大力推广使用耧犁和先进的耕作技术。耧犁耕作下种法，始创于西汉的赵过，曹魏嘉平中，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推广到敦煌一带，并改进了灌溉方法。“初，敦煌不甚晓旧常灌溉潴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

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① 农具的广泛使用和水利灌溉的发展，既适应了当时大规模屯田和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更是曹魏时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因素。同时，小农经济或自耕 农的个体经济，是当时田租户调的主要承担者，也起了重要作用。

曹魏和西域少数民族，通过敦煌有着较频繁的交换往来。仓慈为敦煌太守时，当地豪族与西域等民族贸易中，常有欺诈行为，慈皆为慰抚，或以府中现物和西域商人交市。有要到洛阳等内地经商和要回原地的，就给予过所，派人护送。同时，仓慈对当时的土地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良，相对地解决了当时高度集中的土地状况和大量存在的赤贫农户，并肃整了混乱的社会秩序，为曹魏时期边疆重镇敦煌的安宁安定和繁荣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敦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仓慈老死住所后，"敦煌人悲痛如丧至亲"，西域人们为其修祠立庙，远道祭祀。

第三节　西晋时期对敦煌地区的短暂统治

曹魏后期，朝政大权落入河内士族司马氏家族手中，司马懿杀曹爽而掌握了曹魏的实权，司马昭派邓艾、钟会灭掉蜀汉，司马炎夺取帝位后灭掉孙吴，"三国总归司马氏"，分裂局面暂复归于统一。自曹魏咸熙二年(公元 265 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经西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灭吴统一中国，至建兴四年(公元 316 年)愍帝出降后被杀，晋元帝司马睿立于江东东晋，历时 51 年为我国历史的西晋时期，其统一与立国的时间是十分短暂的。

---

① 《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西晋王朝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置凉州刺史部，敦煌地区属凉州。当时的敦煌郡所辖各县分别为：敦煌、龙勒、广至、宜禾、冥安、深泉（即汉时渊泉）、效谷、昌蒲（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一带）等八县，郡治在敦煌。有户 6300 户，人口约 35000 人左右。其时的敦煌地区是我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融合的地区之一，也是延续汉魏时期佛教与我国原有各种宗教的交汇认同时期，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西晋初年，东吴降将吾彦由星城调任为敦煌太守。吾彦才干卓著，文武皆备，在其担任敦煌太守期间，曾躬耕力行，劝民生产，使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延续了曹魏嘉平中的繁荣，出现了“家给人足，晏然富庶”的新局面。同时，敦煌地区社会秩序安定，老百姓对吾彦太守非常信赖和拥戴。《晋书》赞誉说：“镇抚数年，恩威并著”。为敦煌当时暂短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晋王朝的极端腐败，贵族豪门的争权夺利，“八王之乱”的大规模战乱，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终于爆发了北部和西北各地各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曹操统一北方后，分匈奴为五部，司马炎称帝后，塞外匈奴又有二万余落归附西晋，入居于河西故宜阳等地，逐渐与汉族人杂居融合。其时，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样，受着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压迫和经济的剥削。

东汉末年，鲜卑大人檀石槐立，东败夫余，西击乌孙，东西占地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尽有匈奴故地，分其境为三部，其中上谷以西至敦煌地区，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许多鲜卑人与汉族人杂居于秦凉一带，民族间相互影响很大，融合显著。

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 270 年），凉州的鲜卑族秃发树机能，曾起兵反抗十年有余，最后晋武帝选用马隆为武威太守，于咸宁五年（公元 279 年）十二月，击斩树机能，平定了凉州。

匈奴、鲜卑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反抗西晋统治阶级的压迫中，转而趁机争夺政权，掠夺人民，破坏生产，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

开始陷入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的纷扰割据中。当时的敦煌地区虽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周围大环境的影响,但由于其地极西北偏远,距离统治者争夺政权地带稍远,所以有一个较为安定的时期。

第四节　十六国时期敦煌地区的基本形势

一、前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前凉张轨,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晋惠帝时,他在京城洛阳做散骑常侍。赵王伦当国,张轨亲身体会到朝政混乱,于是想到距离洛阳较远的河西走廊一带,保据一方,所以向朝廷提出去凉州。永宁元年(公元 301 年),西晋政府发表他为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张轨家世以儒学知名,曾被张华赏识,因被品定“为二品之精”[①]。他到任凉州后“课农桑,拔贤才,置崇文祭酒,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当时凉州一带在张轨的治理下,政治局面稳定,成为西晋乱后中原人士的较好避难地之一。

当时鲜卑人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一带者较多,张轨悉予妥善安排,若有鲜卑贵族桀黠难制,甚至侵扰地方时,张轨则毫不留情地进行讨伐。他还延用当地有才干能力的封建贤达人物来共同治理凉州,不久就“威著西州”。惠帝永兴二年(公元 305 年),鲜卑若罗拔能拥众十余万,自漠北向河西进攻,侵入凉州。张轨遣宋配领兵阻击,斩拔能,俘鲜卑十余万口,安置于河西走廊各地,于是张轨更加“威名大震”。西晋永嘉中(公元 307—312 年),怀帝被刘聪、王

---

① 《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前凉张轨》。

弥、石勒围困在洛阳城内，“所在使命莫有至者，(张)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①]。洛阳沦陷后，“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②]，张轨“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今武威)，置武兴郡”。“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③]。张轨团结各族人民，努力发展河西经济，还下令铸造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过张轨的辛勤治理，当时“中州虽乱，此郡安全”，河西成为当时较为安全安定的地区，因而关中和中原大量流民纷纷西来，归制于其，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文儒名士，故史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张轨在凉州执政13年，始终以维护西晋的统一为己任，以西晋忠臣自居自律。

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张轨派遣3000人去保卫长安。临终前，还嘱咐文武将佐：“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安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④]。当时张轨被封为太尉、凉州牧。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张轨死，至张祚称凉王时，追尊轨为武王。张轨死后，其子张寔、张茂相继立。张寔曾派兵救援晋愍帝，张茂曾抗击刘曜的进攻，又曾攻取陇右南安(甘肃陇西境)之地，以置秦州。为此，这时凉州一带还是北方较安定的地区。《晋书·张寔传》记载当时的歌谣说：“秦川中，血流腕，唯心凉州倚柱观。”即可见当时一斑。

张寔继立后，被晋愍帝正式任命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张寔认为当时长安守御困难，还“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等物援助长安，后长安失守，张寔又收容了西晋宗室疎属南阳王司马保残部分散投奔凉州的一万余人。公元320年，张寔为其帐下阎沙等所杀，寔弟张茂诛阎沙等，自称凉州牧。当刘曜大举进攻前凉时，张茂知刘军不可能持久，而刘曜也不过趁灭陈安之后虚张

---

① 《晋书·张轨传》。
② 《晋书·张轨传》。
③ 《晋书·地理志》。
④ 《晋书·张轨传》。

声势，要张茂称藩，及张茂遣使称藩并献牛羊珍宝后，刘曜就退去了。公元 324 年，张茂病死，无子，兄张寔子张骏继位，称凉州牧、西平公。“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① 其间，敦煌属前凉政权所辖。近年在敦煌市境以东佛爷庙、新店台墓地，多次出现前凉时期墓葬，出土有“建兴二十五年”（公元 337 年）、“升平十三年”（公元 369 年）等分属西晋、东晋纪年的器物，足以证明张氏虽建元改制，但仍拥戴晋王朝为其正宗统治者。张骏时期，是前凉最兴盛的时期。

张骏之子张重华继位后，也还能够“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刘曜曾封张茂为凉王，崔鸿《十六国春秋》亦载张重华已称假凉王。重华之后，由子灵曜继位，但不久骏庶长子张祚废灵曜而自立，称凉王，改元为和平元年（东晋永和十年，公元 354 年）。张祚族人张瓘，又拥立灵曜弟张玄靓而杀张祚。以后张骏少子张天锡，又杀张玄靓而自立。前凉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位，自相残杀，促使政权逐步走向下坡路。而其时，正是前秦王朝走向强盛的时期，公元 376 年，前秦苻坚征调步骑 13 万人进攻前凉，张天锡先后征调 10 万军队进行抵抗，两军几次战斗，前凉大败，张天锡被迫出降，前凉终于灭亡，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开始进入前秦王朝统治时期。

前凉共历 76 年，虽然是封建的地方割据政权，但其间的张氏统治使得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劳动人民的农业畜牧业生产基本不遭破坏，中原流亡到河西地带的人民也得以安定下来，并保存了许多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河西及敦煌地区也

---

① 《晋书》卷八六《张轨传附张骏传》。

就自然成为当时汉族先进文化的发展传播的重要据点，这一历史任务是张氏前凉所完成的。

二、前秦时期的敦煌地区

前秦苻坚，随苻健入关时封为龙骧将军。其人博学有才气，结交王猛、吕婆楼等才干卓著之人，以图经世之宜。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苻坚联合苻法等入宫杀死苻生，继立帝位，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在王猛等人辅佐下，劝课农桑，鼓励生产，使“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①。苻坚虽是氐族人，但“生而聪明”，“博学多才艺”，向有“统一四海”的宏图战略。曾实行禁奢侈，与民休息，惩罚和诛杀豪强，抑制权贵，广兴学校等多项措施。

随着前秦苻坚对前凉的攻灭，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被统一，河西走廊的敦煌归于前秦统治。前秦王朝为了有利于对西域的经营，首先开始了对敦煌的经营。前秦苻坚对敦煌的统治权确立后，曾迁徙江汉之民万余户，中州之人七千户到敦煌，完成了继汉武帝之后，在敦煌地区的最多的一次移民，为在边境各族和邻国提高威信并加强联系奠定了基础。他派梁熙出使西域各国，并以彩缯分赐西域各地方政权，“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太元六年（公元381年），“大宛献汉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国献火浣布，羌抑摩献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②。

其时还有车师前部王弥寘、鄯善王休密驮经敦煌来长安见苻坚于西堂，寘等建议，“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

① 《晋书·苻坚载记》。
②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五《前秦苻坚》。

定西域”[1]。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吕光出兵时,苻坚送于建章宫,对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教之,以示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2] 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吕光出长安,经河西,到敦煌,出玉门关,讨平西域三十六国。吕光在西域“耀武西域、恩威甚著”[3]。随后,用两万多匹骆驼满载西域各国的贡品“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4] 数千,还相随着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胜利东归。

其后,苻坚用吕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进封顺乡侯。至此,苻坚加强并巩固了通过敦煌为基地对西域的统治,吕光成为敦煌及西域的最高地方官。

三、后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后凉主吕光,略阳(今甘肃天水市东北)氐族人,前秦太尉吕婆楼之子。为前秦苻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5]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吕光在西域和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取胜之时,也是苻坚从淝水之战败归之际。当时吕光听从部将及鸠摩罗什建议,以“赴难”为号召,急速东进,全师而还。

吕光大军所至,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均献地归服。吕光大军及随行“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6] 至玉门时,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五万阻击吕光于酒泉。吕光大败梁熙后斥其“无赴难之诚”而杀之,并乘势进入凉州刺史的治所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市),割据凉州,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

---

① 《晋书·苻坚载记》。
② 《晋书·苻坚载记》。
③ 《晋书·吕光载记》。
④ 《晋书·吕光载记》。
⑤ 《晋书·吕光载记》。
⑥ 《晋书·吕光载记》。

公元 385 年，吕光得知苻坚被姚苌所杀后，于次年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领护匈奴中郎将，建元太安，史称后凉。公元 389 年，吕光又改称三河王，改元麟嘉，公元 396 年，再自立为大凉天王，并署置百官。其时，占据酒泉的王穆不服，也自称大将军、凉州牧，和吕光抗衡。

王穆为了能够在酒泉站稳脚跟，曾亲自率兵西征敦煌，以扩充势力范围，增加军事补给基地。但遭当时的敦煌太守索嘏率须的敦煌军民的奋力抗御，双方相持于凉兴（今甘肃安西县），难决胜负。吕光闻信，对部下称："二虎相攻，此成擒也"①，即借此良机，亲率步骑二万余众，袭取酒泉，进占凉兴，消灭了王穆势力，敦煌遂为吕光所并。1981 年敦煌佛爷庙墓群出土的一件有"麟嘉八年"纪年的五谷瓶，确证当时后凉对敦煌的统治时期，其农业生产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吕光依靠其氐人为骨干的七万五千军队，称霸于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但此地原非氐人居住地区，吕光要扩充他的军事力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同时，后凉经常与其周围的部落贵族进行战争，折损兵力不少，这样军事力量就逐渐削弱了。加之，吕光统治时期，刑法峻重，晚年又听信谗言，故时人说："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连城。"②沮渠蒙逊、段业原来都是吕光的部下，后来都叛吕光而自立。

公元 399 年，吕光病死，太子吕绍继立，吕光庶出长子吕纂，当年即杀吕绍又立，以后吕光弟吕宝的儿子吕隆又杀吕纂再自立。吕氏集团的互相残杀，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政事败坏亦可见。加之战争连年，致使生产大受破坏。吕光时谷价曾贵到一斗五百文钱，吕隆被沮渠蒙逊围攻时，"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

① 《晋书·吕光载记》。
② 同上。

死者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①，给河西走廊一带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由于南凉、北凉的交相攻逼，吕隆降于后秦，被迁于长安。后凉自吕光据凉州至吕隆降后秦，共历时18年（公元386—403年）。其时对敦煌的真正统治约有15年左右，其间还是和北凉、西凉政权交替穿插进行的。

四、西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李暠，字玄盛，陇西狄道（甘肃临洮）人，汉代李广的第十六代孙。吕光末年，段业据张掖，自称凉州牧，以李暠为效谷（今甘肃敦煌市西）令，后为敦煌太守。段业继称凉王后，其部下索嗣拟夺取敦煌太守位，被李暠挫败。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北凉晋昌太守唐瑶，联合敦煌、酒泉、凉兴、建康、祁连和晋昌六郡，公推李暠为冠军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沙州刺史，并建元庚子，定都敦煌，建立西凉国。当时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一时于阗致玉，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②。李暠分封官吏，攻取了玉门关以西诸地，并广田积谷，以为东伐之资。敦煌成为河西走廊西部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之一。

西凉政权作为一个汉族人建立的政权，其中原文化影响极大。李暠曾在敦煌起设学校，增高门学生500人。且李暠本人就是一个擅长文学的政治家，其赋在五凉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西凉政权建立后，李暠首先扩其疆域，在原有敦煌郡的基础上，逐渐占领了东自建康、西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地区。所辖郡11个：西海（今居延地）、建康、凉宁（今甘肃金塔县）、祁连（今甘肃临泽县）、酒泉、会稽（今甘肃玉门市境内）、晋昌（今甘肃玉门镇西）、凉兴、广夏（今甘肃安西踏实）、敦煌、高昌等，约有28个县。另又置武威、武兴、张掖三个侨置郡（均在今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

① 《晋书·吕隆载记》。
②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县境)。但当时李暠长时期实际所控制的郡县不过酒泉、敦煌、安西诸地,所以言"地狭民少"。

李暠所建西凉政权毕竟是一个汉族政权,所以他对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仍奉表称臣,多次表达他为恢复晋室的统一事业愿做贡献的决心。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李暠派舍人黄始、梁兴等人带着他给晋王朝皇帝的表章,去东都建康(今江苏江宁县南),用窦融、张轨治理河西,威镇关西的故事,表示他对晋王朝的忠诚,以求得晋王朝对他所建西凉政权的承认,敦促晋王朝北伐西征。因没有得到朝廷的明确答复,遂于第二年又派遣法全和尚为使者,再入建康奉表以求,以"忘寝与食、思济黎庶、以崇国宪、全制一方"的情感,进一步表达他的心愿。

鉴于当时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境内数经战乱,地广人稀"的状况,急需补充人力资源,以恢复生产,安定民心。李暠发出号令,动员流民归田,行事农桑。李暠亲自深入到农村劝导农民种好庄稼,使"百姓蒙赖"。一时间战乱时出逃于武威、张掖等地的流民7000 余户返回敦煌。同时他又组织了在玉门关、阳关附近地区的屯田,采取"寓兵于农"的发展生产措施,"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积极为统一河西走廊作准备工作。

晋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李暠为了抗御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不断骚扰,采纳部僚意见,迁都酒泉,并上书东晋王朝。先是,苻坚曾迁江汉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人也迁来 7000 余户,当时张掖、武威以东,西迁敦煌者亦有数千户。李暠既迁酒泉,这些人户大部分随迁于酒泉郡,分南人 5000 户置会稽郡,中州人 5000 户置广夏郡,余 13000 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可见当时敦煌的人口数量,是敦煌历史上少有的高峰时期之一。

李暠迁都于酒泉后,敦煌地区由他的三子李让镇守,并派他的同母弟宋繇辅佐。李暠临行酒泉时劝诫李让:"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郡……吾临

莅五年，兵难骚动，未得休众息役，惠康士庶……”要求李让以“惠政”来弥补自己给敦煌百姓带来的征战和徭役。

李暠西凉政权迁都酒泉后，积极整军修武，励精图治。修筑了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同时为了防止当时建都张掖的北凉沮渠蒙逊的骚扰和进攻，修筑了西南二围。从而使北凉虽数次用兵，企图消灭西凉，均未得逞。双方只得于西凉建初六年（公元410年），订立盟约，宣布停战罢兵。自此，西凉国势日益强盛，百姓乐业，国内安富，曾出现了一度的升平盛世的景象。李暠知人善任，虚衿下士，广招英俊。当时“为群雄所奉，遂起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①，在治理国家方面，不愧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

西凉建初十三年（公元417年），李暠病卒，享年65岁。死后谥为“凉武昭王”。同年，其子李歆继位，东晋王朝封其为“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护羌校尉、酒泉公”。当李暠初起时，“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沮渠蒙逊基宇稍广”②，李暠虽有大志，但步骑兵合计仅有三万人，军事力量较虚弱，不但不能如愿，且时为北凉所攻逼。

李歆，字士业，在他统治西凉时期，“繁刑峻法，宫室是务，人力凋残，百姓愁悴”③，丧失民心，加之沮渠蒙逊的不断进攻，日益衰败。当时西凉近邻劲敌兵力很强，西凉已远非其敌手。公元420年，李歆听说北凉主沮渠蒙逊出兵东伐西秦乞伏炽磐，便想乘虚偷袭沮渠蒙逊的根据地张掖。沮渠蒙逊有意布置疑阵，实际上并没有引兵东去，而是把军队埋伏在李歆进军的道路上，以便进行伏击。李歆率步骑兵三万东出，中伏大败，不肯退兵，率众与沮渠蒙逊决战于蓼泉（今甘肃高台县西），结果全军覆没。李歆被俘虏后死于沮渠蒙逊之手，蒙逊随之入据酒泉，西凉亡。

---

①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②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附李士业传》。

酒泉失守后，李歆弟李恂，带领残部，西奔敦煌，婴城拒守，自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沮渠蒙逊亲自率兵二万督战攻敦煌城，一连数月不下。最后，沮渠蒙逊利用党河水，"三面起堤，引水灌城"，结果城陷，李恂自杀，蒙逊纵兵屠城。西凉残部李暠之孙李宝、唐契被俘，解送武威，后伺机逃到伊吾，依附于柔然，后降北魏。敦煌一时成为城圮人亡之地，满目疮痍。

五、北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北凉主沮渠蒙逊，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卢水即今天的黑河，沮渠是匈奴的官名，据说沮渠蒙逊的祖先做过匈奴左沮渠这个官，所以以官名为氏。蒙逊祖上世居于卢水，是这里部落的酋帅，蒙逊的祖父沮渠祁复延，封狄地王，蒙逊的父亲法弘，被苻秦任为中田护军。"蒙逊代父领部曲……为诸胡所推服"①。

卢水胡虽然很早就居住在河西走廊的黑河流域，但由于他们还是过着游牧的生活，所以一直到十六国时期，还维持其部落组织，沮渠氏就是这个部落组织的酋长。从卢水胡的姓名来看，如晖仲归、祁复延、罗仇、蒙逊、日蹄、颇罗、牧健这些字音，他们应该保存着自己的部落语言，可是既然长期和汉族人错居，必定又娴习汉语，像沮渠蒙逊不仅通晓汉文，而且"博涉群史"②。卢水胡沮渠部落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经济文化生活和汉化程度，仅次于氐苻氏、羌姚氏，而要远远高出于鲜卑乞伏氏、秃发氏。卢水胡的分布地区虽然很广，安定、杏城都有他们的足迹，但河西走廊的张掖郡一带，是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最终为了保卫自己的部落，经过武装过程，逐渐形成为一支武装力量。割据河西地区的吕光、段业都想支配这支武装力量。

晋隆安元年（公元 397 年），后凉吕光命沮渠蒙逊伯父罗仇、麴

① 《宋书·氐胡传》。
②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粥从征乞伏乾归，吕光弟吕延战死，前军大败。吕光归罪于罗仇、麴粥，并处死了他俩。沮渠蒙逊是罗仇侄儿，他那时在姑臧“自领营人配厢直”①，担任宿卫工作。罗仇和麴粥被杀后归葬临松，卢水胡诸部前来送葬者有一万多人。蒙逊遂与诸部结盟起兵，攻下凉临松郡，屯据金山（今甘肃山丹县西南）。这时沮渠蒙逊的堂兄沮渠男成也聚众数千反凉。他们共推后凉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建元神玺元年，以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张掖太守、沮渠男成为辅国将军酒泉太守，委以军国大政。

第二年（公元 398 年），段业攻取张掖即进据之，自称凉王，改元天玺。

段业本京兆汉人，博涉史传，有尽牍之才，先任吕光部下杜进记室，从征西域，后逐渐升官，为沮渠氏拥立。但他是个儒者，没有威武权略，又爱讲迷信，喜听谗言，“无鉴断之明”。隆安五年（公元 401 年），沮渠蒙逊诱使段业以谋叛之名杀沮渠男成，却又借口段业妄杀无辜，集众一万人攻破张掖，杀死段业，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这就是正式的北凉政权的建立。

此时孟敏担任敦煌太守，李暠为效谷县令。不久孟敏去世，敦煌护军敦谦、沙州治中索仙等人，认为李暠“温毅有惠政”，公推为敦煌太守，于是李暠正式称藩于北凉政权。

沮渠蒙逊既据张掖，屡败西凉李氏。秃发傉檀取得姑臧城以后，遭到夏主赫连勃勃的攻击，实力大损。沮渠蒙逊又屡败秃发傉檀，多次进兵包围姑臧。最后秃发傉檀只好放弃姑臧城，退回乐都。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 411 年），沮渠蒙逊终于据有姑臧城，次年迁都于此，改称河西王，改元玄始，置百官，建筑宫殿，史称北凉。

公元 420 元，沮渠蒙逊灭西凉，取酒泉、敦煌，河西走廊完全为

① 《宋书·氐胡传》。

沮渠蒙逊所占领。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郡治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金城、西平、乐都等郡地。并且交通西域诸城邦，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西南）王比龙经敦煌等地亲自到姑臧访问，其它很多城邦同北凉有友好往来，西域三十六国，都向沮渠蒙逊称臣。

另则沮渠蒙逊又向东晋、刘宋称藩臣，互派使者往来，晋、宋都曾封其为凉州刺史。沮渠蒙逊虽为张掖卢水胡人，却"雄杰有英略"，汉语程度很高。他治理北凉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强国富民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鼓励人民努力耕作，发展农业生产，秣马厉兵，继续向各地进军，消除后凉的威胁。这对稳定北凉统治，巩固北凉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约束部下执法甚严，其伯父中田护军纵容亲信临松太守孔笃骄奢淫逸，侵害百姓，称霸一方，他闻知后遂责令伯父和孔笃自杀，并称："乱吾国者，二伯父也。"① 其法不避亲的所为，深得人心。

宋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沮渠蒙逊病死，第三子沮渠牧犍继立，亦称河西王（《晋书》、《宋书》、《太平御览》等作茂乾，《魏书》等作牧犍）。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攻北凉，占领姑臧，擒牧犍，北凉灭亡。北凉自沮渠蒙逊至沮渠牧犍二世，计39年（公元401—439年）。段业称凉州牧、凉王四年，一般不计在内。沮渠牧犍虽被俘，但牧犍弟沮渠无讳、沮渠安周还称王于高昌多年，后终为柔然所灭。

① 《晋书·沮渠蒙孙载记》。

东晋十六国五凉兴亡表

政权建创者	政权名称	政权建制族别	都城	政权起止年代（公元）	统辖疆域	消亡者名称
张轨	前凉	汉	姑臧（武威）	301—376	甘肃西部、宁夏西部、新疆东部	亡于前秦
吕光	后凉	氏	姑臧	386—403	甘肃西部和宁夏、青海、新疆一部分	亡于后秦
秃发乌孤	南凉	鲜卑	乐都（青海地）	397—414	甘肃西部和青海一部分	亡于西秦
沮渠蒙逊	北凉	匈奴	张掖（后迁姑臧）	397—439	甘肃河西走廊	亡于北魏
李暠	西凉	汉	敦煌（后迁酒泉）	400—421	甘肃高台以西，西至新疆天山南	亡于北凉

第五节　北魏时期的敦煌地区

鲜卑族自东汉、三国以来，经常和汉人接触，据有匈奴故地，东起辽东，西到陇西、河西，都有鲜卑族各部居住。其中徒河慕容氏、陇西乞伏氏、河西秃发氏在十六国时都已在中原、陇西、河西建立政权。

拓跋氏这支鲜卑部落，《通典・边防典》说是"别部鲜卑"。原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到拓跋力微的父亲圣武皇帝诘汾时，经历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始居匈奴故地"①。到拓跋力微以前，拓跋部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时期。自拓跋力微至拓跋珪时，为原始社会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和形成国家的过渡时期。由于汉族封建社会的巨大影响，通过拓跋部内部的转化因素，拓跋部进入阶级社会时，奴隶制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展，就过渡到了封建社会，但还残存着大量的家长奴隶制。

登国元年（公元 386 年），拓跋珪即位为代王，随后，改称魏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拓跋珪先行统一大漠诸部，东破库莫奚，西破高车，又灭匈奴别部刘卫辰，获得名马 30 余万匹，牛羊 400 余万头。皇始二年（公元 397 年）前后，拓跋珪尽取黄河以北与东晋相峙。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拓跋珪迁都平城，进称魏帝，即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死后，其子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继立。嗣死，子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立。

公元 439 年，北魏灭建都张掖的北凉，原北凉酒泉太守沮渠无讳西奔敦煌，继续与北魏对抗。太平真君三年（公元 442 年），太武

① 《魏书》卷一《序纪》。

帝拓跋焘，派兵攻打西逃敦煌的北凉残余沮渠无讳。“无讳自率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①，逃到鄯善，归于吐谷浑。此时西凉李暠的孙子李宝乘敦煌空虚之时从伊吾打回敦煌，奉表归降于北魏。

李宝，字怀素，其父李翻曾任西凉祁连、酒泉、晋昌三郡太守。西凉灭亡后，李宝被俘囚于武威。后伺机西逃伊吾，臣于柔然，同时随去的还有敦煌民众2000余人。李宝在伊吾听到北魏进军河西各地，酒泉城中“粮尽兵疲，饿死万余口”，敦煌朝夕难保的消息后，率众从伊吾东奔敦煌 。此时的敦煌城人去城空，一片狼藉。面对残墙颓壁、满目疮痍的敦煌，李宝迅速进行安集居民，“修鄯城府，规复先业”的工作，敦煌开始逐渐恢复。于是李宝遣使奉表降于北魏，北魏封李宝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域校尉、沙州牧、敦煌公。同时封其弟李怀达为敦煌太守，共镇敦煌。三年后，李宝奉命入朝，遂留于京师平城，后卒于官。

李宝入朝留京后，敦煌废郡置敦煌镇，所辖晋昌戍、酒泉军、乐涫戍、张掖军等。这是北魏政权平定西域，大败柔然，统一北方后，经营西域、阻截柔然西部势力、巩固边疆的一个较大的举措。当时的敦煌镇，大致相当于西汉时期敦煌、酒泉二郡的地域。从敦煌及河西走廊西北部的历史来看，以“敦煌”命名的州郡、军镇，北魏时敦煌镇为最广大，而且镇守敦煌地区官吏的品秩也较高，不仅有大将、镇将的名号，还有敦煌镇都大将的品号，如“敦煌镇都大将穆亮”、“敦煌镇都大将阎提”② 等，可见当时北魏政权认为敦煌及河西西北部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拓跋氏由比较落后的民族进入各地后，虽然迅速向封建社会飞跃，但其统治和剥削都很苛暴，必然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在河西地区境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都很尖锐。太宗永兴五年(公元413年)，河西胡曹龙、张大头等，各拥部众二万人起义；神䴥三年

① 《魏书·李宝传》。
② 《魏书·列传》。

（公元 430 年），河西敕勒千余家“叛走”，被残杀，后又有万余落“叛走”，也被残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 445 年），酒泉公郝温起义，杀守将王幡。

关中盖吴起义失败后，安定卢水胡刘超，又聚众万余人起义，次年即太平真君八年（公元 447 年），吐京胡和山胡曹什浑等又接连起兵反抗。结果虽然失败，北魏统治者却怀疑到北凉降王沮渠牧犍与之有关，因为盖吴、刘超和沮渠牧犍都属于卢水胡。牧犍降魏至此，已经八年，但在这年三月，却追究到八年前投降时敦煌府库被盗劫事件，将沮渠牧犍处死了。

北魏孝文帝时，柔然称霸于西域各地。柔然又译作蠕蠕、芮芮、茹茹，原是鲜卑族的一支，受拓跋部统治。4 世纪末，首领社仑称可汗时，柔然地域广大，东到朝鲜，西包括焉耆以北地区，而以敦煌、张掖以北地区为中心。到 5 世纪 60 年代，柔然贵族对西域开始大规模进攻，他们多次跨越长城，以数万之骑威逼敦煌。虽然每次进犯，都被先后驻守敦煌的镇将尉眷、尉多侯、乐洛生相继击退，但战争也给敦煌及附近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为此，当时尚书省给皇帝建议认为：敦煌地处僻远，而且夹于吐谷浑和柔然国的中间，终究难以自保，为此主张把敦煌并入迁徙凉州，放弃敦煌。独有给事中韩秀认为此举不可，他认为：“敦煌之立，其来已久……一旦废罢，则关右荒忧、烽警不息、边役繁兴、艰难方甚”①。经过反复争论和斗争，最终朝廷采纳了韩秀的意见，西域门户敦煌得以保全。

太和九年（公元 485 年），北魏孝文帝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遂决定加强敦煌的守备，将敦煌镇升格置都大将，特调派长乐王秦州刺史穆亮为敦煌镇都大将。并于同年以敦煌为军事、粮草后备基地，积极配合西域高车部对柔然的进攻。

公元 487 年，柔然败于高车，第二年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以城

---

① 《魏书·韩秀传》。

降魏。490年高车杀柔然高昌王阚首归，另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并遣使入魏。至此，敦煌地区得到了较前进一步的巩固和稳定，进入了一个暂时的安宁阶段。这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中西交通及敦煌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使敦煌地区佛教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北魏孝昌中(公元525～527年)，敦煌罢镇置瓜州。当时瓜州下属郡县有：敦煌、酒泉、玉门、长乐、会稽、效谷、寿昌7郡；敦煌、鸣沙、平康、东乡、阳关、效谷、寿昌、冥安、新乡、伊吾、常乐、宜禾、广至、凉兴等14县。首任瓜州刺史是北魏宗室明元帝四世孙东阳王元荣。在元荣任职的20多年里，进一步兴建莫高窟石窟，广撰佛经，发展了莫高窟艺术，推动了宗教事业的发展。

第六节　西魏北周时期敦煌地区历史状况

北魏末年的各地人民起义，动摇了北魏政权的基础，北魏大权转入镇压起义的尔朱荣手中。经过几年的权力争夺战，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元脩不胜高欢的独断凌逼，入关投靠宇文泰。高欢另立清河王亶之子元善为帝，这就是孝静帝，于是东西魏分立，敦煌及河西地区当时归属于西魏统辖。西魏(公元535—556年)时，宇文泰执掌政权，当时忙于与东魏的战争，无暇西顾。至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月，宇文泰死，他的第三子宇文觉继为太师、大冢宰。十二月，魏又封宇文觉为周公。宇文觉随即称帝，这就是北周孝闵帝。于是，西魏名号终了，北周王朝正式开始于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正月。当年九月，宇文觉即被执掌大权的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所杀，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帝，即周明帝。直到周武帝宇文邕杀宇文护后，北周皇权才逐渐稳定下来。在宇文泰和宇文

邕时，进行了不少重要的改革，使得原本弱于东魏北齐的西魏北周，终于转弱为强，灭北齐而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

虽然宇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敦煌就已归北周统属，但由于当时北周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对较为遥远的敦煌进行过多的经营。

周武帝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北周实行合郡并县的举措，将瓜州所属的常乐、会稽、玉门三郡并为常乐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广至、凉兴、渊泉、冥安为凉兴县，寿昌、效谷、敦煌三郡合并为敦煌郡，又并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六县为鸣沙县。常乐郡辖会稽、凉兴二县，敦煌郡辖鸣沙县。

西魏北周时，在苏绰的策划下，宇文家族为了边疆的巩固，政权的稳定进行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改革，为北周统一北方和各民族的进一步大融合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宇文泰执政时就制定实行的尽地利、鼓励耕垦、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均田制和赋役制，对西魏北周的强大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代在敦煌发现《邓延天富等户残卷》①，学术界一般肯定为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 547 年）的户籍或计账。其中邓延天富一户，共五口人，为一丁男、一丁妻、二黄男、一老女（已死）。其课口、不课口、租、布、应受田和已受田如下：

- 凡口五
  - 口一出除　不课　老女死
  - 口四见在
    - 口二不课
      - 口一小男年四
      - 口一黄年二
    - 口二见课
      - 一丁男
      - 一丁妻

计布一匹

计麻二斤

① 《敦煌资料》第一辑。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邓"作"口阝"。"王"改为"口一"，亦据《中国古代籍账研究》。

计租三石五斗
- 二石输租
- 一石五斗折输草三围

计受田口二
- 一丁男
- 一丁妻

应受田卌六亩
- 廿六亩已受
  - 十五亩麻
  - 十亩正
  - 一亩园二分未足
- 廿亩未受

这里具载了此户口数、交纳租布麻数量、应受田亩数及田地类别等。其中麻田男丁十亩，女丁五亩，共十五亩受足。正田（露田）则夫妇规定应受数却为三十亩，且只受十亩。计此各户，除两户麻田不足外，其余七户都受足麻田；正田皆不足。文件还记载奴婢、牛都可受田并交租，又载有“六丁兵卅人”，故定为北周颁布田令前西魏的户籍，大体不差。这一文件的发现，是北周实行均田，发展农业生产的极好佐证，对当时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也可见一斑。同时，北周在宇文氏政权下通过职官和选举的改革以求得贤才；通过府兵制的建立以加强武装力量；通过毁佛运动来抑制寺院经济势力，保证均田制和府兵制的推行。通过改革，巩固了北周的统治，加强了北周的中央集权。建德六年（公元 577 年），北周攻取了邺城，灭了北齐，结束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分裂局面，北方复归统一，为以后隋统一全国打好了基础。

西魏末到北周初，西域突厥部落与魏呼应，击破柔然，铲除了中原与西域交通的障碍，促使中原地区和西域各国的交往迅速发展。鄯善、于阗、龟兹等国都先后派遣使者和北周王朝通好，并献名马和方物。高车部科罗可汗，在魏废帝元钦元年（公元 552 年），一次就向周太祖宇文泰献马五万匹。这对宇文泰镇压关陇起义，控制长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北周建国后，与西域各国“故每联结之，以为外援”。中原与西域，通过敦煌与河西走廊其它地区，一直保持和好的关系。大象元年（公元 579 年），北周静帝宇文衍并将赵

王宇文招的女儿封为千金公主，嫁给突厥沙钵略可汗为妻，以和亲的办法，优礼笼络，使西域各国互相制约，求得西部的稳定。

敦煌是西域与中原交通的重镇，西域与中原修好和稳定，必然给敦煌带来繁荣和稳定。这时期担任敦煌郡守的令狐休，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他在魏大统中曾协助其兄令狐整平息了城民张保“据州叛乱”，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北周初，经宇文护推荐，担任敦煌太守。令狐休清操节俭，奖励耕植，积极为地方多所尽力，把郡内治理的井井有条，“在郡十余年，甚有政绩”[1]。整个北周时期，敦煌的各项事业都呈上升发展的趋势。

---

① 《周书・令狐整传附令狐休》。

第四章　隋、唐时期　敦煌地区走向自己封建时代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第一节　隋代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

公元 581 年，北周皇戚杨坚代周而建立隋朝，接着于公元 589 年，一举灭掉长江以南的陈朝，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

公元 583 年，隋文帝根据当时地方行政机构繁多，“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情况，采纳河南道行台尚书杨尚的建议，实行精简郡县的改革，以利于封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当时，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改置原则，将北周时期的州、郡、县三级行政设置，改置为郡、县两级行政设置。将瓜州改为敦煌郡，改北周鸣沙县为敦煌县。县置以下设保、里、党。五家一保，设保长；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隋代敦煌郡统辖三县，即敦煌、常乐、玉门，其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敦煌、安西、玉门、肃北、阿克塞五县（市）的地域。隋代敦煌郡的人口，按隋志所载有 7779 户，约计 3 万多人口。

在隋文帝统治的 20 年间和隋王朝大业初年期间，当时的敦煌处于“区宇晏加，人殷物阜”的经济繁荣时期。当时，隋文帝“雅好符

瑞”，尊佛教为国教，促进了敦煌各项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加之中西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地处要冲的敦煌占地利之便，因为通西域走欧洲的三条丝路通道都要先到敦煌。

隋文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率所部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走廊至敦煌的界线上，对隋王朝进行骚扰，并占领了西域。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隋用重兵打败了突厥，推进了突厥贵族内部的分裂，突厥形成了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这两个对立的势力。在突厥内部斗争的同时，西突厥集团也时有对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的侵扰。为此，隋王朝几次征发大量农民整修长城，在沿边险要处筑城建塞。

随着突厥贵族不断进行的混战的加剧，到开皇十九年（公元 599 年），倾向隋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汉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汉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汉联合打败，带领部众南下降隋。隋文帝把水草丰美的河套一带划为突厥的牧区，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境建大利城为突厥汗庭。经过短暂的发展，突厥牧区呈现了“人民丰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隋和突厥的互市非常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非常密切，促进了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安定、繁荣和发展。这一形势的转变，对敦煌地区避免劫掠，繁荣经济，发展文化事业创造了外部条件。

隋初，西域被突厥贵族占领着，吐谷浑贵族也经常带领部众向河西走廊进犯，隋和西域的交往受到阻绝，影响着隋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经营。

随着突厥的分裂和衰落，隋通过敦煌与西域的关系密切起来。西域的商人多通过敦煌至张掖交市，隋炀帝派裴矩前往掌管其事。裴矩用厚利吸引西域商人进敦煌入河西到内地贸易，使西域商人往来相继，加强了中原同西北边地人民的相互交往、交流，促进了相互间的发展。裴矩被派驻张掖后，亲自到敦煌等地实地观察，了解敦煌及西域的山川险阻、风俗人情、服章物产等。

隋朝时（公元581—618年），在长城以北和河西走廊实行屯垦，取得了显著成效。整个隋王朝时期，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敦煌地区的经营，大兴屯垦，发展畜牧业，积极开展民族贸易，呈现出了西汉以来开发与发展的新高潮。当时的敦煌地区也是万商云集的西北商业中心，成为中西交流的窗口，因商品经济的成份加大而增强了活力。这既反映了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敦煌地区迎来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唐代开发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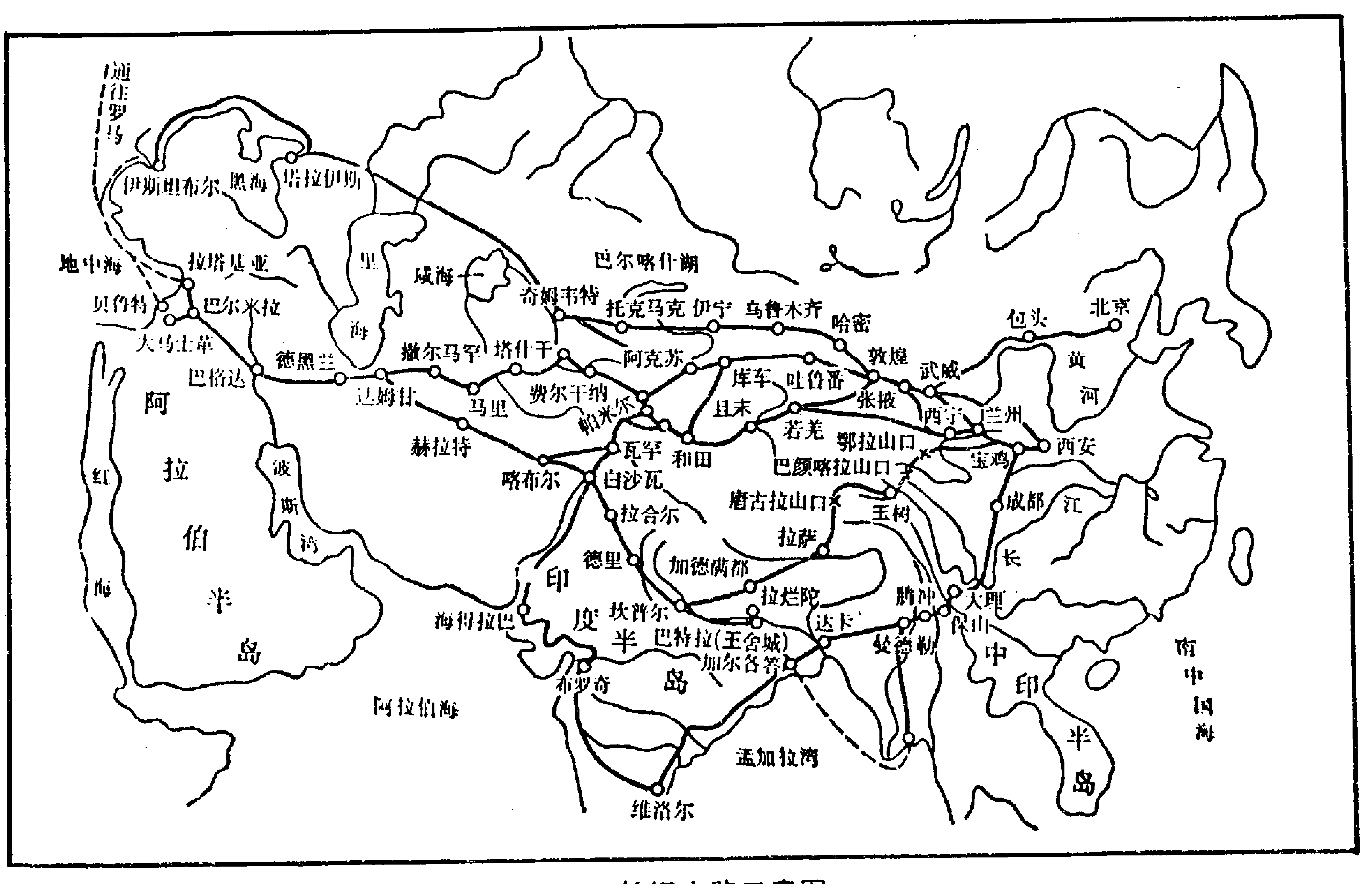
至今仍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序言》里，详细记录了当时出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通道，充分说明敦煌在当时相当长时期里是作为重要的中西交通的补给中继站和枢纽地的。裴矩所录三道是北道（又称新北道）、中道（即汉代的北道）和南道。这是我国史地书籍对丝绸之路走向通道的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记录。这三条经敦煌的通道是：

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今萨斯克湖到乌鲁木齐一带），度北流河水（今楚河、锡尔河），最终到达至拂林国（今叙利亚）。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达葱岭，再经费尔干纳（原苏联境地）等地，最终至波斯（今伊朗）。

南道：出敦煌，经鄯善（今若羌）、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等地，过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至印度各地。

隋大业初年，西域铁勒部所属契弊部首领歌楞，联合薛延陀部首领乙失钵，对曾称霸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发动进攻，一举占领了从吐鲁番到敦煌的广大地区，并遣使到隋朝，表示接受隋王朝的统治。这正好合于隋王朝控制西域通道的思想，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经敦煌出使西域各国，积极调整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裴矩也是同时被派驻张掖主持处理



通往罗马
伊斯坦布尔
黑海
塔拉伊斯
地中海
拉塔基亚
贝鲁特
巴尔米拉
大马士革
巴格达
德黑兰
里海
咸海
奇姆韦特
巴尔喀什湖
托克马克
伊宁
乌鲁木齐
哈密
包头
北京
黄河
撒尔马罕
塔什干
阿克苏
库车
吐鲁番
敦煌
武威
达姆甘
马里
费尔干纳
帕米尔
且末
张掖
西宁
兰州
西安
赫拉特
瓦罕
和田
若羌
鄂拉山口
宝鸡
喀布尔
白沙瓦
巴颜喀拉山口
磨古拉山口
玉树
成都
长江
拉合尔
拉萨
德里
加德满都
拉烂陀
腾冲
大理
保山
扶普尔
达卡
巴特拉(王舍城)
曼德勒
加尔各答
海得拉巴
布罗奇
阿拉伯半岛
红海
波斯湾
阿拉伯海
印度半岛
孟加拉湾
维洛尔
中印半岛
南中国海

图 4　丝绸之路示意图

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间联系、贸易及交通事宜的。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王朝又派军队逼降了伊吾,和高昌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再次以重兵击败吐谷浑,逼使其可汗慕容伏允南走。隋王朝随后即以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今青海都兰东)、河源(今青海东南部)、鄯善、且末四郡,发罪人等前往戍守,并设立军镇,大开屯田,以保护经敦煌通往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丝路商道。

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此间更加显示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正如《裴矩传》所言"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辏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为此隋王朝进行了大力经营。当时使西域地方"相率而来者四十余国。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使者们佩兰玉,被锦罽,焚香奏,尽情歌舞。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河西,在张掖召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时显示了以上的情景。当时河西老百姓也都盛装观看,人群长达数十里,充分显示了隋王朝的强盛和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的繁荣。敦煌作为西域二十七国使者的前应接待站,为这次盛会做出了贡献。舞剧《丝路花雨》正是以这段史实为题材,反映了在敦煌举行盛大交易会的动人场景。这次盛大的接见交易会对宣传隋朝权威,开拓疆域,扩大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隋末,炀帝在"盛世"之下,开始荒淫无道,自然天下大乱。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方割据势力趁机各霸一方,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金城校尉薛举称帝于兰州,改元"秦兴"。当时担任凉州鹰扬府司马的李轨不服,遂起兵一举占领张掖、敦煌、西平等地,于公元618年称"大凉皇帝",占据凉州各地,改元"安乐",敦煌辖属李轨统治。

第二节 唐初期敦煌地区形势及建置

隋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在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杀掉隋炀帝,隋王朝濒于灭亡。隋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事,废掉隋恭帝,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王朝。李唐王朝在关中重建了地主阶级封建政权,即以关中为根据地,逐步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并开始次第消灭遍布全国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

唐王朝建立后,割据西北的地方武装势力,较大的有金城的薛举和凉州的李轨。为统一全国,建立巩固的西北边疆,沟通丝绸之路,就必须铲除这些地主武装的割据势力。唐由李世民率兵经略,首先对付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李世民以远交近攻的办法,联合薛举后方凉州的李轨,致使薛举孤立。不久,薛举死。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李世民进军薛仁杲于折墌城(今甘肃泾川县境),薛仁杲败降,俘至长安被处死。薛氏既灭,李世民进图李轨。唐利用河西走廊粟特商人和汉族地主间的矛盾,拉拢了凉州豪族安兴贵,从内部来反对李轨。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安修仁、安兴贵兄弟攻杀李轨,凉州平定,尽属唐王朝。李世民因此晋封为"陕东道大行台,使持节甘凉等九州诸事"。次年,李世民率唐军又击溃了勾结突厥贵族的刘武周的军队。至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唐平定了各地的地主武装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全国,建成了比隋王朝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李唐王朝经过多年的战争,稳定了全国的局势,特别是稳定了西北边疆地区的局势,恢复了地主阶级在全国较有力的政治统治,也为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敦煌归唐后，仍沿袭旧制称敦煌为瓜州。初时，唐王朝忙于对付东突厥汗国的侵扰和扫荡各地割据势力，无暇西顾，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乘此机会，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十二月，举兵逮捕了驻瓜州的唐朝骠骑将军达奚高，据瓜州举旗反唐，自称"敦煌王"，独霸一方，企图效仿中原各地暂未被唐翦灭的割据势力。贺拔割据敦煌叛唐一年多时间里，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激起了敦煌及附近地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从河西各地征召能工巧匠于敦煌，不惜耗费大量民力、财力，大兴土木，为自己兴建富丽豪华的宫殿——贺拔堂。正像唐写本《敦煌廿咏》对其的无情嘲讽："英雄传贺拔，割据王敦煌。五郡征般匠，千斤是寝堂。绮檐安兽氏，粉壁架鸿梁。峻宇称无德，何曾有不亡。"果然，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五月，敦煌豪族王干联合当地各族民众，一举铲除了贺拔的割据势力，使敦煌上演的这场闹剧顷刻收场，敦煌复归于唐王朝统辖。

贺拔势力覆灭后，唐政府当即于当年分瓜州之常乐县另置瓜州（今安西县），旧瓜州（今敦煌县）改为沙州。瓜、沙州分置后不久，敦煌人张护、李通又效贺拔败举在沙州举兵反唐。沙州总管贺若怀广率领州吏亲随数百人顽强抵抗，死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闻讯后也急派兵救援，但都被张护、李通击败。他们杀了贺若怀广，完全控制了沙州形势，随即率兵东进，攻取瓜州。瓜州长史赵寿伦率兵民拼死抵御，张护、李通无奈仍退守沙州。张护为惑众民心，推沙州别驾窦伏明为城主，积极准备以谋东进，后终因倒行逆施至孤军无援，被迫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秋天，以城降于唐。从此沙州开始逐渐稳定了下来。随着唐王朝在中原地区统治地位的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对敦煌的经营也逐步加强了。

当时唐代的地方政府分州、县两级，州官叫刺史，县官叫县令，其下又分设若干属吏。同时在边缘要冲地区，又设立都督府，官长者称都督，兼管所辖区域各项军民行政。自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河西节度使由凉州徙镇沙州，至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敦煌

一直是都督府的所在地。现存敦煌市博物馆的《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石碑，更进一步确证，当时唐王朝为了加强与西域的联系而在敦煌设立了都督府。

唐代时，敦煌因各种周边及唐王朝势力盛衰，州郡之名屡有变更。唐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高祖李渊时，设瓜州（治所敦煌）；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敦煌更名西沙州，领敦煌、寿昌二县；太宗李世民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敦煌去“西”称沙州；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又改称敦煌郡；肃宗李亨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又复称沙州，至终唐 150 年间，沙州之名再无更改。

唐代沙州的治域，虽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伸缩变化，但在相对稳定时期是非常辽阔宽广的。它直接和于阗接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写于五代后晋天福十年（公元 945 年）的《寿昌县地境》有明确的记载：石城：本汉楼兰国，又名兴谷城，上元二年（公元 675 年）改为石城镇，属沙州。新城：汉名弩支城，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故名新城。屯城：又名小鄯善，汉迁吏士屯田于此，故名屯城。播仙镇：且末城。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公元 676 年）改为播仙镇。除所载上述各城，《寿昌县地境》尚有：葡萄城、薛毗城，鄯善城、故屯城、蒲昌海、且末河等，均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境内。由此可见，唐代沙州的辖地已包括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路、丝绸之路南道的大部分地区。

隋唐之际，吐谷浑可汗伏允尽收河湟之故地。唐高祖时内地民乏耕牛，吐谷浑以牛和杂畜与唐互市。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唐军击败吐谷浑，伏允为左右所杀。唐太宗封其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后又封其子为河源郡王。

唐高宗时，吐蕃贵族的势力伸展到青海高原。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吐谷浑战败，牧地逐渐为吐蕃所吞并。咸亨三年（公元 672 年），唐把吐谷浑人迁到灵州的鸣沙县。

武则天晚年，又有一部分青海的吐谷浑人脱离了吐蕃贵族的统治，迁徙到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等州。

据敦煌遗书圣历(公元698—700年)、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的《敦煌户籍残卷》所载：唐代沙州辖敦煌、寿昌二县。其中敦煌在天宝以前有敦煌、莫高、龙勒、神沙、平康、洪池、玉关、效谷、洪闰、悬泉、慈惠11乡，寿昌县有1乡。约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由于西突厥内乱，其地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影响，大量西域昭武九姓胡人，逃往沙、瓜以避灾乱。敦煌接纳这批人后，划地安置，编入户籍，并取"从化内附"之意，新建了一个从化乡。加原有11乡，敦煌此时为12乡。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废寿昌县，其地并入敦煌县为寿昌乡，敦煌增地域为13乡。但时间很短寿昌恢复置县，原属敦煌的寿昌乡再属县制。直到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沙州止，敦煌一直实辖12乡，这与现今敦煌市博物馆的《唐地理志残卷》所载：沙州二县："敦煌，乡十二，寿昌，乡一"是一致的。按唐王朝时行政区划建制："乡下设里，里理百户"的方式，当时敦煌12乡所辖里数究竟有多少，已经很难详知，目前从敦煌遗书《敦煌户籍残卷》中仅能见到的有诸乡里名如下：敦煌乡的敦煌里、临池里、忧治里；莫高乡的莫高里；龙勒乡的都乡里、常安里；神沙乡的阳沙里、灵化里、弘远里；平康乡的洪文里、安昌里、修武里；洪池乡的神龙里；玉关乡的丰义理；效谷乡的无穷里；洪闰乡的长沙里；悬泉乡的宜禾里和从化乡的慕道里等。①

另据新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沙州的户口状况：有户4265，口16250；而《通典》所载，唐代天宝年间沙州有户6395，口32234。两者相比较，《通典》所载沙州户数比新旧唐书增加了1/3，口则增加了1倍。我们认为，唐时的敦煌地区，有过多次的周边地区战乱

①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度的演变》，载《敦煌研究》。

的各种影响，在当时沙州经济繁荣人口殷繁的情况下，必然发生人口徙入大于徙出的状况，所以户口的增加也是必然的，新旧唐书和《通典》所载户口数的统计时间、统计方法等差异也是可能存在的。

唐太宗时全国实行府兵制，当时沙州有军府三个：龙勒、效谷、悬泉。军府的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300 人为团，团有校尉，50 人为队，队有队正，10 人为火，火有火长。平时和平时期，府兵在驻地从事农业生产，冬季闲时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所谓“三时农耕，一时教战”。战争时期调派各地出征作战，由封建王朝中央派将帅统领，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唐朝设置豆卢（即归义）军，驻扎沙州城内，有兵士 4500 人。唐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府兵制度名存实亡。随着方镇兵的代起，形成节度使权力的无限膨胀，最终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第三节 唐前期敦煌地区与西域等的关系

隋末唐初，东、西突厥再度强盛，其势力北据漠北，西控西域直到里海以东中亚诸国。“隋末乱离”，“（突厥）又更强盛”，“东至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1] 突厥连年进扰唐王朝北部、西北部边地，给各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唐太宗为了反击突厥进扰，亲自训练了精锐的武装部队；加之唐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也有了反击的足够的经济力量；另外，突厥统治者之间内部的矛盾，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且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人民反抗，最终促成了唐王朝反击的胜利。

①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唐太宗即位初,颉利可汗带领十多万骑兵推进到长安附近的渭水北岸,威胁唐朝的政治统治。唐太宗与颉利可汗订盟约和而退。之后,唐太宗下诏修葺边塞障,进行反击的准备。

贞观元年、二年间(公元627—628年),突厥内部矛盾纷起,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唐王朝与摆脱东突厥统治的薛延陀建立了联系,统辖东突厥东部的突利可汗也降了唐。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徐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大将柴绍、李道宗、薛万彻、卫孝节等,分道大举出击,于次年大破突厥。高宗初,在突厥故地设置单于、安北二大都护府来管理。东突厥既亡,薛延陀、回纥、什固等"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唐朝皇帝成了这些部落、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唐王朝为了维护对西域的统治,加强与西域的关系,保护中西商路的畅通,进行了对西突厥的战争。

唐击败东突厥以后,敦煌以西的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归属唐朝,高昌王亲自到长安,焉耆王也遣使请开碛路以通往来。唐与西域经敦煌的交通打开了。

隋唐时期,西突厥人游牧于乌孙故地。隋时,射匮可汗在龟兹以北的三弥山建牙,"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①。后来,西突厥贵族北并铁勒,西南侵吐火罗。唐初,西突厥分裂,各部互争雄长,力量在混战中有所削弱。

唐经敦煌与西域的通道畅通后,吐谷浑贵族多次侵犯唐边境,威胁敦煌及河西走廊。唐太宗派李靖节度诸军,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击溃吐谷浑军,吐谷浑降唐。唐太宗终于征服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并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维护了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的安定。

---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当时的敦煌和河西走廊地区形势一直较为紧张。尤其是接近沙州的高昌王　文泰"发徒聚众，贼杀无已"，致使沙州受累也不得安宁。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唐太宗下决心讨伐叛逆，以确保中西交通的畅通，他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薛万均、副总管姜行本等进军高昌，沙州刺史刘德敏率沙州军民协同作战。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征战，粉碎了麴文泰勾结吐蕃，企图反唐割据的阴谋。高昌改设西州，唐因置安西都护府于此，以镇守其地。

唐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 年），西突厥联合龟兹国的反唐势力，互相勾结在一起，攻城掠地，大肆侵扰，西域又出现了紧张的局势。次年，唐太宗再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昆山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敦孝恪，带领铁勒十三部兵力十余万，西伐龟兹。沙州刺史苏海政、行军长史敦煌人薛万彻也率精骑一部，配合行动。双方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唐军最终击败西突厥和龟兹联军。苏海政和薛万彻乘胜率军急追 600 余里，俘虏了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取得了战争的完全胜利。

唐王朝既破龟兹，西域各地大震，当地各部首领相继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结好于唐朝，贡使通商，往来不绝。唐王朝即将安西都护府自高昌移至龟兹，下统辖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是为安西四镇，以控制扼守西境，保护中西商路。随后，西突厥也遣使来唐，"（唐）太宗……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1]。此后，西突厥势力益孤，终于在高宗初年，灭西突厥。在其故地天山北路一带，置北庭都护府，下统二州，昆陵、濛池二都护和 23 个都督府[2]；天山南路，于龙朔元年（公元 661 年）分置十六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3]，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唐朝恢复在西域的统治，解除了西突厥势力对西北边疆的威胁，对

---

① 《新唐书·西域传》。
② 《新唐书·地理志》。
③ 《唐会要·安西都护府》。

于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发展中西商业交通，特别是对于敦煌及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此后，武则天逐渐将权力转移到自己的手中。

在新兴的普通地主支持下，武则天的势力越来越大。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死，太子李显立，武则天临朝称制。第二年，武则天废李显，改立豫王李旦。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在巩固封建国家的边疆，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繁荣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唐太宗后期到唐高宗前期，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稳定，声威极盛。但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势力兴盛，侵扰龟兹，进而攻陷西域"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兵，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1]。内地经敦煌与西域的交通再次中断。同时，东突厥又再次兴起，雄踞漠北，西征中亚。

此后西域唐军又连为吐蕃军所败。由于对吐蕃军作战的需要，唐在鄯州（今青海乐都）、甘州、凉州、沙州一带、敦煌及靠近敦煌地区兴置了大量的屯田。永隆（公元680年）前后，鄯州河源军的屯田达5000多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武则天时，甘州、凉州、沙州的屯田连岁丰收，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吐蕃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在王孝杰的统领指挥下，击败吐蕃军，收回了安西四镇。唐王朝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从内地和附近地区发兵前往驻守。

唐玄宗在开元中叶以后，进行了检括户口，改变地税、户税征收办法和改革兵制等工作，以求符合政治经济方面发生的新情况。在勉强维系均田制的同时，唐在边地确立了节度使制度。

---

[1]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镇压边地各族人民的反抗，唐王朝在沿边地区先后设置了安西、北庭、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各自总管一个地区的军事。

在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发动战争。东突厥灭亡后，唐王朝决定要在西北大举用兵。天宝六年（公元 747 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拒攻吐蕃石堡城，李林甫乘机倾陷，王忠嗣被贬逐。此后诸道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

突厥在默啜晚年逐渐衰落。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默啜为回纥所杀，继立的毗伽可汗与唐和好，但也不时犯边，唐设朔方、河东节度使进行防御。其时，唐人和突厥人“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末作”，并相互交易。[①] 双方的互市规模很大，唐每年用帛数十万匹换取突厥的马。但东突厥贵族内部不断纷争，各族人民不断反抗，力量日益削弱。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东突厥为回纥所灭，突厥人大部分并入回纥，一部分西迁中亚，一部分南迁丰州、灵州之间，也有一部分转入河北。

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东突厥覆灭。代兴的回纥还不够强大，对唐和好。唐开始把力量集中到西北边疆，去对付吐蕃的军队。

由于唐王朝在河西走廊地区和陇右建立了坚强的防务，开元时，唐和吐蕃的相持线推到青海境内石堡城一带。吐蕃在东线不能占据优势，就向西侵入了小勃律，企图从西线攻占唐的安西四镇。天宝六年（公元 747 年）唐将高仙芝将万骑远征小勃律，俘其王及吐蕃公主并留兵戍守。天宝八年（公元 749 年），唐将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自此以后，安西四镇时叛时附，反复无常。为此唐王朝内部有人提出：西域沙碛荒绝，民供货粮甚苦，主张废弃安西四镇。武则天不允，曾先后数次派敦煌人张孝嵩以及安西都护郭元振等，领兵争

---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

夺安西四镇，其间的敦煌郡为粮草供应基地，又为军事指挥基地。安史乱后，四镇又没于吐蕃，直到武宗会昌时，敦煌人张议潮率众起义归唐，才收复了瓜、沙、伊、肃等11州。

唐王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县等，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推行施行了府兵制、均田制、租佃制等。唐在西域的统治，是推行着和内地相同的各种制度和措施，而已经不是泛泛的服属关系了。当时有不少汉人在西域定居，也有不少西域人入居内地。中西人员来往杂居，促进了汉族和各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汉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第四节 唐代敦煌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唐开元、天宝以前的100多年间，统治阶级为了强化封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级，以亡隋为戒，尽量利用各种工具和办法，进行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巩固封建政权，以致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同时，由于中西交通畅通，商旅信使往来不绝，“信徒络绎，香火不断，兴塔造像，极力鼓吹”，丝绸之路也呈现出了兴旺繁荣安定的局面。这时的敦煌也出现了“村坞毗连，鸡犬相闻，佛塔遍地，市场广大，家给人足，焉然富庶”和“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故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的说法，充分反映了敦煌各项事业的繁荣。

唐朝主要边患有突厥、契丹，为边防而设的屯垦大多在北部及西北部的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唐王朝在敦煌地区的屯垦，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促进了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还推行均田制、和籴法，设置常平仓，同时治水修渠，形成较

完整的灌溉网络。敦煌遗书中的《开元水部形》残卷，就是唐代在敦煌地区水利管理机构和制度接近法律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唐朝时的河西及敦煌地区通过政治、经济等综合治理和协调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富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唐代时农业生产工具普通使用了铁制犁铧，及一系列的配套生产工具，敦煌莫高窟中的《雨中耕作图》等就充分反映了当时敦煌农业生产方面的精耘细作，自然，农业生产力水平就提高了。同时，唐朝在兴修水利方面，比过去也做的多得多，当时把水利事业作为封建国家的公共职能之一，河渠陂塘等水利工程修建的增多，是农业发达的又一鲜明标志。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中记载，沙州在汉、晋修渠筑坎的基础上，唐代沙州刺史李无亏，新修了一条"长三丈，高一丈五尺，阔二丈"的"长城堰，百姓欢庆"。此后，又陆续修整了许多水渠，有长 20 里的宜秋渠，长 10 里的都乡渠，长 15 里的北府渠，长 5 里的三丈渠和长 20 里的孟授渠等。另外，敦煌遗书残卷中记有河渠使用灌溉事项的规定，"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民间自组"渠人社"。通过一系列组织，管理着敦煌农田灌溉和修筑渠坎等各项水利事务。

在土地制度方面，隋唐时敦煌实行了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办法，《唐六典》卷三《尚书部》说："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注云：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此之。""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从《敦煌户籍残卷》中，可看到每户内均载明户主、男女人口，各口下又载明是丁，抑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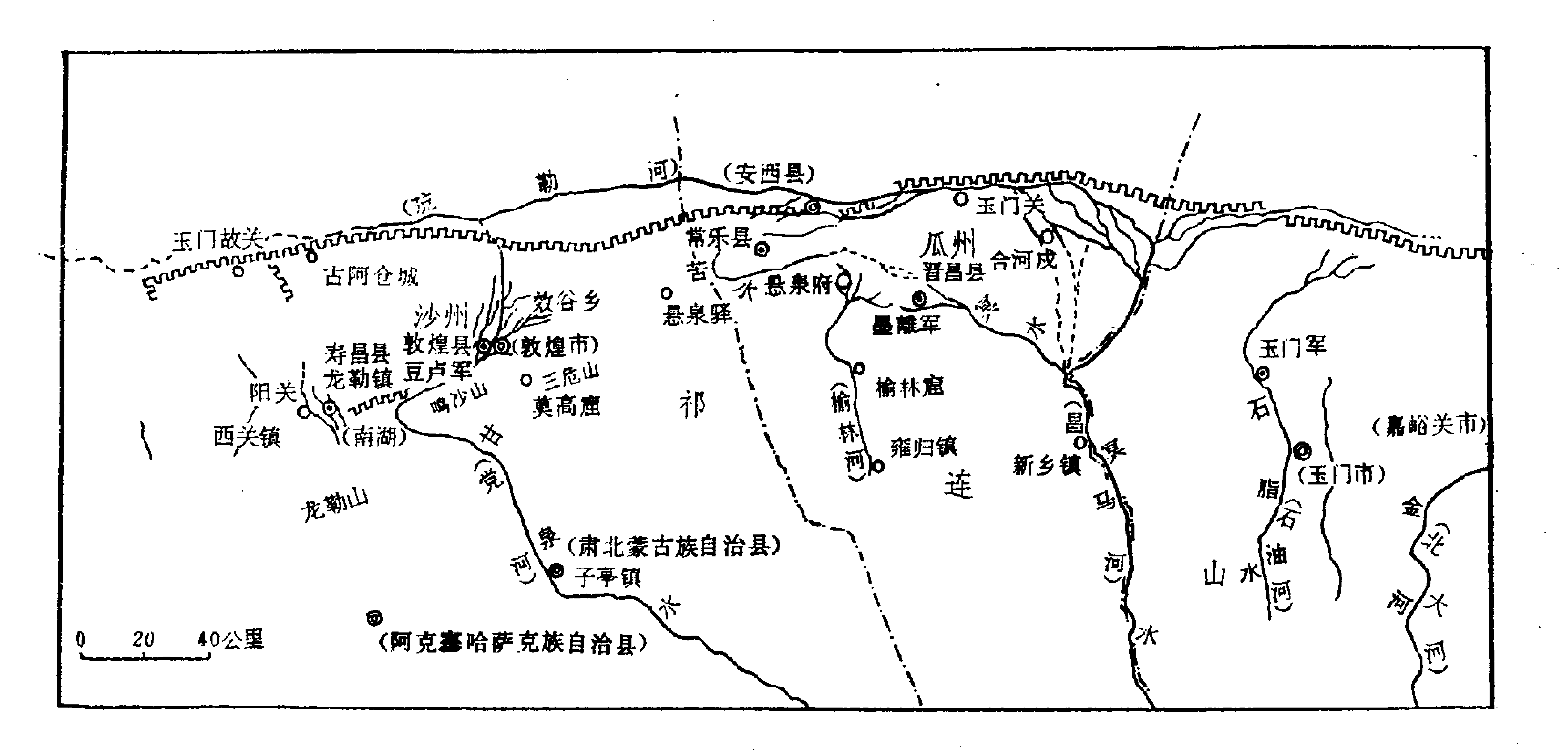


图5 盛唐时期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示意图

为中、小、黄，或丁妻，抑寡妻妾，年龄若干；更载明应受田若干，已受田若干，其中口分、永业、园宅各若干。当时敦煌地区农民受田普遍不足，原因在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贵族官僚地主豪商们，趁机兼并掠夺农民的小块耕地。

试举天宝六年(公元 747 年)，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民刘智新一户受田记载：

户主	刘智新	载贰拾玖岁	白丁下下户	空	课户	见输
祖母	王	载陆拾玖岁	老寡空			
母	索	载肆拾玖岁	寡空			
妻	王	载贰拾壹岁	丁妻天宝三载	籍后漏		附空
弟	知古	载壹拾柒岁	小男空			
妹	仙云	载贰拾玖岁	中女空			
妹	王王	载柒岁	小女空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陆拾捌亩已受，廿亩永业，卌七亩口分，一亩居住园宅，九十五亩未受。①

就当时刘智新这样的贫困无地户来说，能够通过均田制获得一些土地，经过自己辛勤的耕耘，维持基本的饱暖生活，足以说明，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均田制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自然反映了唐朝封建经济在敦煌地区空前繁荣的景象。

在武则天时期，为进一步发展边疆事业，曾对河西走廊西部的瓜州、沙州等地区实行“官贷种子，付户助营”、“课役具免，复得田苗”的奖励耕垦的办法，安置浮游人口，使大量荒芜农田得到垦殖，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时敦煌地区呈现“州城四面，水渠流畅，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土不生棘，鸟则无鸮，五谷皆饶”② 的繁荣富庶景象。这种景象大量地进入敦煌莫高窟，作为壁画描绘的内容，如 25 窟和 12 窟的《唐耕获图》，描绘了敦煌人民从

① 《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② 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

耕种到收割的全部农业生产过程，反映了唐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辛勤播种、耕作和收获的生动画面。445窟的《耕作收获图》，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庄稼丰收的场面，壁画上大堆的粮食，巨型的斛斗和人们当时的收获谷物的喜悦心情跃然窟壁之上，体现了《弥勒经变》中"雨泽随时，谷稼滋茂，不生秽草，一种七收，用功甚少，所获甚多"愿望的实现。

唐朝初年，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均田农民，向其征取租税，强服徭役和兵役，国力比较强盛。当时，大量的富裕农民都希望上升为地主，中小地主更有扩充土地和财富的强烈欲望。他们都希望在战争中掠夺人口和财富，建立军功以取得占有勋田的权利。唐太宗、高宗父子为了发展封建国家的力量，并满足这部分人的要求，继续执行隋王朝的征战政策。军事征发迫使自耕农民大量贫困破产，有利于地主进行规模较大的土地兼并。

唐朝时，对西域的用兵，与东、西突厥的战争，对吐谷浑的战争，与回纥(即回鹘)的争夺，对吐蕃的战斗，与西夏的争夺，都与敦煌地区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些甚至是以敦煌作为重要基地的。因此，敦煌地区最为繁忙，是兵站、粮站，也是庸役人力的补给站，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沉重。他们除了耕种自己所得的均田，还要负担各种繁苛的徭役赋税，有些农民被迫抛弃业田，背井离乡，逃亡到甘州、瓜州、肃州等地去当雇佣，境遇艰难。于是唐王朝派遣括逃御史来处理沙州逃户的问题。《敦煌户籍残卷》中也登记着为数不少的当时户口逃亡的事实，既有逃亡丁口，也有合户逃亡的登记。现存敦煌《长安二年三月为括甘凉瓜肃所停逃户牒》中指出当时为制止农户外逃的办法："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逃户若归，苗稼见在，课役具免，复得田苗。"这对于稳定人心、鼓励耕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田主出现，正是这些田主等私人和封建国家，残酷地压榨和勒索农民，搞得许多农民家破人亡。敦煌和吐

鲁番发现的文件中，除出现许多租佃契约，还有大量的卖地契、卖牛契、雇工契、便麦契、贷生绢契、举钱契、卖宅舍契，以至卖儿契等。

第五节 唐代敦煌地区的商业发展与交流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在隋朝统一全国后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陆上中西的交通总枢纽的敦煌，同时又是唐代著名的国际贸易市场，对促进陆上中西交通交流，丰富中原人民生活，传播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时纺织练染业非常发达，为满足贵族宫廷和中西贸易的需要，当时丝织品的品种花式很多，争奇斗妍，琳琅满目。就绫、锦而言，唐政府禁止织造的就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及大裥锦、竭凿六破以上锦、上行高丽白锦、半臂锦和杂色锦等，绫有独窠文绫、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两窠细绫、瑞绫、白编绫等，还有许多小文字绫、锦。而绫绵的花式更多，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以及许多织造差样文字。[1] 近代敦煌莫高窟、敦煌地区及敦煌附近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都发现了大量织造技术精湛、品种花式繁多的唐代丝织物。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大约开元（公元713—741年）间废置的大批残幡，残幡大部分由绞缬绢和蜡缬绢制成，其中宝相花蜡缬绢和联珠对禽纹绢，比吐鲁番发现的还要精工。而仅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经过

① 《唐大诏令集·禁大花绫锦等敕》。

整理作为绵、绮、染缬标本的，就近50件之多。[①]

唐代丝绸练染业的发展，为陆上中西交通重镇敦煌商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当时的沙州，每天有早、中、晚三次集市，交易活跃，买卖兴隆。各地出产的美丽丝绸，清香的茶叶，精制的陶瓷器具，首先在此进行带有批发性质的交易，然后再转运西方各地。而西域各国出产的金玉珠宝、奇禽异兽及各种畜产品，也在这里进行交易，然后再转运销售中原及全国各地。敦煌遗书《王梵志诗》描写敦煌当时商铺："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可见当时的沙州市场上的繁荣兴旺的情况。在丝绸之路玉门关、阳关的东西两边大道上，各国各地使臣、将士、商贾、僧侣等，往来不绝，相望于道。因此，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出现了许多西域使者和胡商及僧侣的生动形象。有些是牵着满载货物的驼队，跋涉于广阔无际的荒漠中；有些是赶着毛驴马匹，驮着丝绸绢匹，奔走于高崖深谷中。这些来往的商贾，有深目高鼻、虬髯卷发、头戴白毡高帽、身穿圆领长袍、脚登乌皮鞋的波斯商人；也有浓眉大眼、高鼻多髭、身披袈裟的西域梵僧。他们或为了政治利益，或为了经济利益，或为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万里迢迢汇集于敦煌，再进一步走出去，或者走回去，去进一步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为人类的文明奔走劳碌。

唐王朝对外贸易经以敦煌为枢纽的西北陆路，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通过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大量的丝织物和工艺品传至国外。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文中提到，在弓月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附近）一次可取绢275匹。玄奘西行取经时，高昌王麴文泰送与"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又以绫绢五百匹"，"献叶护可

① 《文物》1972年第1期《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第3期《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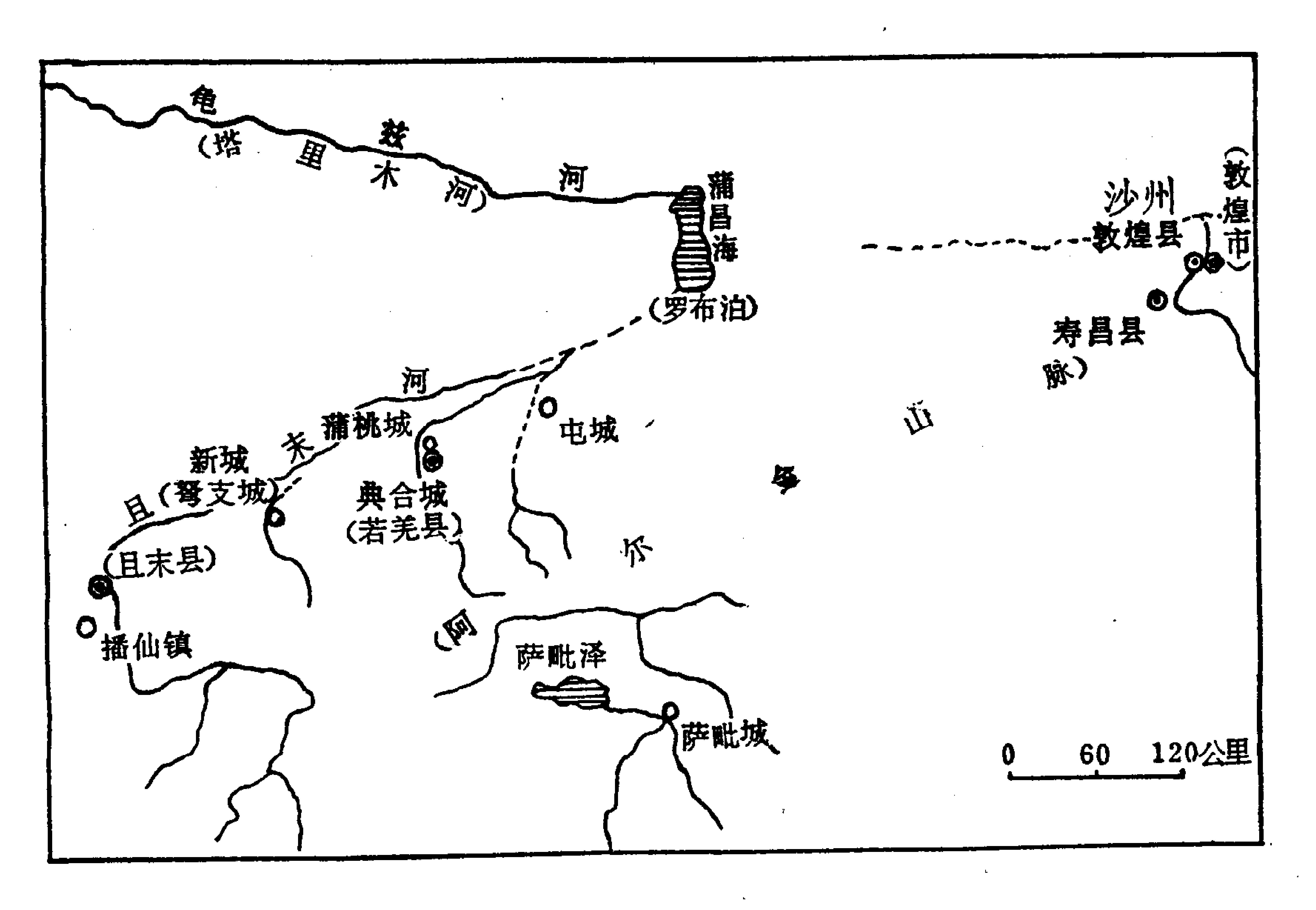


图6 盛唐时期敦煌西部地区示意图

汗”。[1] 足见当时由此输到西方的丝绸之多，真无愧于“丝绸之路”之号，这也是唐王朝前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敦煌自然也就进入了对外交往的黄金时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中《沙州图经》祥瑞条记述：当时属沙州所管辖的石城镇，就有康国人奏事的条文，说明此地曾居住着大批的康国商人。另外还有记述：当时沙州西北有一所“兴湖泊”，也是胡商侨居的地方。《敦煌廿咏》中有《安城短咏》诗，从中可知当时在沙州城附近有一土城，是波斯的安息人和中亚安国侨民的居住地，故称安城。城内建有祆教的神庙，来往祭祀的西域商旅和敦煌百姓众多，教事兴盛，场面热烈，有“朝夕酒如渑”的形容。当时玄奘经敦煌西行取经时，曾有“同侣商旅商胡数十”[2] 人同行，印度无畏三藏到唐朝来，也是和“商旅同次”[3]，足见中外商旅往来的频繁，说明敦煌这个国际贸易市场，对内对外商业发展的繁荣情况。

唐写本《沙州图经》详细记载了唐代沙州的周边，共设置清泉、百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 21 个驿站的名称、方位及距州里数等。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三月，瓜、沙州给石染典过所》通行证中，有沙州“市令张休”的记载，并有“沙州之印”。敦煌及附近地区近年还发现大量的至今染色艳丽、手工精巧的晕缩锦幡、宝相花纹绮、显花人字纹绮等唐代丝织物，这些产自中原各地的丝织物，由内地运往敦煌，通过敦煌这一国际贸易市场，再输入西域各国及西亚、欧洲各地。

---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③ 《全唐文·东都圣善师无畏三藏碑》

第六节　吐蕃对敦煌地区的统治

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 年），胡人安禄山诱降了被回纥攻破的突厥西叶护阿布思的残部，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冬，开始了安史之乱。

唐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时，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即位，是为肃宗。他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敦煌和西域的军队，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夺回了长安和洛阳。

在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把河西、陇右的军队大批调征入援，吐蕃贵族乘西北边防空虚的机会，攻占了陇右诸州土地。

大历十四年（公元 779 年），唐军击退了吐蕃进攻，并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双方的关系，边疆形势得到了缓和。

贞元二年起，吐蕃贵族又对唐发动了进攻，并于贞元六、七年攻占北庭和西州。唐在沿边修复城塞，开置屯田，加强了备御，同时和回纥恢复和好关系，削弱了吐蕃贵族的力量，边疆形势再次逐渐缓和下来。

在安史之乱后的 30 多年里，吐蕃贵族趁机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的大片土地，采用封建剥削方式来剥削这里的人民。吐蕃把大批的汉人迁到吐蕃部地，在客观上有助于吐蕃生产技术的改进。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唐穆宗时，唐和吐蕃订立了盟约。长庆三年（公元 823 年）建立了会盟碑，直到唐末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吐蕃贵族在长期对唐、回鹘和大食的战争中力量削弱了，8 世纪末，羌人诸部摆脱了吐蕃 贵族的统治。

8、9世纪之交，佛教在吐蕃普遍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吐蕃贵族受其统治的汉族地区，特别是河西及敦煌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影响。在吐蕃贵族之间、贵族和僧侣之间，不断发生冲突，青藏高原逐渐分裂成为许多割据势力，陷入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吐蕃统治下的河湟一带人民也相继起义归唐，在长期的斗争中，西域也转到了与唐修好的回鹘手中。吐蕃也开始了向封建农奴制转化的过程。

吐蕃人很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到六七世纪时，他们中的一部分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种植青稞麦、小麦、荞麦和豌豆；另一部分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无常所"，家畜有牛、马、狗、羊、猪和单峰驼。吐蕃人能够制造金器、银器和铜器，也能用铁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还有捻毛线、织布、织毡的传统。此时，吐蕃已经建成了一个早期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吐蕃人重战死，世代战死的家庭被尊为高厅。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中部和北部的苏毗势力，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又击灭了西部的羊同势力，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事业。

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人创制了文字，制定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通婚后，吐蕃贵族子弟被派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许多唐人被聘请到吐蕃掌管文书。随着文成公主的进入吐蕃，唐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了，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的少数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安西四镇。由于横征暴敛的加剧，各族人民不断反抗，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吐蕃赞普遣使跟唐王朝修好。

唐王朝虽与吐蕃一开始就有甥舅之好的关系，但吐蕃一直没有间断在唐蕃边界制造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安史之乱"后，唐边境重兵大都调往内地平叛，吐蕃军便乘虚而入。他们先攻占了陇右的十几个州郡，于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十月攻入唐朝京师长安，

十几日后又退居陇右，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对黄河以西唐王朝疆土的大举进攻和吞并。

吐蕃军队在墀松德赞的亲自统领下，对河西走廊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吐蕃军铁骑百万，从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底到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连克河西重镇凉州、甘州、肃州（今武威、张掖、酒泉）。其间，凉州陷于吐蕃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逃奔甘州，于永泰元年（公元 765 年）十月为沙陀所杀。闰十月，郭子仪将此事报奏唐德宗，朝廷任命杨休明继任河西节度使并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杨休明徙河西节镇至敦煌，积极进行抗击吐蕃的战备组织工作。在周鼎和宋衡等的协助下，积极调整和维护与边地各民族的友好关系，处理各种军政大事。随后，杨休明委托周鼎、宋衡驻守敦煌，管理河西军政事务，自己去管辖之内的伊西庭巡视、征兵，不料途中遭暗杀身亡。

留守敦煌的河西观察使周鼎与河西节度行军司马宋衡一面将此事通告各州郡并录奏朝廷，一面继续遣使西去四镇求援索兵。唐王朝接到奏报，即任命周鼎继任河西节度使，拜宋衡为中丞、常侍。大历二年（公元 767 年），救兵未至，朝廷诏命未达，吐蕃军陷瓜州（今安西）后包围并开始进攻敦煌。周鼎见势害怕，欲焚城逃跑，为部下阎朝所缢杀。聚集在敦煌的汉唐军民在阎朝的领导下坚持与吐蕃军进行顽强的战争对抗，坚持达 11 年之久，终因“兵尽矢穷”，于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敦煌被吐蕃军队攻陷。吐蕃贵族念与唐的甥舅之情，将宋衡送还长安。至此，“河陇郡县皆陷吐蕃”。随即，吐蕃大军继续西进，敦煌之西的伊州虽“固守历年”，终于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被吐蕃攻陷。

吐蕃既是王朝名称，也是当时的地域名称。在我国汉文的众多古文献中，称藏族为吐蕃，同时也称西蕃、乌斯藏、唐古特、图伯特等名称的，最终直到公元 17 世纪以后，才统称为藏族。唐代文献中有些认为是出自汉代西羌族，有些则认为出自南凉秃发利鹿孤的

后代，近人一般认为源出羌族，较为可信。吐蕃活动的地区，初在今西藏自治区和四川西部地区一带，都城在唐时的逻些城（今拉萨）。其兴起于北周、隋朝。《隋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附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号令自王出”，“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有水阔百余丈”，“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指的就是吐蕃。藏族是我国各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的古老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就居住游牧于青藏高原一带，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历史。唐蕃战争较之和平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议而结束，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

8世纪末叶，吐蕃管辖敦煌后，改变了沙州原有的建制，取消了河西节度使、州、县、乡、里的体制，而改变为吐蕃建制。据敦煌遗书所提供的资料，当时敦煌十三乡的名字被取消，代之以纥骨萨部落、悉董萨部落、擘三部落、上部落、下部落、行人部落、丝绵部落、獠笼部落、中元部落、悉宁宗部落、僧尼部落及道门亲表部落等。各部落由沙州城首席长官节儿统辖。当时沙州吐蕃部落中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千户，千户之下是五百户组成的小千户，置小千户长一人，再其下是百户，由百户长“勒曲勘”管制，另设小百户的“格儿”，最后是十户组织，有十户长“勒勘”。

吐蕃多年围攻征战后占领沙州，初期吐蕃奴隶主对沙州当地人民的统治，是非常残酷的。他们不仅大肆抢掠沙州各族人民的财产，而且迫使各族人民成为其奴隶，“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斩手凿目，弃之而去”[①]。先进的汉族经济和文化与落后的奴隶制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被辱的各族人民，受尽种种残暴的折磨，悲愤之余，增添了对吐蕃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仇恨和反抗。

---

① 《唐书·吐蕃传》。

吐蕃奴隶主贵族统治沙州时期，还强迫当时居住敦煌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强迫汉族人吐蕃化，平时不准许沙州汉族人穿着汉族服装，只有在每年岁首祭祀的时候，偷偷取出自己民族的服装穿上，以表示自己是汉族人，自己的祖先是汉族人，祭祀结束仍收藏起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缚戎人》诗中写道："一落蕃中四十载，迁者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正好具体反映了当时敦煌等地区被吐蕃统治压迫下的汉族人的痛苦心情。

吐蕃统治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逼迫沙州人民进行了多次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和坚决反抗。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被斯坦因劫去的斯 1483 号《书仪》残卷，是沙州被吐蕃占领时期，其守将向吐蕃赞普的报告。此报告中透露了吐蕃占领沙州初期，沙州各族人民曾有多次的起义和反抗。其中玉门关驿户氾国忠等六人的起义，杀吐蕃沙州节儿，焚烧吐蕃沙州官署，给吐蕃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书仪》陈述："自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前后三度，频遭猜忌，屡发兵戈，岂敢违天，终当致地，彷徨抵拒，陷在重围，进退无由，甘从万死。伏赖宰相守信，使无涂炭之忧，大国好生，庶免累囚之苦"。可见，当时的沙州各族人民在吐蕃奴隶主贵族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武力镇压面前并未屈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此吐蕃与当地人民八年间订盟三次。由此也证明，吐蕃对沙州的真正有效的统治，是历经许多年以后，经过相互的让步和适应之后才完成的。

吐蕃统治沙州时期，敦煌地区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当时的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根据敦煌遗书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当时沙州一地有报恩寺、净五寺、莲台寺、三界寺、兴善寺、永寿寺、金光明寺等 14 所僧寺，同时还有安国寺、普光寺、灵修寺、大乘寺、圣光寺等 5 所尼寺，僧尼者人众近千。每个寺院都拥有大量土地，役使当地广大劳动群众为其耕种收获。寺院里囤积着大量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春困时节又被贷于民进行高利贷盘剥。

另外，各寺院还有泥匠、木匠、皮匠、毡匠、纸匠、制酒工等匠工和放驼牧羊的牧工，从事各种手工业和畜牧业生产，为寺院创造更多的财富。敦煌寺院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和吐蕃统治时期经济的发展、吐蕃贵族的民族习俗紧密联系着的，而对受其剥削压迫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寺院经济的膨胀和发展加重的经济上的负担，也是空前深重的，自然也就更激起其反抗和斗争的情绪，最终导致张议潮领导的沙州各族人民的起义，推翻了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第七节 张议潮领导的起义及张氏家族对敦煌地区的统治

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 846 年），吐蕃赞普朗达摩遇刺身亡，致使吐蕃国内大乱。河陇一带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攻不已，吐蕃势力在各地人民的反抗和内部纷争中逐渐衰弱。河西走廊和敦煌地区的各族人民也乘隙纷纷起来斗争，要求摆脱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结束多年战乱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痛苦不堪的生活状况。

唐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地区汉族人民，联合居住在沙州的以安景祐为代表的粟特人和以阎英达为代表的吐谷浑人等各民族人民，组成强大的反抗吐蕃奴隶主贵族的同盟军，一举驱逐吐蕃沙州守将，夺取政权，收复沙州地区。接着乘势继续东向，攻克瓜州。张议潮夺取沙、瓜二州后，一面差遣押牙高进达率人驰表赴长安向唐王朝报捷，一面以瓜、沙二州为根据地，积极修甲治兵扩大起义队伍。各地各族人民受吐蕃奴隶主贵族残暴统治多年，遂纷纷报名当兵，起义军迅速成长，声势大振。

在起义军作了充分的军备准备后，从公元 850 年开始，张议潮率起义军向吐蕃奴隶主贵族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起义军所到之处，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配合，先后攻克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贵德）、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州，进入甘青两省及新疆广大的地区。

公元 851 年八月，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天宝年间河西陇右十一州地图、簿籍归朝，对此段历史，《新唐书·吐蕃传》有记载："沙州首领张议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议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唐王朝于当年十一月在沙州设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营田处置观察使，全权负责河西等地的军事、行政和财政。至此，人民起义推翻吐蕃统治的斗争得到唐王朝的正式承认。

咸通二年（公元 861 年），张议潮率领各族人民组成的归义军蕃汉兵士 7000 人，攻克河西重镇凉州，受到凉州人民的热烈欢迎："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归反，塞外纵横战血流。"

咸通七年（公元 866 年）冬，张议潮所部的北庭回鹘仆固俊攻克西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接着合兵挥师东进，与吐蕃军队大战于邠（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归义军大获全胜，吐蕃大将尚恐热被斩，首级传送长安。吐蕃势力被迫全部退出河西陇右地区。至此，"西进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六郡山河，宛然而归"[①]。断绝近百年的中西交通和交流，从此再次又畅行无阻，唐王朝也再次无西顾之忧。敦煌遗书中载有当地各族人民当时以《菩

---

① 敦煌遗书伯 6161《张淮深碑》。

萨蛮》词歌，对这一唐时西北敦煌河西地区盛举的颂扬："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愿难伸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瓜、沙二州收复后，张议潮恢复了唐王朝建置，再设州、县、乡、里制度，并将占沙州人口很大比重的僧尼统一管理，创设都僧统制。

咸通八年（公元 867 年），张议潮奉旨入朝，官拜河西十一州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右神武统军、南阳郡开国公。唐王朝赐给宅第和田地，食邑两千户。咸通十三年（公元 872 年），张议潮卒于长安，享年 74 岁。其兄张议潭也受封优厚，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兼检校吏部尚书。张议潮父亲张谦逸被追赠为工部尚书。

张议朝入朝后，归义军的军政大权皆交由其侄张淮深总揽。张淮深于大中七年（公元 853 年）任沙州刺史，尔后官至伊西等州节度使兼司徒。其弟张淮鼎官至归义军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敦煌地区，河西地区，新疆、青海一部分地区，在张氏家族的统治下蒸蒸日上，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繁荣局面，对当时的西北形势和中西交通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反对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暴虐统治，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巩固了当时的西北边疆，在敦煌历史、西北边疆交通史、西北各民族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这段历史，史籍记载很少，难窥全貌，我们只能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敦煌遗书中去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唐写本的《张议潮变文》和归义军统治沙、瓜州时期所遗存的部分文书，为研究张议潮的生平事迹提供了资料。近代人罗振玉，还特地写了《补〈唐书〉张议潮传》。

张氏家族统治时期，其地域范围较为广大，虽然直接辖区主要是沙州、瓜州地区，但势力范围较广，为其统治基础的稳定，发展了境内特别是河西走廊地区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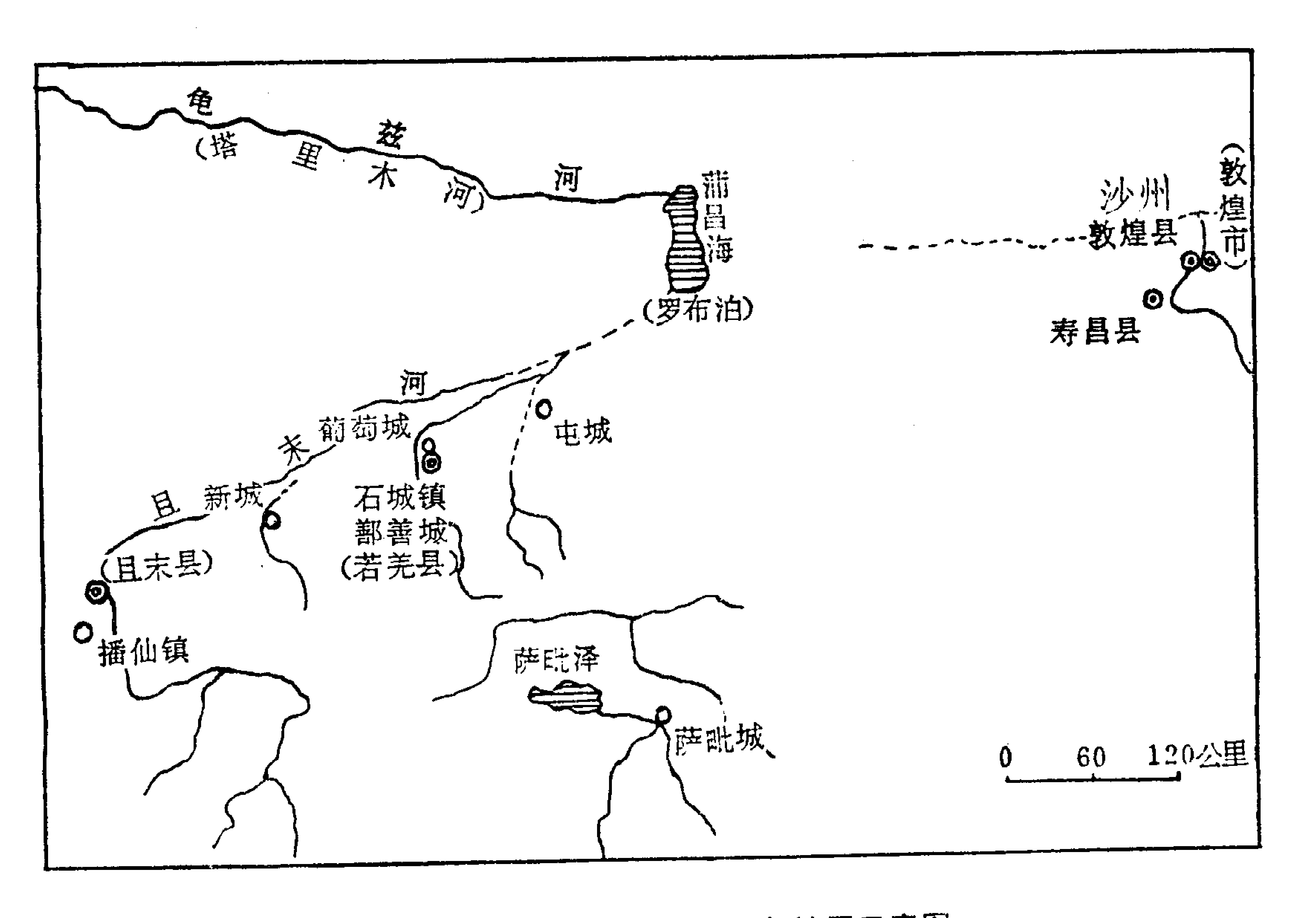


图7 归义军时期敦煌西部地区示意图

张议潮起义时，回鹘、月氏、粟特、党项、吐蕃、吐谷浑、嗢末、龙家等民族人民先后都参加到了起义军的行列，为民族解放、起义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起义之后，随着形势的稳定，生产、贸易和生活的稳定，各民族人民在归义军的领导下，有些在各城市从事中西通商贸易；有些在草原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有些受汉族人的影响走向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各民族人民团结互助，“社稷如一”，“和同为一家”，为沙州和河西的繁荣昌盛，为中西交通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张氏勋德纪》说：“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 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令驯良，轨俗一变”，又言：“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疑少骏之蹶蹄；南土蕃浑，献□岗之白璧”。可见，张议潮为首的张氏家族，和境内各民族间建立了和睦相处的深厚友谊，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拥戴，自然就有“通好而求和”，敬献骏马和白璧的史实。同时，在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中，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在张议潮的护卫者中间，有手持戈矛的回鹘士兵；在仪仗队伍中间，有欣然起舞的吐蕃族人，有退浑装束的舞乐者。

由于进一步对吐蕃战争的需要，为巩固张氏政权的统治，张议潮叔侄在敦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对寺院经济中的一部分农民“给状放出”，成为具有人身自由的乡营百姓，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收复瓜、沙二州之初，即采取“且耕且战”的措施，“释放夺户，实行均田”，发展农业生产，为对吐蕃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安西县（唐时瓜州）苦峪城遗址中曾出土唐时残碑一块，记述张议潮“兴屯田，疏水利”的事迹。张议潮归朝后，其侄张淮深继续实行鼓励农耕的措施，致使瓜沙地区出现了“万户歌谣满路，千门谷麦盈仓”的局面，不愧为《张淮深变文》中对张氏家族称颂的：“河西陷落百余年，路断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第八节　西汉金山国与甘州回鹘

张议潮于唐咸通八年（公元 867 年）应诏入朝后，其侄儿张淮深任沙州刺史和归义军留后，总揽河西归义军军政大事。至唐大顺元年（公元 890 年），沙州发生骤乱，由于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演变到了刀兵相见。张淮深对祸起萧墙的内乱猝不及防，与夫人陈氏和六个儿子延晖、延礼、延寿、延锷、延信、延武同时被害遇难。

张淮深死后，张淮鼎接替执掌归义军军政大权。现存敦煌莫高窟唐代《乾宁碑》有"妻弟前瓜州伊西□节度使……张淮鼎"的具衔。两年后，张淮鼎去世，执掌归义军的权柄转到张议潮的子婿、瓜州刺史索勋的手中，其子索承勋为沙州长史，并引张议潮孙张承奉为归义军副节度使。到唐景福元年（公元 892 年），朝廷正式任命索勋为归义军节度使。不久到唐乾宁元年（公元 894 年），张议潮第十四女，即凉州司马李明振之妻，率李氏诸子诛杀了索勋。名义上仍拥立张承奉为节度使，实际上李氏诸子"分茅裂土"，掌握着归义军的实际权力，李宏愿为沙州刺史，李宏定为瓜州刺史，李宏谏为甘州刺史，张承奉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傀儡而已。后来，张承奉经过苦心经营，在自己周围培殖势力，逐渐形成了能与李氏诸子抗争的环境，最终夺回了权力。唐光化三年（公元 900 年），朝廷正式追授其为归义军节度使。

唐哀帝天祐初年，中原王朝祸乱纷起，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终于开始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天祐四年（公元 907 年），唐哀帝"禅位"于朱温，唐王朝灭亡。

唐王朝灭亡前后，受中原形势的影响，在张承奉归义军节度使统治集团内部，导演了沙州"白雀之瑞"的事端。敦煌遗书伯 2574

卷子《白雀歌》云："白雀飞来过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深向后宫呈宝瑞；玉楼深处送嘉声，……"张承奉臣僚张永进以此歌劝进，请其称帝。张承奉乘此机会，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酝酿准备，遂于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在敦煌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西"指方位，"汉"指汉族人、汉人，"西汉"合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境，古为同楼兰与于阗、吐谷浑分界之岭，即今甘肃、青海、新疆三界之交的阿尔金山。按"五行"观念所指，西方属金，金为白色，所以"白衣天子"者，即"西方之天子"。

回鹘即回纥，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更名回鹘。盛时辖地甚广，有一部分在我国境内。回鹘人又是后来我国天山以南地区的维吾尔族的主要祖源。

回鹘人是铁勒的一支，居住于娑陵水(色楞格河)和嗢昆水(鄂尔浑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住在天山一带。在很长的时期里，他们过着氏族制的生活，"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①。从6世纪中叶始，回鹘人屈服于突厥，突厥统治者经常征发回鹘人打仗，同时又向他们索取沉重的贡赋，引起了回鹘人的不断反抗。隋炀帝初年，回鹘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屡次打败西突厥的军队。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回鹘人以少胜多，击败东突厥的骑兵十万人于敦煌附近的马鬣山，遂逐北于天山。东突厥灭亡以后，回鹘和另一个铁勒部落薛延陀并为当时中国北方、西北方强大的势力。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回鹘的军事贵族乘薛延陀内乱之机，配合唐王朝的军队攻灭了薛延陀，占领了薛延陀的大部分土地。

武则天时，东突厥占领了铁勒故地，一部分回鹘人被东突厥所破，徙居于甘凉敦煌间，大部分役属于东突厥贵族。唐开元中，东突

---

①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厥衰乱，回鹘逐渐强大起来。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玄宗封回鹘首领为怀仁可汗，第二年怀仁可汗在唐王朝帮助下灭了东突厥汗国。

安史之乱期间，回鹘贵族曾两度派兵协助唐朝政府军作战，双方的关系为此更加密切。吐蕃贵族占领陇右后，唐和西域、中亚的交通必须借道回鹘。回鹘从东西贸易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回鹘人常以马数万匹向唐换取数十万匹绢帛。

回鹘人从唐王朝内地换取的各种物品，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还把绢帛等物品运往中亚各地牟取厚利。

回鹘贵族为了和吐蕃贵族争夺西域，极力支持唐在北庭、安西的驻屯军。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败回鹘，占北庭，次年，又占领安西。此后，唐王朝与回鹘继续以丝马互市，回鹘人留居长安的数以千计。唐还把崇徽、咸安、太和公主嫁给回鹘可汗。

在唐的先进文化影响下，回鹘人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考古材料显示，回鹘人已经从事农耕生产，他们使用的铁犁、铧头较长，有了犁壁。旧鹘人建筑中用的莲花瓦当，与中原出土的唐代瓦池完全一样。

昭武九姓国被大食占领后，那里的人大量迁到回鹘境内。回鹘人受其影响，放弃了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改信摩尼教。回鹘人起初采用突厥文字，后来又创造了古回鹘文。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古回鹘文、汉文和突厥文三种文字刻成的。充分显示了当时回鹘、汉和突厥民族的相互交往和相互融合的历史。

公元840年，回鹘因内部矛盾及自然灾害，已日渐衰弱，及为黠戛斯击败，少部分移居唐的边境，绝大部分则分为三支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南移河西地区；另一支西移去西域，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最后一支远移葱岭以西，在10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在葱岭以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哈喇汗王朝，首都在八拉沙衮城，辖地包括东边的喀什噶尔(今喀什)和于阗，喀什噶尔成为其第二首

都和文化中心。

19世纪中期迁往河西地区的回鹘，把牙帐设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其时，陇右、河西之地都在吐蕃人控制之下，他们迁抵河西之初，曾一度役属于吐蕃，到张议潮以敦煌、安西、酒泉等十一州之地归附于唐王朝时，河西的回鹘又一度归附张议潮。

张承奉的“西汉金山国”，名义上拥有瓜州、沙州、肃州、鄯州、河州、兰州、岷州、廓州等八州之地，实际上在他的东西两边，从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起，先后兴起了甘州和西州两大回鹘政权，就堵截了东西交通。所以，张承奉的“西汉金山国”实际只钳制在瓜州、沙州一隅之地，随时都有被回鹘侵吞的可能。为此，张承奉在立国之初即运兵遣将，企图消灭甘州回鹘势力，进而统一河西走廊，建立以汉族为主的统治区域。他志向高远，目标是“东取河兰广武城，西取天山瀚海军，扫定燕然□岭镇，南尽羌戎逻莎（今西藏拉萨）平”①。

张承奉“西汉金山国”立国当年秋，甘州回鹘趁其立足未稳来寇，张承奉派遣兵将拒战于金河东岸（今甘肃酒泉讨赖河以东），歌云：“金风初动虏兵来，点提干戈会将台，战马铁衣铺雁翅，金河东岸阵云开。”② 战斗中，张承奉先锋浑鹞子，陷阵擒敌，连获四城，回鹘败退。不久，回鹘又联合吐蕃军，集兵力共一万余人，对“西汉金山国”发起再次进攻，“今年回鹘数侵疆，直到便桥列战场”。在强敌面前，张承奉毫不示弱，积极部署应战措施：“阴仁贵冲锋，张西豹陷阵，罗通达遏后”。战争爆发后，在瓜、沙军民积极配合下，回鹘兵大败而归，致此，“西汉金山国”瓜州、沙州基地始固，然后徐图恢复甘州。

甘州回鹘不甘心多次对张承奉交战的失败，经过几年的秣马厉兵，积极备战，逐渐强大起来。于是，又于后梁乾化元年（公元

① 敦煌遗书伯3033号卷子《龙泉神剑歌》。
② 同上。

911 年)，由回鹘可汗之弟狄银亲率重兵，再次向“西汉金山国”发动战争。此次战争，回鹘军以风卷残云之势直逼沙州。张承奉为挽回败局，曾派遣罗通达出使吐蕃，欲借兵以抗回鹘，但吐蕃援兵未到之际，回鹘已将沙州团团包围。张承奉在无力抵御的情况下，最后只得派宰相大德僧人出城议和，与回鹘订立“城下之盟”，相议结为“父子之国”，可汗曰其父，天子曰其子。“西汉金山国”在敌军压境的严峻时刻，彻底失败了，并从此一蹶不振，在屈辱受制于回鹘的情况下苟延残端。

此次战事的失利，有其深刻的原因：金山国立国未稳，就与回鹘首战于金河东岸，再战于便桥，均以回鹘失败而终，虽有保疆守土的暂时胜利，但物力、财力、兵力、人力所限，最终没有实现光复甘州的目的。另外，在很短的时间内，两地战争不绝，自然国力衰微不支，百姓重负憔悴，正如《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书》所言：“沿路州镇，逦迤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此后不久，“西汉金山国”被逼降格为“敦煌国”，敦煌遗书斯 1563 号卷有“西汉敦煌国圣文神王敕”字样，自然“白衣天子”也就成了“敦煌王”了。到后梁乾化四年(公元 914 年)十月，随着张承奉的去世，“敦煌国”也寿终正寝，终结了自己似为闹剧的九年。此间及其后，吐蕃势力衰弱，回鹘进一步强盛，逐渐控制了兰州和河州，扼制西域的交通要道，最终成为安西(瓜州)、敦煌(沙州)的统治者，瓜、沙二州实际上成了回鹘的附庸。

到 11 世纪 30 年代，西夏连年用兵于河西走廊地区，先后攻占张掖、武威、瓜州、沙州，从此，河西甘肃回鹘又成了西夏的附庸。

作为河西回鹘的聚居地，南跨青海，北控居延海，在绵亘数千里之内，水草丰美，极适合于畜牧业的发展，有些地方借祁连山的冰雪之利也十分宜于农耕。为此迁徙到此地的回鹘人，大部分还从事畜牧生活，也有一部分人转变为农业居民，进行农业生产。

公元 1227 年，西夏为蒙古的西征军所灭，河西甘州回鹘也被

蒙古人直接统治了。回鹘文字对北方、西北地区一些民族文字的创造产生了直接影响，元代的蒙古文是根据回鹘文字母创造的，一直使用至今。而清朝努尔哈赤颁行的满文，则是根据蒙古文创造的。

回鹘各支尽占东西亚欧陆路交通要道上的咽喉之地，逐渐成为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他们无论战乱年月，还是和平时期，足迹西到波斯、印度，东到陕西、河南、山东，特别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汴京、燕京和辽的上京临潢府等地。回鹘人用马匹、百叠布、褐、斜褐、罽氎等，用貂鼠皮、野马皮、乳香、珠、玉、琥珀、玛瑙、硇砂、镔铁兵器等等各类货物，从五代各朝和宋、辽、金的政府换取到大量的铜钱、白银和绢、帛、丝、茶等物，大大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此，各地还建置了回鹘商人的聚居之地。

第五章　五代、西夏、宋元时期　敦煌地区发展的延续和开始走向衰落

第一节　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曹氏政权

出现在中国历史上10世纪前半期的五代十国，是开始于8世纪末的藩镇割据局面的进一步延续。

朱温在907年篡夺了唐朝的政权，建立了后梁。为了进行掠夺，朱温曾不断地南征北战，并对人民在其16年的统治中横征暴敛，残酷压榨。从而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抗。在农民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下，在和李存　的长期混战中，实力日益削弱，到923年便被李存勗推翻了。同年，李在洛阳建立了后唐，在原统治华北地区范围的基础上，把统治范围扩大到后梁统治的全部地区。

到936年，在太原的石敬瑭，以出卖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为代价，向契丹请来援兵，把后唐推翻，建立了后晋。同时，契丹贵族日益加强对后晋的压迫，多次进兵中原。但遭到中原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最终把契丹贵族及南侵军赶出了中原和华北，且使其从此不敢长驱直入到黄河以南。

947年春，刘知远趁契丹兵马撤退之机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950年冬，郭威举兵向南，推翻了后汉王朝，于次年正月即位建元，是为后周。其时，太原留守刘崇也称帝于太原，是为北汉。960年正月初，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了北宋政权，开始承担了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历史任务。

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敦煌（沙州）长史、金山国吏部尚书曹仁贵自称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已经创立了曹氏家族在敦煌的统治地位，偕同张承奉共同统领敦煌。其时，东与甘州回鹘结好，畅通东路交通，并向唐王朝派出朝贡使者，以取得中原王朝的承认，敕封他为节度使。同时与虎踞西陲的于阗李氏通好，并采取必要的政治军事措施以巩固内政及边防，且大兴佛教，为确立其正式的统治地位奠定基础。此间，张承奉只是名义上的"天子"、"王"，实际权力已经旁落于曹氏，时敦煌地区的局面也很复杂，特别是面对回鹘的进攻，无甚坚强后盾，张氏大权旁落，曹氏又名不正，言不顺，暂不可能有大的建树。

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敦煌（沙州）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曹仁贵继替张承奉，成为敦煌地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对敦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为以后曹氏家族在敦煌的统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曹仁贵取代张氏掌握瓜、沙实际统治权后，取消了"敦煌国"的建制，恢复了唐朝归义军的名号，曹仁贵自称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宗奉中原王朝正朔，多次遣人于中朝，希望求得承认。他统治敦煌时期，统辖瓜州、沙州二州之地，辖紫亭、悬泉、雍归、新城、石城、常乐六镇之戎，开始了曹氏家族在这一地区卓有成效和建树的统治时期。

后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前，曹议金代替曹仁贵主持瓜、沙二州军政事务，并于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正月遣使至灵武进贡于后唐，当年五月后唐庄宗册封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曹氏政权正式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曹氏统治合法

化的同时，也奠定了中原王朝支持的坚强后盾。根据敦煌遗书《曹良才画像赞文》，我们可知曹氏家族原籍亳州（今安徽合肥），先祖因在敦煌任官而留居沙州，逐渐发展为敦煌世家豪族，并与张议潮有亲戚关系。张承奉期间，曹议金曾任归义军沙州长史，执掌政权后，继承曹仁贵的政策，审时度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内部改革，对维护敦煌（沙州）地区的和平和安定，恢复发展生产，巩固曹氏政权，保护和发展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使西北敦煌一隅在中原纷乱时偏安一时。

当时，瓜、沙地区处于东西回鹘两大势力之间，无力与强雄抗衡，曹议金鉴于此，采取了西和于阗、东结回鹘的与近邻修好政策，改善了与邻国的关系。嫁女给于阗王李圣天，并努力于天福年间被后唐王朝册封为于阗皇后，敦煌莫高窟98窟东壁北向二身题名结衔"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词。同时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夫人，又嫁女给回鹘可汗为妻，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有"北方大回鹘口圣天可汗的子"和"甘州圣天可汗公主"之类的题名，还有身着回鹘服装的公主画像等。这种和亲式的姻亲关系，是当时瓜、沙二州统治者对外关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必要举措，对医治张承奉时期战争创伤、巩固政权、稳定局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为此，敦煌遗书伯3500卷子中记载当时："四面蕃人来跪服，献驼纳马没停时，甘、肃可汗亲降使，情愿与作阿耶尔，汉路当时没停滞，这回来往也无虑。"

在对付局势稳定的条件下，曹议金政权积极发展农牧业生产，并进一步加强同中原王朝的联系。《册府元龟》卷972中记载：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四月，曹议金进玉三团，还有"羚羊角、波斯锦、生黄金"等；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九月，"沙州曹议金进马四百匹，玉一团"。从中可见当时瓜、沙地区经济繁荣，农牧业生产兴旺昌盛。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卷子斯4245号也载有："……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司空……刀兵罢散，四海通达，疠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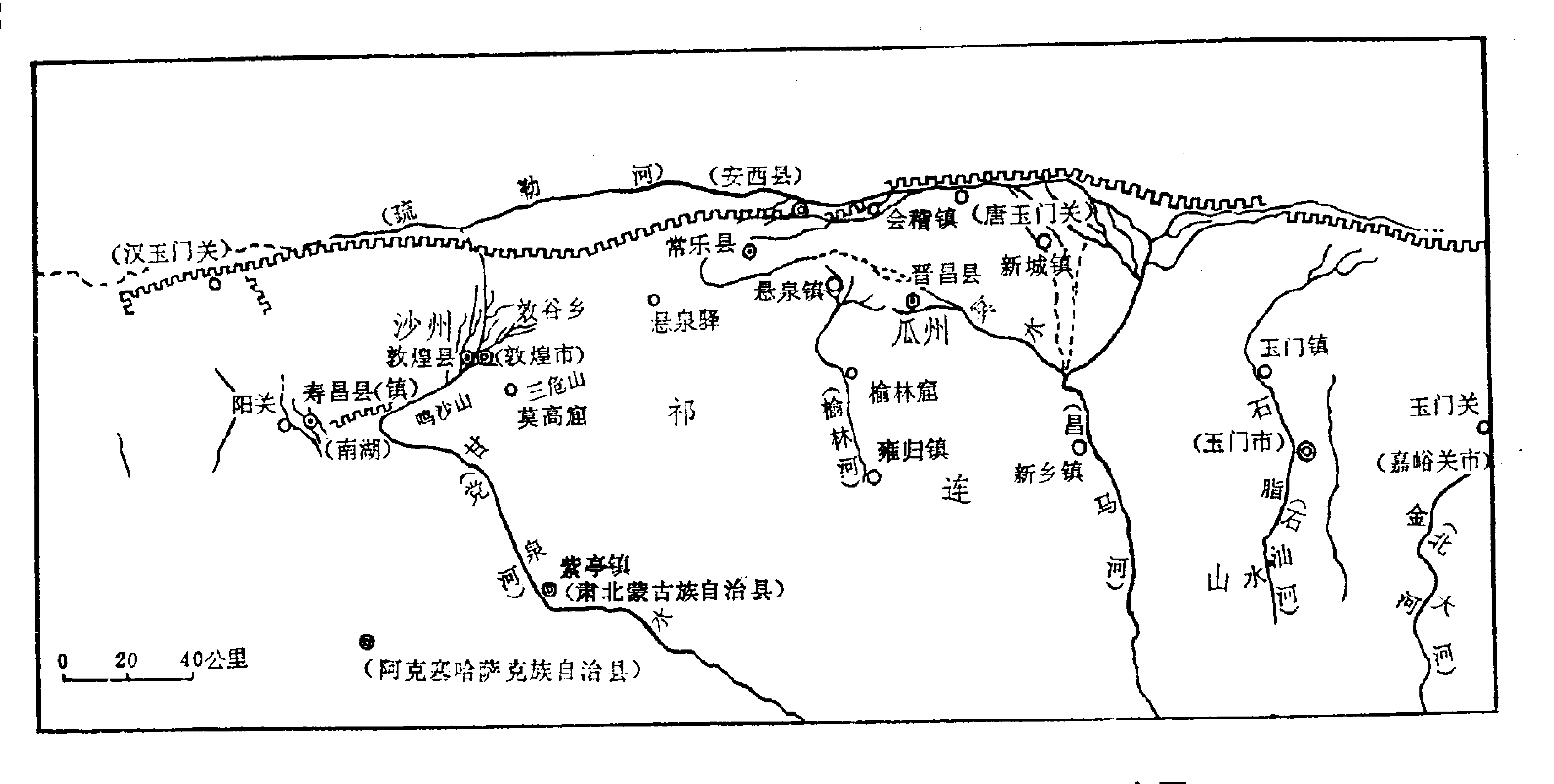


图8 曹氏归义军时期(五代)敦煌及期附近地区示意图

注：图1.5.6.7.8. 引自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所李并成教授的有关成果.

不侵，犹抢永灭，三农实香，民歌来暮之秋；霜疸无朝，用绝生蝗之患。”充分显示出瓜、沙地区农畜业生产恢复发展，灾疫免除，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景象。

另外，我们从现存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可知，在曹氏家族统治时期，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与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面，进行了大量的开窟造像活动，利用其宗教力量，维护其统治。据统计，仅敦煌莫高窟现存属于曹氏统治时期新修洞窟和重修洞窟就达 37 窟。现存第 98 窟，是曹议金时期所开，洞窟总面积达 220 平方米，窟内现存以曹议金为中心的供养人像题名多至 163 条，为敦煌莫高窟之最。另外，在曹元忠和曹延禄统治时期，还对敦煌莫高窟许多洞窟进行了较全面的修整，进行了大量的培修阁道、增修窟檐、缩小窟门等工程，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敦煌曹氏，在其统治地区还利用广结世家豪族、互相联姻等方法，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根据敦煌遗书和敦煌莫高窟当时供养人题名等资料，曹氏家族和累世簪缨的敦煌世家豪族，如索氏家族、阴氏家族、翟氏家族、张氏家族、瓜州慕容氏家族等，都有姻亲关系。“南阳张淮庆，字思美，为曹议金十六妹婿；豫章罗盈达为曹议金十三女婿；瓜州慕容归盈为曹议金第十妹婿。”这种从属于政治的婚姻，形成了这些地位显赫声势极隆的瓜、沙著姓间盘根错节、荣损与共的地方强势，对曹氏政权的巩固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曹议金大约在后唐清泰三年(公元 936 年)去世，死后追赠太师。在其统治时期，因有保境安民之功，所以受到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敦煌遗书伯 3128 卷子中曲子词里有《望江南》二首，即是当时对其的称颂之词：“曹公德，为国托西关。六戎尽来做百姓，压弹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做人君。”“敦煌郡，四面六蕃国。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陇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

曹议金死后，曹长子曹元德、次子曹元深先后均以归义军节度使相继掌握瓜、沙二州政权，为敦煌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公元945—974年，曹氏政权由曹议金第三子曹元忠执掌，其在位30年，统治时间最长。此间，曹元忠谨修内政，外结邻邦，政绩突出，是为曹氏瓜沙政权的鼎盛时期。

曹元忠继续保持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以其臣属关系，多次遣使朝贡。特别是北宋统一中原后，即曹元忠统治后期，更加强了与北宋王朝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坚强的政权后盾。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遂被北宋封为“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翌年，他死后诏赠“敦煌郡王”，其礼遇声望之隆，超越父兄。

曹元忠在任期间忠奉其父曹议金的政策，和周围邻邦保持发展了友好相处、不断往来的关系。在和于阗王的书函、人员往来中，一直以甥舅相称，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于阗太子三人被邀到敦煌礼佛法会，就是这种友好往来关系健康发展的标志。敦煌莫高窟444窟，至今还存有“南无释迦牟尼佛说妙法华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和“南无多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的榜题。

曹元忠卒后，其侄曹延恭、其子曹延禄相继任归义军节度使之职。至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曹氏内部矛盾纷争，发生变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禄和其弟瓜州防御使曹延瑞都为族子曹宗寿所杀害。

曹宗寿夺取统治权后，即差牙校阴会遣赴中原王朝入贡表文，托称“且为叔，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及瓜州防御使(曹)延瑞将见害，臣先知觉，即投瓜州，盖以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众意请臣，统领兵马，不期内外合势，便围军府。延禄等知其力屈，寻自尽。臣为三军所逼，权知留后，兼差弟宗文，以权知

瓜州，讫文表以求旌节……”①。宋王朝远离瓜沙，只得根据既成事实，正式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其弟曹宗文知瓜州，曹宗寿子曹贤顺为衙内都指挥使，曹宗寿妻汜氏亦被封济北郡夫人，即“一门荣宠，各有所授”。

曹宗寿统治敦煌地区时期，中原宋王朝日趋衰弱昏道，无暇西顾于瓜沙西陲一隅，权将其作为“羁縻”州县看视。此间，辽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并日益强盛，势力逐渐向西扩张。曹宗寿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继续保持和宋王朝的正常关系外，还和辽发生关系，加强往来，以免受其攻击。宋景德三年（公元 1006 年），曾遣使向辽贡献大食马及美玉等。辽也以衣、银器等物回赐，以表亲密之关系。曹宗寿的和好邻邦、兼事辽宋的外交路线，有利于中西交通交流的发展，瓜沙地区又出现了一度的“道路清谧、行旅如流”的短暂繁荣。

曹宗寿在敦煌地区的统治，约在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 年）结束。其子曹贤顺继替军政，在加强与宋、辽通使称臣的关系基础上，更加注重同辽的关系。曹贤顺多次遣使向辽进贡，并且于辽开泰八年（公元 1019 年）亲自入辽觐见，受到辽的宠遇，先后封其为“于越”、“敦煌郡王”等显爵，辽还派专使护送回敦煌。曹贤顺和辽的关系的密切是为了防止辽的进一步西进，因其地缘上的必然联系，自然比同宋王朝所持的一般贡使关系要重要些。

宋景祐三年（公元 1036 年），原游牧于我国西北部，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边区一带的党项羌族，势力崛起，推进河西，一举攻陷瓜、沙、肃三州。从此，西夏党项羌族全部控制河西走廊。随着西夏占领沙州，曹氏在敦煌的统治结束。

唐末五代的瓜、沙地区，自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张议潮起义，到宋景祐三年（公元 1036 年）西夏占领为止，敦煌历史称归义

① 《宋会要辑稿》197 卷《蕃夷志》四《瓜沙二州》。

军时期。这一时期，张氏、曹氏两敦煌世家豪族守土安疆，达198年之久，其间虽有各种变故，但对守卫西北边地、加强民族团结、维持中西交通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瓜州曹氏年表补正》一文对此做出了十分中肯和实际的评价："边围有金汤之固，中土无烽燧之惊"。特别是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原纷乱变多，而西北敦煌对于保证中西交通交流畅通，促进中西民族文化融合和政治交往，扩大贸易，繁荣经济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致使瓜州地区曾几度"风调雨顺，岁熟时康，道塞清平，歌谣满路。"①。

第二节　党项族西夏统治敦煌地区时期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住在今四川省西部边境内外。由于受到吐蕃的侵逼，在八九世纪内就逐渐向今甘肃省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陕西北部一带迁徙，并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10世纪初叶，广泛分布于甘、宁、青、陕的党项族，在和汉族等各族人民交往过程中，由于受到先进的封建制的影响，以及民族自身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大约到11世纪中叶，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并较快地迅速发展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党项族人民在开发发展我国西北，促进西北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著名的西夏文化。

宋太宗即位后，令据有河套以南五州之地的党项部落首领挈家入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从此党项族首领李继迁长时期与北宋为敌，并结辽国为外援。辽国这时也愿和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以

---

① 敦煌遗书伯2838号卷。

共困北宋，遂以契丹贵族女与李继迁结亲，并册封李继迁为夏王国国王。11世纪初，李继迁攻占北宋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地灵州（今灵武），并建都于此。它的失陷对宋的影响很大，北宋购买西北边区良马所必经之地被阻断。

宋太宗屡次调兵遣将，想用武力制服其，但因李继迁经常出入侵扰的几个州都在西北边陲，山路险狭，并间有沙碛，北宋的行军转饷都很困难，且常因此而致失利。转而又采取了经济封锁的办法，从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开始，禁止把青白盐输入汉地宋境。当时，党项人自己经营盐业，每年都有数千人经营池盐，他们的青白盐质量非常好，且价薄，不仅供党项人食用，还远销到其它民族居住地区，宋王朝的盐禁使其无法用青白盐换取所需的米麦。党项人的商业，主要是在沿边地区和北宋王朝统治下的汉族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在交易中，他们卖出牧畜产品、毡毯、毛织品、药材，买进粮食、茶叶等，既有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也有使用货币的方式。

德明继位为夏国王时，宋夏鏖兵已经20年了，这时夏正要集中全力攻取河西走廊诸州郡，所以改变策略，与北宋修好，要求宋王朝承认其在西北诸州郡的统治，按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青白盐的禁令，并开设互市榷场。宋应允了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予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官市与民间贸易很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情况。

这时，河西的凉州（甘肃武威）为吐蕃族六谷部所占据，甘州（甘肃张掖）为回鹘族的一支所占据。宋王朝在失掉灵州之后，便想与此两族首领连结，共同对付夏。但到11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两地也先后被夏攻占。此时，夏首都也迁到了兴州（今银川市）。

公元1032年，元昊继夏王位，继续向河西地区用兵。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元昊亲自领兵西征，与回鹘唃斯罗部将安子罗

会战于肃州(今甘肃酒泉),经过200多天的激战,回鹘败走。元昊继续西进,一举攻陷瓜州、沙州,至此河西地区尽为夏王国所占,敦煌被西夏统治达191年,是为少数民族统治最长的一个时期。从此,西夏国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关),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

元昊"性雄毅,多大略",继位时河西走廊地区已全部并入西夏的领土之内,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实力都已较前雄厚得多。因此,他撕毁了已经维持了将近30年的宋夏和约,积极谋划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宋也停止了给予西夏的银绢和钱币,停止了沿边榷场的互市,双方的民间商贩及其它往来也从此中断。

元昊仿效北宋政府的组织,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制、兵制,制定了官民的服式,立十二监军司,制定西夏文学,建立年号,更定礼乐,到公元1038年十月便改称皇帝,正式定国号为大夏,表示其势力与北宋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

西夏境土,共包括22州,居民除汉族人和党项族人,还有吐蕃族人、回鹘族人、塔塔族人等。这些民族除汉族外,主要从事游牧业。当时,河西走廊地区及敦煌地区水草丰美,极有利于畜牧经济的发展,且依托祁连山冰雪资源,富有灌溉之利,对农业居民汉族人的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也是极其有利的。

元昊在称帝之后,在于州东设置了一个"铁冶务",制造甲胄兵器。从敦煌附近的榆林窟壁画中的锻铁图可以看出,当时锻铁已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竖式风箱的鼓风设备。而其时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①。他们锻造的"神臂弓"和"夏人剑",异常犀利,被当时誉为天下第一。

党项族的西夏王国是一个封建割据性的国家政权,因其地域广大,所以在占领瓜、沙二州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这一地

① 田况《兵策十四事》,见《历代名臣奏议·御边门》及《长编》卷一三二。

区的统治力量是比较薄弱的。这里的曹氏后代势力和回鹘势力，依然存在且较为强大，他们还以各种方式和不同途径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希望与中原王朝同心协力，共同推翻西夏王国的统治。《宋史・仁宗纪》有载："四年（公元1037年），是岁龟兹、沙州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志》也载："六月，沙州遣大使杨骨盖、副使翟延顺入贡于宋"。《宋史・沙州传》也载："自景祐至皇祐凡七贡方物"。公元1041年，"沙州镇王子"上书宋朝的秦州知州曹琮："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迁击贼"①。当时，"回鹘本匈奴之别裔"，"自贞观以后朝贡不绝"，"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以后皆因之"②。据以上相关资料，敦煌史学界认为，这个"沙州镇国王子"是曾盘据沙州回鹘部落的一个首领。他们在西夏占领统治敦煌五年之后，仍与中原王朝秘密联系，企图伺机推翻西夏的统治，自然世居此地的汉族人民就更是"思慕中朝"了。

在敦煌莫高窟第444窟檐处北壁，至今还保存着一条汉文题记："庆历六年丙戌岁十二月座□神写窟记也"。庆历六年即公元1046年，已是西夏占领统治沙州后的第十年，这条题记仍然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而不用西夏的年号，可见当时瓜州地区民众确是"心系中朝"、仰慕汉仪，并随时准备推翻现有统治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西夏王朝忙于与中原王朝调整关系，忙于与辽、金调整关系，从而对沙州的统治是极其松散的。所以，西夏对沙州的实际有效的统治，要到皇祐（公元1049—1054年）以后了。

西夏的地方行政组织建置，基本上和宋代相同，分为州县两级制，敦煌当时属沙州。沙州当时的属县及户口情况，以及西夏王朝统治瓜沙州时期其它方面的各种情况，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且甚少，

---

① 《资治通鉴》卷四庆历元年条。

② 《宋史・回鹘传》

我们目前还难以窥见全貌。但是，我们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留存的大量佛教遗迹和反映当时瓜沙州人民生产生活的壁画艺术品及西夏文题记来看，西夏统治时期，是极其繁荣昌盛的。他们“横抗宋、辽、金、元，视四国之强弱以为向背”，保卫了自己民族的独立统治近 200 年。

我们从西夏统治时期各处广建佛寺、修造浮图，即可知当时是有相当的经济发展为其作保证的。酒泉文殊山、安西榆林窟、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及肃北地区的五个庙等地，都有西夏兴建或者重修的洞窟。仅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现存的属于西夏时期兴建和抹壁重绘的石窟就达 88 个，可见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上，佛事活动规模盛大。

另外，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壁画画面中有许多反映瓜沙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形象资料，也可见当时西夏统治时期手工业、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繁荣状况。壁画中的《打铁图》、《酿酒图》、《耕种图》、《舂米图》、《犁耕画》等都有形象生动直观的对生产生活的反映。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西夏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了北宋中原地区的耕作方法，“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了。

在西夏统治近 200 年的历史中，敦煌一带地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方面，都是有所发展、有所进步的，基本保持了“与中原无殊”的水平。这与西夏王朝政权的统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们在维护敦煌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方面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同时，西夏统治敦煌地区时期，这一地区又是各族人民如汉、党项、回鹘、吐蕃等的聚居地区，其发展繁荣又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党项族不仅是我们多民族国家中卓越的一员，而且对我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西北地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第三节 蒙古族元代时期的敦煌地区

蒙古族在唐朝时称为“蒙兀室韦”，原来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上游（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约在11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

11、12世纪时，在今蒙古草原及周围地区，有很多大小部落。当时的蒙古还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蒙古部落统一以后，蒙古一名就成为草原各部族的通称。

蒙古族过着游牧的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①，又兼营狩猎，“生长鞍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②。12世纪时，蒙古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畜群更加繁殖了。同时，辽金以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对与汉地毗邻的蒙古部落塔塔儿、克烈、翁古剌、汪古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各部经常以马匹、皮毛换取汉族人的绢帛和铁器，有些部落族人已经开始农业生产。畏吾儿文化也传入西部的一些部落，乃蛮部已使用畏吾儿文字。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已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和奴隶等阶级与阶层。

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年），在长期的征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先后击败了塔塔儿、泰赤乌、蔑儿乞、札木合、王罕、克烈、乃蛮等部落。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在斡难河源成为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在其统一蒙古和建国的过程中，采取了各种顺应且加

---

①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② 赵珙《蒙鞑备录·军政》。

速当时蒙古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政治、军事措施，建立起了强大的部落联盟，拥有一支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队伍。

从 1211 年到 1214 年，蒙古军大举向金进攻，金宣宗被迫遣使求和，蒙古的骑兵给金朝带来严重的威胁。

随后，从 1218 年到 1223 年，在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下，蒙古贵族发动了第一次西侵。蒙古军攻灭了西辽和花剌子模国，在迦勒迦河打败了斡罗思诸部，把蒙古国的领土扩充到中亚细亚地区。

公元 1224 年，成吉思汗在结束西征，回军漠北路经沙州时，对西夏西部边境重镇敦煌，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进攻。当时西夏军队联合沙州民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致使蒙古军队攻城"逾月不下"。无奈蒙古军队采取"乘夜穴城以入"的策略，而西夏沙州守将籍辣思义对应以"纳火穴中"的策略，使"蒙兵多死"，终于打退了蒙古远征军队的进攻。但是，这次战争也给人力、财力极其有限的沙州地区造成十分沉重的战争创伤，"军民困乏，牛羊驼马殊尽"[①]。

公元 1226 年春，蒙古大将速不台再次率军越过大漠，收降沙州西南边界的撒里畏吾部之后，继续东进，乘沙州还没有因上次战争恢复元气时用兵，沙州被蒙古军最终攻占了。从此沙州属蒙元王朝直接管辖，成为元宗室术赤的儿子拔都大王的封地。察合台的部将安竺迩并在敦煌设置驿站直抵玉门关，以保障西域中亚欧洲交通的畅通。时敦煌是蒙元王朝东西、中西交通的重镇。

从 1235 年到 1241 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灭金之后，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军第二次西征。先后攻占了斡罗思等地，军锋直逼东欧的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

从 1253 年到 1258 年，蒙古大汗蒙哥又派遣旭烈兀第三次西征。1258 年，蒙古军战败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达和达马士革城，势力发展到西南亚。

---

① 《元史·世祖纪》。

蒙古贵族在对西部世界远征，进行军事征服的过程中，客观上进一步沟通了中西交通，在促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人民的进一步交往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只是一个不稳固的政治军事联合体，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不久就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汗国了。为此，对其被征服地的影响也是十分短暂和不稳固的。

元朝建立之前，忽必烈曾在蒙哥汗即位的第三年（公元 1253 年），派兵攻占了吐蕃。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八年（公元 1271 年），定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第二年又改中都为大都（即汗八里），把大都作为元朝的都城。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攻占临安，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

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较之汉唐盛世，领土更加广阔。为了便于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元朝政府在甘肃设置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元政府复置沙州，开始把敦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进行经营。当时因为“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自之肃州，然后给与，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2]。至元十七年（公元 1280 年），元朝政府设置沙州路总管府，将瓜州也改隶沙州路管辖，并设置了河渠司治，统一管理瓜沙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同年，元朝政府对沙州的农户进行了彻底清查，规定了常年田赋，把一些富户多余的耕地分给驻戍沙州的汉族军队屯种，并诏发“四川军万人，由药剌海领之”，到瓜沙州屯田。

元朝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各族人民，镇压其反抗，进一步加强对

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②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

边远地区的统治，建立了女真军、契丹军等；同时又封诸子为王，分别镇戍回回、畏吾、河西等地，各地驻军都设有屯田。另外，还在全国设置驿站和急递铺，以便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这样也有利于边疆各地与内地的交通交流，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直到13世纪末，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塞栉比，屯垦大军遍布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仅瓜沙二州的屯兵，每年除自己食用及储粮，上交政府的屯粮就达22000余石。当时屯垦事业的兴盛，边疆及敦煌地区的繁荣可见一斑。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沙州路一度很不平静，西南各少数民族对各地的骚扰侵掠不断，影响到元朝政府对敦煌的政策，采取了移民东迁的措施。把瓜沙地区居民尽悉东迁甘州、肃州一带，并在甘、肃二州交界处划出一片耕种地区，让其安居生产。无力耕种生产者，由政府发放农具、籽种和畜力帮其耕种。经过这次居民大迁徙，瓜沙地区曾一度荒芜，沙州路也名存实亡，元朝边疆防务退缩千里之余。

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御使台向皇帝建议改变这种局面：瓜沙二州为边塞重地，不可忽视放任，今大军内屯甘州，而使百姓反居边外，实非良策。为了加强边防以防备万一起见，建议元政府仍“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方便”①。为了充实和巩固元王朝的西北边防，加强中西交通交流，元政府采纳了御使台的建议，于是又派兵驻守瓜沙地区。终元之世，瓜沙地区一直为军屯区域。

13世纪，蒙古军继续西征西亚各国，火药、火器的制造方法亦随之而传入伊斯兰教各国，经其改进后的制造方法又传回南宋和蒙古。《宋史·兵志》记载，南宋于1273年曾颁布制造“回回炮”的法式给沿边州郡，边地州郡人触类巧思，所制炮又能超出“回回炮”

① 《元史·世祖纪》。

之上。

随着元朝的建立，成吉思汗时期所奠定的横跨欧亚地区的蒙古大帝国，除元以外，已逐渐分裂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等独立的汗国，彼此间还有一定的联系，但元朝的皇帝只在名义上是各汗国的大汗。如此，加强元的边地经营，加强交通交流也就成为必然和必须注意的事情。

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声誉远及于欧亚非三洲。特别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更激起西欧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由于当时经陆路和海路的中外交通的频繁，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欧，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知识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信徒和清真寺院增多了。当时还有许多中国人到达了中亚、西亚和南洋等地。

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大帝国，自始至终都特别重视西北交通交流，对敦煌这一西北战略重镇，常以宗室诸王驻镇管理经营。延祐元年(公元 1314 年)，蒙古族元王朝在瓜沙地区设立屯储总管府，后特派诸王阿剌特纳失里出镇沙州。敦煌莫高窟现存汉文、蒙文、藏文、梵文、西夏文和回鹘文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碑》，是当时治镇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于至正八年(公元 1348 年)刻立的。其后的至正十三年(公元 1353 年)，另一个西宁王牙罕沙也由四川还镇沙州。敦煌具有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中国历代各族统治者为建立稳固的统治地位所必须注重经营的地区，特别是蒙元帝国兴起于北方，发展扩充势力于西北，在西北坚强后方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的统治地位，自然对西北“丝绸之路”重镇、中西交通交流枢纽的敦煌特别注意经营。

在元朝统治敦煌时期，瓜沙地区及邻近地区，除蒙古族人和汉族人外，还有更多的各民族人民在这里生产生活。当时，回鹘人从事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吐蕃族人从事畜牧业生产，西方的波斯、印度、大食等国的使节、僧侣、商团等，也东向“丝绸之路”，取道敦

煌进入内地，进行政治经济活动和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敦煌在元代时曾一度又形成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为中西交通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到达敦煌，并游历了敦煌全城，在他的《行纪》中尚有详细的记载。

第六章 明、清、民国时期 敦煌地区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与进一步衰落

第一节 明王朝时期的敦煌地区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的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同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明朝在四川、甘肃等地设立了只限于官府贸易、严格禁止私人贸易的茶马互市,发展汉藏经济,维护了由甘肃到西藏的旧有道路,使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初立国的明王朝,国基很不巩固,当时元朝的一部分残余势力还很强大,退守内蒙古和外蒙交界处的元后裔扩廓铁木儿和占据河西地区的李思奇等,还拥有数十万军队,他们武装侵扰陕甘一带,对明王朝造成较大的威胁。

明初于全国平定之后,明王朝统治者认为:"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尔,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1];其海外诸国,"有

① 《明太祖实录》卷34。

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而“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②，一般是不会为患于中国的。

明太祖朱元璋为尽快发展农业生产，曾实行屯田制，到永乐时期，民屯、军屯都有了新的发展，收效更为显著。明成祖朱棣执政之初，于建文四年（公元 1402 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诸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给户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③。除了移民屯田和召募屯田两种民屯形式外，永乐初还多次迁徙罪囚屯田，“凡人命、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律处决，其余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种田”④。朱棣更重视的是发展军屯，战争一结束，即命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令卫所屯田如旧制”，“岁终，上其所入之数，以课勤怠”⑤。永乐初年，又进一步制定了屯田官军赏罚条例，规定“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⑥。还在各屯田处所设置红牌，把赏罚条例逐一写在上面，敦促屯田军恪守。这种赏罚制度，是因地制宜而施行的，随耕田土质肥瘠不同，“令视其岁收之数参校之，谓之样田”⑦。这样定出不同标准的岁收之数，肥田多收，薄田少收，就较为合理，更有利于发挥屯田军士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增加军屯的员数，对那些调离原卫所从事其它事务，以及犯法被罚各地及边疆充军的军士，都命令他们复回原卫所屯田。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管理工作，朱棣多次派遣官吏分赴各地妥善安置屯田军民，整理屯种事务，改善经营方式，更定军士屯守的数目等。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永乐时期的军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军屯制度的完善，又

---

① 朱元璋《皇明祖训》箴言章。
② 《明太祖实录》卷 68。
③ 《明成祖实录》卷 12 下。
④ 《明成祖实录》卷 12 下。
⑤ 《明成祖实录》卷 12 上。
⑥ 《明史》卷 77《食货志》
⑦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 9。

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军屯事业的发展。“于时，东自辽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在在兴屯矣。”① 大力发展屯田事业，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永乐时期，“屯田米常溢三之一，……以是边饷恒足。”② 军屯所获，不仅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军屯税粮又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来，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政治上继续实行中央集权，消除割据势力，使封建皇权进一步强化，并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在西北，封诸西僧为法王、国师、西天佛子等，羁縻西藏，分遣使者宣慰抚谕西域诸国。从永乐八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10—1424年)，明成祖朱棣五次亲自率军出征，大举讨伐蒙古的遗族鞑靼瓦剌，迫使其向西北退却，北边西边由是奠安。史称：“四十余年，天清地谧，胡尘不飞者，皆皇帝之力也。”③ 明成祖朱棣在维护祖国统一，开拓、经营和巩固边疆方面的功绩，是远在明太祖朱元璋之上的。

洪武初期，扩廓铁木儿从北面派兵，联合李思奇进攻兰州，企图切断明王朝与西域的联系。明王朝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贸易，则必须打通西域的道路。于是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冯胜、李文忠等出兵西征。经过兰州争夺战，明军不仅解救了兰州之危，而且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几万人。冯胜和将军傅友德乘胜继续西进，连克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直追元残兵败将于肃州(酒泉)、亦集等地。元太尉锁纳儿及大部分元兵缴械投降，少数西逃，将军傅友德一举攻克瓜、沙二州，驻守敦煌附近的元屯垦兵士全部投降，明军获金印、银印及杂畜两万余头，沙州遂为明

---

① 《明史》卷77《食货志》。

② 《明史》卷77《食货志》。

③ 姚广孝《平胡颂》，《明经世文编》卷13。

朝所统辖。

明王朝尽占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后，为经营西域，加强陆上中西交通交流的平稳畅顺，从肃州(酒泉)以西至哈密，建立了相互紧密联系的 7 个卫所，每卫兵员 5600 人，每所兵员 1120 人，实行军政、民政合一统治。这就是当时的“关(嘉峪关)外七卫”：赤斤蒙古所(后改卫)、罕东卫、沙州卫、哈密卫、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其中哈密卫是明王朝西北地区的最前哨；设在敦煌地区的罕东卫和沙州卫则直接担负西域防线军马粮秣的供应，与明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如若敦煌不保，明王朝的西域防线也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无所谓经营西域了。

敦煌地区明王朝罕东卫，成立于洪武三十年(公元 1397 年)，由罕东部落酋长喃南吉剌思担任指挥佥事，卫址约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一带。永乐初，喃南吉剌思偕其兄答力袭入朝，被明王朝封为喃南吉剌思指挥使，并授答力袭为指挥同知。罕东卫南连接青海、西藏，西与新疆(西域)关系密切，明王朝为此特别注意这一地区的安定平稳。

从永乐八年(公元 1410 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 1424 年)之间，明成祖曾亲自率兵五次出塞，先后打败了本雅失里、阿鲁台和马哈木的蒙古骑兵，使鞑靼、瓦剌西部统治者都遭受到很大的挫折。

明朝政府为了防止蒙古的侵扰，“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积极在沿边修缮长城。

同时，在汉族人的影响下，更多的蒙古人开始了农业定居的生活。到了明代后期，蒙汉商业往来更加频繁。这对北部边地和西北边地人民在当时困难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敦煌地区沙州卫，成立于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由原驻敦煌的蒙古部落酋长困即来和买住二人任指挥使，卫址在沙州故城。明正统五年(公元 1440 年)，沙州指挥使困即来去世，由其子喃

哥袭任指挥使，与明王朝始终保持朝贡关系。但到正统十三年（公元 1448 年），喃哥兄弟间相互争夺权利，引起部众不满，欲各自逃散异地。在此种情况下，甘肃镇将任礼派遣都指挥毛哈剌，前来沙州安抚其众，劝其安守沙州，勿持异端。喃哥和哄南兄弟表面上虽表示归顺，但暗中却伺机率众西投瓦剌。任礼趁其举棋不定、军心涣散之机，带重兵收复沙州。时哄南已率少数部众逃奔瓦剌，对喃哥部众共 200 余户，计 1230 余口，全部让其迁入塞内，耕牧于甘州一带，沙州卫遂废。

明英宗正统初，原驻牧于今安西县境内的罕东蒙古部，因部落内部矛盾发生激烈争斗，其头人奄章率其众逃居沙州地耕牧。以后借其优越的自然环境，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部落日益繁盛，逐渐脱离了罕东统属。到奄章子班麻思结时，犹居沙州而不还。"朝廷屡勒还本卫，不奉命。正统中沙州全部内徙（甘州）后，思结遂尽有其地。"① 自此，沙州即为罕东蒙古部驻牧。明成化十五年（公元 1479 年），吐鲁番贵族攻陷哈密，沙州面临新的威胁，罕东指挥使班麻思结之孙只克，上书明朝廷请自立一卫，和吐鲁番相抗衡。明政府准其所请，命其在沙州故城建立罕东左卫，授只克为都指挥使，习惯上仍被称为沙州卫。

明朝中叶，西北等地往往是"商贾罕至"，甚至"五谷财物无所售"，或"不能尽售"。有的城市除定期的市集之外，"余日则若五墟"②。

畏吾尔（亦作畏兀儿，即今维吾尔族）是明代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一个主要民族。在明初已普遍改信了伊斯兰教。畏吾儿族地区的封建主之间常常相互争战，敦煌近邻的哈密等地经常又遭受蒙古旧部瓦剌等的侵扰。

---

① 常钧《敦煌杂钞》。

② 霍与瑕《霍勉斋集》卷十八《申稿》。

景泰时，吐鲁番势力强大，攻占哈密城，合 并了敦煌、安西二州，兵锋直指嘉峪关内的酒泉、张掖等地。从此明朝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和西域的控制日益松弛，不得不在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放弃了哈密。但是当时敦煌、哈密仍然是通向"西域之襟喉"，经过这里来北京和甘肃等地贸易的使者，始终没有中断。

畏吾儿人善于经营商业贸易，他们或"行贾诸番"，或随同使者经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来内地贸易，有些人并久留不归，与汉人友好相处，经常往来。另一方面，畏吾儿族地区也有很多汉人，他们大都是被蒙古统治者掳掠和转卖而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经济文化往来中、在商业贸易中留居畏吾儿的。当时，有许多原居敦煌的汉人流落、迁徙于畏吾儿各地，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弘治十七年(公元 1504 年)，瓦剌和安定部联合举兵大肆侵扰抢掠敦煌地区人畜，沙州指挥使只克势弱屡挫不能自保，派人赴嘉峪关求救，明政府即拨粮赈济，并宣谕：安定、瓦剌"二部解仇息争，不得构兵招衅"。可见明王朝已减弱了经营沙州、交通西域的兴趣和力量，自此以后，沙州遂多事。正德中吐鲁番再据哈密，沙州经常遭侵扰抢掠。此时只克去世，其子乞台执掌沙州卫事，加之沙州屡遭瓦剌、安定和吐鲁番的侵扰劫掠，势力衰弱不振，难以抵御吐鲁番的力量。明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乞台无奈只得求请明政府批准，率部分部众迁入肃州(酒泉)塞内耕牧，以保部族人等平安。

乞台部下贴木哥和土巴二人，当时不愿离开水草丰美、利于农牧的沙州，降附于吐鲁番贵族，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吐鲁番贵族对其横征暴敛太甚，每年要沙州交献妇女，交纳大批牛马。贴木哥和土巴无法忍受这种苛罚，于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率部众 4500 余人，迁徙至嘉峪关内驻牧，沙州就被吐鲁番完全占据，进行直接的统辖了。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明王朝政府在少数人"闭关绝贡"的主张盛嚣之下,封闭嘉峪关,从此瓜沙二州的敦煌地区,旷无中原王朝建置近200年。

明朝政府"封闭"嘉峪关,使关外地方曾脱离了自己的统治,这只是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内地的暂时断绝,是一种维护统治的策略,并非是放弃了对这一带地区的国家权利和版图,更不是断绝了相互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其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还是很密切的,而且一直没有间断过。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甘肃总兵王玺与西域二十九族代表阿吉等,共同订立相互界约,在嘉峪关外"立石划界"、"听界外互市"。以后,甘肃巡抚徐进和总兵刘宁又与吐鲁番酋长满哥亦剌思,订立在肃州(酒泉)一带允许汉族和吐鲁番商民相互进行贸易的办法。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陕甘总督王崇古又向明王朝提出在关外互市贸易的建议:"广招商贩,听令贸易,收其税以充赔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明朝政府采纳其建议,于是王崇古在公元1571年和关外的蒙古族、藏族酋长吉能及俺答等,共同商议订立了贸易条约,准许汉人和少数民族人进行农、牧、商民的茶马互市,以互通有无。致使"封关"后几度出现"边境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民乐业"[①]。这种友好相处、相互交流交往的关系,一直保持着。

第二节　清王朝时期的敦煌地区

16世纪后期,隆庆、万历年间,女真建州部的社会生产力已有

① 《甘肃纪事稿》卷三。

了显著的发展。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力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做了皇帝。他先后颁布了官制和法律,有了国家的组织。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其子皇太极继承了皇位,其间女真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天聪元年已不用建州之名而改为满洲)。当明末农民起义军胜利进军之时,崛起于东北的满洲贵族已经在关外建号大清,势力日益强大。大顺永昌元年(公元1640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军猝然袭击山海关,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北京撤退陕西,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同年九月,清顺治帝迁来北京,定北京为清朝的首都。

清王朝统治者在压服了南方的抗清力量之后,便开始向边疆各地发展。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连续向西北用兵,最后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一个空前强盛的王朝。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清兵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等地与噶尔丹军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噶尔丹大败。

为了驱逐准噶尔的势力,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18—1720年)间派兵击败了准噶尔的军队,恢复了西藏地方秩序,受到西藏各部僧俗的欢迎。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和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清政府又先后两次平定了西藏的叛乱,西藏长期混乱的局面稳定了下来。其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清朝政府发兵入藏,击败了侵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

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军全部平定了在新疆与清廷为敌并煽动西北各地反清的准噶尔部。至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清朝政府平服了天山南路,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统一。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朝政府以岳钟琪率兵击败了在策妄阿拉布坦的煽动下封建主罗卜藏丹津胁从游牧各部落在青海的

叛乱。

清朝政府为巩固边疆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康熙时与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雍正、乾隆时对西藏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与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乾隆时与“四部”的战争，这些巩固边疆的战争，客观上最终改善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闭塞的面貌，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联系，因而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使清王朝成为一个幅员广大、国势强盛的统一的封建国家。

清朝前期即康熙以后，经过对西北边疆的多年经营，当时在西北各地出现了很多的商业城市，如库伦、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西宁、打箭炉、伊犁、哈密、敦煌、阿克苏、叶尔羌等，其间的商业贸易敦煌起了很重要的中转补给作用。

内地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来到了西北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安家落户，还在蒙古、新疆的各大城市开设了许多商店和作坊，使内地和边疆的商业联系更加频繁，并且还把内地很多手工业技术带到了边疆。商品生产的发展促成了西北各地商业的繁荣。

清王朝康熙时开始经营西域，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域渐次得到恢复，清势力不断西进。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清王朝在今甘肃玉门、安西地境设立赤斤卫和靖逆卫。到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为卫”[1]，隶安西镇。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川陕总督岳钟琪西巡至古沙州地，确认其地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垦荒生产的适宜之地，于是奏请清廷，建议向沙州移民屯垦，以备军需。清政府准奏后，即派汉兴副道尤汶来沙州督理屯田垦殖事务，当年起即由甘肃五十六州县开始大规模移民至敦煌屯垦。

---

① 《清史稿·地理志》

新至敦煌的移民，由清政府借给耕牛、农具和籽种及七个月的口粮，并每户发给房价银三两，划给空地二分四厘，促其先自盖房屋两间，暂时解决基本的生活生产所需。当时解决住房、修盖房屋的具体办法是，每十户编为一甲，推举甲长一人负责调派总理事项，五户砍伐运送木料，五户打制土坯。经互相合作，统一调派，共同努力，共计修建房屋4810间。① 这样，就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上解决了新近迁徙至敦煌的大量移民的生活问题。

基本生活安定后，开始划地授田，按当时的实际情况规定，移民每人开荒地50亩，为"一份地"，以"一份地"为一户。截至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大规模移民结束，共开田120250亩，计2405户。当时安置移民时，为了照顾不同州县移民生活、习俗和语言的方便，仍按原籍州县集中居住生活生产。把黄河以东各州县的移民，安置在党河(敦煌段)东岸及西岸的上游地区；把黄河以西各州县的移民，安置在党河西岸的下游地区。并且以原籍州县名称，命名移民们新定居集中点地名。如移民由原"××县"迁来，现仍冠以原县名称"××县"。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敦煌(沙州)改卫升县时，又去"县"称，冠以"坊"称，以示区别。

今天敦煌市农村的坊里名称，绝大多数仍是甘肃旧县名称谓，如"岷州"坊、"姚州"坊、"金县"、新"肃州"等皆源于此。

清时，在开荒屯垦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在党河两岸兴修水利，开永丰、普利、通裕、庆余、大有五条水渠(后再开五条)，共计长389华里，又分置数十条相通相连小渠。自此，形成支渠与农毛渠纵横交织，从而使新开的12万余亩良田，均沾水利，使百年荒芜的原野变为平畴畸错的良田，敦煌再次成为林树茂密的绿洲农业耕种地区。

在移民屯垦、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因沙州故城受党河水多年

---

① 《重修敦煌县志稿·编年志》。

冲刷，城垣大多毁坏，遂在故城之东修筑了敦煌新城（今敦煌市盘旋路以西）。新城“周围三里三分，开东、西、南三城门”，分别为：迎恩门、宁塞门、靖远门，并由清政府特调原临洮知府白讷具体督理。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加派光禄少卿汪隆来敦煌，继续监理修建新城和新建官署、兵房等各项基建工程。至公元1729年，新城建成，衙署也基本峻工。为此，汪隆还留诗四首以纪“疆宇新开增气象，边民辐辏往来通”①。

敦煌新城建成后，初名“沙州卫城”，后随着中西交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商业贸易也日益兴盛，原筑卫城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为此，又于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增建郭城（俗名关厢城）。关厢城包围卫城的东、南、北三面，开设东门“迩安门”、西门“望瑶门”、南门“瑞映门”、北门“归极门”。关厢城周围五里五分，全系土筑。卫城、郭城两城，就是旧敦煌县县城，即今敦煌沙州镇的规模。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清政府根据当时敦煌实际发展情况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正式升沙州卫为敦煌县，隶安西同知。同时，置沙州巡防营，隶肃州镇，设参将统领。

为巩固和强化其统治，当时敦煌县下设：礼房、吏房、兵房、刑房、户房、工房和快班、皂班、轿班，即“三班六房”。另设“儒学署”掌管地方教育文化，“典史署”专管地方刑狱。

在农村各地则实行“隅”、“坊”建制，全县分为6“隅”、56“坊”。东南隅13坊，西南隅6坊，中南隅6坊，东北隅6坊，西北隅12坊，中北隅13坊。每隅设“老农”1人，管理全隅的农田、水利、差役、赋税等各项事宜；另设“乡约”1人，负责调解诉讼和民事纠纷等。每坊再设“坊长”1人，负责催收赋税、徭役、杂草及纠察赌盗各事。每10户又设“小甲”1人，专事稽查户口、催收赋税等具体事

① 《敦煌县志》。

务。

敦煌县城镇分东关、南关和北关，共 24 巷，设“商正”、“保正”各 1 人。商正负责商民的商业贸易活动和调解债务纠纷等项事宜，保正负责催收税赋和差役等事务。这样，就形成了较完整有序的农村和城镇分别不同的管理系统，为维护有效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同治年间（公元 1862—1874 年），陕西回民白彦虎领导了声势浩大的西北回民起义，给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予以沉重的打击。同治六、七年，白彦虎率领号称 20 万的回民起义军，由陕西进入甘肃陇东，随即势力遍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关陇震惊，清兵节节败退，闻风丧胆。

此间，河西走廊地区的肃州（酒泉），被以青海回民猎户马文录为首的回民等占据，他们与白彦虎起义军遥相呼应，使清王朝派往“督剿回匪”的左宗棠、金顺、刘锦棠等部，处于东西夹背受敌、穷于应付的被动局面。左宗棠向清王朝哀叹：“甘肃土匪二十万，蔓及延、榆、绥一带”，“凶悍殊常”、“而玉关内外竟无完土，军民之勤劳涂炭亦极矣！”①

至 1871 年五月，白彦虎的回民起义军转战于青海金积堡，随后进入河西走廊，迅速与马文录部会合，以肃州为据点，筹划出关西征，以打通到新疆的通路。七月，起义军派马长顺率军一部出嘉峪关，首先占领安西，随即挥师敦煌。在敦煌东北隅秦安坊一带，起义军受到清军副将李天和部的堵截，双方经过激战，结果清军溃败，逃回敦煌县城倚城固守。马长顺急攻敦煌城不下，派人进关求援，起义军遂派邹阿訇带兵 3000 余人至敦煌接应，两部兵将合一将敦煌城团团围住。两军相持半年之久，终因防守严密，攻城不破；且清军坚壁清野，起义军粮秣断尽，只得撤兵而退。

1873 年春，白彦虎亲率回民起义军万余人，再次出嘉峪关围

---

① 《甘肃省通志稿》。

攻敦煌。清军调集四个统领的兵力和起义军对抗，在北乡张家堡子展开激战。起义军将士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当场击毙清军统领李宗经，活捉统领胡鹏飞，杀死杀伤清官兵数百人，缴获辎重马匹无数。经此一战，清军魂惊胆丧，龟缩于敦煌城中，再也无力和起义军交锋。两军再次相持半年之久，起义军也难以破城取胜。最后，清军派人出城讲和，由清官军出粮200石，赎回被俘的统领胡鹏飞，并相约在县城北郊漳县庙一带设立市场，准许敦煌老百姓和起义军进行以物换粮等各种交易。缓兵之计即成，左宗棠迅速调集数倍于起义军的兵力，亲自到肃州督战，以断白彦虎后援。据占肃州的马文录孤军无援，城破被杀，起义军遭到残酷镇压，"肃州回族，诛戮殆尽，尸骸枕藉"。

肃州既破，围困敦煌的白彦虎自成孤军，最后只得撤围，沿古丝绸之路南道窜入新疆。

白彦虎是著名的陕西回民起义领袖之一，起义之初"一呼而聚有数万之众"。但起义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军事路线，起义军缺乏严格的训练的严密的组织纪律，只知其攻城掠地，似打家劫舍，又不分良善乱杀汉人，引起民族纷争，因而失去了大众的支持，以失败告终。白彦虎本人进入新疆后，最终投降了英帝国主义扶殖的阿古柏，堕落为民族的罪人。

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公元1904—1907年)，敦煌爆发了农民的抗粮斗争，这是一次农民自发地反抗残酷封建剥削的斗争，在敦煌近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敦煌自雍正时移民迁户以来，清政府规定自领荒之年算起，三年后才征田赋。当时，广大农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庄稼连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已达20万石以上。由于粮多人少，致使粮价很低，关内酒泉、高台等粮食商贩乘机贱价收购谋取厚利。陕甘总督查朗阿，见有利可图，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奏请清廷准允："由司库发银，就地采买粮谷"，以补"关外军粮不足"。清廷批复："若有将

盈余之谷情愿出粜者，着动支官银，照市价购买，存储公所”，“不可勒令粜卖，生事滋挠”。[①] 但查朗阿硬性规定，农民每份地除纳屯粮外，另纳采买粮千石后，由官府发给1440文铜钱统一定购，不管粮食丰欠、物价浮动，“屯采并纳，永为定例”，且“此项采粮所得盈余，即为地方各官公私费用”。至后来，连采买粮官价，也被扣发，无形中农民每份地增加了4石粮(约800公斤)的沉重负担。

敦煌农民多次对此提出抗议，并上书清政府，要求取消这一不合理负担，但官府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暴力压服，此矛盾终未解决。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敦煌县监生张鉴铭、武举张壶铭兄弟，联合生员朱永和及农民谢全、谢大伦等20余人，联名呈请敦煌县署，要求免除采买粮。敦煌县令汪宗翰不但不肯允准，还捏造“敛钱包讼，把持会款，隐种官田”的罪名，将朱永和等三人投入监狱。以张壶铭为首抗粮群众上诉安西州、安肃道，并多次聚众请愿要求放人，无任何效果。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夏，张壶铭、李正贵一面派人上诉甘肃省垣，一面酝酿组织抗粮团体，分赴四乡号召农民抗交采买粮。

当时担任陕甘总督的满族大吏升允，恐怕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斗争，被迫调走知县汪宗翰，另派黄万春代理政务。黄万春软硬兼施，无奈群众的抗粮呼声日益高涨继起，甘肃督署又免黄万春，再派王家彦代替，以图扑灭汹涌的群众抗粮斗争。

王家彦抓捕了张壶铭，殴辱张氏家属等人，其兵勇将张氏财物洗劫一空，后又在押解途中杀害了张壶铭。消息既出，激起了敦煌民众的愤怒，四方百姓不约而聚3000余人，可持木棒、刀、斧，要“替张举人报仇”，要“捉住赃官王家彦”。愤怒的群众斩关扭键，进入县城，打死巡警攻破县署，王家彦慌忙从后门出逃参将府。

---

① 《敦煌县志·开设沙州记》。

陕甘总督升允闻迅，急电肃州总兵柴洪山，令其日夜兼程前往镇压。柴洪山到敦煌后，认为敦煌百姓“民情淳朴，并非刁民，亦无反意”，抗粮一事至此，是由于官方高压而成，不可深究。升允认为柴洪山镇压不力，指使参将林太清使用兵力大肆搜捕抗粮运动领导人。

为使无辜百姓免受牵连，抗粮领导人挺身而出，被解往酒泉，升允指定张掖县令沈龄皋审讯后，或处死，或判永远监禁。轰轰烈烈的敦煌人民抗粮斗争，经过两年的斗争最终失败了。清政府在自己的末日到来之际，无奈对敦煌农民做了让步，免除了每户必须交纳的“采买粮”4石的“常规”。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敦煌地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结束，开始代之以“民主共和”。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封建时代，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这个政权，不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把中国人带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它的存在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和国成立止，一共不到38年，但它却是中国历史承上启下值得重视的一段历史。这一时期的敦煌地区，因偏离争夺政治权力的中心，所以其历史有自己的特殊性的一面。

民国成立后，撤销安西直隶州，敦煌仍旧属安肃道(治所酒泉)。县及以下行政建制仍沿袭清代的“房班”、“隅坊”制度，只将原来的典史署改为警备队和监狱署，儒学署更名劝学所。原来清朝的官吏，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官员，封建统治的方式略微改变些，其本质上毫无变化，革命的影响力至于敦煌似乎连“彻底”不“彻底”

都无需挂问，原来的官吏，原来的人民，无甚变革。

直到1926年，民国政府才将原来的县属六房，改组合并设立科局，分置科长、局长，管理敦煌全县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宜。农村则仍旧实行坊隅制度。1932年，裁撤坊隅，设立区乡。全敦煌县分置五区十乡，乡下设闾，闾下为邻。区设区长一人，乡设乡长一人，闾设闾长一人，邻设邻长一人，分别管理所辖地区的民事、赋税、差役等事务。

1935年，民国政府又在敦煌县并区设置联保，实行保甲制度。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每两保设联保主任一人，联保以上设区，把全县分为两个区。

1938年，又取消联保，实行乡镇保甲制度。全敦煌县划分为一镇（鸣沙镇）四乡（和平乡、新安乡、永宁乡、静肃乡），39保共416甲。同时，还设立了国民自卫组织，县设自卫团，乡镇建自卫队。当时敦煌县共有户4825户，有口27948人。

哥老会又称仁义会，是一种民间结社的秘密组织。19世纪中叶，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各省区。同治中期哥老会组织逐渐渗透，进入清军兵勇及下级军官当中。后又随被遣返的兵勇及军官再流入民间，许多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也加入了进去，势力日益扩张，徒众遍及全国各地。哥老会最初的发展宗旨以“反清复明”为号，但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活动采取分散进行的方式，并搀杂了许多封建迷信的色彩。最终甚至发展到乱杀乱劫，逐渐转变为反动会道门了。

民国初期，哥老会在关外和新疆一带活动猖獗，他们在各县“开山立堂”，散发会证，勾结军队，害民扰官。它的总部叫“通统山”，最初设在陕西，以后在酒泉，关外和新疆地方，又有“太极山”、“迪龙山”、“福寿山”等名目，分部设在肃州，山主韩应忠。

1913年起，韩应忠开山为堂，四处活动，在布隆吉尔、玉门、敦煌等地，分设据点。同时差遣杨生花、郝金章等人，潜入新疆秘密活

动。新疆督军杨增新发现后，进行大规模捕杀，余党遂潜逃进入敦煌。他们和敦煌哥老会会徒王伦、王之禧、侯得胜、罗裁缝等人串通，秘密串联，相约相机行事。

当时，被边关观察使周务学和敦煌县长刘治清探知底细，遂会同驻军负责人何炳文相机，以迅速果敢的举动将其一网打尽，县城东大街升字和秦州户口时有人头落地。此次捕杀"会党案"活动，一时间敦煌满城恐惧，人人自危。

1920 年 5 月，苏联红军追剿顽固对抗人民的白俄军队少校阿连阔夫。阿连阔夫率残部官兵 1400 余人，马匹 700 余，窜入我国新疆伊犁地区，企图建立反苏基地。中国当局缴获了他们的部分武器装备，于 9 月将其遣送乌鲁木齐，随即再遣送至奇台驻扎，并作了严密的戒备。1921 年 1 月，阿连阔夫残部发动了对奇台的袭击，中国军队事先早有防范，阿部被迫缴出全部武器。

新疆督军杨增新恐其再生祸端，恳请甘肃督军陆洪涛，"以分其势，而免意外"。经电报磋商数月，最后陆洪涛答应将阿连阔夫残部暂时安置到敦煌，再另作处置。当时，敦煌县长陆恩泰和防军管带周炳南具体负责安置事宜。陆恩泰和周炳南邀集农商各界及乡绅多次计议后，决定将其安置到距离县城 40 多里的千佛洞。1922 年 5 月，阿连阔夫率残部约 500 余人，乘四轮马车数十辆，由哈密穿戈壁，经敦煌北湖到达敦煌，先被安置于县城北门外大教场驻扎，随后，由地方巡防营"护送"遣往千佛洞驻扎。白俄阿连阔夫残部，在敦煌千佛洞暂留约八个月左右，分三批遣送进关，赴上海、天津等地，再行遣送回国。阿连阔夫后被引渡给苏联政府，"苏联当局把他解到斜米，交付人民审判，判处了死刑"①。

1929 年 4 月 11 日，酒泉城防司令部因久欠军饷，致使军心涣散不稳，排长吴廷章借机率众哗变。他们释放狱囚，抢掠酒泉农工

---

①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

贷质所、团防局和商贾大户，然后裹胁民众700余人，合哗变兵士计1200余人，仓惶窜出嘉峪关。吴廷章自称“安国军总司令”，沿途再抢掠玉门、安西两县，于7月4日到达敦煌。7月6日吴廷章率兵变匪徒攻敦煌城，全县军民全力抵御，吴撤围东去。随后，吴廷章又搜罗安西、玉门二县武器弹药库所藏抬炮数门，纠合永昌西窜叛乱残兵200余人，于8月12日第二次围攻敦煌城。匪徒们用炮轰、火烧、云梯猛攻、引水灌城等法，终不能破城，最后只得向新疆逃窜，后被雷中田部所灭。

吴廷章哗变所演变的匪徒行径，两次进攻敦煌城，城虽终未破，但四乡百姓却受到了惨重的祸害。据《重修敦煌县志》所记载，吴廷章匪众寇掠敦煌时，共掳掠丁壮200余人，杀死致伤百姓民众二三十人，抢去骡马500余匹，百姓民众财产损失约合10万余银元。这种事变也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兵祸相继，自然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1930年，原起事河州，与国民军对敌，自称“西北讨逆军总司令”，俗称“尕司令”的马仲英，“劫湟源，屠永昌，洗民勤”，仅两个月就劫杀汉、藏群众万余人。因遭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遂潜出宁夏，窜入河西走廊地区。

当年夏天，马仲英占据甘州后，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下设民政、财政、军需、军械、参谋、交通、副官及执法等“八大处”，张掖以西各县均霸为其势力范围。此时，青海的马步芳匪徒深感如若马仲英在河西得势且站稳脚跟，对自己的统治是极大的威胁，于是采用武力开始兼并马仲英。

1931年4月，马步芳亲率韩起功部，由西宁经门源出扁都口，突然袭击马仲英于洪水、三堡、六坎，马仲英激战中见势弱不敌，只能退据肃州。时蒋介石已授马仲英部为新编三十六师，为此马步芳占据甘州后再未西进。

同年9月，马仲英向西扩展势力进入新疆，被金树仁部击败，

又转而东退入关。马步芳命马步康占据酒泉，只划金塔、鼎新、安西、敦煌、玉门五县为马仲英的驻防区。

马仲英为了在这些地区立足，在各县大规模征兵筹粮，扩充军备。仅在敦煌县，1931 年 8 月到 12 月，“征兵五百多名，索要麦面四百余石，马草四十二万斤，豌豆三百四十余石，皮衣一千五百件，棉衣五百套，至于银饷摊派更是屡征不止。”[①]1933 年 4 月，又在敦煌“强征马料一千余石，骆驼六百峰，白洋六千元”[②]，然后进入新疆。

马仲英再次进入新疆，遭到盛世才的阻击，无奈退入南疆，翌年 7 月转苏联，后坠机身亡。

敦煌地区成为马步芳的势力范围，百姓民众所受抓兵、苛征暴敛数倍于以前，敦煌人民生活在如同人间地狱之中，惨遭马家军的残害欺凌和敲诈勒索。

1942 年，马步芳撤出河西走廊地区，敦煌人民再次被中央军投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马仲英抓兵征赋、扩充势力祸害敦煌人民之际，原甘肃兰州第一中学校长杨灿，于 1933 年出任敦煌县长。杨灿到任后，目睹敦煌人民“壮者去充兵役，老弱者乞食街头”的惨状，多次召集地方士绅和农商各界负责人，商讨解民于水火的应急措施。他还邀请敦煌殷实富户，劝其解囊捐粮赈饥。

与此同时，杨灿对缺粮的农户由官方贷以籽种，确保百姓民众不误农时播种耕地，并在城区火神庙等处设“施饭场”，对老弱病残者予以救济。这种“官民共赈”的措施，使敦煌饥民死里逃生，度过了难关。次年春，杨灿又组织核查组，调查核实农村四乡农户地亩与负担不平衡的积弊，解决了敦煌农民多年来所担负的额外不合

---

① 《重修敦煌县志》。
② 同上。

理沉重负担。杨灿所举，深得民心，1937年他卸任内调时，地方各界勉其惠政，赠以“遗爱甘棠”的匾额。

敦煌地区建置沿革表

事项/时代		敦煌郡 建置时间、名称、隶属	敦煌郡 所领县名称、数量	敦煌县 建置时间、名称、隶属
汉代	西汉	公元前 111 年，敦煌郡	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汉代	新莽	公元 9 年，敦德郡	敦德、冥安、效谷、渊泉、广桓、龙勒六县(亭)	敦德亭，隶属于敦德郡
汉代	东汉	敦煌郡	同西汉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三国(曹魏)		敦煌郡，隶属于凉州刺史部	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宜禾七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西晋		敦煌郡	昌蒲、敦煌、冥安、龙勒、效谷、广至、宜禾、渊泉、伊吾九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东晋十六国	前凉	敦煌郡，隶属于凉州、沙州	昌蒲、敦煌、龙勒、效谷、乌泽、凉兴六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东晋十六国	前秦	敦煌郡，隶属于凉州	昌蒲、敦煌、龙勒、效谷四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东晋十六国	后凉	敦煌郡，隶属于凉州	昌蒲、敦煌、龙勒、效谷四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东晋十六国	西凉	敦煌郡	昌蒲、敦煌、龙勒、效谷四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东晋十六国	北凉	敦煌郡，隶属于凉州	昌蒲、敦煌、龙勒、效谷四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续表一

事项 时代		敦煌郡		敦煌县
		建置时间、名称、隶属	所领县名称、数量	建置时间、名称、隶属
北朝	北魏	公元 439 年，敦煌镇	治所敦煌，辖酒泉军、乐涫戍、晋昌戍等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镇
	西魏	公元 526 年，瓜州	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后增效谷、寿昌二郡	瓜州
	北周		敦煌、效谷、龙勒、东乡、平康、鸣沙六县	公元 564 年，鸣沙县
隋代		公元 607 年，敦煌郡	敦煌、常乐、玉门（后改会稽）三县	敦煌县，隶属于敦煌郡
唐代		公元 633 年，沙州，隶属于陇右道	敦煌、寿昌二县	敦煌县，隶属于沙州
五代		沙州	敦煌、寿昌、紫亭三县	敦煌，隶属于沙州
宋代		沙州	敦煌、寿昌、紫亭三县	敦煌，隶属于沙州
元代		公元 1280 年，沙州路，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	沙州、瓜州	
明代				公元 1405 年，沙州卫

续表二

事项 时代	敦煌郡		敦煌县
	建置时间、名称、隶属	所领县名称、数量	建置时间、名称、隶属
清代	安西府		公元1760年，敦煌县，隶属于安西府
中华民国			1936年，敦煌县，隶属于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敦煌县，隶属于甘肃省酒泉专署
			1955年，敦煌县，隶属于甘肃省张掖专署
			1961年，敦煌县，隶属于甘肃省酒泉行署
			1987年，敦煌市，隶属于甘肃省酒泉行署

下编

敦煌文化艺术

第七章　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敦煌文化艺术

第一节　敦煌地区的石刻岩画

在敦煌附近地区的马鬃山和祁连山区，共发现了以凹刻、凸刻凿制而成的西汉以前的岩画群，有55组、300百多幅反映狩猎与游牧生活及带有相互交流性质的画面。其中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东北部别盖乡大黑沟布尔肯哈达又称佛山的大黑沟岩刻画，最为丰富，其画面34组，图案190多幅。内容多数是表现原始的狩猎、放牧、练艺习武、乘马作战的场面，反映了敦煌地区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也表明氏族部落间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岩刻画中还刻有大量的动物形象，如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骆驼、大象和老虎等，充分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的自然生态面貌和环境较现在要好得多，是非常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另外，这一地区还有野牛沟岩刻画群、灰湾子岩刻画群和七个驴岩刻画群。这些岩刻画年代有早晚之分，但画面的内容是较为丰富的，有反映早期牧人及骆驼、大角羊、野牛形象的，有骑马人形象的。其中骑马人和骆驼的形象最多，各种动物形象也较多。从人物装饰来看，不仅有春秋、战国、秦时期居于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乌

孙、月氏等民族，还有西域民族。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联系。当然其具体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还有待于对远古时期及春秋、战国、秦时期敦煌及附近地区古代游牧民族各种文化遗存的进一步发现和发掘。但这些古代岩刻画群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居于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特别是乌孙、月氏及西域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重要形象资料。

我们从敦煌及附近地区古代岩刻画的丰富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中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古代社会各民族人民丰厚的文化艺术底韵与后来大量石窟艺术发展的渊源关系。

第二节　汉代的诗词歌赋

汉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汉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和亲”于乌孙王昆莫，公主因昆莫年老、且言语不通，悲愁之余，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①

此歌反映了封建王朝为其政治利益采取的“和亲”政策下妇女的牺牲及地处偏远情势下悲怨愁苦的心情，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奉献的精神和天隔一方思念故土的情怀。

在中国汉代文学史上，曾经留下了很多直接由童谣民歌演变而来的无名氏五言古诗。其中《古诗十九首》大都是以青年男女的离别及离别后的思念为题材，反映当时远征作战、戍边绝域的现实

①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

生活。《结发为夫妻》、《良时不再至》、《携手河上梁》等诗描写了远征的青年和自己心爱的妻子临别之夜、送别和分别天涯的情景。《行行重行行》、《孟冬寒气至》、《凛凛岁云暮》等诗描写了丈夫远征戍边，家中军人眷属对丈夫的苦恋，盼到丈夫家书，担忧丈夫西北苦寒无衣的情形。

同时，久役不归远征戍边的将士们，也无时不在想念故乡的亲人妻女，《涉江采芙蓉》正是描写了这种怀念乡土的心情。而《十五从军征》则描写了征战戍边所幸生还归故里时，凄惨荒凉的景象。

另外，汉代《乐府》歌曲中，大半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民歌，其中如杂曲中的《古歌》、《悲歌》，描写了当时征戍军人的伤感情怀。

结发为夫妻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良时不再至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携手上河梁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孟冬寒气至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
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盼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
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古　　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悲　　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些古诗是在千万人传诵的基础上的对民歌的再创作，是当时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征战戍边战士的文学。汉代的远征大多在敦煌地区及其以西以北，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一定响彻当时的荒漠古道、亭障烽燧，也正是人民大众的歌与泣铸成了当时的国防文学与军旅文化。

第三节　侯瑾的辞赋　张芝的书法

汉代的辞赋，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学形式，总体而言"汉赋正犹一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一满怀幽怨之淡

妆轻抹的思妇。"[1]这是与当时大汉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为此汉武帝时辞赋作家盛极一时，尽显巨制宏篇、富丽堂皇之作。自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300余年间，辞赋作家仍接踵辈出，其间东汉敦煌人侯瑾的《筝赋》，既有汉代辞赋华美、庄严和壮丽的特色，又较多地表现了作者个人的情绪，是当时少有的别具一格的杰作。其中有"散清商而流转兮，若将绝而复续，行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绝俗。若乃查其风采，练其声音，美武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豳风之遗音，于是雅曲沉缺，郑卫仍终，新声顺便，妙弄优游，微风漂裔，冷气轻浮，感悲音而增叹，抱　啐而怀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2]

侯瑾以筝喻人，格调高亢，是其崇尚气节的人格写照。侯瑾，字子瑜，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后孤苦无依，只得寄居叔伯家中。少时刻苦求学，成年后仍勤学不辍，且学业品行兼优，"常以礼自牧"。面对东汉末年朝政混乱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他一方面作《矫世论》揭露朝弊，抗争黑暗，另一方面洁身自好，坚决不与腐败同流合污，多次拒绝朝廷、州郡要他做官的召求，后来"徒入山中，覃思著述"了。

侯瑾擅长作赋的同时，还著有东汉光武中兴以后故事三十篇，概以总名《皇德传》。另外，他还写有杂文数十篇，可惜皆已佚失。

侯瑾个人的品格和他文章的风格相统一，人格上的威望和他文学上的成就相一致。为此，当时当地甚至整个敦煌地区及河西走廊各地人士"敬其才而不敢名之"，被尊称为民之共有的"侯君"。

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字伯英，最善于草书书法，与当时著名书法家罗叔景、张元嗣并名，被称为"草圣"。

张芝本为前汉司隶校尉清河张襄的后裔，张氏家族后代西迁

---

① 翦伯赞《秦汉史》。

② 《艺文类聚》。

敦煌，世居于县城北府，故号称“北府张”。张芝出身宦门，其父曾任封疆大吏，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直接影响张芝“少有操节”的性格形成。张芝一生潜心于书法艺术，“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染翰，水为之黑”。

张芝的书法，精劲绝妙，行、隶见长，尤精草书。其书体一笔贯底，连缀不断，气脉通联，似惊蛇入草，飞鸟入林，古人谓之“一笔飞白”。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推崇备至，认为“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

张芝书法保存于《淳化阁贴》中有五贴，其中《秋凉平善帖》是张芝草书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草书艺术的精品。另，张芝还著有《笔心论》，可惜今已佚。

张芝的兄弟张昶，字文舒，也极善草书书法，又极工八分书式的汉隶，被当时人称之为“亚圣”。他所书《西岳华山堂阙碑铭》传世至今。

第四节　氾胜之的农学

两汉时期，在农业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农学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其中氾胜之和其所著的《氾胜之书》对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氾胜之，又名氾胜，西汉成帝时（公元前 32—28 年）议郎，曾在三辅教田，因此关中丰穰。他的儿子氾辑担任敦煌太守时，他徙家定居于敦煌，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农学技术著述工作。他所著的《氾胜之书》概括了他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他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细致地探索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提倡复种、间种以及两种作物混

合播种，从而增加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他的最大贡献，是总结出了著名的区种法。

区种法亦称区田法，把农田分为上、中、下三种不同的区域，分畦分区种植，因地制宜进行耕作。同时要求掘坑点播，按不同的作物决定不同的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并且要求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大力进行中耕、灌溉、施肥。这种耕作方法把大田的耕作提高到了园艺的水平，在科学上有很高的价值。氾胜之还对植物栽培的一般过程进行了总结，掌握了各种不同作物的生长规律，确定了禾、黍、麦、稻、桑、麻以及蔬菜水果的不同栽种法。

氾胜之提出了溲种法，即用肥料种虫药来处理种子，以增加种子发育和抗病能力，在农业科学上也有很高的价值。在敦煌地区，他根据农业生产环境，推广“雪汁拌种法”，冬至后用雪水拌种，同时积草压制绿肥。这些方法对敦煌地区当时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以后这一地区精耕细作农业生产传统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节　秦汉时期文化的传播

在秦时代，随着新旧土地所有者的政权交替，在文化思想上，儒家学说跟着旧贵族的政权崩溃遭受了摧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第二年的“坑儒”，使儒学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同时，法家学说因适应地主商人政权的统治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墨家学说因其在反对旧贵族的思想上与地主商人的政治倾向相符合，也得以流行；老庄学说因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不能再对社会各方面发挥作用了。当时，秦的文字的统一与进步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秦王朝时期，最初信奉原始的多神教。秦初襄公时，秦人游牧于陕甘边境，有时势力可达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他们以少皞之神为自己的种族之神，称之为“白帝”。当时建立了神庙，叫“西畤”，祠祀“白帝”即白虎。后来，西部和西北部一些种族视其为图腾，奉为西方之神。同时，随着秦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并祀青帝、黄帝、赤帝，但“最得西北一般农民之信仰的，还是那位古典的雉神”①。这正是反映当时西北地区狩猎畜牧生活的内容，显然带有一种鲜明的部落生活的性质。

秦王朝一方面有计划地繁荣都市经济，另一方面又执行一种对商业的鼓励政策，为此秦代的商人在政府的武装保护之下，展开了与匈奴和西北各地西戎之间的繁盛贸易。他们用中原出产的丝织物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所出产的马牛羊之类的牲畜及皮毛。于是“骏良駃騠”得以充实秦始皇之外厩。同时，秦王朝时的商人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敦煌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及周围西域各地诸种族发生贸易关系，因而秦始皇在统一以前就得以“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②。秦统一后，自然更当如此。随之而来的中西文化的互相冲击也在萌芽之中。

在秦代艺术最大的结晶阿房宫中，有着很多精巧的雕刻和美丽的壁画，据王子年《拾遗记》所载，秦始皇时有西域之一国，骞霄国人烈裔来献画。“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群物之象。以指画地，长百尺，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成岳渎列国；又画成龙凤，骞翥如飞，不可点睛，点或飞去也”。当时，希腊人的艺术、宗教已经逾过帕米尔高原与西域中国羌族的文化发生了接触，印度佛教也开始向世界展开。正像翦伯赞先生所言：“希腊文化与印度的浪涛，则已在

① 翦伯赞《秦汉史》。

② 《史记·李斯列传》引《谏逐客书》。

冲击中国的西部疆界。"[1] 秦王朝强盛时期，受希腊艺术影响的西域艺术随商业而东进是可能的。

根据斯坦因的报告所载，在罗布泊沙漠中，一个较小的亭障之北，发现了许多用树枝构筑的房屋。在这里发现了用古佉卢文、婆罗门文、窣利文及汉文等文字所写的木简。还有许多美丽的漆盆、有画的丝织物、毛织物残片及木制农具等遗物。在盐泽沙漠中的另一地，又发现汉代古钱、金属器件及陶器碎片。又在古楼兰遗址附近发现一葬地，其中除人骨棺木残片之外，尚发现各种殉葬物品，有镂花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汉简、美丽的彩绢、地毡、绣品残片、堆绒毛织物和粗毛织物等。斯坦因报告中记载在盐泽的古道中，"沿途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古钱、小件金属器物、珠子之类的东西"，在某一个地方，"明明白白散布着二百枚左右的中国古钱，距离相隔约三十码左右，这些方孔钱都是汉代形式，似乎是新铸的一般，显然是护路人员或商人带的钱，绳子松了以后，从钱袋或箱子孔中逐渐漏了出来"。[2] 可见当时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通过敦煌这一中间站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也随着商旅们贸易的脚步开始了，中西文化夹带于商品之中，融汇于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中西文化在这一地区涌动着、潜行着。

汉代时，西域及中亚各国的民族文化，各种乐器、舞蹈等也都随之东来，敦煌作为其桥梁，始终发挥着融汇中西文化，改制加工发展中西文化，并进一步西进东传的作用。

在公元2世纪初，中原地区宦官蔡伦发明的纸，以及纸的应用和西传，由斯坦因等考古工作者在西北汉长城烽燧中发现遗存，这就提供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以更好的物质条件。

---

① 翦伯赞《秦汉史·秦代的世界形势》。

②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第六节 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初传

一、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相当于距今约2500年左右的我国春秋时代。佛教兴起的时期，正是古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大批城市国家兴起的时期。特别是北印度早已从青铜器时代转入铁器时代，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生产力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印度商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商人已有相当规模的陆上运输商队和海上运输商队，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根据佛教经典的记载，当时北印度有16个国家，其中较有影响的摩揭陀国和居萨罗国，都是佛教流行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

佛教兴起时期的印度社会，不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促使印度思想界呈现了空前的活跃状况，为佛教的进一步流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佛教创始人悉达多，族姓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信徒对他的尊称，意即释迦族的“圣人”。相传他是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生于现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传和北传佛教中记载各异，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65～公元前485年，与我国孔丘差不多同时。据说他幼时曾受婆罗门教传统教育，29岁出家，中经6年苦行，35岁创立佛教，随后在印度河恒河流域进行传教活动，逐渐得到统治阶级上层的支持，并最终在一般民众中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徒。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反映了刹帝利和吠舍中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最终发展为世界流行的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宣称现实世界是“苦”的，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摆脱“苦”的道路。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个痛苦的“苦海无边”的世界，说明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即是苦、集、灭、道“四谛说”。“苦谛”是讲现实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痛苦现象，“集谛”介绍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和根据，“灭谛”宣扬作为佛教最后理想境界的无苦（涅槃）世界，“道谛”论述了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当遵循的手段和方法。佛教在分析现实世界的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论，其中心的内容是，人生的痛苦是“无明”（愚昧无知）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后来的一些佛教著述又把十二因缘说与轮回说教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三世两重因果”说，论证了只有信仰佛教修行，消除“无明”，才能使人摆脱生死轮回。

佛教思想还主张“因果报应”观点、“生死轮回”观点和“三世”观点，早期佛教还提出以八种正确的途径，即“八正道”解脱痛苦的方法。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着，佛教教义自然也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到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分裂为“大乘”、“小乘”两派，“乘”是“乘载”或“道路”的意思，后期的佛教思想自称“大乘”，即“大道”，把前期佛教思想贬称为“小乘”。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在教义理论、修持实践、修持方法和结果、对释迦牟尼的看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区别。

二、佛教在中国的初传

佛教比较注重理论宣传和佛教教义的广泛传播，在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64—公元前227年），即与秦始皇同时期，传说阿育王曾派遣传教僧侣256人分赴世界各地，宣传佛教思想和佛教教义。另传阿育王曾起佛塔四万八千，其中有二塔在中国。同时，中国也有类似传说，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载曰：“秦始

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

对于以上这类国内外的历史传说，我们既不能以为它是传说就一概否定它的史料价值，但也不能在考古工作和史料研究没有确证之前就断然承认其就是历史事实。因为，有许多历史传说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最终可能被历史遗迹和历史史料所证实；但传说终归是传说，我们不能依据传说来推断历史事实。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就现有的史料，我们还很难推断。但作为一种宗教，从它的产生发展，到它的传播并获得人们的信仰，需要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的传播，还要经过翻译，甚或是多次翻译的过程，才能够把其教义思想传达于广大的人们之中，自然需要更长久的历史时期。其间，一种宗教要获得政治统治者的承认和支持，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为此，佛教思想最初传入中国，得到当时中国封建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也一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我们不能不追溯到西汉及以远时期。

目前，史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佛教是经由中亚首先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经敦煌地区，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佛教是随着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行动逐渐东传的，大约于西汉末年正式传入内地，并开始为中原地区的帝王贵族所接受。其间，敦煌地区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和其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相一致的。

《魏书·释老志》记述：“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这里的记载认为，休屠王的金人是佛像，汉武帝时中国开始流传佛教。霍去病从匈奴俘获的金人，是否是释迦牟尼的偶像，当时匈奴人是否信奉佛教，今已无从可考。但当时佛教已经最初传入西域是可能的。

《魏书·释老志》又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述身毒国:“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有人认为张骞在西域不知道有佛教,原因是张骞有关西域的见闻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佛教信仰的事。我们认为,张骞到达大月氏后是应当看见到当时印度诸神的,只是因为当时他的使命主要是联合大月氏,了解西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所以对佛教没有着意写进他的著述报告中。而根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报告,他在于阗附近尼雅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用梵文雅语书写的一段一段的佛经”,并证明这些书写佛经的木牍是张骞出使大月氏前后留下来的,那么也就可以肯定,张骞在西域各地就已经接触过了佛教。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方法,可见佛教在中西政治经济交往的同时,已经达到了传播至中国知识阶层传诵的新阶段。

汉献帝初平年间成书的《牟子理惑论》以及随后的《四十二章经序》等,都指出,东汉明帝曾遣使者,至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后汉书》亦载,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国内已有信佛的“伊蒲塞”(即不出家的男性佛教信徒)与“沙门”,楚王英曾为他们设盛馔。可见,佛教进入中国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有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佛)斋戒祭祀”,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同时,当时人们把佛教当作一种祠祀,近似于神仙方术,并且把佛教思想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与黄老学说相提并论,因此浮屠与老子往往并祭,而“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也很流行于世。

桓帝、灵帝之时,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谶等相继来到中

国，在洛阳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汉人严浮调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佛经译著。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大起浮屠祠，造铜质浮屠像，用复免徭役广招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① 从而在中国第一次掀起了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高潮。

佛教思想进入了中国，敦煌地区是其首先的接收地和放大站，因为传播佛教思想的僧者、使者，都是以敦煌地区作为进入中原的首先补给停歇地的，自然，敦煌地区也就必然成为佛教思想的第一个接收地和传播地。西方的宗教文化在敦煌地区首先和中国的中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然后再进一步东进西出，为此也为随后敦煌莫高窟的凿建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宗教基础。

①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文化艺术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文化概况

北魏王朝统一黄河流域及中国北方地区，结束了历时135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特别是北魏灭北凉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文化东移的过程，对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从前凉张氏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气就很浓郁，西凉、北凉一直保持了这个优秀传统。这一河西走廊及敦煌文化的传统，同江左的文化传统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因而不论是前凉，还是西凉和北凉，不仅在政治上同江南的东晋以及后来的刘宋信使往来，彼此在文化上的联系也特别密切。

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北凉主沮渠蒙逊子沮渠兴国，遣使至宋，“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合四百七十五卷”。沮渠蒙逊自己又写信给宋司徒王弘，要求替他找一部干宝的《搜神记》，王弘就请人抄了一部送给他。

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北凉主沮渠牧犍又遣使至宋，送给江南154卷书籍，其中就有敦煌赵敺所著的《甲寅元历》一卷，这

个历法最早提出改革闰法，对以后祖冲之编制《大明历》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还送了《赵畋传》、《周髀注》各一卷，刘昞所著的《凉书》十卷，阚骃的《十三州志》十卷。此外，还送去魏、晋之间著名历法家杨伟的著作《乘丘先生书》二卷、《时务论》十二卷，魏敦煌人周生烈的《周生子》十三卷，前凉名臣谢艾的《谢艾集》八卷。同时沮渠牧犍也向江南求抄晋·赵起居注和其它杂志数十种，宋文帝满足了他的要求，命人抄好送去。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与汉南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频繁，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保存和进一步交流发展。

北魏灭了北凉之后，除了把三万多户吏民掠至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一带，作为"平凉户"，罚作隶户以外，也特别注意到了接纳有成就的河西及敦煌学者，把他们迁移到平城去居住。其中著名的学者有敦煌刘昞、阚骃、索敞，武威阴兴、宋钦、段承根，金城赵柔，以及流寓在河西的广平程骏、程弘，河内常爽等人。这些学者到达平城后，或是著书修史，或是讲学授生，胡三省称："代北以右武为俗"、"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始振"。① 说明河西及敦煌学者的东迁和河西及敦煌学风的东传，对北魏学术界及文化事业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史地、天文、数学

一、西晋索靖的书法艺术

索靖(公元 239—303 年)，字幼安，西晋时敦煌龙勒人，是中国

① 《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三年注。

书法史上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出身于一个累世宦族之家，其父索湛曾任北地太守。索靖曾任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尚书郎、关内侯、始平内史、散骑常侍、后将军、监洛阳诸军事、游击将军等。死后被追赠"司空"，封安乐亭侯。

青年时期的索靖就有"逸群之量"，与同乡氾衷、张甝、索紾、索永同在太学读书。他们五人皆才艺绝人，驰名海内，被誉为"敦煌五龙"。索靖"博经史，兼通内纬"，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很深，为此得到当时的士林名流如傅玄、张华等人的赏识，并结交为学友。

索靖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姊之孙，书法受张芝的影响很大，以善写草书闻名于世，尤其精于章草，即隶书草化后的书体。晋武帝时，索靖与另一位著名书法家卫瓘同在尚书台供职，卫瓘为尚书令，索靖为尚书郎，二人都以书法知名于世，且独具风格，被当时誉为"一台二妙"。后人评价说："瓘得伯英（张芝字）筋，靖得伯英肉"，可见两人的书法艺术受张芝影响很深。

索靖的书法作品，浓浅得度，内涵朴厚，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气势雄宏，历来被书法艺术界称为上乘。梁武帝萧衍非常赏识他的书法，称誉其"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黄山谷也称道其书法为"笺短意长，诚不可及"。另有人把索靖的书法与张芝的书法作了比较，认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两人各有精妙，各见其长。

索靖书法作品流传后世的有《出师表》、《月仪帖》、《急就章》等，宋代著名的《淳化阁帖》也收录了索靖的墨迹艺术品。索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唐代书法大家欧阳洵平生最重法度，从不肯轻易推许古人。当他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作品后，竟卧于碑下，朝夕摩挲，爱惜备至，不忍离去。

索靖还著有《草书状》一篇，对书法的演变、风格、气韵、用笔及章法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全文虽仅四百余字，但对书法艺术

的论述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他以“驾驭烈马、海水扬波”来形容草书的雄浑强劲和舒展潇洒；以“芝草、葡萄、棠棣”来总括各种风格的书法艺术；以“玄熊对踞，飞燕差池”状其对称平衡，欹侧参次。在草书技法上，他用“骇龙反踞、凌鱼奋尾”指出用笔要无往不收，执笔要豪迈有力。同时还强调，起笔要顾盼左右，运笔要照顾前后（登高望其美，既望而中顾）。这些基本的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索靖平生著述颇丰，其《五行三统正验证》一书，是论述阴阳气运的，另还有《索子》、《晋诗》各 20 卷等著述，可惜早已佚失。

二、史地、天文和数学

敦煌人刘昞，字延明，与其父刘宝皆以儒学著称于世。刘昞一生史学著述甚丰，是著名的史学家。刘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130 篇，84 卷，《凉书》10 卷，《敦煌实录》20 卷，《方言》2 卷，《靖恭堂铭》1 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

刘昞的《略记》是删削《史记》、《汉书》和《东观记》三书而成的一部通史著作，《凉书》是专门记述前凉史事的纪传体国别史，《敦煌实录》是一部专门记述敦煌历史的实录体编年史。三部著作，体裁不同，各具特色，反映了作者在史学上的深湛功力。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体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惜此书早在唐时已散佚，我们只能从清人张澍所辑《续敦煌实录》中略见其梗貌。

公元 437 年，北凉主沮渠茂虔（又名牧犍）通使南朝刘宋，贡献河西文化典范著作图书 20 多种，154 卷，包括经、史、子、集、文学、算术、历法等诸多方面，其中就有刘昞的《凉书》、《敦煌实录》，还有前凉敦煌人谢艾的文集《谢艾集》，北凉太史公、敦煌人赵𢾺的《甲寅元历》（又称《玄始历》）等书籍。以上书籍，都为南朝人第一次所见，影响极大。后来，北魏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时，五史实多采用刘昞的《凉书》和敦煌人索绥的《凉春秋》50 卷等书。

刘昞是郭瑀的学生和女婿，因此受郭瑀的影响很大，不求仕进，隐居山林，从事论述与讲学，远近受业的学生有五百多人。他的儒学造诣很深，授课很受各方学生的欢迎。沮渠蒙逊还时常到学府看望刘昞，和他讨论治国治民大计。蒙逊死后，其子牧犍更尊其为国师，一时间儒学兴盛，刘昞声名远扬。可谓"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类，颇足可观"。北魏孝明帝也下诏："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史书也称刘昞"通涉经史，才志不穷，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刘昞为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六国时期，敦煌人阚骃，字元阳，受其祖父阚倞、父亲阚玖的儒学思想影响，加之他聪明过人，博闻强记，"三史群言，经目则诵"，又酷爱读书，勤奋不惰，博通经传，成为著名的史地学家，受到当时及后来人们的赞赏和推崇。

北凉主沮渠蒙逊十分重视阚骃的学识，拜其做秘书考课郎中，每遇国家大事，都要征询阚骃的意见。为了让阚骃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沮渠蒙逊特派三十多个文职官员做阚骃的助手，让阚骃专心从事校注经籍的工作。当时共刊订诸子百家三千余卷，为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典籍遗产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阚骃是五凉时期著名的学者、史地学家。他注疏的王朗《易传》，成为当时学习经典的范本，影响很大。他还花费几十年心血撰写了《十三州志》，是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它详细、准确地记述了魏晋时期的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进行了新的考证，不少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有许多独到之处。阚骃的《十三州志》，是研究我国西北地方史、古代地理状况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唐代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就大量引用了阚骃的《十三州志》，足见其对后世史地学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敦煌赵𢾺，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赵𢾺曾是北凉的太史公，专掌天文和律历。他在任期间，组织在河西观测星象，并结合研究前人的历法资料，结合河西走廊地区的实际情况，撰写了《七曜历数算经》。所谓"七曜"，就是指日、月、水、火、土、木、金七星，也就是国外历法中的"七曜日"，即历书中七日一周的名称。以每日第一小时为属于某曜日，如日曜、月曜、水曜、火曜、木曜、金曜和土曜。《北史·李业兴传》曾记载："以世行赵𢾺历、节气后辰下算"，《宋书》中也记载"河西人赵𢾺善历算"，可见赵𢾺的天文历算成就，在中国古代就有了较大的影响。

赵𢾺同时还著有《河西甲寅之算》、《阴阳历书》等学术著作，对天文、占候多所启发。为此英国著名的中国学者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记载了赵𢾺的科学成就，并对这位中国古代科学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

北凉主沮渠蒙逊，虽是张掖卢水胡人，但他"博涉经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由于长期和汉族交往相处，汉文水平很好。他很重视发展汉族文化，曾多次旨令内外大臣，推荐有才能的人士，广献治国之策。他起用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的敦煌人张穆为中书侍郎，并委以机密之任。公元421年灭西凉后，沮渠蒙逊又重用了当时在西凉任职的敦煌著名学者宋繇、刘昞、阚骃等。他任命刘昞为北凉的秘书郎，并让其子沮渠牧犍尊刘昞为国师，还为刘昞修建"陆沉观"于西苑，作为学府，让其教授生徒，发展教育事业。

沮渠蒙逊笃信佛教，兴修佛寺，鼓励佛经翻译，开凿了武威天梯山等石窟，为当时佛教事业的兴盛做出了贡献。敦煌莫高窟现存

有十六国时期所开凿洞窟七个，其中虽无法确证有沮渠蒙逊时开凿的洞窟，也无明文记载，但从他“广传信教、广收门徒”，发展佛教文化事业的各项措施来看，敦煌地区当时佛教文化事业兴盛，敦煌莫高窟绝不会成为空白。只是目前保留下来的洞窟，仅为当年“洞窟千龛”的三分之一，使我们无法窥见其全貌。沮渠蒙逊对敦煌地区当时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治领袖难能可贵的卓越贡献。

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安定国事以后，在敦煌地区积极推行振兴文化教育事业的措施。当时在敦煌南门处修筑厅堂，名曰“靖恭堂”，作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听取收集各方意见的地方。堂内画上“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帝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① 可见，李暠虽与中原王朝相隔而偏居西陲，但与中原文化和思想意识是紧密联系、承继相向的。同时，李暠还在敦煌设立县学、州学和医学，广招学生五百余人，学习汉族文化，传播汉族思想意识，致使当时敦煌地区文风大兴。

李暠是当时西凉的政治领袖，他知人善任，虚衿下士，广招英俊。在他统治期间，西凉境内聚集了大批文人名流，如史地学家阚骃、经学家宋繇、教育学家刘昞、天文学家赵歐等。当时中原流士纷纷西来，一时间敦煌群雄齐集，成为中国西陲边疆传播汉文化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为汉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的李暠，同时又是一个擅长诗赋的文学家，他的赋著在五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曾作《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多篇。其中流传下来的仅有《述志赋》，篇中他以清新温厚的笔调，抒发了幼年希望隐居，不慕荣利的志趣；同时，他又以诚挚热烈的感情，表明自己愿在前凉政治统治下有所建树的抱负和决心。

---

①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述 志 赋

篾玄晃于朱门，羡漆园之傲生，
尚渔父于沧海，善泪溺之耦耕。
跨弱水以建基，蹉昆墟以为墉，
总奔驷之骇辔，接摧辕于峻峰。

李暠重武功，抓文治，对繁荣“五凉文化”有突出的贡献。唐写本《敦煌廿咏》的歌颂正是历代文人崇敬的代言：

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
叱咤雄千古，英威镇一方。
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傍。
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敦煌人郭瑀，曾游学张掖，受名师郭荷的精心培养，学习写作和辩论。后“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为师守墓三年后，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开馆讲学，教授弟子一千多人，并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经学著作。郭瑀一生清苦，以著书讲学教授弟子为己任。前后拒绝了前凉主张天锡、前秦王苻坚的多次“蒲轮玄纁”之礼邀其出山为政的请求。

敦煌效谷人宋纤，是东晋时另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奋好学，年逾八十时仍手不释卷，著有《论语注》、《诗颂》数万言，今已散佚迨尽。宋纤淡泊名利，隐逸山林，喜好山川之胜，注重修身养性，专志于钻研经学，潜心于教授生徒。曾在其门下受业的弟子达三千多人，对当时河西文化发展、教育兴盛做出了贡献，是当时河西地区有名望的硕德名儒。他多次拒绝前凉张祚的征聘，对所有赠送一概不受，其清高节操超于常人，人称“高尚之士”，是

为“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其人如玉”。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

随着汉以来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发展，至魏晋时更加频繁，佛教事业也进一步发展。敦煌地区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到西晋时期，佛事活动更加盛行，其中竺法护及其弟子的活动影响最大。

竺法护，原名昙摩罗刹，其祖为大月氏人，后流寓敦煌。竺法护生长于敦煌，故视为敦煌人。他八岁出家，拜印度高僧竺高座为师，每日诵经万言，孜孜不懈。西晋武帝时，法护随师遍游西域各地诸国，通晓了西域三十六国语言文字，搜集了大量的佛经著作。回归的时候，先至敦煌，再至长安，沿途传译佛经，劳不告倦，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晋初年，竺法护号称“敦煌菩萨”，曾在敦煌将佛经《不退传法轮经》和《正法华经》译为汉文广为传布，并流传至中原地区。后来，竺法护还译出《华严经》五品、《大品般若》中的《光赞般若经》十卷等。他前后共翻译出佛经165部，“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对佛经的翻译事业有一定的贡献，释道安称道他的翻译“纲领必正”，“宏达欣畅”。汉魏晋时竺法护等大批僧人一生大都从事把印度佛经“写为晋文”① 的事业，改变了“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② 的局面。

竺法护还广招弟子，传播佛法。他的弟子中，敦煌人竺法乘，在

---

① 《高僧传》卷一《晋长安竺昙摩罗刹传》。

② 《分别功德论》卷上。

敦煌"立有延学，忘身为道，海而不倦。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①。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已经有了讲经说法的佛教寺院，佛教思想已经在当地的各民族中广为流传，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敦煌已经是各国各地各民族佛教高僧的重要聚集地之一，寺院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墨书《莫高窟题记》中载有："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可证其史。

佛教事业的兴盛，寺院的发展，翻译佛经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敦煌莫高窟的凿建创造了条件。

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吕光西征获胜而归，带着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途经敦煌。罗什所乘白马病死，曾瘗于沙州城内，留下了白马的美妙传说，后来建塔名"白马塔"，一直保存至今。

鸠摩罗什随吕光从龟兹东去长安传播佛教，停至敦煌停留歇息，罗什所乘白马突然染病不起，几天里水草不进。一日晚，白马托梦给罗什言："我本是上界天骝龙驹，受佛主之命，驮你东去传播佛教。入吴之前道路险阻，风沙迷漫，方向难辨，由白马伴你而行。再前行便是阳关大道，敦煌是我超脱生死之地，我将不再伴你而行，望你前途郑重。"罗什听罢紧抓马尾，苦苦哀求："传教乃是佛祖大事，可不能半途而废，功败垂成。"白马见罗什情切，又言："前边不远处便是葫芦谷，那里有你的新乘骑，将伴你东去。"言毕，白马化作一片彩霞，冉冉升向天际。值此时，一声马嘶，罗什惊醒，原为一场噩梦，旋即随侍来报："白马已逝。"罗什悲痛于心，花费重金修建了敦煌白马塔。

敦煌白马塔位于沙州故城东南隅，后历朝各代重修。塔高叠九级，意为白马死时九岁，塔壁形奇饰美，别具风格。塔底呈八角形，每角面宽三米；二至四层为折角重叠式；第五层周有突出之一乳钉，上为仰莲瓣；第六层为覆体形塔身；第七层为相轮形；最上为六

① 《高僧传·竺法乘》。

角坡刹盘盖顶，每角挂有一铃。

敦煌白马塔的建筑艺术，是中国民间建塔艺术和佛教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充分反映了敦煌地区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白马塔的建筑是为佛教思想的传播服务的，在相当时期内它也推动了敦煌地区佛教事业的兴盛。一个神奇美妙的故事，一段如诉如泣的历史，今仰观白马塔，在微风吹拂下，借鸠摩罗什的情思，听塔顶角铃的鼓磬，仿佛悠扬清远之际白马啸啸长嘶。佛教思想在中国古代，正是通过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结合远扬的。

北魏孝昌中，敦煌罢镇置瓜州，首任州刺史是北魏宗室明元帝四世孙东阳王元荣。元荣是一个非常佞佛的人，在他担任刺史的二十多年里，不仅在敦煌莫高窟新凿建了许多石窟，而且还广写佛经，以为功德。

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有西魏大统四—五年（公元 538—539 年）的题记和东阳王元荣的画像。北魏建明元年（公元 530 年）元荣一次就写《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300 部；普泰二年（公元 532 年）又写《无量寿经》100 部；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又写《涅槃》、《法华》、《大云》等经百余部。佛教等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和当时敦煌地区风平浪静、相对安宁的政治经济形势相一致的，也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直接相关。对统治者来说，兴建开凿石窟规模越大，施写佛经越多，似乎就表示自己的“功德”愈高。

当时的敦煌地区，“地接西域”，“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随着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兴盛，僧徒云集，各项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仅敦煌一地就涌现出众多的《史》、《传》高僧和佛学大师。如释道韶（敦煌氾氏）、释道法（敦煌曹氏）、释道颖（敦煌索氏）、释慧远（敦煌李氏）以及佛学大师宋云等等。他们对敦煌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兴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法颖撰有《十诵律比丘尼戒本》；慧远撰有《涅槃疏》10 卷、《大乘义章》14 卷，都流行于世。敦煌在中外高僧佛徒及统治者的影响

下，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早期的佛教中心，布满了佛教寺院。

‘敦煌人宋云从小受佛教影响，崇慕佛法，不辞辛劳游学于当时寺院林立、高僧云集的北魏都城洛阳，后又归依佛门，专心修行。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巩固自己的地位，选派已是洛阳崇立寺的高僧宋云和惠生等到天竺（印度）取经。宋云、惠生等高僧从洛阳出发，西行40天达“国之西疆”“赤岭”（今青海湖东北日月山）；再越“赤岭”西行23天，到达吐谷浑国（今青海省都兰一带）；又沿柴达木盆地北缘继续西行，越阿尔金山到达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地区），过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经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哌哒国；又经其西南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天竺，遍游佛迹，取得真经。

宋云、惠生等前后历时五年，过雪山、涉流沙，克服千难万险，足迹踏遍西域诸国，于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从天竺带回佛经170部，均为“大乘妙典”。宋云等取经回国，推动了当时佛教事业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兴盛。

宋云西行东归，不仅完成了“修礼佛迹”、求取佛经的任务，还将沿途所见所闻及各国风土人情写入《宋云家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宋云家记》早已散佚，但幸北魏秘书监杨衒之依据其书和《惠生行记》、《道荣传》等有关记载，辑录成《宋云行记》，附于《洛阳伽蓝记》一书内。这对了解当时阿富汉、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民俗和文化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宋云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传播了友谊，增进了中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北周时期，虽仅短短二十多年的统治，但其施行西部修好和稳定的政策，为敦煌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间虽有周武帝宇文邕文化改革的毁佛运动，即“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

门、道士,并令还民,"[1] 又将"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2] 但未及波动敦煌郡,北周即被隋代,所以对敦煌地区佛教文化事业的影响甚少。

敦煌莫高窟现存北周时期凿建洞窟 15 个,其中不乏建筑弘大的大窟,敦编第 428 窟,面积达 178.38 平方米,内绘供养人像多至 1200 多身,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都是超越前代的。另有敦煌西千佛洞,现仅存 16 个洞窟中,就有北周时期洞窟 3 个,可见当年该处未毁之前,北周所开洞窟更不在少数。暂短的政治统治时间里,能够开凿如此数量和规模的洞窟,足见其佛教兴盛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表明当时敦煌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的程度。

为此,北周大诗人庚信游历敦煌时,写下了吟诵敦煌莫高窟景致的诗句,更可佐证当时敦煌佛教、文化事业兴盛:"三危上风翼,九坡度龙麟,路高山里树,云低马上人。悬岩泉流响……,应知有姓秦。"北周时期的佛教文化发展,为隋唐时敦煌佛教、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敦煌莫高窟的早期石窟艺术(北凉、西凉、北魏、西魏、北周时期)

一、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艺术概况

敦煌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经很难寻觅,或许早已不复存在了。敦煌学学者们经过艰苦努力,从现存的早期洞窟中,通过比较、分析,找出一组十六国晚期、相当于西凉到北凉统治时期的石

①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② 《广弘明集》卷八。

窟，即第267、268、269、270、271、272、275窟。

这一时期战祸离乱频繁，石窟题材和内容及表现形式，最富有时代的特征，反映了当时人们热切地盼望"弥勒下生"，以解救其苦难的愿望。窟内大都是以弥勒菩萨、禅定佛、说法佛为主的造像，在成排的阙形龛内塑着各种姿态的、救世人于水火的弥勒菩萨。

北魏平定凉州时，曾遭到沮渠氏的激烈抵抗，经过了反复的争夺，佛法精深的凉州沙门都持械登城以御魏军。凉州陷落后，酒泉、敦煌等地继续抵抗，最后沮渠氏残部才被迫撤离敦煌远渡流沙。但同时，柔然与吐谷浑经常侵扰元魏西境，敦煌地区还是不得安宁。时敦煌虽一度置镇，但孤处危境几乎自不能保，幸尉多侯率领敦煌军民多次苦战才稳定了下来。自是东西交通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地据两关的敦煌也逐渐恢复了战后的繁荣。此时兴建保留至今的莫高窟洞窟有第251、254、257、259、260、263、265和487窟。其时主要窟型是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式或称"支提"式窟，洞窟内壁画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

高欢、宇文泰分割北魏为东、西魏，元魏之际，柔然衰微，丝路畅通，北魏在敦煌撤镇建立瓜州。宗室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任职历北魏、西魏两代，他十分佞佛，曾在莫高窟开凿修建了很多窟寺，而且施写了藏经几百卷。这一时期现存莫高窟洞窟有：第246、247、248、249、285、286、288、431、435和437窟。其特点是将东传于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又移植西来。同时历史的战乱和割据，使统治者感到自己政权的不稳，从而有《五百强盗成佛》这样的故事画，以佛教壁画的意识形态措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

北周一代虽统治敦煌仅24年，但东西交通畅通，其间在莫高窟很有建树。曾经在敦煌莫高窟兴修过佛窟的建平公于翼，正驰骋在西北河西走廊，为对付兴起的突厥、吐谷浑而努力。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宇文邕灭佛时，也曾在瓜州大乘寺毁过几座佛塔，但并

未影响石窟的兴建，莫高窟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许多精美的北周洞窟 15 个：第 250、290、294、296、297、298、299、301、428、430、438、439、440、442 和 461 窟。其形制、绘塑风格，正是西魏到隋洞窟之间的过渡。壁画内容首次出现了须阇提品、善事太子入海品，这些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画正是周武帝复古制、重儒术、沙汰释道的反映，中国传统的孝悌观念与佛教善恶思想开始结合。这些北朝晚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内容丰富，描绘细腻，均以描述瞻详而超越前代。特别是对人物描绘晕染手法的多样化，在绘画技巧上充满了探索精神，为未来的隋代石窟艺术丰富的表达形式和能力积累，提供了制作经验。

敦煌石窟艺术的早期阶段，在古老的汉晋文化的基础上，外来的佛教文化执着地保留着它的宗教仪轨所必须遵循的大部分特点，但也不断地在被改造成汉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并已经有了壁画、塑像的从改造到创造的优秀成果。

二、敦煌莫高窟早期建筑艺术

莫高窟艺术石窟群，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佛教艺术宝库。

从建筑来说，它是莫高窟艺术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莫高窟的建筑，主要是木构建筑。古代艺术匠师们把木构建筑和石窟巧妙结合起来，着重发展了窟檐和通廊。根据不同的洞窟形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筑特点和形式各自有所不同，不断地出现着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形式。

早期的洞窟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最早的洞窟为禅房式（僧房式）。第 268 窟是北凉时期开凿的洞窟。窟形窄长，平棋顶，西壁开一龛。龛里塑一交脚弥勒像，南北两壁各有两禅室。

禅室就是在主室内开小室，供僧人坐禅修行。

第 285 窟是西魏时的洞窟。窟顶为覆斗形，中间开一个大佛

龛，两侧各开一小佛龛。南北两壁各开四个对称并列的小禅室。北魏 487 窟也属这种类型(历经后世所重修)。

还有一种类型的洞窟，中心塔柱式。主室平面为纵长方形，高大方形的中心塔柱位于室内后侧中心部位，塔柱前窟顶为人字披顶，塔柱后窟顶为平棋顶，塔柱直通窟顶。这种洞窟形式为早期洞窟形式。

北魏第 254 窟、第 257 窟、第 248 窟，北周第 428 窟，都属于这种类型。

覆斗式洞窟窟形又是莫高窟早期的窟形之一，也是莫高窟形制最多的窟形。由于取掉了中心塔柱，使窟内的光线充足，窟室宽敞，四壁完整，不会分割，有利于画师绘制大型故事画和经变画。室内有了宽敞的空间，也有利于僧俗大众拜佛和观赏壁画，又为供养礼拜活动提供了场所。

西魏第 249 窟就是最早、最典型的覆斗形洞窟，此窟呈长方形，南北长为 6 米，东西宽为 4 米，面积为 24 平方米。西壁中央开一圆券形佛龛，龛内塑一坐佛，顶为覆斗形。覆斗中央开一圆心莲花藻井。

这些石窟的建筑风格，在印度石窟寺的基础上糅合了西域的地方风格，传到敦煌，再和中原建筑传统结合，表现了细部的中国式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古代艺术匠师们对于自己建筑传统的尊重。

除石窟本身和木构窟檐而外，壁画里还有许多建筑画：宫殿、楼阁、城池、寺院、民居、马厩，应有尽有，形成了一部中国一千余年的建筑史。

壁画中的建筑，分别属于十六国到西夏的各个时代，前后延续了 800 年。用很生动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平面配制、结构特征、处理手法、作风格调和建筑方法。

阙形建筑是北朝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也是莫高窟最早的建筑

图形之一。它主要是建在入口处两侧的岗楼，或中心地的高大观察台。慢慢又演变成宫门、城门等建筑。

北魏第257窟《小沙弥守戒自杀因缘》的佛经故事中就有宫阙的构图，中间为宽阔的宫门，宫门上有瓦脊、廊檐，宫门两侧各有一座阙形建筑。这种宫阙形式的建筑在此时此地，已经失去了登高远望的作用，只是起着装饰的作用。

三、敦煌莫高窟早期彩塑艺术

莫高窟洞窟里的主体是塑像，它们是从十六国、北朝经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代1000多年间陆续塑造起来的。它经历了11个朝代，延续1000多年，从高达三十几米的巨像到十几公分的小像，均生动形象，活灵活现。莫高窟保存了3000余身彩塑，它包括圆雕塑像2000余身、影塑1000余身。在元代以前的2000多身彩塑中，基本完好的原作，共计1400余身，其余大都经过后代（特别是清代）妆色或重塑，有的已失去原作原貌。敦煌莫高窟的艺术是古代民间匠师们的卓越创造，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像敦煌莫高窟这样保存古代彩塑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久、塑绘技艺之高的石窟群，世界罕见。它不但是我们民族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彩塑的题材和对象是佛教尊奉的诸佛和诸神，是佛门弟子、僧俗大众敬奉和崇拜的各种偶像。有佛陀、各类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像等，大多为虚构的宗教世界中的各种人物，也有世俗世界的各种人物。

由于敦煌莫高窟石窟开凿在砾石岩层上，不适宜搞雕刻，古代的匠师们就用草泥、胶泥、土坯、木料、柴草、色料等材料，用木头扎制成骨架，根据塑像的形象、姿态，用草泥塑裹，再用细泥、草泥，加胶泥塑造形态表面的细致部分，经过修正，然后用色料描绘妆銮而成。

据考证，北凉第268窟的交脚弥勒像就是莫高窟最早的彩塑佛像。它的手臂已残损，它的整体造型简洁洗炼，身披红色袈裟，两脚相交，垂在座前，全身和头部完好，含笑慈祥，神情庄重。还有北凉第275窟的交脚弥勒菩萨，是莫高窟现存最大的弥勒菩萨，其面颊丰满秀雅，五官线条柔和，鼻梁高隆，直通前庭，眼珠外突，鼻翼单薄，嘴唇微抿，神态安详庄重，整个塑像造型简括，稳定挺拔，给人以动感和艺术美感。

北朝时期的彩塑，具有古朴、深厚、粗犷、庄重的风格，体现出北方民族的气质特征。但造像题材比较狭窄，多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像，北凉的彩塑像大多是单身像，到了北魏出现了一佛二菩萨的组合造像。还有武士式的天王像。到了北周，又增加了迦叶、阿难二弟子的造像。

北魏第248窟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释迦牟尼苦修像。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相握，收在腹前。头束高髻，两颊瘦削，锁骨突出；透过薄质细软的袈裟，显出隐隐可数的肋骨；头部微俯，眼睑垂沉，双唇紧闭，表现出了一副“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修道者形象。为什么要把释迦牟尼的形象表现成这样“骨瘦如柴”的形象。佛经故事讲：释迦牟尼二十九岁时，放弃富贵的宫廷生活，一心想出家，寻找一条解救生、老、病、死和各种烦恼，得到极乐和幸福的方法。出家以后，访遍名师一无所获。在他走投无路时，得到一个外道法师的指教：苦行节食，静心修行，才能得到人生的真理。释迦牟尼便来到尼连禅河边苦修，日食一米一麻，在几年的苦修中，他久居旷野，风餐露宿，顶风冒雨，不避雷电，盘腿静坐，入定禅思。所以古代的艺术家们在创造释迦牟尼的苦修像时，就把它塑造的十分瘦削，从而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产生一种对佛的尊敬和崇拜。

在西魏第285窟西壁南侧有一尊最大的禅僧像。禅僧就是禅修的僧人。造型单纯整洁，清秀俊逸，神情坦然。一块麻布裹头，又通肩缠体，起伏轻缓，填平了肢体的细部空间，那微微下视的双目

和翕张欲动的嘴唇，似乎在虔心专注地默诵佛经，给人一种富有生机的感觉。

北朝时期的塑像，大多受印度佛教雕塑艺术和新疆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彩塑着重于通过面部表情去刻划人物的内心精神状态，不怎么注意对人物躯体四肢的刻划描写。所以，这一时期也为早期发展时期。

四、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艺术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举世闻名，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主体。就其壁画的内容来说，都是佛教经典的图解，属于佛教文化艺术。但它从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如古代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耕获、狩猎、捕鱼、拉纤、撑船、修建、制陶、驶车等，为我们研究古代的劳动生产、交通运输、音乐舞蹈、衣冠装饰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壁画中还有大量的富有装饰性的图案画，如藻井边饰龛楣，装饰花纹，千变万化，内容丰富，反映了我国古代纺织印染工艺发展的高度水平。还有一些壁画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剥削生活，如乘舆、骏马、宴饮、出行、宫廷娱乐等。莫高窟壁画艺术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地理、交通运输、宗教哲学、民族关系，以及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等各种形象生动的社会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莫高窟现存洞窟 492 个，约有壁画总面积 45000 平方米。如若以两米的幅宽把壁画衔接起来，其长度可达 25 公里，真是一条稀世的艺术画廊。这些壁画历经千余年，十几个朝代，从初始的开创，到创新发展，逐渐到鼎盛时期，最终又走向自己的衰落。敦煌莫高窟壁画题材形式各异，内容十分丰富，基本可分为：1、佛像画；2、经变画；3、本生故事画；4、供养人画像；5、装饰图案画。

这些壁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层各种各样人物的历史活动，同时也反映了中西交通交往、友好相处的历史。所以，有人又把敦煌莫高窟壁画比喻为“墙壁上的图书馆”。

1. 佛像画（尊像画）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几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洞窟都能够看到，以释迦牟尼的形象虚构出来的许多佛像画，亦称尊像画。有三世佛像、七世佛像、千佛像、十方诸佛像等。另外，还有很多菩萨画像，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都是佛经里虚构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菩萨。这些佛和菩萨的形象并非随意绘画构造，而是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互配合的。

在佛像画中，还有大量让人注目的，就是围绕佛像上空飞翔的飞天画像。飞天即佛经中的乾闼婆与紧那罗，乾闼婆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能作歌舞，与乾闼婆同在极乐国里弹琴歌唱，娱乐于佛。

在莫高窟的早期洞窟中，以佛为主尊的说法图很多，而佛陀画像则较少。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是北凉时期的第 272 窟。其中有一幅说法图，弥勒佛盘坐中心莲台，右手上举，作说法印；两边有二位胁侍菩萨侍立。菩萨呈 S 形，头向中倾，形成向心结构。佛头上悬华盖，身后有项光背光，另还有供养菩萨在背光上方，在华盖两侧还有两身飞天在环绕飞翔于空中。此图中的佛、菩萨、飞天造型，都采用了西域的艺术风格。据敦煌文物研究院专家的考证，此类是属于弥勒佛说法图。

在北凉、北魏、西魏、北周时期的说法图绘画像中，除西魏之外，基本都吸取了西域的绘画艺术风格。在第 251 窟中，阿弥陀盘坐莲花台，头悬华盖，两侧有脚踩莲花的观世音和大势至作胁侍菩萨，从而构成了一佛二菩萨组成的“西方三圣”的格局。壁画中佛陀的形象庄严肃立，其面相丰圆，神情恬静；菩萨头戴宝冠，身着裙

帔，上身半裸，腰肢微弯。这幅美妙的佛国图画，是《阿弥陀说法图》的最早雏形，它画在洞窟北壁的前部，是北魏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图。

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都有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从人物造型、穿着打扮等艺术风格特点，我们就可窥见其时代的不同风貌和历史的变迁。

西魏第285窟和北周第428窟相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在西魏时期的说法图中，人物造型方面已有了很大的突破，已有了中原地区的风格出现。佛像的脸清瘦、宽额小颏、展目微笑，嘴角和下巴加有点小须髭；长颈挺胸，直背端坐，超然潇洒于幽窟墙壁之上。而稍后的北周时期，佛像造型中，佛的脸面已由长变圆。西魏的菩萨造型已无北魏西域菩萨风味，头戴花冠，脚登高履，肩披大巾，身姿修长，眉目清秀，嘴角带着微笑。北周的菩萨身材变的短壮，面相丰圆，上身半裸，着短衫，身披长巾，腰裹长裙，是西域风格再次传入敦煌的艺术反映。可见北周的风格特点既有相似于北魏风格特点，又区别于北魏的风格特点。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第285窟北壁，东起共七铺说法图，是敦煌最早的七佛图像。大多作一佛二菩萨的形式，唯有西端一铺为二佛并坐。七佛是指，释迦牟尼和过去六佛。此图本应为释迦牟尼佛，因壁面宽余，而画释迦、多宝二佛代之，并与南壁西端的二佛并坐像相对应。

二佛均束高发髻，右袒袈裟，结跏趺坐于一平台，作说法相。二佛两侧各有一位胁侍菩萨。

北魏第263窟还有三佛说法图。在北壁后部说法图，与中心搭柱南壁三身佛遥遥相对。南壁三身立佛，各着右袒袈裟，脚踩莲花，中间主尊略高，两侧立佛略低。中间一尊上有树形和帷幔，左右二佛上有华盖。这三佛是：过去燃灯、现在释迦、未来弥勒三佛。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供养菩萨的地位又比胁侍菩萨地位低，在

壁画中可多可少，不像胁侍菩萨有一定的数量规定。莫高窟洞窟最早的供养菩萨是画在北凉第268窟佛龛两侧的八身供养菩萨。第272窟也是北凉时期的洞窟，龛外南、北两侧绘满坐式供养菩萨，手式灵巧，舞姿婀娜，两侧各二十身无一相同，造型极为优美。第248窟是北魏晚期的一个小型中心塔柱洞窟，在中心塔柱的人字披顶前部，画有十一身供养菩萨。身材修长，裸露上体，腰系长裙，肩披巾带。双手捧着高大的花枝，向洞窟中央行进，以供养塔柱正面龛内的主尊。人物造型不再似北凉和北魏的粗壮，而开始向西魏时的修长清秀过渡。

第285窟是西魏时期的洞窟。它有两种不同风格的供养菩萨，一种西域式，一种中原式。西壁以土红涂底，色彩浓重艳丽，为西域式风格，其他三壁以白粉为底，爽朗明快，造型、衣饰及晕染方式均属中原风格。在西壁主尊佛龛内，南北两则各画十身供养菩萨，或裸体披巾，或着通肩大衣，或披右袒袈裟，或斜披罗巾，姿态各异，神情自如。与西域式供养菩萨完全不同的中原风格特点，褒衣博带，体不露衣，双足穿鞋，脚踩莲花，是受中原南朝艺术风格影响下的作品。

第428窟的供养菩萨具有北周时期的艺术风格。它是以释迦牟尼说法像为主，两侧各画四身供养菩萨像。其造型和西魏供养菩萨相比，脸形丰圆，身体较短，人物肉体用浓厚的凸凹晕染法，脸面因变色，出现五白特点：白眼眶、白鼻梁、白牙齿、白嘴唇、白下巴。这是西域传入莫高窟北周时期又一种艺术新风格。

2、本生故事画

在北周时期，壁画以说法图和本生故事为主，经变很少。因为这个时期的佛教经典刚刚翻译过来，把它变为一幅图像还需要一个过程。而本生故事画早已出现在西域各地的石窟寺壁上，故事的内容大都是描述释迦牟尼前身如何舍己救人的。当时既有了方便的借鉴条件，又切合了当时部分生活在苦难时代的群众心理，所以

本生故事画在壁画艺术中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本生”也叫“本缘”，就是指释迦的前生。佛教的创造人释迦牟尼，原是古代印度北部一个小国——迦比罗卫(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的王子，据说因为看到人生“生、老、病、死”诸苦，出家修道而成为“佛”的。佛教徒相信“轮回”之说，认为像释迦这样的圣者，必然来历不凡，在他降生之前，一定还经过许多世事，积累了不少的善果，因此“本生故事”便产生了。许多印度佛教徒根据民间的寓言和传说，经过加工整理，把好的主角说成是佛的前身，把“调达”和“波旬”说成是坏人的前身。这些民间的本生故事，经过古代艺术家的彩笔，构成莫高窟壁画中最富有人间气息的动人的作品。从最初的独幅画的形式，发展成为连环画形式，从而把故事及其情节描绘出来。古代艺术家在处理画面时，都显示了巨大的匠心和技巧，充分地表达了故事的主题。

第275窟是莫高窟最早的北凉洞窟之一。画在该窟南壁中的《出游四门》连环画，是莫高窟最早的佛教故事画。

故事中描述了悉达太子出生以后，一直守在宫中，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父亲，觉得生活无聊、没趣。他的父亲净饭王就召集大臣，让大家共同想办法，从而使太子能无忧无虑。一位大臣建议说：让太子出城游览一下，见一见社会生活的世面，了解一下世故人情，这样就会分散精力，自然会快乐起来。国王认为可以一试，于是就准其太子出游。

悉达太子就骑着马，领着护卫出了王城的东门。出城以后，首先碰上了一位老人，悉达太子问曰：“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一位老人。”太子再问：“只是你一个人老呢，还是人人都要老？”老人回答说：“世上之人，不分男女，不分贫富贵残，从婴儿至童年，至少年，至青年，至壮年，终至老年。尘世间没有一个人不老的，都要老而终了他的一生。”听了老人的话，悉达太子非常苦恼。他想，人生如梦，老死为终，有生之日能有几何？我有荣华富贵，也还是免不了

一老而终。

第二次出游，悉达太子又在护卫的保护下骑马出了南门。路上碰见一位躺在地下的人，太子就问："躺卧在地下的人是什么人？"有人答曰："他是病人。"太子再问："什么叫病人？"再有人答曰："至饥至饱，狂饮狂喝，晨昏不分，行卧无常，苦痛难忍，不久于人世的人，就叫病人。"悉达太子又问："就他一人得病吗？"答曰："世人皆然，无一例外。"悉达太子听了此言，认为人生之苦连接不断，人之为人实在太难了。

从此，他就闭门不出，昼夜苦思冥想：人生有许多痛苦，又如何才能不痛苦呢？

第三次出游，悉达太子悄悄与车匿骑马出了宫，这次从王城的西门出了城。

在郊外大道上，车来人往，络绎不绝。迎面驶来了一辆牛车，尾随着许多人，皆都身穿缞衣，在牛车的车厢里放着彩绘的棺木。大家有的扶棺，有的推车，有的拉车，都在哭哭啼啼。太子不知在干什么，就派车匿去问：

"牛车拉的是什么？"

"是死人。"

悉达太子就亲自去问：

"什么叫死人？"

"死人就是不呼吸不饮食的人，灵魂离体，肢躯僵硬不动，数月之后，体无完肤。再过半年，皮肉全无，枯骨一堆。"丧主回答完毕，就随殡车而去。

悉达太子长叹再三："苦海无边，众生皆苦。悲哉悲哉！"

悉达太子的三次出游，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更加增添了不少的忧思愁苦。东门遇老人，南门逢病人，西门见死人，使净饭王对太子更加怜悯。净饭王想：太子几次出游，事属偶然凑巧吧，这次，让他从北门出去，也许不会再碰上不愉快的事了。

第四次出游是在大队人马的护卫下，悉达太子出了王城的北门。

在路上碰见一行人，匆匆忙忙，前卫武士让他绕道而行，行人不听劝阻。悉达太子看他们争执拉扯，忙上去询问：

“你为何匆匆忙忙，还不听劝阻？”

“我有急事。”

“什么事？”

“我妻子怀胎十月，将要生产，现在腹痛难忍，痛苦异常，我去请助产婆。”

“只有你的妻子生孩子是这样痛苦呢，还是所有的产妇都是这样的要经受痛苦的生产？”悉在太子又问。

“吃五谷杂粮的人，没有一个产妇不是这样的。”行人说完就冲开武士，大步而去。

悉达太子沉默不语，一队人马只得又回到城中去了。悉达太子在宫中久久思虑：生老病死，是人们痛苦不堪的四种苦难，又使人们烦恼无穷，难道说，就没有办法解除这些痛苦吗？

此时，他觉得宫中太小，憋得他喘不过气，他就骑马无目的地信步前行。

在路上，他碰见一位僧人，就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僧人。”僧人施礼回答说。

悉达太子又问：“什么是僧人？”

“就是断六情绝七欲，一心一意坐禅修行，永无烦恼，轻松自在。若能修行得道，万念皆灭，虽死犹生，不再轮回，不生不灭，还能拯救他人。”僧人说出一番道理。

悉达太子听完以后，恍然大悟：如此即可出离人生之苦海，何乐而不为呢？

回到宫中，太子的心情平静了。他要修炼得道，救大众脱离苦海。这时，悉达太子萌生出家修道的念头。

这幅壁画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造型、服饰具有印度、西域风格，是典型的释迦牟尼诞生修佛入道故事。

让我们再看一看 254 窟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它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最流行的题材之一。

有一位国王名叫大车，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摩诃波罗，次子叫摩诃提婆，最小的叫摩诃萨埵。

一天，三位王子外出游玩，来到一座陡峭的高山上。这时，他们同时发现在山谷中有七只出生不久的小虎，围绕着一只母虎，嗷嗷待哺。而母虎由于饥饿和生产的折磨，已筋疲力尽，奄奄一息。面对这八只即将饿死的老虎，三位王子都表示同情。

大王子说："你们看这母虎产子不过七日，七子围绕不能出外求食，眼看就要吃它自己亲生的儿子了。"三王子就问："这老虎吃什么?"大王子答："它只吃新鲜热血肉，但是现在替它寻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它就要饿死，谁又能为它不惜生命呢?"三王子听了心里一动，发誓要舍身救虎，用自己的生命和肉体去解救苦难的生灵。

他怕两位哥哥阻拦，就借口让哥哥先走，自己脱了衣服躺在母虎嘴前。因母虎快要死亡，连吃肉的气力都没有了。萨埵太子救虎之心更加迫切，爬到崖上，攀折一根干竹刺，刺破自己的身体，纵身跳到老虎身旁。他的这种勇敢的牺牲行为，使得大地都为之震动了。

饿虎舐食了王子流的血，慢慢有了力气，便把他整个身子都吃掉了，只剩一堆骨头和毛发。

在回家的路上两位哥哥不见了弟弟，赶紧回来寻找，当他们返回山谷时，已不见弟弟的踪迹，而是一堆刚刚被吃去的血肉残骸。他们从留下的衣服上认出了是弟弟的尸骨，顿时昏绝过去。

与此同时，王后忽得一梦，梦见自己两乳被割，牙齿全落，她的三只心爱的鸽子中，最小的一只忽然被鹰叼去。消息传到宫中，国

王和王妃得知最小的爱子已经死去，也昏绝过去，苏醒之后，就哭哭啼啼赶到现场，捡拾萨埵太子的骨骸，在那里建起了一座七宝舍利塔。

这幅画造型生动，构图严密，具有强烈的悲剧气氛，是早期故事画中一件杰出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我们再来看看采取了连环画形式来表现的《鹿王本生故事》。这里我们听说的连环画形式和我们今日所见的连环画形式是有区别的。它不是许多表现故事进程、有一定时间与空间的单幅画的组合，而是如一条连绵不断的带子，或者是说展开的横幅手卷，让人物在其间活动。

《九色鹿的故事》讲述的是：在很久以前，有一只毛色九种的鹿，它特别善良。它与朋友乌鸦互相照顾，互相关怀，形影不离。

有一天，九色鹿在河边游戏，忽然听见从河边传来阵阵呼救声，在汹涌的激浪里有一个人。善良的九色鹿丝毫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纵身跳进河里向落水的人游去。在和汹涌的洪水搏斗中，九色鹿毫不气馁，经过顽强努力，把落水的人救了出来。落水人名叫调达，他庆幸自己的再生，频频向鹿叩头，不停地向鹿说着感激的话："尊敬的恩人，感激您的救命之恩，我愿作您的奴仆。"九色鹿亲切地说："可怜的调达，你的情意，我心领了。我要自由自在地生活，我将永远不忘你对我的诚挚的感情。希望你不要向别人透露我的行踪。"调达指天发誓说："恩人啊！请您放心。如果我背信弃义，就叫我浑身长满烂疮，嘴里散发出恶臭吧。"说完，他就告别了九色鹿走了。

这个国家的国王是个忠厚的长者，而王后却是个十分贪婪而又奸恶的女人。她梦见鹿王毛分九色，角如明犀，便想取鹿皮为衣，鹿角为珥饰。醒来后，要挟国王说："如得不到它，我就活不成了。"国王无奈，只得布告全国，说是有人若能获致九色鹿者，我将以一半国土封赠，还将用大银碗装满金豆，用大金碗装满银豆作为赏

赐。

那溺水的人看到布告，寻思：我若告发九色鹿的所在，便可得到国土的一半，金银满钵，终生受用不尽。那鹿自寻死路，与我何干？这时，他忘记了对天的起誓，就跑到宫中向国王告发。国王听了他的报告后，便命他作向导，率领大批善射能武的勇士向九色鹿的所在地出发了。

此时，鹿正酣睡，不知国王前来捉它。鹿的好友乌鸦看到事情不妙，赶紧飞来向它报信，把它啄醒，鹿耸身起立，勇士们张弓拔弩，引箭待发。国王身旁站着那个负义的曾经溺水的人。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鹿跳到国王面前，说起话来，把自己如何在江边觅食，看到溺水的人，将他救起，和那人如何负义等情节，向国王陈述。溺水人在九色鹿义正词严的指控下，汗流满面，无地自容，无话为自己辩解。这时，溺水人的身上即刻长满烂疮，嘴里散发着恶臭。国王听了九色鹿的话，不胜惊叹，便放了它，并通令全国此后听鹿游食，不得伤害。王后听到国王把九色鹿放了，她的贪欲落空了，又羞又恨，最后，活活气死了。

经文的最后，佛讲完这故事，对弟子们说："鹿王就是我，乌鸦是阿难，国王是鹫鹭子。而溺水人则是调达，王后即今是调达的妻子。"

这幅画是以赭红打底，一开始即画九色鹿泅水救溺水的人，接着便是国王与鹿相对，后面则是浑身长癞的溺水的人向国王、王后告发的情景。

故事可以说是从左右两方开始的，而集中于一点——王与鹿相对。这样便突出地把故事发展的高潮放到最引人注目的地位。这种表现手法也很巧妙，非常自由，可能看出艺术家的智慧。

3、供养人画像

供养人像应当是真人的肖像。但是这类宗教"功德像"往往是大批制作的，画师自然无法以特定的个人为蓝本，只能采取程式化

和类型化的方法以表现其民族特征、等级身份和虔诚的宗教热忱，不能脱去千人一面的倾向。

在供养人的行列中，王公贵族像用显著的地位和笔墨加以突出。西魏第288窟的两幅供养人像是：男像头戴笼冠，身穿大袖长袍，足登笏头履，后有侍者张障伞盖，僮仆簇拥。女像头束高髻，穿大袖襦，间色长裙，前有侍婢捧持鲜花，后有侍婢持障扇以蔽风日。因榜题已消失，但从画面上来看，便知是豪门贵族。

西魏第285窟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形象，戴毡帽，穿裤褶，腰束蹀躞带，挂水壶、小刀等生活用品，形象虽小，表情动态却饶有风趣。

北周第290窟的胡人驯马像，所绘胡人高鼻大耳，一手持缰，一手扬鞭，两眼盯着所驯的骏马。这幅画表现了胡人的沉着勇敢。

早期的供养人像，作为一种艺术还不够精细，最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价值。它直接描绘了当时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其人物形象，特别是人像的衣冠服饰，都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第一手形象资料。

4、图案画

敦煌莫高窟的窟顶绘画了许多装饰图案，其中有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云气纹和人物纹等，变化巧妙，结构严谨。这些纹样大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莲花，在印度很早就用它装饰，在佛教艺术里，它象征净土，因为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一切进入极乐世界的，都从莲花自然化生，以示灵魂的净化。另如狮子象征佛；凤、麒麟象征祥瑞；人参象征坚忍不拔；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等等。

每一个洞里面都有天井和"天花板"，所以，在不同的时代里，敦煌图案就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花纹。北周时期的花纹比较简单。还有些纹样没有多大意义，仅仅表现一种形式美，如茶花、葡萄和几何纹等，五颜六色、绚丽夺目，是作为石窟建筑的装饰图案。

莫高窟北凉268窟是现存最早有装饰图案的洞窟。窟顶中心绿色方块内绘圆形红莲花，内层岔角内，上下左右对称地绘火焰与

化生，外层岔角画四飞天，形成方形、圆形与三角形相结合，造型朴拙。

第431窟是北魏晚期较大的一个洞窟。绘有十几方平棋图案。在人字披上塑出椽子，系北魏早期遗风。这是人字披南段，东披画莲花、摩尼宝珠，西披画菩萨胡跪持莲花供养。莲蓬上画一枝五瓣忍冬，使莲蓬如同花盆模样。西面通道上方窟顶的一方平基，外层四角装饰飞感很强的飞天和平稳宁静的化生童子，造成对比，使外形方正、排列整齐的图案装饰饶有生趣。

西魏时期的图案，大致和北魏时期差不多，但西魏时的图案已经有较多的中原汉族的风格。其中285窟中的藻井图案就具有这种风格。图案为正方形三套格，第一方格内，绿色水涡纹中绘二套圆，中心圆内画莲籽，外圆为覆莲莲瓣。第二方格四岔角画火焰纹，第三方格四岔角画莲花。三套格边饰均为忍冬纹，藻井四面饰双层垂幔。垂幔四角为兽头嘴衔玉佩、流苏、羽葆，悬达四披，层次分明，色彩丰富。

这个时期的图案很能看出来是受西域的影响，表现手法劲健和丰妍，尤其是莲瓣式的龛楣，组织得尤为精巧富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一切艺术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敦煌壁画艺术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原汉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它表现的是佛教的内容，也尽管受到外来艺术的浓重影响。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佛教信仰已经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它已经“中国化”，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佛教文化艺术自然也不可能不以中国式的风格和面貌出现。虽然敦煌毗连西域，但自汉武帝时代建郡以来，经过四五百年的艰苦经营，远在莫高窟创建之前，这里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中原文化。

从题材上看，壁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宣传苦行和牺牲。不论在说法图、本生故事中和经变中，都贯穿着这个精神。为什么要在

壁画中宣传这些东西呢?佛教本身充满着消极的因素，是剥削阶级利用它来麻醉和欺骗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它宣传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是在于自我牺牲，牺牲的方式也是极其残酷，如《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的故事》等。在当时战祸频繁的时代，生活极端痛苦，人民往往不得已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安慰，希望有舍己为人的救世主出现，来拯救他们出于水火。从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中，我们仿佛真切地接触到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善良人民，听到他们的叹息和呻吟。北朝的壁画给了我们最鲜明最难忘的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刻印象。

第九章　隋唐时期敦煌文化艺术

第一节　隋朝时的敦煌文化

一、佛教兴盛

隋文帝“雅好符瑞”，大力提倡佛教，对敦煌地区佛教事业在隋代的发展推波助澜。他认为：佛能“生养万物，利益兆人”。为此，尊佛教为国教，加强同西域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建立较为巩固的西北后方基地，稳定其政治统治。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杨坚下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降大慈，济度群品……故而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以封建的王权，用封建的法律命令来保护佛教造像，提倡佛教事业，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自然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当时佛教及其相关文化事业的发展。

仁寿年间（公元601—604年），隋文帝又派遣中使至瓜州崇教寺（即敦煌莫高窟）建舍利塔，以推动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兴盛。正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隋代时敦煌莫高窟的开窟造像

出现了超越前代、规模空前的记录。在隋王朝立国的37年中，敦煌莫高窟竟留下所开凿洞窟94个，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而且有些洞窟规模十分宏大，绝非一两年能够完成。可见当时敦煌莫高窟各族人民开窟造像、绘制壁画、传诵佛教经典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以及各国各地僧徒相互交流学习的文化大融合情景。

敦煌地区在隋文帝时期的二十多年间和隋炀帝杨广大业初期，是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时期，正所谓"区宇晏加，人殷物阜"，奠定了佛教及其它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的基础。同时，保存于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雕塑、绘画艺术品，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现实，为研究敦煌历史乃至当时隋王朝的历史，特别是佛教及相关文化发展史提供了真实、生动而丰富的资料。隋代敦煌佛教、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唐王朝敦煌佛教、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裴矩的《西域图记》

隋王朝时，随着当时经济的发展，中外交通交流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地理学，特别是地图的绘制，已有了较为科学的方法。

隋炀帝时，为了发展西域的商路交通，派内侍郎裴矩驻于张掖，往来于武威、张掖、敦煌间，主持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间的相互联系、贸易及交通等事宜。裴矩在敦煌等地搜集了西域境内以及中亚、西亚各国山川险阻、风俗人情、服章物产等资料，"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①。这是一部有丹青绘像、有地图、有记述的相当完整的地理学著作。

特别是裴矩在《西域图记》序言中，记载了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东岸的三条大道，敦煌是由内地到西域的咽喉，而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鄯善则分别为三条大道的起点。经由三条大

①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道可到西海，再达波斯（今伊朗）、拂菻（古代罗马帝国）等西亚、欧洲各国，这就是中外国际大通道，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是我国地理学著述中，对“丝绸之路”走向的最早、最系统的论述。

裴矩对西域、中亚、西亚的研究和他的《西域图记》，是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对我国古代进一步发展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　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艺术

一、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艺术概况

隋代从王朝立国开始，就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战胜吐谷浑与突厥，巩固了自己的西北边防疆土，敦煌莫高窟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走向自己艺术顶峰前的兴盛期。杨坚、杨广两代佞佛，用封建法律与皇权的手段弘扬佛教，并对河西、西域用兵频繁，促进了石窟寺建造的不断兴盛。隋代敦煌莫高窟艺术，在原有的汉晋传统结合外来影响所形成的地方风格的基础上，面临中原文化艺术与西域文化艺术两种风格的熏染，从多方面不断融合、取舍、探索，准备着一个新的文化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莫高窟除去后代凿窟毁去的残龛，现存隋代三十七年间开凿的洞窟七十余个：第56、59、62、63、64、206、253、255、262、266、274、276、277、278、279、280、284、292、293、295、302、303、304、305、311、312、313、314、315、316、317、388、393、394、396、397、398、401、402、403、404、405、406、407、410、411、412、413、414、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30、433、434、436、451、453、455和485窟。

隋承周制，敦煌莫高窟艺术在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以前，带有浓厚的北朝风格，还属于北朝佛教艺术的范畴。无论是人物造型、内容布局、窟形、色彩和装饰纹样的运用，都与北周洞窟艺术风格接近。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隋灭陈，南北统一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在文化艺术上开始走向其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空前通畅，海西三道总凑于敦煌。政治使节、远征士卒、商旅队伍、僧者伎乐东来西去，一派兴盛繁荣景象。敦煌玉门关、阳关之外，无尽的瀚海与沙漠，不测的旅途艰险，自然激发人们离别敦煌前向石窟寺布施、祈求平安、鼓舞勇气的感情需求，为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出现了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越前代的空前现象。

这一时期莫高窟的佛和菩萨造像，大都是广额丰颐、体态健硕、腹部微凸、神情怡脱的“度济者”，仿佛他们也将以自己雄健的体格和开朗乐观的情绪去远征西行，去穿越冰山沙漠横亘、狂风酷热肆虐的漫长古道。同时，佛和菩萨被装饰得十分华丽，大都“佩金玉、被锦罽”。雁行成列的伎乐飞天，在洞窟壁顶的蓝天里追逐翱翔，错彩成行的千佛，晃灼着信徒眼目的金色面孔，在石窟深处闪烁着它们的幽光。壁画上细致繁丽的风格和塑像衣褶彻底改变了阶梯式的作法，而变为贴体流畅的衣纹。佛和菩萨的装饰物也由石窟艺术家以运往海西的丝绸和织锦图案来纹饰，佛的袈裟上、菩萨的衣裙上艺术而现实地绘画有“联珠狩猎纹”、“联珠飞马纹”、“菱形狮凤纹”、“菱形团花”、“棋格团花”等。

隋代敦煌莫高窟修窟的窟形，先有须弥山式中心塔柱，以后多是西壁开龛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人字披顶方形窟，还有了三面开龛的中心龛柱与前部三铺大像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在绘画题材上，作为佛经“变相”的经变画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结构也趋于宏伟，除去图解抽象的教义，还包含着一些故事情节的描绘，画面结构也适应新的内容创造出了新的形式。隋代莫高窟壁

画上出现了“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结构简单的经变和鸿篇巨制的结构比较自由的“法华经变”等，是为敦煌莫高窟经变画艺术的探索时期，为唐代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建筑艺术

隋时期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探索时期。虽然隋代是个短命王朝，共维持了三十八年，却在莫高窟中留存了七十余个洞窟，而且有些洞窟规模宏大。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年间和大业初期，当时敦煌正处于经济繁荣时期，这是修建石窟的物质基础。隋代洞窟的塑画艺术的保存，相当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社会。

隋代敦煌石窟建筑的位置，主要是从南段中心的魏窟群向北端和下层发展，与魏窟共占了长约四百米的崖面，其中也有少数隋窟是对原魏窟的修改，从隋代壁画的下层可以剥露出魏画。

隋窟的窟形大体上和魏窟相似，仍按北魏中心柱窟，于主室后部凿有直通窟顶的中心柱。还出现了另一种中心柱窟。石窟平面为方形，中心柱下部为方坛，中心柱上部呈倒塔形直通窟顶，塔刹四龙环绕，以象征为须弥山。窟顶前部有人字披，后部有平基。最主要的窟形是殿堂窟（即覆斗顶窟）。这一种洞窟的平面为正方形，窟顶作覆斗状，窟顶四面呈斜披。在隋代窟中，有的正面开龛，有的三面开龛，有的作马蹄形佛床，有的依壁造像，布局多种多样。

第 292、427 等窟就属中心柱窟。第 302、303 窟为方形窟。第 407 窟即属覆斗顶窟。

隋代石窟形制的变化，主要呈现在窟内布局和内容上。由于早期洞窟，多以说法、禅定和弥勒等塑像为主尊，到了隋代则普遍出现了群塑。一些在建筑空间上很典型的中心柱窟，窟内布局也有所改变，如第 292、427 窟，以三铺大立佛为主体，形成一派庄严的佛堂气氛。

隋代的石窟形制和内部布局，注重摹仿中原寺院，西域石窟的影响已逐渐消失。

随着时代的变化，敦煌建筑画也就随着变化。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到了隋代，已经把宫殿、寺院渲染在经变画中，天宫经变建筑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殿二楼的典型代表。建筑画很简单，很单调。第423窟前部人字披顶西披画《弥勒上生经变》画，就反映了弥勒菩萨常坐宫中为诸天人讲经说法的情景。

这幅建筑画没有表现建筑的体积和建筑的纵深空间，整个建筑画面简单，气氛单调。

三、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彩塑艺术

隋代是敦煌彩塑走向成熟的发展奠基时期，隋代的塑像也还有不少的遗存。除了承袭北魏一佛一菩萨的配例方式外，同时又出现了大型力士像和天王像，还有三铺高大立像三身佛或三世佛，又塑造出了十大弟子阿难和迦叶等的像。

从造型风格上看，隋代的塑造艺术家进一步突破了外来艺术规范的束缚，已逐步形成自己民族的风格。

隋代第427窟计塑像28身，它由三组塑像布局，也是莫高窟保存隋代最完好的洞窟。但它还有一定的缺点，虽然改变了北魏的“秀骨清像”的作法，发展成雍容厚重的风度，但在人物造型上受到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人物的整体效果还不是太完美，头大，上身长，下肢短，肢体的比例不相称。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脸部略嫌扁平，虽然表现了一定的庄重、慈祥，却也显得呆板。由于这一代艺术家的努力，结合自己民族艺术特点，逐渐克服缺点，在实践中改进提高，才出现优美绝伦的唐代塑像。塑像衣着的富丽也是前所未有的。塑像原是塑造与彩绘的结合，可以说从隋代开始，才充分发挥了彩绘的装饰作用。

隋第427窟中的三身佛是敦煌彩塑中最高大的一佛二菩萨的三组佛像。佛身高4.25米，菩萨身高3.62米。这三组佛像塑在主室中心柱人字披下，每佛左右各塑胁侍菩萨。三组一佛二菩萨形成三佛鼎立布局。佛像头大，腿短，颈粗，额宽，颐满，头微俯，脸部扁平，鼻直唇厚，眼下视。佛身着紫红色通肩袈裟，菩萨着天衣长裙。衣裙上彩绘精美的花纹图案。佩戴手镯、瓔珞、臂钏，珠光宝气，显得高贵华丽。

在敦煌莫高窟塑像中，塑造的佛弟子形象主要是大弟子迦叶和小弟子阿难。佛为坐像，左边是迦叶，右边是阿难。所有的迦叶和阿难，在不同的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艺术风格的造像。

隋代第419窟的阿难是一位少年阿难。圆脸方额，细眉大眼，直鼻厚唇，面庞流露出内在的淳朴和浓厚的稚气。身披绿色袈裟，双手斜捧桃形小钵，谦诚恭敬地立在佛的身旁。

419窟的老迦叶与少年阿难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方脸大耳，满面皱纹，嘻笑露齿，鼻翼两侧肌肉松弛，两眼深陷，目光衰退，不辞辛苦，饱尝风霜。表现了一个游方说法、随机应变、终身苦修的老迦叶形象。

四大天王像也是莫高窟彩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四大天王在佛教里被称作“护世四天王”。在隋代第427窟中，古代匠师夸张了天王的头部及上身躯干，使之腰圆背厚，胸鼓腹隆，显得顶天立地，神情威严。头戴花冠，身穿战裙，甲胄严整，披巾贴身，身躯魁伟，健壮剽悍，足着高靴，脚踩地神，表现出一副不怕一切的威势。

金刚力士是天王身边常配的力士。他们手持金刚杵护法，在第427窟中，赤腿光足，双脚五趾分开，两腿粗壮，肌肉凸起，筋脉暴胀，趾关节粗大，身躯粗壮。这二位力士头戴宝冠，耳饰垂肩，裸上身，披长巾，腰束战裙，昂首怒目，执肘握拳，咬牙切齿，作怒吼状。古代匠师们用块面来表现骨骼和肌肉用力时的起伏转折，加上咬

牙切齿，怒目而视的表情，把力士的雄猛、强暴、放纵不羁的特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壁画艺术

1、佛像画（尊像画）

敦煌莫高窟隋代壁画仍以本生故事为主体，说法图逐渐为发展起来的经变画所代替，单身菩萨像出现并逐渐增多，图案纹样画更加富丽多彩。

第420窟就是隋代洞窟，东壁门上的释迦牟尼说法图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佛居中，结跏趺坐于金刚宝座上，作说法相，左有观世音菩萨，右有大势至菩萨，十大弟子分离在佛和菩萨的身后。此图共画佛陀、菩萨、弟子十三身。绘全十大弟子是隋代说法图的一大特点。人物造型和彩塑造型相一致。

在隋代第303窟的北壁千佛图案中，还有一幅二佛说法图。

释迦牟尼佛和多宝佛均一腿平放，一腿曲抬，手作说法印，坐于双狮座上，二佛身后各有捧着莲花的供养菩萨，二佛两侧各有一身手持莲花的胁侍菩萨。图形有了新的特点，多宝塔画成佛龛形，二佛坐于龛内。人物也增多了。人物造型和绘画技艺仍沿用北周风格，四周的小千佛仍沿用西域晕染法色彩变色后的小字脸。

隋代单身菩萨像逐渐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是第394窟和第276窟。西壁佛龛两侧中间各画一身胁侍菩萨。南侧的观音菩萨，脸形方圆，弯眉细眼，大耳垂肩，头有桃形三色圆光，戴三珠宝冠，披天衣，露前胸，系长裙，赤足踩大莲座，左手提净瓶于腰下，右手举火焰宝珠，身边有莲枝攀绕。

在276窟中，迦叶身旁有一尊观音菩萨像，脸形丰圆，弯眉细眼，棱鼻厚唇，唇边有蝌蚪式小胡子。头有三色圆光、戴化佛宝冠。露前胸，披天衣，系长裙，配饰有项圈、手镯、臂钏、璎珞、流苏。赤足踩大莲花，右手举柳枝于肩下，左手持净瓶于胸前。此观音菩萨的

造型已有变化，身材修长，脸形丰圆，神态也比较慈祥，衣饰华丽，已脱离隋代风格，向唐代菩萨过渡。

供养菩萨在隋前期和彩塑造型的风格相一致。头大身短，面相丰圆，肩宽腹圆，体态健美。在绘画技艺上，肉体用中原式晕染。第420窟的六身供养菩萨就具有这种特点。

第402窟是隋晚期的洞窟。供养菩萨的造型已有明显的变化，脸形长圆，弯眉细眼，棱鼻厚唇。菩萨的衣饰华丽，色彩鲜艳。

隋代已不采用单幅画的形式，完全用横列的手卷式的连环画出现。故事分段更细，表现也更为复杂，背景的山水树木屋宇，尤富于装饰的情趣。所用的颜色，以青、绿、白、棕为主。

2、本生故事画

隋代419窟中的《须达拿太子施象》就是长卷连环画的形式。

故事讲，在古印度，有一个国家名叫叶波国。叶波国的太子叫须达拿，他喜欢施舍济贫。有一天，他来到城外，看到一群又聋又哑的瞎眼穷汉跪在路旁，太子就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他回到宫里，把自己的所见告诉国王，请求国王把宫中的珍宝施舍给穷人。国王答应了他的请求，立即命令大臣把珍宝用车拉到大街广行布施。消息传开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城内，拿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人们都兴高采烈，满意而去。一下子须达拿太子声名大扬。

敌国的国王知道太子喜欢布施，他就召集大臣商议："叶波国有一只白象名须檀延，力大善斗。每次与别国打仗时，便用此象打头取胜。谁愿意前往，把他们的国宝弄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前往。国王就选派了八位婆罗门徒前往叶波国向须达拿太子乞索叶波国的国宝——檀延大白象。

此日，他们到了叶波国的城门下，装成贫困的样子，呼喊着太子的名字。守门的人听见呼叫声，赶快报告太子说："外面来了几位外道的人，拄着拐杖，翘起一只脚，说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要求见太子。"太子听了以后，立即出门施礼迎接。为首的道士说："太子喜

欢给贫困的人布施，我们不远万里来请求太子布施。我们都是残废人，请您施舍一头白象为我们足力。”太子就把他们领到象厩任他们选象。道士们看了象以后，连连摇头，又说：“太子我们要求您把那头叫须檀延的大白象施舍给我们。”他经过一番思索以后，决定把白象施舍给他们。八道士骑上白象就匆匆而去。

叶波国的大臣听说太子把白象施舍给了敌国，都感到很害怕，都来见国王。他们想，如果失去白象，用什么武器来战胜敌国？国王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忙与大臣商议，如何处置太子。想了好多办法，都不妥。最后，有位大臣说：“依臣之见，可把太子逐出城内，让他到深山居住十二年，使他自己觉悟。”国王觉得这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就召来太子，让他赶快准备一下，立即出城。太子不敢违背父王的命令，他对国王说：“在我走之前，我要求再布施七天。”国王听了很惊讶地说：“你已经把我的国库都布施空了，把御敌白象也布施了。今天，我要处罚你，你还要布施。你就放弃这个念头，赶快走吧。”在太子的一再恳求下，国王答应了王子的要求，于是太子发出通告。四方的民众都来到宫门外，吃到了王子准备的饭食，拿到了想得到的珍宝。

施舍完以后，太子就对妻子说：“父王已把我们驱逐出城，罚我们去深山荒野悔改。”他的妻子曼坻感到很惊奇，就问太子：“你有什么过失，父王要如此处置你？”太子就对她讲了因布施太多，国库空虚，连御敌的白象都施舍给了敌国。所以，父王及大臣们逐他出国。妻子听了他的缘由以后，就对太子说：“我跟你去。”可是太子说：“山里有凶猛的虎，你在宫里过惯了舒适的生活，能忍受下来吗？”曼坻说：“常言道，王者以幡作为象征，火者以烟为象征，妇人以夫为象征。有了你，我才觉得幸福。你因行布施受处罚，可是，布施是我们一起行的。”可太子说：“我喜欢布施，任人随意而取，如有一天有人向我要儿女，我也不能不给。”曼坻说：“任凭你布施，我不阻拦。”于是夫妻二人携带儿女一起进山了。

二人出城以后，还把随身所带的物品都施舍给穷人。太子让妻子和两个孩子坐在马车上，自己执鞭赶车。途中，又有几个婆罗门向太子乞马，太子把马卸下施舍给他们。然后，太子在前面拉车，妻子在后面推车，拉着两个孩子继续前行。走不多远，又遇见一婆罗门来乞车，太子又把车子施舍给他。正要前行，又来了一婆罗门请太子施舍，太子为难地说："我已没有什么可施舍的东西给你。"婆罗门说："那就把你的衣服施舍给我吧。"太子就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了他，只留下一身单薄的旧衣。送走一个又来一个，直到把妻子、孩子的衣服都施舍了。于是夫妻二人又背着孩子继续前行。

经过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他们终于到了檀特山。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他们在山上遇见一位道人，年已五百岁。他问太子："你为什么要带妻子到这里来？"太子一时难以回答。曼坻问："像我这样的人，什么时候能得道？"道人说："这我确实不知。"太子又对道人讲了他的名字。道人听说了须达拿太子，感到很惊喜，帮助太子选择了居住地方。太子也仿效道人束结头发，以泉水瓜果为食，在这山里安居下来。

自从太子一家来到这儿以后，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了生命，一切凶猛的野兽都有了人心。

鸠留国有一穷婆罗门，四十岁时娶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妻子。这个婆罗门长的特别丑。他的妻子因为别人耻笑了她，就回家威胁她的丈夫，让她丈夫去找须达拿太子，乞讨他的孩子。如找不来，就以死要挟。

这一天，他终于来到了檀特山，遇见一猎人，猎人一见是个婆罗门，他又在打听太子，就怒火顿生，把婆罗门捆绑起来，一顿鞭打。结果，这个婆罗门用假话欺骗了猎人，猎人一听是国王思念太了，让他寻找，就给他指了路，道了歉。

婆罗门寻路到了太子的住所，太子就热情接待，吃饱喝足以后，就对太子说："久闻太子好喜布施，我十分贫穷，想得到施舍。"

可太子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能施舍给你什么?”婆罗门说:“你既然什么都没有,就把你两个孩子施舍给我吧。”太子犹豫不定,婆罗门就再三索要。太子就把两个孩子找来,对他们说:“婆罗门远道来索要你们,你们就随他去吧。”两个孩子听了父王的话以后,非常害怕,他们号啕大哭,苦苦哀求,对父亲说:“你怎么这样狠心?如果我母亲回来见不着我们,一定十分伤心。”太子对两个孩子说:“我已答应,你们就跟他去吧。”婆罗门见状催促说:“太子,虽然你发了慈悲把孩子施舍给我,可是,他们的母亲回来就会改变了主意。我还是赶快走吧。”太子说:“我们布施从来没有反悔过。”就把孩子亲手牵给了婆罗门。可二子还是跪在父亲面前哀求,但太子不为之动心。二子一看不能挽回,就放声大哭。婆罗门又吩咐太子用绳子把孩子捆绑起来。二子不愿离去,婆罗门就用鞭子抽打,血流满地,太子也泪下如雨,不忍看下去,就送二子下山。送走以后,太子就号啕大哭。因孩子想等母亲回来,就把绳子绕在树上,可婆罗门用鞭子抽打。二子忍痛不过,只好随婆罗门前行。两个孩子想到自己遭到这样的厄运,禁不住求告山神树神,让他们的母亲来见见他们。山神树神被感动了,使曼坻在山中左足发痒,右眼湿润,两乳流汁。她想是不是孩子出事了,于是,急忙回家去了。在路上又碰到天王化作的狮子,怕曼坻阻挠了太子的善心,所以,当道阻拦。曼坻请狮子让让路,让她赶快回家看看孩子。狮子估计婆罗门走远了,才起身让路。曼坻回来以后,四处寻找,不见儿子,感到发生了不幸,禁不住号啕大哭,让太子告诉她,孩子怎么不见了。太子一看无法隐瞒,就对妻子讲了他把孩子施舍的经过。曼坻听了以后,好似山崩地裂,顿觉肝肠寸断,哭倒在地。太子劝慰她,讲了他们认识经过,曾经发的誓,要广行布施,有求必应,除了父母不能施舍,其余一切都要随意施舍。听了这些以后,曼坻止住了哭声,不再追寻二子的下落。

天王想进一步试一试他如此布施的诚心,就有意变成一个奇

丑的婆罗门，来到太子面前，要求把王妃施给他。太子说："可以，就把妃子施给你吧！"曼坻说："你把我施与人，谁来供养你呢？"太子说："如不施你，如何修得正果？"天王见太子毫无悔意，就领着曼坻往前走了七步，又转回来，把曼坻交给了太子，并对太子说："再不要将妃子施与别人了。"而太子却拒绝了，他又对天王讲了曼坻的善良和勤劳。这时，天王复现了真身，就对他夫妇说出了真情。问他们有什么愿望，曼坻说：一愿把他们的孩子卖回自己的国家；二愿孩子不遭饥渴之苦；三愿她和太子早日回国。太子也发愿说："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得到解脱，永无生老病死之苦，上升极乐净土。"天王说："请你们放心，你们的愿望一定能实现。"说完就不见了。

婆罗门带着两个孩子，打的遍体伤痕，血染衣衫。回到家里，他的妻子也不敢把孩子留在家里，让其夫带到街市卖掉。天王得知以后把婆罗门引诱到叶波国。叶波国的臣民认出是皇孙。报告国王，买下了孙子孙女。孩子们给国王讲述了他们在山上的情况，国王立即遣使臣迎太子回国。经过十几年的相处，山林中的百鸟禽兽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出檀特山，才洒泪而别。太子的行为也深深感动了敌国，也派遣使臣送还白象。但是，王子没有收下他们的礼物，反而给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收下白象的缘由，使敌国冤家变成了友好之邦。

3、经变画

经变在这个时候逐渐得到发展，题材渐渐多了起来，构图也力求生动与变化。

《法华经变》最早出现在隋代，也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在莫高窟第419、420、303、313窟。但是第420窟中的《法华经变》是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法华经变》有六品：《序品》、《方便品》、《譬喻品》、《见宝塔品》、《观音普门品》等。第420窟中就有四品：北披是《序品》，南披是《譬喻品》，西披是《方便品》，东坡是

《普门品》。整个画面十分密集，以小组画为主，画与画之间用楼阁房屋、青山绿水相隔。

《维摩诘经》也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它共分十四品。《维摩诘经》最早也出现在隋代，在420窟中绘制。它主要内容是：在毗耶城有一位大居士，名叫维摩诘，他精通大乘佛教的哲理，善于辩论。因装病在家，释迦牟尼知道以后，就先后派了十大弟子、弥勒等四大菩萨前去问疾。但谁都害怕维摩诘的弘理辩论，都不敢前往。最后，文殊菩萨承佛旨，前往问疾。画面上维摩诘盘坐在殿前中央，双眉紧锁，面庞消瘦，手执麈尾，扬头向前，慷慨激昂，似乎正和前来问疾的文殊菩萨展开激烈的辩论。

《药师经变》也是莫高窟壁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早出自隋代。它的主要内容反映东方药师佛国中各类佛神之间地位关系，没有描绘极乐净土美妙景象。

在隋第394、417、433、436窟中，都绘有《药师经变》。第433窟的药师佛盘坐在莲台上，作说法相，身后有背光，有华盖，两侧有站立在莲花上的两身菩萨，即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与药师佛合称为"东方三圣"，供养药师佛，祈福消灾，免遭诸难，超度亡灵。

4、供养人画像

隋代供养人画像，继承北周传统，保持着装饰效果和程式化手法，大多画于石窟下部。

隋第390窟隋画供养人八十三身及从者八十余人，男供养人幞头靴袍，或襦裙大裘，捧花盆；女供养人头饰盘髻，身材修长，穿窄袖小衫，系长裙，披帛很自如地从两肩或两肘弯垂下，其手捧花枝，动作优雅，色调柔和。在供养人行列中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活泼的场面，有车辆、牛马和奴婢随从，还有供养女乐一组，分别演奏着琵琶、箜篌、方响、横笛、排箫等诸般乐器，缓缓行进。

5、图案画

隋代壁画中最丰富多彩的还是图案画。图案不仅大量用于菩

萨塑像及画像的衣饰中，也用于它身后的背光、龛楣及窟顶等处。藻井尤为富丽，其结构大都为中央是莲花，四框是各种二方连续图案。

第407窟的顶部藻井比较宽大，有八瓣大莲花仰开。三只追逐的兔子在莲花中心，藻井中央是象征蓝色的天空。在蓝底色的莲花四周，有八身飞天，姿态各异。三只追逐奔跑的兔子在莲花中心尤为奇特，造型优美。三只耳朵组成了等边的三角形，三只兔子不停地在一个圆中奔跑，使三只兔子的三只耳朵，巧妙地代替了应用的六只耳朵，不论从哪一边看，一只兔子都有二只耳朵。由于我们古代的画师有高度的想象力，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今天这优美的图画。莲花中心的兔子和莲心外围的飞天，它们飘旋的方向与天花是一致的，所以形成运动的合力，静止中的莲花仿佛也在运动。

隋代的洞窟给人总的印象是装饰趣味很浓厚，这是和图案应用的普遍和它的多样化分不开的。

隋代的艺术家，正在进一步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走向创造自己民族艺术形式的道路。外来风格经过长期的吸收融化，主要是社会审美观念的要求支持着艺术家的革新尝试，才出现了隋代这种虽未完全成熟，但已充分体现了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也才有宽广和光辉的前途。北魏的艺术充满原始气息，而唐代的艺术绚丽多彩，隋代艺术在两者之间架起了桥梁。

第三节 唐朝时的敦煌文化

一、书法艺术

敦煌保存的《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唐大历碑》、《唐乾宁碑》、《唐洪䛒受牒碑》等碑刻书法，加上敦煌莫高窟大量唐人墨书题记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数万卷写经，构成了一部较完整的敦煌书法艺术文库。

从这些唐人隶、楷、行、草书体墨迹中，可以窥见唐代敦煌地区书法艺术承传演变的历史，也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的概况。唐时敦煌碑刻书法艺术均为楷书，字体工整严谨，细腻隽秀，足见唐人欧派风格对敦煌文化艺术事业影响颇深。写经多属生活实践中的实用性书体，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较少，而且出自各地人士之手，不完全是敦煌人所写。其中有一部分出自中原地区书法高手和宫廷御书之手，如宫廷经生王思谦、弘文馆楷书成公道等。他们所写的卷子，在书法艺术水平上都是第一流的上乘之作。

当时敦煌地区受多年来文化东西交融交流的影响，也不乏造诣较高深的书法艺术大家，有纪年题记的卷子书法艺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文人张大忠、张球、阴庭诫、翟奉达，写经生邬忠、索奇、苏文颇等，他们的书法作品虽以经卷、题记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技艺精湛的墨迹，都可成为书法艺术研究和发展史上的范本。

二、民间文学和诗词

唐代敦煌地区文学，一般是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出现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代敦煌民间文学作品，种类之繁杂，内容

之丰富，真可谓是一部民间文学大全。

根据敦煌遗书和敦煌文学研究学者提供的材料，唐代敦煌文学和敦煌民间文学大体可以分为变文、话本、诗词、歌谣和讲经文等几大类。这些作品都是在当时敦煌地区佛教兴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的条件下不断成长起来的。尽管这些作品大多不是来自真正劳动者的创作，更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文人和城镇市民阶层的文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实际及思想感情与广大劳动者息息相通。因而他们的作品，大多能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出劳动群众的痛苦与欢乐、精神和理想、生产与生活，从而真实生动地展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性，自然为广大的民众所喜好。

由敦煌民间艺术家编唱的《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通过散文讲述，以韵文歌唱的形式，热情讴歌了领导敦煌人民驱除异族统治，收复河陇故土山河的张氏叔侄。《变文》先讲述道："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令整顿队伍，排比兵戈，展旗帜，动鸣鼍严，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拽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在气氛渲染至极之时，接着以优美的歌调又唱出下文：

忽闻戎犬起狼心，叛逆西同把险林。
星夜排兵奔疾病，此时用命总须擒。
雄雄上将谋如雨，蠢愚蕃戎计岂深？
十载提戈驱丑虏，三边犷悍不能侵。
头中锋芒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
一阵吐浑输欲尽，上将威临杀气高。

这种讲唱文学有鲜明的敦煌地方特色。它以当时当地的真实可见的人物和真实的人人皆知的典型事件，就地取材。同时运用通俗易懂、简练生动的文字形式，夹述夹议夹唱，为广大的人民群众

所喜闻乐见并广泛传唱。

另外，从众多的史籍材料，特别是敦煌遗书卷子资料中，我们可知，汉以来流行的歌谣小调在敦煌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也继续流行和发展，且颇具文学价值。这些诗歌和曲子词，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唐代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敦煌人民淳朴厚重健康的民情风俗，体现了敦煌地区民间文学发展的优良土壤和极高的水平。

下女夫词·去花诗

一花却去一花新，前花似假后花真，
假花上有衔花鸟，真花更有采花人。

五言白话诗

用钱索新妇，当家有新故。
儿替阿耶来，新妇替家母。
替人既来到，条录相分付。
新妇替家事，儿郎承门户。

王梵志诗（一）

有女欲嫁娶，不用绝高门。
但得身超后，钱财总莫论。

王梵志诗（二）

立身行孝道，省事莫为愆。
但事长无过，耶娘高枕眠。
耶娘绝年迈，不得离旁边。
晓晚专看待，仍须省睡眠。

斗百草·曲子词

庭前一株花，芬芳独自好。
欲摘问旁人，两两相捻取。
喜去喜去觅草，灼灼其花报。

芦花白

芦花白，秋夜长，庭前树叶黄。
门前寒，旋草霜，来了绣襦裆，
夫妻在他乡，泪千行。

三、唐代《敦煌廿咏》

《敦煌廿咏》是一组描写敦煌地区名胜古迹的五言律诗，是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创作完成的。《敦煌廿咏》虽算不上唐诗中的上乘佳品，但在写作上表现和运用的广阔意境、豪壮的气势和浪漫主义色彩，正是盛唐时代诗风的余韵。作者是开元、天宝时期的盛唐诗人，怀着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抱负，从中原来到边陲佛教圣地敦煌，虽再无力呈现盛唐浩歌的磅礴气势，却也唱出了浩歌的尾声。诗中作者大都表现了爱憎分明、褒贬清晰的立场的同时，以哀痛忧伤的情调，表现了自矜清高的姿态，在孤芳自赏、与世无争之时极借古喻今之诗风。

敦煌廿咏并序

仆到三危，向逾二纪。略观图录，粗览山川，古迹灵奇，莫可详究。聊申短咏，以讽美名云尔矣。

三危山咏

危山镇群望，岫崿凌穹苍。
万古不毛发，四时含雪霜。

若连九陇崄，地窜三苗乡。
风雨暗溪谷，令人心自伤。

白龙堆咏

传道神沙异，喧寒也自鸣。
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惊。
风削棱还峻，人跻刃不平。
更寻掊井处，时见白龙行。

莫高窟咏

雪岭干青汉，云楼架碧空。
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
瑞鸟含珠影，灵花吐蕙丛。
洗心游胜境，从此去尘蒙。

贰师泉咏

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
路指三危迥，山连万里枯。
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
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苏。

渥洼池天马咏

渥洼为小海，伊昔献龙媒。
花里牵丝去，云间曳练来。
腾骧走天阙，灭没下章台。
一入重泉底，千金市不回。

阳关戍咏

万里通西域，千秋尚有名。
平沙迷旧路，眢井引前程。
马色无人问，晨鸡吏不听。
遥瞻废关下，昼夜谁复扃？

水精堂咏

阳关临绝漠，中有水精堂。
暗碛铺银地，平沙散玉羊。
体明同夜月，色净含秋霜。
可则弃胡塞，终归还帝乡。

玉女泉咏

用人祭淫水，黍稷信非馨。
西豹追河伯，蛟龙遂隐形。
红妆随洛浦，绿须逐浮萍。
尚有销金冶，何曾玉女灵。

瑟瑟监咏

瑟瑟焦山同步，悠悠采几年。
为珠悬宝髻，作璞间金钿。
色入青霄里，光浮黑碛边。
世人偏重此，谁念楚材贤。

李　庙　咏

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
叱咤雄千古，英威静一方。
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傍。

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贞女台咏

贞白谁家女？孤标坐此台。
青蛾随月转，红粉向花开。
二八无人识，千秋已作灰。
洁身终不嫁，非为乏良媒。

安城祆咏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
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
蘋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
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渑。

墨 池 咏

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
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
舒笺行鸟迹，研墨染鱼缁。
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

半壁树咏

半壁生奇木，盘根到水涯。
高柯笼宿雾，密叶隐朝霞。
二月含青翠，三秋带紫花。
森森神树下，祈赛不应赊。

三攒草咏

池草三攒别，能芳二月春。

绿苔生水嫩，翠色出泥新。
散舞飧花蝶，潜惊触钓鳞。
芳非观不厌，留兴待诗人。

贺拔堂咏

英雄传贺拔，割据王敦煌。
五郡征般匠，千金造寝堂。
绮檐安兽瓦，粉壁架鸿梁。
峻宇称无德，何曾有不亡。

望京门咏

郭门望京处，楼上起重闉。
水北通西域，桥东路入秦。
黄沙吐双喉，白草生三春。
不见中华使，翩翩起虏尘。

相似树咏

两树夹招提，三春引影低。
叶中微有字，阶下已成蹊。
含气同修短，分条德且齐。
不容凡鸟坐，应欲俟鸾栖。

凿壁井咏

尝闻凿壁井，兹水最为灵。
色带三春绿，芳传一味清。
玄言称上善，图录著高名。
德重胜铢两，诸流量且轻。

分流泉咏

地涌澄泉美，环城本自奇。
一源分异派，两道入汤池。
波上青蘋合，洲前翠柳垂。
况逢佳景处，从此遂忘疲。

四、音乐舞蹈

早在南北朝时期，敦煌地区音乐舞蹈就十分盛行，而且形成了中西结合独树一帜的《敦煌乐》。北魏温子升曾赞誉《敦煌乐》曰："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到了唐代，敦煌音乐舞蹈已经发展至较为成熟，对中国音乐舞蹈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敦煌掇琐》抄录的敦煌舞谱，说明唐时期敦煌的民间舞蹈形式已经相当丰富多彩，已经能够用舞蹈动作来表达人们丰富多彩的娱乐情感。敦煌莫高窟洞窟壁画中有很多音乐舞蹈图，其中有龟兹舞、胡旋舞、柘枝舞、琵琶舞、本俗舞等。本俗舞为敦煌民间盛行的舞蹈，其它舞蹈皆为外来音乐舞蹈形式，但大多又经过了加工改造，融进了中国中原文化和敦煌本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敦煌莫高窟洞窟壁画上，本俗舞蹈集中反映了敦煌民间少女舞蹈的形象。她们的舞蹈婀娜多姿，融进了许多佛教经典的思想情感，显得飘逸轻盈，风格柔丽，让人感到天上人间自在身边。伯3994号卷子《菩萨蛮》唱道："霏霏点点回塘雨，双双只只鸳鸯语。灼灼野花香，依依金柳黄。盈盈江上女，两两溪边舞。皎皎绮罗光，轻轻云粉妆。"这首诗把敦煌少女的情怀和在明媚春光中翩翩起舞的情景，描写得维妙维肖、俊美如画。

另外，唐代敦煌地区还有一种在盛大节日、特别的庆典活动中舞蹈的习俗，从伯2506号卷子中《献忠心》词，可见一斑："蓦却多少云水，直至如今。涉历山阻意难任。早晚来到唐国里，朝圣明主。

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香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万岁，献忠心。”这种以歌舞的形式祝愿国家昌盛永存圣上万寿无疆的形式，实际上是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幸福康乐、安居稳定的寄托。敦煌的音乐歌舞从内容到形式，都走向了她在中国古代最辉煌灿烂的时期。

五、吐蕃时期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先后占领河西、陇右，控制并统治了敦煌地区。吐蕃具有较高的文化，松赞干布时仿照梵文(古印度文)创造了文字，结束了吐蕃社会“结绳啮木为约”的历史，保存至今的大量吐蕃时期用吐蕃文字写成的碑铭、木简、文书、经卷等，是研究吐蕃社会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发展增添了光彩。

吐蕃早期时信仰本原，亦称“黑教”，是崇信巫术和鬼神的原始宗教。大约松赞干布时期，佛教由唐王朝和泥婆罗传入到吐蕃，并在吐蕃得到广泛传播。大约8世纪末，佛教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僧侣开始进入政界，出现了“却论”，即僧侣充任的相，这是佛教僧侣在西藏地区掌政之先声。唐蕃和亲，吐蕃从唐获得了锦缯、杂伎、工匠的同时，也获得了唐代先进的文化艺术，如龟兹乐队，精工书写的《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当时称沙州)的佛教空前发展，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中，属于吐蕃时期开凿的就有四十多个。第159、112、360、236等窟，都是吐蕃时期的代表窟。窟中塑像造型准确、生动、精巧细腻、比例适度，且大方美观。例如第159窟南北两侧的菩萨塑像，其神态端庄、慈祥、文静，身躯秀美、典雅，活脱脱再现了“菩萨如宫娃的美姿”。还有当时开凿的第112窟，其壁所绘壁画结构严谨，笔墨精湛练达，线条流畅如云，其中乐伎画像“反弹琵琶”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堪称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上乘之品。

据敦煌遗书的资料显示，吐蕃统治敦煌地区时期，不但壁画雕塑艺术在盛唐壁画雕塑艺术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发展，而且其它相关文化事业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和发展。特别是有僧寺十四所、尼寺五所、僧尼近千人，发展了佛教事业，寺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第四节　唐代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

一、唐代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概述

唐王朝统治的历史长达289年，在敦煌莫高窟开窟最多，和其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政治、经济到达高峰一样，其文化艺术也走向了自己的顶峰时期。莫高窟现存唐代洞窟二百余窟，几乎是全部现存洞的二分之一，且艺术风格变化显著，逐渐走向了石窟艺术的成熟期。前人把唐代敦煌莫高窟时期分为四个阶段：初唐期，内地早已统一，敦煌地区还有五六年的动荡、割据与纷争；盛唐起于神龙年间，迄于建中年间；之后是吐蕃王朝近七十年的统治，一般亦称为中唐期，佛教空前繁荣，形成了莫高窟后期的地方风格；归义军时期进入晚唐，在对中唐文化艺术承继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初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留存至今的石窟有：第57、60、68、71、77、96、202、203、204、205、209、210、211、212、213、220、242、244、280、283、287、321、322、328、329、331、332、333、334、335、338、339、340、341、342、371、372、373、375、381、386、390、392和448窟。其前期石窟在艺术上是隋大业时期石窟艺术的余韵，虽然只经历了公元617－624年的短暂时期，但在艺术史上却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随着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均田制一起来到敦煌，是隋末进入唐初的交接点。随着唐王朝向西域的军事行动，中原长安的

新画风随之而来，但河西和敦煌地区正在恢复时期，又地处西陲，交通不便，敦煌艺术受其影响较缓慢，也较小。贞观十四年唐朝平高昌，对西域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东西交通开始畅通，敦煌莫高窟艺术便迅速地出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风格和面貌。武则天时期，沙州佛事兴盛与武则天本人佞信佛教是分不开的，加之，对西域的用兵也更加频繁，自上而下的佛教与石窟寺发展的基础已经奠定，于是敦煌莫高窟的开窟造像也开始走向自己的高潮时期。随着社会政治力量的强大，经济力量的空前发展，雄伟、壮丽成为艺术家所追求的时代风格，敦煌莫高窟的巨型造像应运而生，群像塑造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公元 705——780 年，唐王朝进入盛期，而西北地区都正值多事之秋。民族关系紧张，军事争战频繁酷烈，唐史、唐文、唐诗及各类唐代册籍中记载反映很多。但敦煌莫高窟此时反映的则是盛唐佛教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和成熟昌盛。当时的将军、都护、军使出征西域时，大都是带着自己的文士、诗人、歌童、舞女、医卜、星相、画匠和织工等各类随军服务的人才的，自然如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光庭、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乐庭瓌当时在莫高窟建窟造像时，一定会有他们从内地带来的匠师们参与绘塑，为此敦煌本地的画工就可以直接地学到内地的新画风和新技法。现存敦煌莫高窟的盛唐洞窟有：第 23、26、28、31、32、33、34、39、41、42、44、45、46、47、48、49、50、51、52、66、74、75、79、80、91、101、103、109、113、115、116、117、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9、130、148、162、164、165、166、170、171、172、175、176、180、182、185、194、199、208、214、215、216、217、218、219、225、264、319、320、323、374、384、387、444、445、446、458、460、482、484 和 490 窟。不同画家工匠，以他们对佛教文化艺术的不同理解，以自己各具特色的画风，画出了自己不同的作品，表明了自己不同的佛教思想观念和佛教文化艺术观念。盛唐的敦煌莫高窟艺术以自己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多样化的

艺术形式，不仅受到当时信众的崇拜和敬仰，也受到今天人们的称赞。至建中元年前后，政治上的盛唐已经不盛，对沙州的统治权岌岌可危，但石窟佛教文化艺术却愈趋成熟，中原京洛地区的不同画派的艺术风格及其艺术成就在敦煌莫高窟均有其自身的演变发展。

敦煌莫高窟的中唐时期，是吐蕃王朝统治敦煌的时期。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从建中二年，其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状况有了逐步的改变。虽然当时先有敦煌的十年守城抗战，后有驿户的多次起义反抗，但吐蕃赞普多次赦免了敦煌这一“获罪之邑”与佛教圣地。同时，吐蕃贵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利用沙州世家豪族统治敦煌，大兴佛事，广度僧尼，并派吐蕃大德僧管理佛教事务参与政事。到吐蕃统治后期，更将敦煌地方的部分政权、军权和地方税收管理权一并交给了敦煌世家豪族，从而使吐蕃政权维持了稳定和较为巩固的局面，佛教文化艺术事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期，敦煌地区在吐蕃赞普可黎可足治理下，正是佛教最为兴盛之时，寺院增多，寺院经济空前发展，莫高窟修造洞窟大量增加。敦煌文物研究所重新判定的吐蕃时代石窟有：第 21、92、93、112、133、134、135、153、154、155、157、158、159、179、186、188、191、197、200、201、202、222、231、236、237、238、240、258、357、358、359、360、361、365、369、370、447、469、471、472、474、475、478 和 479 窟。这些洞窟对后来晚唐、五代、宋和西夏的继续修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莫高窟吐蕃（中唐）时期艺术和盛唐时期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但其窟型、龛型和壁画内容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每窟内经变画的数量增多，有些洞窟内一壁上绘画有多铺经变。同时，吐蕃时代洞窟在制作上更加考究，覆斗形窟顶，方整的四壁，盝顶帐形龛及佛床、壸门，无不严整、精巧。一壁之上不仅绘有二至四铺经变，而且在壁画下面还绘画了十二至十四扇屏风。各屏风内所绘画各品比喻故事，其内容细节又与上方经变

画中盛大的法会场面相结合，精致细腻的艺术效果跃然全壁，满目生辉。这一时期壁画塑像笔墨精湛，线描造型准确、生动，以其结构谨严、刻画精微取优，是唐代艺术向深度探索所显示的卓越成就。这是敦煌艺术发展道路近五百年漫长经验和不断探索的必然结果。

晚唐时期半个多世纪里，给敦煌莫高窟留下了约六十余个石窟：第8、9、10、12、13、14、16、17、18、19、20、24、54、82、85、94、102、104、105、106、107、111、114、127、128、132、139、141、144、145、147、150、156、160、161、163、167、168、173、177、181、183、184、190、192、193、195、196、198、221、227、232、241、336、337、343、459、470和473窟。

张议潮率领敦煌民众驱逐吐蕃，收复河西故地，从陇西经河西及敦煌地区到北庭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各族人民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其不同的战功，张氏、索氏、李氏等世家豪族都等级有差地获得勋位，共同执掌着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政治统治权。他们本来是吐蕃统治管辖时期政治、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此时则致力于保护和扩大世家豪族与各大寺院的利益；他们脱掉了吐蕃部落使的长袖袍，佩上了唐朝的“银青光禄大夫”的鱼袋。这一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无重大的改变，主要是世家豪族纷纷以“报恩”、“庆寺”的名义营造的洞窟，是吐蕃时期的继续。但也出现了个别的新题材和新形式。特别是张氏、李氏、索氏三姓与三个僧统在莫高窟所开的规模宏大的大窟，反映了敦煌及河西地区与中原联系比吐蕃时期的加强和进一步发展。

二、唐代敦煌莫高窟建筑艺术

跨越魏、隋两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灿烂辉煌的唐代艺术。它以雄伟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强烈地吸引着我们，显示出这个时代不平凡的开端。莫高窟的艺术到了唐代，算是达到了

顶峰，这是无数艺术家殚精竭虑辛勤创造的成果。

唐代洞窟遗存至今还有二百多窟，数量占全部现存洞窟数的近二分之一。随着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敦煌莫高窟唐代的洞窟开凿继续沿隋代向南北两端和下层发展，到了唐末，崖面的长度已经达到今天的规模。

唐代的洞窟形制，还是沿用覆斗式的窟形，这种窟形在莫高窟中是最多的一种。佛龛加深加大，成为一间颇为宽敞的房子。塑像都被安置在后室的佛龛中。窟顶覆斗形中有四方藻井。有些是平顶，也有作浅斗形。这都是一般的样式。

除了以上的这些建窟形式，还有一些特殊的洞窟，如大佛窟、涅槃窟，都是唐代根据造像规模和造像体态而开窟建造的。第 96 窟就是根据所容纳的巨大坐佛开凿的一个具有高耸的空间的洞窟，窟平面为方形，窟身为方锥形，窟顶为覆斗形。为了窟内的光线和供人们就近瞻仰大佛的面容和身体，在大佛的正面留有小门和几处明窗，还有可供攀登的通道。因窟内坐佛高 34.3 米，所以经过历代维修扩建成为现在的九层楼，也成为当今室内第一大佛。虽经后人多次拙劣的装修，但伟大的气魄仍旧存在。

第 130 窟的坐像高 26 米，是莫高窟第二大坐佛，它也用了第 96 窟的做法，外面凿通了三层崖壁，才算把它隐蔽起来。

第 158 窟的大卧佛，是莫高窟第一大卧佛。此窟平面为横长方形，窟顶为横长方盝形顶，整个洞窟像一具巨大的棺材。

各窟间的交通，在初期大概仍是由前室凿出通路，唐末由于前室崩坏，才加木构窟檐和廊道。窟檐和廊道大都为单层建筑，结构简单，因上面盛饰彩画，便显得十分华丽复杂。石窟和木构建筑结合，是我国先代劳动人民一项重要的创造，它丰富了中国建筑艺术。现保存完好的唐末窟檐，至今尚存一处，在第 196 窟外。檐顶虽已坍坏，但梁枋栱柱尚存，彩画如新，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的建筑画艺术在初唐时，处在发展、创新、变革的

阶段。到了盛唐，建筑画达到了顶峰时期，已经不是单调、简单的建筑画了，出现了大型经变群体画，在经变画中，出现了群体建筑。把殿堂楼阁用透视的手法画出，表现出了建筑的体积和纵横空间，具有了真实感。壁画中的佛陀、菩萨、天人等都被安置在建筑物的前面和建筑物中间，画面中还表现了极乐世界的盛况，天上有飞天撒花，池内碧水中有鸳鸯、妙音等在水中游戏。有舞伎、乐伎，有天宫楼阁，有高耸的钟楼、鼓楼、佛塔。把人们融于景物之中，是一幅集人物、景物的精美艺术画。

第 329 窟，是初唐时期的代表作品。南壁与北壁都是通壁画。其主要内容宣传西方教主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美妙、快乐。《西方净土变》、《弥勒经变》的壁画中还有部分欠缺，但是，仍然是唐代壁画的杰作。因为初唐时期是变革、创新的时期。到了盛唐，莫高窟的建筑画走向鼎盛时期和成熟时期。从盛唐第 217、148 窟中可以看出，建筑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 217 窟北壁通壁画巨幅《观无量寿经变》是大乘佛教净土三经之一。在《西方净土变》的两侧新增加了条幅画，又把经变画分为三大部分。自上而下分别是殿堂、楼阁、竖楼式木台、方亭，形成了有组织的建筑群。但是，建筑物过于密集，给人在视觉中产生不真实感。第 172 窟是盛唐中期的代表洞窟之一，它与 217 窟的建筑画相比，已有很大的区别，建筑物已不过于密集，平面布局已按照真实的佛寺来设计。第 148 窟是盛唐之末修建的，也是规模大、艺术水平高的一个洞窟，它有着 40 平方米面积的大型经变画。虽然此时李唐王朝与吐蕃王朝正在激烈争夺河西，但就在这战火之中，古代匠师们留下了这艺术高超的洞窟建筑和宏伟建筑画。

到了中唐以后，莫高窟的建筑画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开始趋于程式化。大型经变画也不复存在，画面缩小，画幅增多。这一时期的建筑画完整地显示了庭院布局。第 361 窟就是中唐时期的洞窟，它的北壁中的《药师经变》东方净土世界的建筑就是完整的

一个寺院，它的南壁《阿弥陀经变》西方净土世界的建筑也是一座完整寺院。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建筑画不仅仅反映了极乐世界的亭台、楼阁、寺院，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间建筑的风貌。晚唐第85窟的《华法经变》的佛经故事中，就画有二进式四合院，现在北京地区还遗存这种院子。在壁画中还有大量反映古代人民在建筑中施工的场面，有用简单力学原理吊运材料的，有为建筑筹备木料的，有伐木的。在第296、321、372、98等窟中，都绘画有这种建筑施工的场面。

三、唐代敦煌莫高窟彩塑艺术

敦煌莫高窟彩塑经过从早期塑制到隋代几百年的实践积累，到唐初已经从最初的早期、中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代的彩塑大放光彩。同时，唐代遗存的彩塑的数量也比较多，共有六百多身，其中有半数保存了原型。

莫高窟唐代初期的塑像，克服了隋代比例不对称的毛病，更接近于现实，已特别注意刻划人物性格心理，自然佛和菩萨都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古代匠师们在塑造佛和菩萨的形象时，仿照真实的人物性格捏塑，给予它们以人的思想感情，使观者精神与之相通，激起其虔敬与亲切之感。

第205窟是初唐的洞窟，有一尊断臂菩萨像，上身裸露，项饰链珠，胸饰璎珞，胸部丰满，腹部微鼓，体态纤巧，通身富有弹性，姿态雅典，庄重大方，给人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青春健美形象。无论从她的体态、面部表情，还是服饰上看，都表现出一种安祥、自信，和她得体的服饰的真实感。虽然她的面部和双肩都已残损，可是人们还是给她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莫高窟的“维纳斯”。

这个时代的佛像，面相温和、慈祥、庄严镇定。大多盘膝端坐，手势作说法、思维或召唤的姿态。襞衣的襞褶流利如绘画的线描，

但同时又准确地透露出内部丰润的肉体，合乎人体的结构。显示了古代艺术家的才能。

盛唐第 328 窟中的释迦牟尼像，已经完全中国人化了。身穿通肩彩袈裟，左手抚膝，右手平举，掌心向外，结跏趺坐，作说法姿态。肉髻高耸，螺发油黑，鹅蛋脸形，眉毛弯弯，细长的眼睛，方正的鼻子，果决的嘴角，挺直的躯体，威严而端庄。他的形象，不像一位身穿袈裟的佛，而更像一位雄才大略的中国帝王。所以说，他是一个完全中国化、十分完美的释迦牟尼造像。

唐代时期敦煌彩塑菩萨的造型有了很大的变化。菩萨的姿态也多种多样，有立式菩萨、坐式菩萨、跪式菩萨。这些菩萨像，都如袒胸露臂的美丽女性，妥贴地表现了肌肤的细腻润泽。她们的身段纤巧，气质娴雅，眉眼修长，从眼神里看出智慧、温柔。小小的嘴，唇角带着微笑，好像在聆听着人们的祈求。因这一时期的社会比较稳定，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敦煌莫高窟彩塑艺术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艺术匠师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大胆以贵妇、宫娃为模特，塑造了富有社会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形象。

第 194 窟有一组九身彩塑，其中南侧的立式菩萨更为楚楚动人。人物造型丰满圆润，头梳垂双鬟髻，长眉连鬓，两目低垂，嘴角深陷，面颊丰腴。身穿圆领无袖上衣，衣裙上彩绘花朵。脚踩在圆形莲台上，具有雍容华贵的风度。使人在欣赏她的时候，已不把她作为一尊菩萨，而把她看作是一位唐代皇亲贵族的美丽少妇。

第 328 窟有盛唐的跪式菩萨。身穿锦裙，袒露上身，项坠璎珞，臂饰环钏，肩披天衣，胡跪莲台上。胡跪，是菩萨的一种跪式。整体造型朴素含蓄，没有造作之感。还有一尊，只是神情相异，显得得沉静寡言。

第 328 窟两身游戏坐菩萨是盛唐精美佳作之一。游戏坐是地位较高的菩萨一种坐式。一腿盘坐莲台，一腿自然下垂。赤裸上身，斜披天衣，云髻高耸，粉面朱唇，仪容典雅，神情洒脱，肌肤丰润，璎

珞饰胸。精美的衣裙自然下垂。一手放在腿上，一手平举胸前，仿佛在给信徒们宣讲佛国的“极乐净土”。

南侧的菩萨与北侧的菩萨大致相同，一手抚在盘腿上，一手举过肩，手指屈为环形，表情略有不同，双目微敛，细眉横展，表情沉静，安详自如，好像在思想什么问题。

从菩萨的形体、姿态、相貌上看，既具有男性的体魄，又体现了女性的温柔美丽。嘴角和嘴唇下的三绺蝌蚪形的小胡子，真正体现了佛国的菩萨“非男非女”。

在罗汉的制作上，古代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家又表现了刻画人类性格的卓绝技巧。天真无邪的迦叶，世故深沉的阿难，还有更吸引我们的是天王、力士，他们集中表现了男性的刚毅，和菩萨女性的优美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古代武士威严、勇猛、正直、坚毅的性格，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肌肉的凸起，关节的强调，青筋的暴露，给人一种迸发力量的显示。这充分表现了古代艺术匠师创造出来的不朽生命，他们虽不过是涂了色的泥土，但却使人满目生辉。

在隋代我们已介绍了少年阿难和老年迦叶，在唐代第45窟中则塑造了青年时期的阿难和中年时期的迦叶。青年阿难在造型和神态上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他双手相握，自然抄在腹前，胯部向左扭摆，躯体稍向右倾，面部表情自然，举止大方，身穿花边绣纹裙襦，上身披红色袈裟，颇有一副踌躇满志和漫不经心的神态。如果不是剃度，真是一位豪族的风流才子。

左边的迦叶则显现出是一位老成持重、具有权威气派的沉着老练又特别有自信心的高僧形象。他身穿花边绣纹裙襦，上披绿色田相袈裟，一手平举，一手上举向外，像是对人宣讲佛法。这身佛像着重突出了他的头部，脸形略长，突额大耳，颧骨高出，嘴唇敦厚。微带讥讽的嘴角，显示出自信和其雄辩的口才。在头额下还有两道浓眉，从紧锁的眉头显出成熟的思索。

古代的匠师们以娴熟的技巧，把这两位佛的忠实弟子塑造成

了有情有欲、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像。

第 45、46 窟都是莫高窟盛唐的洞窟。在佛像南北两侧各塑造一身天王像，也是塑造最完好的天王像之一。他们身穿涂金铠甲，两眼怒视，张口大吼，一手挥拳，一手叉腰，以稳健的半弓长步踩踏在挣扎的地鬼身上。其身躯魁伟，气势威武，表现出了唐代武将的豪放气概。

第 427、194 窟中的金刚力士像，在造型艺术术也是独具风格的杰作。

地鬼是破坏佛国安宁的捣乱分子，天王镇压的对象。古代艺术匠师们凭着自己的观察力、想象力，生动地把地鬼塑造成鼓目锁眉、龇牙咧嘴、披头散发、眼球突出的怪物形象。在天王的脚下，摆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堪忍受的动作、姿态和表情，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烘托了天王降伏一切妖魔鬼怪的雄伟气势。

现保存最完好的彩塑群像盛唐第 45 窟。原有塑像九身，现还保存原貌七身，在敦煌莫高窟千余身塑像中，它就算精品了。无论从人物性格、表情、姿态上来说，还是从形式、内容上来说，都是唐代风格的典型代表。他们既彼此间相互呼应，又与洞窟壁画相互呼应，充分体现了古代艺术匠师们精湛的艺术才华。

肖像塑造艺术又是莫高窟雕塑中的一种形式，它以真人为模特进行雕塑。唐代的肖像原作，已保存不多。在莫高窟 16 窟中有高僧洪䛒的彩塑是原作。

莫高窟唐代塑像在塑刻艺术上已达到高超的技艺，在几千身彩塑中，能工巧匠们凭着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塑绘技巧，把屈指可数的几个主要人物塑造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形象逼真的彩塑。

在同一时期，还依岩崖营造巨型大佛。第 96 窟(俗称大佛殿)有高 34.5 的大佛，是居室内泥塑第一大佛(四川乐山大佛为石刻)，由于大佛的"石胎"与崖相连，所以，它基础牢固，经过多次的维修，基本上保持了原样，现在大佛已有 1300 余岁。窟檐九层，层

层都有鲜艳的飞檐，飞檐下是土红的大柱和栏杆。下七层依山靠岩而建，上两层是上翘的星状的顶盖，保护着弥勒头像。

莫高窟的第二大佛，是第130窟中的南大像。高26米，也是一身弥勒像。其面颊丰腴，神情庄静。此大佛塑法与北大佛一样，先在石崖上刻出石胎，然后用草泥塑出形貌，最后绘彩。它的坐姿和北大像一样，双腿下垂，两脚着地，左手抚膝，轻柔自然。在腿上置经书，右手施无畏印，肘倚在经书上。佛头微俯，双眼微合下视，略含笑意，神情庄重慈祥。与仰视者的目光相接，神人感应，增加了宗教的感染作用。

南大像基本保持了唐代原貌。

除了坐姿的两身大佛以外，现还有两座唐代建造的涅槃窟，即148窟和158窟。

所谓“涅槃”，就是说修真悟道，成无上正觉，灵魂得以脱离肉体，解脱了生老病死和轮回之苦，进入了不生不灭的境界而永存极乐的意思。佛教传说人生最苦，涅槃最乐。

第158窟的涅槃像，长16米，枕右手侧身而卧，比例适度，姿态自然，似睡非睡，心境恬静，出神入化地刻划出释迦牟尼涅槃，安详自信、泰然而往的形象，与四周充满哀悼的壁画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佛的弟子们和各国王子们中间，修行功德圆满，果位很高的神态自然，心境平静，而果位不高的尚未脱离尘俗情思，以为佛陀真的死了，就嚎啕大哭，击头捶胸，切鼻、割耳、穿胸、刺腹，痛不欲生，表现了世俗的柔子之情。佛床下还有奏乐跳舞、翻筋斗者，他们都是佛的反对派，以为佛是真的死了。当然，佛教徒不是真的表现他们高兴，而是讽刺他们愚昧无知。这尊优美的巨型卧佛，体现了佛教只有美的身体，才能主载美的心灵。这身卧佛像基本保持原貌，它和130窟的大佛像一样，都是最可贵的雕塑遗产。

第148窟的涅槃像，同159窟的卧佛是一样的，整个洞窟像是一具巨大的棺材，佛像即卧于塌上，身长14.4米、肩宽3米。大卧

佛的身后和头前足后，塑有佛弟子、天人、各国王子、菩萨等举哀塑像 73 身。这尊佛像体态优美，神情如睡梦一般安详宁静。由于经过几个朝代的重修、重绘，已失去了唐代原貌，从躯体的姿态看，远不如第一卧佛女性化的处理，而男性化的成份居多。

进入晚唐，敦煌彩塑艺术总的趋向是逐渐衰退。多数塑造技法已失去活力，再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经济的萧条衰退，艺术家们再没有以前的那种充足优越的物质条件来保证，使其发挥艺术的创造力。所以，此时的彩塑作品就稍缺乏内在的生命力。由于当时当地的世家大族在敦煌社会中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纷纷以“庆神”和“报恩”的形式，在莫高窟开凿了许多洞窟。为此，这一时期的洞窟大都是巨型大洞窟，但佛坛上的塑像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已所剩无几。

四、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

1、佛像画（尊像画）

唐代人们对菩萨信仰的普遍致使艺术家对制作菩萨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菩萨像画的都很高大，很细致，菩萨像不再是群像，而单身菩萨像大为盛行起来。菩萨及其属性和形象都最接近于现实世界的人。所以，古代的艺术匠师们给菩萨装束都作俗装，顶梳高髻，头戴宝冠，胸前杂饰珠串璎珞，臂腕佩带环钏；天衣飘举，长裙覆足，披帛从肩上一直垂搭地面；袒胸露臂，面相丰满端丽，身体比例匀称健美。有些洞窟的菩萨虽然嘴角画着小髭，但给人的印象仍旧是女性，而且是典型的唐代贵族妇女，只是服饰上有所区别而已。

世俗社会中充满了苦难和烦恼，人们信仰阿弥陀佛，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更受到人们的信仰。因为菩萨似乎总是大慈大悲，更能够解脱众生的苦难与烦恼。

唐时期所绘画的观音菩萨，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古代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且对人物的个性表现和心理刻画独具一格。

初唐第 57 窟的观音像最为优美，体态婀娜，神态略显沉思，头部微斜，脸为蛋形，细眉长眼，鼻直唇小，全身上下，珠光宝气，一手举颏下，一手下垂身后，赤足踩大莲花。这身菩萨画像是最精美的佳作之一。

大势至作为阿弥陀佛的右侍菩萨，与观音菩萨的形象十分相似，但手持物不同，观世音头戴化佛冠，大势至头戴宝瓶冠。第 217 窟是初唐后期的一个洞窟，此窟中的大势至菩萨体态匀称，面相丰圆，修眉细眼，浑身上下珠光宝气，遍体罗绮，双目下视，神态庄严。虽然嘴边有小胡子，但是，仍然显露女性的温雅特征。

在盛唐出现了许多单独观音菩萨画像。

在第 205 窟中，高大观音头戴宝冠，系长裙，披巾带，亭亭玉立在大莲花上。在观音的右下方，还画有一供养人，通过目光对视和一串念珠，把神和人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幅画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第 320 窟的观音菩萨保存完好，观音身材修长，一手垂净瓶，一手扬举柳枝，头有圆光，戴化佛冠，裸露上身，肩披罗巾，腰系长裙，佩带项链、璎珞、臂钏、手镯、流苏、环佩，衣饰华丽，面目清秀，唇边有绿色蝌蚪小胡子。目视前方，神情专注，赤足站在大莲花上。

到中唐时，由于敦煌地区被吐蕃统治者占领，壁画中的胁侍菩萨已无唐代前期那样姿态潇洒庄严，其衣饰虽依旧鲜艳富丽，但神情变的沉静和善，淡彩素雅。在第 199 窟中就有一幅大势至菩萨是中唐补画的。

第 196 窟是晚唐保存完好的洞窟之一。莫高窟壁画晚唐时出现屏风画，在 196 窟南壁经变画下方绘有一排菩萨，其中东起第一身，作侧面像，保存最为完好。面目虽有点模糊，但造型十分优美。

一手托举莲花，一手下握巾带，腰系石榴长裙，脚踩两朵莲，侧面背向，徐步前行，四周香花飞落，既是一身端庄秀丽菩萨，又似一位正在表演歌舞、快乐青春的女伎。

在初唐早期第322窟和初唐晚期第328窟中，绘画有初唐时期莫高窟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图。

图中央画大小人物九身，其人物造型真实，服饰朴素，概括简练，线描轻快流畅，色彩简单清丽。人物形象健美、丰润的同时，还有一特点，就是人佛相交。佛陀身着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佛陀身边各有一弟子，一胁侍菩萨坐在莲座听佛陀说法，在佛陀莲台的两边各有两身很小的供养人，向佛胡跪供养。这又是初唐画师的创新，把佛的形象凌架于凡人之上，是宗教思想对人们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

第328窟的说法图场面宏大，色彩比较艳丽，人物众多，有佛陀、弟子、菩萨共23身。它也有两大特点：其一，人物造型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菩萨形象，身材修长匀称，身穿彩色长裙，脸为鹅蛋脸形，眉毛弯弯，樱桃小口。已具盛唐的风格。其二，释迦牟尼的宝座，已不是从前的形式，而是传自西域和印度的一种新式样式。

第205窟的释迦牟尼转法轮说法图因在高处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保存完好。释迦牟尼佛居中，身着红色右袒袈裟，结跏趺坐于高莲台上，手结“转法轮印”，额间白毫发光，头顶上高悬华盖，两边有前来听法的三身小化佛。佛陀两侧各有两身脚踩莲花的胁侍菩萨侍立。佛陀莲台两侧各有一身护法金刚力士。佛陀莲台前面，两身胡跪供养菩萨分居东西。

205窟还有三幅阿弥陀说法图。因阿弥说法图都画在《西方净土变》中，而作为单独说法图较少。图中画一佛二菩萨，三身画像等高，都脚踩莲花伫立。阿弥陀佛居中，头悬华盖，身披通肩袈裟，手作“施无畏印”和“与愿印”，左边是头戴三珠冠、身披团花袈裟的大势至菩萨。身披袈裟的菩萨在敦煌壁画中还很少见。这两幅说法

图都保存完好，人物画像都比较完整，色彩艳丽夺目，充分显示了唐代风格。

药师佛说法图也是尊像画一种，在壁画中还出现了不少药师佛，药师佛曾发誓，要破除人间的不幸与苦难，消除人间的病痛与灾祸。而人世间缺医少药和苦难病痛又太多太多，人们就把解除苦难与病痛的希望寄托在药师佛的身上。

第322窟是初唐的洞窟，在洞窟东壁南侧，就保存一完整药师说法图。图中药师佛垂伸右手，手掌向外，以食指与大拇指夹一药丸，一手持钖仗，一手托药，束高发髻，着红色通肩袈裟，双脚踩莲花，药师佛头上高悬花盖，飘落悬花。同时，有月日二菩萨在两侧，一菩萨手持莲花表示迎接民众，一菩萨手持药丸救度众生。

第45窟是唐时期的另一个二佛说法图。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并做说法图。在二佛两侧各有11身听法菩萨，每位菩萨都是珠光宝气，头有五彩光环，华贵无比。

2、本生故事画

唐代的壁画以经变为主，本生故事和佛传也算是经变的一种。在唐代，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也用新的方式出现，中部是巨幅极乐世界说法图，两侧为立轴式连环画，一般是“未生怨”和“十六观”，这是经文中“序分六缘”阿阇世太子幽闭父王的故事。

王舍城国王频沙王年老没有太子，到处求神都不能得。请相师算了一卦，说山中有一修道的人，三年后命终，即来投生作太子。国王听了很高兴，但又一想，自己这么大的岁数了，国家后继无人，三年哪等得了。便派人进山断了道人的粮食，让道人饿死。果然，道人不久就死了，却投生作了白兔。频沙王求子心切，派人追捕白兔，叫锻师作铁钉，钉在兔子的四足和口鼻，兔子被钉死了。王后怀孕了，于是频沙王有了太子，取名阿阇世。

太子长大了，有一天出城游览，受调达调唆，把父王捉来，幽闭在狱中，断他粮饷。王后韦提希夫人惶急万分，把炒面和蜂蜜涂在

身上，买通守卒，偷偷前去探视，用刀子把身上的食物刮下来给国王吃。国王多日不死，阿阇世太子知道王后所为，大怒，把王后也幽闭起来，并叫锻师来作铁钉，阿阇王也像钉白兔一样把父王钉死。这是宣传佛教思想中的因果报应的。

“十六观”是被幽闭的韦提希夫人，受佛的启示，作种种沉思默想。如日想观，就是对太阳来默想，水想观，就是对水来默想。其他地想观、树想观、宝池观、宝楼观、华座观、像想观、真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想观、杂想观、上辈生想观、中辈生想观、下辈生想观等均可以类推。

3、经变故事画

莫高窟遗留唐代报恩经变有几十壁，它的结构和西方净土变没有什么不同。唐以来，连环画式的佛经故事逐渐消失，《报恩经变》成了莫高窟绘制故事画最多的经变。

表现最多的是“论议品”与“恶友品”，因为这两个故事非常美丽动人。《鹿母夫人生莲花》就是其中之一。

在波罗奈国离城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风光宜人的山。因为常常有仙人到山上游居，人们又叫它“圣所游居”的山。这山上住着两位修道人。山谷中有一条清澈的泉水，自东而西涓涓流过。住在北岸的叫北窟仙人，住在南岸的叫南窟仙人。有一天，南窟仙人在泉边洗衣，洗完衣服就在泉边小解，刚好有一头母鹿经过泉边，饮了这泉水，便怀了孕。等到月满要生产了，母鹿按照自己的习性，回到受孕的地方来生。于是，母鹿来到泉边，宛转哀鸣，幼子终于出世了。母鹿睁开双眼，它惊喜地看到，这只生命不是鹿，而是一个清秀俊美的女婴。

母鹿的悲鸣引起南窟道人的怜悯，便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母鹿等仙人来到近前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自己亲生的幼女。道人从地上抱起孩子，看他容貌端正，人相俱全，只是两脚是鹿脚。心里非常欣喜怜爱，用草衣包裹，抱回住处，采众妙鲜果来喂养她。

这个母鹿所生的女孩渐渐长大，出落得十分端庄美丽，鹿女以山泉作乳，以野果为食。她的父亲南窟道人非常钟爱她，为了防止不测，从不让她外出一步。为了使她免受寒冷，居窟的火堆从不熄灭。可是，有一天偶然不慎火熄灭了，父亲无奈，只好让女儿到北窟道人处乞求火种。

鹿女遵从父亲的旨意，怀着好奇的心情第一次离开家门。突然，奇迹出现了，她每走一步，所践踏的地面上就涌现出一朵莲花。她一步一步地走到北窟，一朵朵的莲花就升起留在她的身后。

北窟道人看到鹿女步步生莲的奇迹，就说若要得火，须从右边绕我窟七周。鹿女为了求得火种，就依言绕窟七周，举足之处，皆生莲花。然而北窟道人没有依诺言给火，却又说："若要得火，还须从左边绕我窟七周。"鹿女无奈，只好又依言绕窟七周，这才取得了火种，回到南窟。

有一天，梵豫王上山打猎，看见一朵朵的莲花，十分惊奇。他想：此地可能住着一位神仙，所以，才有这样的奇景。他就循着莲花，找到南窟，发现了这个长着鹿脚的美丽少女，心生爱念，便向她求婚，娶作王妃，十分宠爱。

国王爱上鹿女很快使其他王妃不快，更因相师占卦，说她有孕，将生千子，那些王妃越发嫉妒她。到了足月，鹿女果然分娩，生了一朵莲花。吓得国王赶紧派人把莲花丢弃，让她别宫居住。

有一天，国王与群臣来到花园解闷，有一大力士献技，一跺脚，把水池边的一个花盆震得掉进池里，花盆里的莲花也掉落水中。突然，掉在水池里的莲花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在五百片的莲瓣上，坐着五百个孩子。国王猛然想到鹿母，急忙询问内侍："鹿母所生莲花丢在什么地方？""就放在刚才那个花盆下面。"国王明白了，这朵莲花中的五百个男孩，正是鹿母所生，所以国王跑进后宫，立即向鹿母忏悔赔情，恢复鹿母第一夫人的称号。

为了庆贺太子的降临，国王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典。经过十多年

的抚养，五百太子长大成人，一个个变的威武英俊，力大无穷，一切外来敌人，都由太子前往抵御。从此，国家国土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报恩经变另一内容"恶友品"，故事亦很动人。是说波罗奈国国王有两个太子，善友与恶友，他们的为人正如其名，一善一恶。善友太子好施舍，将国家宝库所存的金银珍珠，都已施舍完毕。为了满足众生，他决意驾船入海寻求宝物，随从有五百人，其中有一熟知道路的盲目导师。恶友太子心怀嫉妒，也要求同去。到了珍宝山岛，大家上岸采取了许多珍宝，五百人和怕吃苦的恶友先回去了，只剩善友和盲导师继续前行。经过十分艰苦的旅程，导师体弱不支，中途死去，意志坚强的善友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善友在此取得了摩尼宝珠，在回国的途中遇见弟弟恶友，才知船在归途中沉没，同伴都已死尽，只有他得以幸存。善友便安慰弟弟说："虽然人和宝物都已失去，但我已从龙宫中取得了摩尼宝珠，所以，任何愿望都可以实现。"恶友听了以后，顿生贪欲之心，等善友睡熟之后，用枝干上的竹刺，刺瞎了善友的眼睛，夺走了宝珠。

恶友回国以后，就在父母眼前编造了一套谎言，说善友已经淹死，我自己因有福德，才能取珠生还。父母因疼爱善友，特别悲伤，便骂恶友。恶友讨了没趣，便把宝珠埋进了土里。

瞎了眼的善友并没有死，醒来之后，忍痛前行，来到了利师跋国，被好心人收留。他要求收留他的人制一个筝，去卖艺过活，善友本来就是一个弹筝好手，很快出了名。利师跋国王有一座果园，因只有一个守园人，常有鸟雀啄食，守园人就把善友找来，帮他防护。善友说："我已双目失明，怎么能帮你驱除鸟雀呢？"守园人说："不要紧，我在树上系铜铃，你在树下牵着绳子，一听到鸟雀声你就拉铃，鸟雀自然惊走。"善友就答应了，便在果园住了下来，有鸟雀就拉铃，没有鸟雀就弹筝。

利师跋国王有一公主，从小许配给善友，不过两人从来没见过

面。这一天公主来游园，见盲人弹筝，音乐美妙，一见钟情，便不顾父王反对，嫁给了他。公主并不知道盲人就是自己的未婚夫善友太子。

结婚以后，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公主因事外出时久，善友责备她。公主感到很委屈，就发誓说："我若有丑行，就让你双目永盲，如若不然，让你一目平复如故！"说完，善友一目蠕动，忽然睁开，视力平复。公主说："你这人太没良心，我尽心奉候你，还得不到你信任！"善友说："错了，错了，我是波罗奈国善友太子，本是你的未婚夫。"公主却说："你是一个弹筝的叫化子！"善友就赌咒说："我平生从未妄言，如果我欺骗你，就让我一目永盲；否则就让我那一目平复如故！"说完果然如他所誓，那一目也复明了，善友不再是盲人了。

善友太子未入海前，曾畜养了一只白雁。这天白雁降落在善友面前，悲鸣欢喜，雁颈上系着一封信，原来是王后派来寻找善友的。

善友看信以后，知道父母思念他，都哭瞎了眼睛。他立即写了回信，说明了一切，把信系在雁颈上，白雁欢欢喜喜地飞回去了。

父母接到信以后，又喜又恼，便把恶友关进狱中，又派人把善友夫妇接回国。善友见了父母，知道把恶友下到狱中，一再为他求情，国王才放了恶友，让他交出埋在地里的摩尼宝珠。

善友拿到自己千辛万苦取得的宝珠，就焚香顶礼，供上宝珠说："如意宝珠，请你让我父母双目复明！"刚一说完，国王、王后的眼眼果然亮了，善友又让宝珠遍降甘米、名衣、金银等七宝和众妙伎乐等，普济众生。

4、经变画

唐代的敦煌，是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统治的巩固，而进入她的文化艺术繁荣期的。其时，莫高窟壁画艺术领域里的成就十分突出，达到了自己的极盛时期。唐代的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经变画已占有主导地位。四壁都是巨幅的经变，汇成一片经变的汪洋，其

他一切都退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去了。

所谓“经变”，就是佛经的“变相”或“变现”，也就是把经文的故事变为图像。这一时期的绘画技能和卓越的创造才能，显示了我国古代画师卓越的艺术成就，佛像庄严仁慈，神情恬静，姿态安然；菩萨娟秀雅致，温顺虔诚；天上的仙人圣者俊秀丰腴，神情各异；观音菩萨面相丰满，体态健美，珠宝满身，遍体绫罗，曲眉丰颊，丰肌秀骨，意态温婉，眉目传情，表现了大慈大悲的形象。飞天造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线描流畅，色彩艳丽，造型优美，姿态表现轻松愉快，裙带飘逸，神情悠然，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唐代文化艺术进入高度发展的新时期，融合了西域兄弟民族艺术和外来艺术的表现技法。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是敦煌佛教艺术最为灿烂的时代。

在一幅经变中当然不可能仔细交代这许多内容，尤其有些报恩经变，表现好几品，便不能不把故事压缩到最大限度，只选取其中几个关键性的和典型的场面。这种抒情的优美小品，在许多经变中都可以找到。这些经变四周的故事画是最富于现实生活气息的，因为它通过佛经故事，直接描绘了人世间的生活。

除了以上报恩经变以外，画的最多的是维摩变。维摩变共有十四品，但壁画中表现了九品。

唐代壁画上的维摩诘居士，须眉奋张，目光如炬，手挥麈尾，投身向前，活生生地刻划出这个智慧过人、不甘寂寞的老人在激辩时的兴奋热烈的情绪，与文殊师利的冷静安详形成强烈的对照。文殊是受如来派遣从毗耶离城前来问疾的。文殊在诸大菩萨中智慧辩才第一，所以被派遣充当了这个使者。画面上的维摩装着生病，吸引人们和他论道。文殊一来，问答就开始了。当维摩与文殊往复激辩的时候，天女示现，散花于空中。

初唐第220窟是《维摩诘经变》形式绘制最多、历经时代最长的构图形式之一。而130窟中的《维摩诘经变》是保存最完好的。第332窟的《维摩诘经变》是莫高窟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洞窟

经变画之一，在北壁通壁画着八品对称的《维摩诘经变》画 。

5、供养人画像

供养人就是那些出钱修窟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像画在墙壁上，表示这窟内的佛和菩萨都是他们所供养的，是他们的功德。

供养人的位置，大都绘在甬道两侧和经变下方，行列整齐，尊者在先。而且总要画得大些，有的身后并有侍从人物。愈排在后面的愈小，又有男女区别。表现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

唐第 130 窟乐庭瓌夫妇供养像就是八九尺高的大像，一般都是和真人等身大小。无论主人还是奴婢，都具有曲眉丰颊、丰肌腻体的特征。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各不相同，主人们雍容华贵，手持香炉或鲜花，表现出虔诚的心态；奴婢们有的捧琴，有的捧花，有的捧水瓶，有的左顾右盼，与主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

唐时期供养人的服饰也大不相同，初期仍和隋代一样，男的是窄袖短袍，女的是细腰长裙。但是到唐中期，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时无论男女都面相丰满，身体健美，衣裙都是丝质的，上面有华丽的花纹，颜色非常鲜艳。男供养人袍服宽大，幞头也变成了硬脚的。女像也是"大髻宽衣"，这种服饰在当时颇为流行。

晚唐第 156 窟四壁经变图画下方，绘制有张议潮和夫人及其随行者宏大壮观的出游行列。这个洞窟是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所开，是为纪念他的叔父的功勋的壁画。

这幅巨大的壁画中，众多的人物大都缀以花草、景物，共画绘各种人物 257，且车骑随从、驼马成群，画功也极其精细，甬道两壁绘有张议潮夫妇的等身大像。这幅壁画出行图，是敦煌莫高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出行图。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供养人壁画画像中看到当时生活的另一面。第 107 窟是几个妓女所开的小型洞窟，她们为了摆脱生活的悲惨与痛苦，解脱其非人的生活状况，乞求神佛保佑她们。为此，她们

用尽自己出卖身体的积蓄，修建一个小小的洞窟，在壁画中留下她们的肖像，并题壁写下她们的心愿："舍贱从良"，渴求并努力做一名良家妇女。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供养人画像当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实，表现了不同阶级、阶层人们的感情和愿望，为我们留下了生动丰富而又形象的历史资料。

6、图案画

从敦煌莫高窟唐代图案画中可以看出，唐代图案画在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唐时期的图案画及其纹样，吸收了罗马、印度图案纹样的艺术风格，结合自己民族图案纹样的基础和特点，完成了新的伟大的艺术创造。

在莫高窟洞窟内，到处都可以看到，藻井、龛顶、背光、莲座、塑像及供养人服饰图案画。在经变画的四周，也都同样绘饰着艺术家们精心设计的图案画。其中运用最普遍的是卷草纹，它以流丽婉妙的线，描出正反相间的卷叶，填充以莲花、宝相花、海石榴等，并且巧妙地配置孔雀、灵鸟、飞仙、化佛、人首鸟身的伽陵频伽等。这种卷草可以自由舒卷，适应于任何空间，也最富于变化。

在莫高窟唐代洞窟第329、217、360和85窟内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大量图案纹样画。

在第217窟中，窟顶为覆斗形，中心方井为绛红色，由莲花、云纹等多种花样图案绘制而成。中心的小莲花仰开绽放，四角绘有莲花纹样，有五彩边饰。分别是：鱼鳞垂幔纹、石榴卷草纹、华璎采玲纹、一整二破团花纹。其整体构图严谨，色彩艳丽丰富，层次分明清晰，纹样严密，结构紧凑。充分显示了唐代图案纹样艺术的卓越高超之处，表现了唐代艺术家追求艺术创意自由的美好愿望。

第十章　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时期的敦煌文化与艺术

第一节　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

一、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概述

五代十国中原地区大混战、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敦煌及西北地区则是一片和睦安宁的景象。张承奉的部将曹仁贵、曹议金在“西汉金山国”草草收场之后，一方面与甘州回鹘议和，另一方面恢复了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迅速和中原朱梁王朝取得联系。后来又和于阗联姻，进一步和周围的浑、羌、龙、蕃等民族修好，加强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宗教、艺术方面的密切联系。此时的敦煌地区成为汉族文化在西北大地的代表，成为各民族人民友好交往、互济互存的重要纽带。在这一基础之上，敦煌莫高窟佛教文化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艺术优秀成果有积极的意义。现存五代的莫高窟洞窟有：第4、5、6、22、36、40、53、61、72、78、86、90、98、99、100、108、137、146、187、226、261、300、342、346、362、385、391、440、441、468、469和476窟。

五代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世族豪门先后修建了一些大窟的同时，历任河西都僧统在归义军节度使曹氏祖孙的支持下，对莫高窟进行了较全面的维修整理。其中加修窟檐、缩小甬道门，对保存保护壁画和塑像都起到了积极的良好作用。同时期，敦煌地区群众结社捐资造窟修佛也很盛行，推动了莫高窟艺术的发展。五代的莫高窟艺术风格是对晚唐艺术风格的继续，特别是焦墨痕中略施微染的壁画画法被广泛应用。此时期莫高窟艺术虽有艺术表现程式化的逐渐严重趋势，但色彩鲜丽、线条刚劲，代表了五代、宋初壁画的基本格调。

宋王朝对遥远的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无实质上的统辖，只是瓜沙归义军政权心系中原，努力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而求得诸如“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中书令西平王”，甚至“敦煌郡王”等样的封赠。但这足以使曹氏家族的统治在自身努力的基础得以稳固，为此也推动了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现存莫高窟宋时期的洞窟有：第7(宋修)、15、25、34(宋修)、35、55、58、65、67、73、76、89、94(宋修)、118、130、136、152、170(宋修)、174、178、189、230、235、243、256、264(宋修)、289、355、364、368、376、377、427(宋修)、431(宋修)、443、444(宋修)、449、452、454、456、457、467、478(宋修)等窟。

其中曹氏政权的节度使更替、祖父子孙的升官进爵，在石窟的壁画画像上都有反映。另有一些大窟的修建，都是跨越了五代和宋两个时代的。五代和宋时的敦煌，不但政治上以亲缘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而且石窟文化艺术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原艺术风格、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莫高窟仍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一点对远离中央王朝、分割近二百年的敦煌地方政权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建筑、彩塑艺术

五代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建筑洞窟窟形还是沿用晚唐的中心佛

坛式，窟顶呈覆斗形，中心偏后置马蹄形佛坛，上面安置塑像。像后壁作直通窟顶的大背屏，窟顶四角圈出一定位置，供画四大天王像。

但第 100 窟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窟形，四角画四天王，而不设中心佛坛和背屏，仍在西壁开一大龛。

曹氏家族开窟多在下层，窟室规模之大超越前代。由于曹氏家族统治河西，佛教的信仰者决不以前人的“功德”为满足，以自己的财力、政治力量来开凿石窟，把小窟扩建成大窟。

莫高窟现保存完好的五座唐宋窟檐建筑中，第 427 窟窟檐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此窟位于石窟群中部偏北第三层，原是隋代洞窟，宋代又重修妆銮彩塑，并修建了窟檐。

此窟檐是单层，面阔三间，通面阔 6.8 米，进深 3.4 米，四阿顶，窟檐斗拱为六铺作，向外挑出三层斗拱。斗拱尺度雄大，伸出较远，屋檐平直，屋角不起翘，不同于内地唐宋以及以后的所有木构建筑，而与敦煌壁画中的通常画法一致。

在敦煌莫高窟晚期，五代第 61 窟绘有一幅巨型壁画《五台山图》，高 3.42 米，宽 13.45 米，面积达 46 平方米，是莫高窟画中建筑物最多的壁画。

图上山峦起伏，五台并峙；画有四座高峰，六七十处寺院、佛塔，还有尚存唐代塑像和壁画。唐大中十一年所建大殿佛光寺，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珍贵遗迹。它还形象逼真描绘了大好河山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

五代塑像不多，被自然和人为破坏，所剩无几，只有在造型和布局上仍然保留着唐代风格的几身彩塑。

三、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

1、佛像画(尊像画)

敦煌莫高窟到了五代，壁画中已无上乘的佛陀说法图。但是此

时佛教密宗兴起，莫高窟壁画中出了许多密宗菩萨、明王说法图。

第390窟中的地藏菩萨说法图和第205窟中的孔雀明王说法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第390窟是隋末唐初时营建的洞窟，主室甬道是五代时改建的。甬道顶部地藏菩萨说法图是五代改建甬道后所画。

图中地藏菩萨居中，是一位面相慈祥的僧人形象，身着山水纹通肩袈裟，坐在莲花座上，一腿平曲座上，一脚放在座前莲花上，一手举锡仗，一手托宝珠。身后有火焰纹背光，头顶高悬华盖。

第205窟是唐代营建的洞窟，甬道是五代时改建的，甬道顶部的孔雀明王说法图亦是五代时所画的。

图中孔雀明王居中，相貌如菩萨，端正慈祥，头戴化佛宝冠，衣着透体菩萨装，胸饰璎珞，臂有玉钏，结跏趺坐于白莲上。身有四臂，右边第一手执开敷莲，第二手持俱缘果。左边第一手执孔雀羽，第二手持吉祥果。身后是孔雀羽和火焰纹组成的背文。头上是飞天环绕的华盖。明王的莲座驮在绿孔雀的背上。

在曹氏时期有显著特点的佛像画就是把四大天王绘于窟室顶部的四隅，用以"镇窟"；天龙八部整齐地分布在龛内两侧，以示侍卫。

第36窟有四身供养菩萨，其中两身姿态神情尤为优雅传神，具有五代风格特点。这两身菩萨头有圆光装饰，一身为光环，一身为花环。面相丰圆，修眉细眼，棱鼻厚唇。耳垂环铛，皆束椎髻，戴宝冠，披天衣，露前胸，项饰璎珞，腕戴玉镯。左边的菩萨，双手托花盘，右边的菩萨，一手持莲花，二位菩萨面相斜对，目光同时集中在莲花上，神态十分虔诚专注。

第55窟是北宋初期所建的一个大型背屏式洞窟。洞窟内有四身高大的供养菩萨，是莫高窟最高大的供养菩萨。

这里我们介绍背屏南向面供养菩萨一幅：这身高大的菩萨头悬宝珠彩铃华盖，有三色圆光，束高发髻，戴化佛冠，修眉细眼，棱

鼻厚唇，披天衣，系长裙，露前胸，饰璎珞，戴手镯，赤足脚踩大莲花，双手端香炉于胸前，神情十分虔诚。这位供养菩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嘴唇边有蝌蚪似的绿色小胡子，躯身粗壮，与唐代时的供养菩萨相比，男性化的成份较大。

第220窟甬道新发现的一幅有确凿纪年的新样文殊菩萨图，保存完好，最具五代的风格特点。

观音是阿弥陀佛的胁侍，文殊是释迦牟尼佛的胁侍。图中这两位大菩萨又画在文殊图的两侧，组成一中堂、两条幅的三联式，并不是按佛仪轨画的，而是按供养人的心愿画的。两侧大菩萨形象大体一样，西侧观音保存完好，姿态优美，色彩如新。观音头悬宝珠彩铃华盖，有三色圆光，戴宝珠冠，面相丰圆，修眉细眼，棱鼻红唇，有黑色蝌蚪小胡子，目光平视，面带笑容，一手举莲花，一手下提净瓶，足踩两朵莲花，身上的天衣、巾带、长裙、项莲、璎珞、手镯、臂钏、环佩等衣饰多用墨色线描，以红绿二色涂染，色调对比鲜明，整个画面气氛热烈。

莫高窟五代时期佛弟子画像，继承唐代风格，在相貌造型上准确地刻划出人物的年龄、性格差异。

第99窟具有代表性的西壁南侧三身弟子形象尤为生动。三身弟子，三种年龄，三种相貌，三种姿态，三种性格。老年弟子，脸形瘦长，满额皱纹，长眉圆眼，高鼻大嘴，面相慈祥，双手合十，张嘴露齿，像似讲经论法。中间的中年弟子，脸形方圆，短发黑直，浓眉大眼，高鼻厚唇，两眼直视，双唇紧闭，双手合十，若有所思，体魄健壮，刚愎自持。北边的青年弟子，脸形丰圆，修眉细眼，棱鼻小嘴，双唇微闭，手持经卷，神情自若，憨厚忠诚。这三身弟子画像，赋色艳丽，线描工整，面部晕染虽已变色，但从线描造型上仍然可以看出老、中、青三身弟子的外貌特点和内在气质。

莫高窟宋代时，佛弟子画像已无唐代时丰富生动，能够以外貌体现人物性格和内在气质，精品佳作很少。

第76窟东壁《八塔变》中的佛弟子画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图中的五弟子，相貌年轻，眉目清秀，除袈裟的颜色不同，其相貌姿态完全一样，没年龄、性格上的差异，只起表意作用。

2、本生故事画

五代时期的故事画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形式上也与早期的故事不同，一窟之内独立的故事画就多达三十几种。

第98窟象护与金象故事，是一个新内容，故事讲：在摩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生了一个男孩，长的一表人才，全家人捧若心肝宝贝，特别高兴。

就在儿子出生的同一天，在藏珠宝的库房里，出现一只小巧玲珑的金象。父母对这喜降祥瑞的吉兆更是万分欣喜，请来一位相师，给孩子取名为象护。

象护渐渐长大，金象也慢慢长大了。象护与金象形影不离。奇怪的是金象不吃不喝，却要拉大小便，而且是黄灿灿的金子。

象护常常跟达官豪商王侯的子弟玩耍，各自夸耀家内奇事，象护也讲了家中金象之事。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个是阿阇世王子，听了象护说了那只奇象，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心想：我将来当上国王，一定要把这只金象夺到手。

后来，阿阇世果然做了国王，他就下诏书命令象护把大象牵入宫中。象护父亲明白其中有诈，就对象护说："阿阇世凶暴无道，阴险狡诈，他生身父亲都死在了他的刀下，何况平民百姓！自从他当国王以来，欺压百姓，枉杀无辜，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现在，召你进宫，凶多吉少，是贪图你的象。"象护说："我的象是谁也无法夺去的。"于是，父亲就跟着儿子一起进宫。国王命令护卫不要阻拦，让他们骑着金象进内宫。象护父子从金象上下来，参拜了国王。阿阇王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寒暄应酬了几句，设宴招待象护父子。象护父子应付了一会儿，起身告别。阿阇世王一反常态，命令把象留下。象护欣然同意，与父亲出宫。

阿阇世王盯着象护父子出了宫门，特别高兴。低头再看金象，金象不见了，原来金象沉没在地下了。

金象在王宫沉没地下后，从宫外大道上涌现出来，站在了匆匆赶路的象护父子面前。象护父子跨上金象，回到了家中。象护生怕阿阇王加害于他，就告别父母，骑着金象，入山修行去了。

3、经变画

敦煌莫高窟晚期洞窟由于窟室的加大，给人以规模宏伟的感觉，但仔细观察，已没有唐代那种精妙生动、神采焕发的情致，显得有些呆板。壁画的题材以经变为主，佛传还有一些，其余只剩了供养人、菩萨像和图案。

与晚唐一样，经变画是石窟壁画最主要题材。因大多数题材前代都已流行，只有"劳度叉斗圣变"，在五代窟中制作颇多，而且都把它绘在正壁上。它比维摩变更进一步，在表现手法上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幽默和夸张，是佛教画中富有独创性的作品。

五代"劳度叉斗圣变"第146窟的故事说：释迦牟尼在王舍城竹园的时候，舍卫国王波斯匿有一个名叫须达的大臣，家资巨万，财宝无限，性好施舍，专门赈济贫穷和孤老无依的人。他立志要在本国造一精舍，作为释迦说法之所，要求释迦派一弟子，和他同去选择园址。释迦就派了舍利弗，因为他考虑到舍卫城都是信外教的婆罗门，别人去怕办不了，只有舍利弗是婆罗门种，自小聪明，神智兼备，可以放心。于是舍利弗便和给孤独者须达一同到了舍卫国。

他们到处寻找，都没有合意的。只有王太子祇陀的园子，平正广大，树木郁茂，不远不近，最为合适。便以黄金铺地，把它买了过来，准备建立精舍。这时外道六师以劳度叉为首，起来反对，要求和沙门斗法。如果沙门胜了，就听任建造；如果败了，就不得兴建。

舍利弗接受了外道的挑战，于是，六师宣告国人："七日之后，在城外广场和沙门斗法。"到了那天，打起金鼓，舍卫国十八亿人都齐集广场，来看斗法。六师外道到场的有三亿人之多。

双方都登上高座。外道劳度叉就施行法术，化作一棵大树，枝叶茂盛，花果各异。大家都说劳度叉变得好。这时舍利弗便以神通力，唤来一阵旋风，吹拔树根，使它倒地碎为微尘。大家又都说舍利弗胜了，劳度叉不如舍利弗。劳度叉又化作一个宝池，舍利弗便化作六牙白象，把池水吸干。劳度叉又化作一山，舍利弗就化作金刚力士，用金刚杵把山击碎。劳度叉又化作一龙，兴雷作雨，舍利弗便化作金翅鸟王，飞上天空把它擘开吃了。劳度叉又化作一牛，舍得弗就化作狮子王，把它一口吞了。劳度叉又化作夜叉鬼，四牙长利，口中出火，腾空直扑舍利弗，舍利弗便化作毗沙门天王。夜叉恐怖，要想逃走；但风神放风，四面火起，烈焰炽燃，没有退路。只有舍利弗身边清凉无火。劳度叉须眉都烧光了，走投无路，只得逃向舍利弗身旁哀求乞命。一场斗争，结果是劳度叉和六师外道三亿人众都出家皈依了佛法，自然祇陀园精舍也就造成了。

这幅壁画描绘双方斗法的场面十分引人入胜。尤其是当风神放风，吹回牢度叉所吐之火，使其自烧须眉，急得他往水缸直钻的狼狈情景，刻划得淋漓尽致。而观斗法的外道天女们被风吹时，那种偎依瑟缩、衣袖飘举的样子形象逼真。这个经变，和那些千篇一律的说法图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 98 窟是五代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开凿的功德窟。

该窟东壁所绘的《维摩诘经变》上下高 2.95 米，南北宽 12.65 米，总面约为 37.3 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维摩诘经变》。内容共画八品，无所创新，艺术水平、人物造型不如唐代富于想象、生动活泼。其中几品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方便品”中的酒肆图，画面是花树丛中，绿叶成荫，一酒肆中，维摩诘和六位老者，列座酒案两旁。酒肆外面，一位老年舞师，甩袖踢腿，翩翩起舞，吸引了酒客们的目光。有一酒肆侍者，托盘前来奉酒，维摩诘手执羽扇，在酒色面前表现出一副清高的姿态，与诸酒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实际上是一幅古代民间生活风俗画。

4、供养人画像

五代时供养人画像规模有了巨大的发展。首先供养人像已从门上、龛下进而占据甬道，莫高窟最大的供养人像一于阗国王李圣天及其后曹氏，就制作在这个时代。几个曹氏大型窟的供养人像，都是等身大小。

画像既多而又高大，就大多数而言，有着公式化的倾向。但从服饰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贵族妇女许多不同装扮。她们发髻上满插簪钗梳栉以及步摇之属，脸上也贴了许多花钿，这是当时的盛装。衣裙的花纹多半是小簇花鸟，可以看出是织绣或染缬而成的。这些女供养人，各按尊卑大小紧紧排列在一起，渐后渐小，远望如一团花簇。男供养人服饰较简单，都是朱色袍服(因年长已变黑)，幞头都是硬脚的。

由于曹氏家族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有联姻关系，画像中颇多回鹘公主画像。第61窟东壁南侧曹议金的夫人，头顶高髻，后垂红结绶，翻领窄袖长袍，绣鞋。这是回鹘妇女的礼服。又因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可汗兄弟相称，曹议金的女儿也有的称天公主，着回鹘装。

第98窟于阗国王、皇后及侍从像，是一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画像。于阗国王头戴旒冕，上饰北斗七星，头后垂红绢，高鼻，大眼，蝌蚪式的八字胡，身穿衮龙袍，腰束蔽膝，双脚有天女承托。皇后头饰花钗冠，穿回汉混合装、画披。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曹家和回鹘人的亲密关系，就由于这一点，才使曹氏统治权在吐蕃、回鹘各族包围中维持了百余年之久。

在第100窟中出现了模仿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形式的曹议金与回鹘公主出行图。这两幅出行图是莫高窟规模最大的《出行图》。

《曹议金出行图》宽约1米，长1.3米，总面积约13平方米。绘于南壁和东壁南侧下部。南壁出行图中部为曹议金，戴展脚幞头，赭袍，乌靴，扬鞭乘白马，前有舞乐，后随侍从奴婢和回鹘等各族骑

士。《回鹘公主出行图》与南壁《曹议金出行图》相对称、长度、宽度，面积都相同。绘于北壁和东壁南侧下部。回鹘公主扬鞭乘马居主位，戴毡笠，着翻领窄袖袍，前有舞乐，后有奴婢、车马和方亭式肩舆。场面宏大，热烈排场，表现了曹氏家族豪华富贵逍遥悠闲的出游场面。

5、图案画

五代敦煌莫高窟的装饰图案，主要表现在藻井、圆光、边饰和壁画中的地毯上。纹样主要有团龙、团凤、鹦鹉、孔雀、狻猊、莲花、团花、三角花、菱纹、回纹、联珠纹、波状缠枝石榴纹等。藻井已超越常制，往往以整个窟顶为一大盖，使石窟结构的整体感更强，更加规矩严整。

第146窟是五代时期的一座大型中心佛坛式洞窟。窟内平面为方形，窟顶为覆斗形，藻井略显不规则。方井中心圆内，一条金龙蟠曲在卷瓣莲花花心的绿水池中。水池外层以云纹五瓣花环绕，组成一朵层次丰富的五彩大团花方井，四角各画四分之一的团花，团花内各有一颗火焰宝珠。在绛红色的方井地上，每边中心地段画一对面向相对、展翅欲飞的彩色鹦鹉。方井边饰，由里向外，逐层扩大，分别是联珠纹、团花纹、菱形几何纹、回向几何纹、莲花化佛石榴卷草纹、山形垂幔纹、彩铃垂幔纹。垂幔上挂宝珠、玉。

这幅藻井图案结构紧凑，描绘工整，层次分明，纹样丰富，画面对称，是曹氏画院的风格特点。

第二节　党项族西夏时的敦煌文化

最初，党项人依照传统的风习，崇奉鬼神和自然物，因而巫术很流行。后来他们开始信奉佛教，在许多地区建有庙宇，里面收藏

佛教的各种经典。11 世纪初期，党项人模仿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字形方整，字体分楷书、草书、篆书；字的结构，每字由一块或数小块组成，分为上、中、左、右、下等块，每块都有含义。党项人用西夏文撰写的字书，以现存下来的《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最为重要。《音同》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是现存最早的西夏文字书，收有 6000 多字。《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字和汉字对译的词典，使用时极为方便。

文学艺术在西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乾顺创作的《灵芝歌》是党项族人的著名诗歌。现仍保留着的安西榆林窟壁画"打铁图"、"酿酒图"、"农耕图"等，色泽鲜艳如新，人物形象逼真生动，既反映了党项族人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况，也表现了党项族人民深厚的艺术造诣。党项族人使用的乐器，主要有琵琶、箫和笛，其中颇负盛名的羌笛，音调婉转悠扬动听，扣人心弦，奏出的乐曲艺术感染力很强。西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与党项族产生的许多杰出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李继迁、李元昊，都非常注意吸取汉族先进的文化，且通晓汉语，喜欢阅读汉文的文学、法律和兵书，又能够把汉族思想文化和党项民族文化进行很好的融合发展。

西夏党项族文化在吸收发展较高的汉族文化的同时，又接受了吐蕃、回鹘等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别具一格、丰富多彩的西夏文化。《宋史・夏国传》记载，李元昊"善绘画，能创物始，晓浮图学"，在他称帝后"自制蕃书，命野利任荣，演绎成十二卷，字形方正，类八分书，而字体颇重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都现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数量仅次于汉文题记。1959 年 3 月，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宕泉河东岸的一个元代喇嘛塔中，发现三部西夏文佛经，其中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为现存海内孤本，甚为珍贵。此件为木刻梵夹纸本，纸质灰白，柔软细密。页面长 20.5 厘米，宽 9 厘米，扉页

有双面通栏印制水月观音图，图高15.5厘米，宽17.5厘米。经文部分分上下两栏，上栏有插图54幅，下栏印制经文51面零1行。全部经有西夏文256行，2324字，字为西夏文楷书，字体大小肥瘦不等，笔划粗细也不尽相同，墨色浓浅适度，印刷清晰美观，既反映了西夏统治时期的造纸技艺的精湛，又反映了其时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它为我们考察研究西夏佛教译经史和西夏雕版印刷术及版画艺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党项族人崇信佛教，元昊建国后将佛教定为国教，规定一年中的四个孟朔日为"圣节"，令其所辖境内的官吏和百姓，届时对佛礼拜，举行规模盛大的佛事活动，为统治者诵经求福，并广建寺庙修造浮图。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地均有西夏时期新建，重建的，新绘、重绘壁画的佛窟寺庙，其数量和规模较其它朝代毫不逊色。

另外，在敦煌地区及附近地区西夏时期石窟寺庙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元昊吸收了唐宋官服制度，改革衣冠，创造了颇具民族特色，又融汇中西的党项族官制服饰。贵族穿着"圆领窄袖四襟龙袍"，"庶民则衣青绿，以别贵贱"，这是洞窟西夏供养人像服饰中反映的西夏服饰文化与西夏社会严格等级制度的历史写照。

在西夏统治敦煌地区的近二百年中，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兴盛，文化艺术事业不断发展，基本保持了"与中原无殊"的发展水平。这一时期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汉族、党项族、回鹘族、吐蕃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民族团结的结果。

第三节　蒙元时期的敦煌文化

敦煌莫高窟现存元代新修和重修洞窟二十多个，保存的许多

艺术珍品，是元代沙州文化发展的标志。第 3 窟的千眼千手观音菩萨；第 465 窟的照镜、画符、群众听法图；窟顶所见各种伎乐、持花菩萨等，都堪称为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教艺术的佳作，同前代的作品相比是毫不逊色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蒙古族自身的文化渊源。

随着蒙古族国家的建立及经济的发展，其文化也进一步繁荣起来。13 世纪初，蒙古族曾使用畏兀儿体蒙文，即采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1269 年颁行。这种蒙古字字形复杂，不便书写，难学难用，只是蒙古贵族的特用文字，没有在民间普遍流行。元朝后期，畏兀儿体蒙文又逐渐通行。《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是 13 世纪写出的蒙古族历史、文学巨著，是研究蒙古民族发展、社会生活的重要著作。

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舞蹈、音乐、绘画、雕塑、造型艺术，既发扬了自己民族的传统，又吸收了其它民族的特点，不但在内容方面大大丰富充实了，而且形式和风格上也有了进步。其壁画、图案、雕塑、雕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绘画和造型艺术的创新。蒙古族在这一时期，还从汉族人民中学会了印刷术。医药学方面也有了进步，有了适应社会生活和不同气候地理特征的疾病治疗方法。在宗教方面，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先后进入蒙古地区。对敦煌莫高窟的新修和重修就是其容纳重视佛教的最好说明。

元蒙统治敦煌时期，十分重视发展中西文化交流，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至元十一年（公元 1274 年）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着古“丝绸之路”，到达敦煌，游历敦煌全城后，留下了美好的祝愿，他的《行记》里有详细的记载。

第四节　西夏、蒙元时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

一、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概述

党项族西夏民族政权处于各民族政权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中原汉族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受汉文化的影响最深，其融于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西北敦煌地区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西夏文化艺术在我国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汉、藏、回鹘、契丹、女真等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经验融合在一起，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貌。现存敦煌莫高窟西夏时期洞窟，多数是由前代洞窟改建和补修而成，有：第6（重修）、16（重修）、27（重修）、29、30、37、38、69、70、78、81、83、84、87、88、97、140、142、151、164、165、169、206（重修）、207、223、224、229、233、234、239、245、246、252、263（重修）、265、281、291、306、307、308、309、310、324、325、326、327、328（重修）、330、339（重修）、344、345（重修）、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6、363、365（重修）、366、367、378、382、388（重修）、389（重修）、395、399、400、408、409、415、418（重修）、420（重修）、432（重修）、437（重修）、450、460（重修）、464和491窟。

敦煌莫高窟西夏早期改建了前代不少洞窟，几乎没有开凿新窟，壁画画风与归义军时期相衔接，酷似归义军后期的"绿壁画"。曹贤顺时代的画家及其后裔仍继续在莫高窟作画，其表现形式更加程式化、简单化。西夏早期壁画承袭了沙州曹氏所设地方画院的余绪，和宋代壁画一样具有严谨、写实的作风。

西夏中期莫高窟艺术接近甘州和西州的回鹘风格。1036年前

后，在莫高窟改绘了一批石窟。佛、菩萨与僧俗供养人的造型矮而丰腴，鼻隆颐满。由于运用了长锋硬毫的笔，使线描匀洁，但笔端起落收敛变化较少，使人感觉装饰味浓厚，生动表象的画意有所欠缺。同时，装饰图案的团花纹样显著减少，边饰多用连珠纹、曲水纹、云头纹、忍冬莲花卷草纹。由于色彩上出现了以赭石、铁朱、大红等热色作底色，与石绿、石青形成鲜明对比，纹样的变形渐趋饱满，沥粉堆金和泥塑贴金已经完全消失，藻井蟠龙用色晕染。

西夏晚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受到金、蒙古和南宋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密教风行于西夏，藏式佛画开始流行，影响到了莫高窟的艺术风格。出现了彩塑供养天女题材，制作不甚精细，圆塑兼施阴刻线纹，整个造型端美，颇有虔诚自然之态，和壁画一样，具有西夏的时代风格。

敦煌地区是较早受到蒙古族元朝统治的州郡，蒙元王朝十分重视对瓜、沙的经营，移民屯垦，恢复水利，发展生产，为其文化的发展、艺术的创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蒙元王朝统治者同样信奉佛教，大力倡导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莫高窟蒙元时代至今尚存洞窟有：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另外，还修筑了宕泉河东岸的几座塔。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之外，又增加了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同时，元大都朝廷对敦煌宗教事业的关注，敦煌佛教艺术，也受到喇嘛教中的萨迦派的影响。蒙古族元代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亦有佛教艺术的佳作，某些方面同前代的作品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二、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建筑艺术

党项族西夏政权和蒙古族元王朝，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敦煌莫高窟现存这一时期洞窟九十余窟，其中西夏八十余窟，蒙元时期十余窟。

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大都是利用前代的旧窟加以改造营建的，

在洞窟建筑形制上很少西夏时期时代的特点。

党项族立国之前，就是一个崇奉佛教的民族，立国之后在国家最高统治者倡导和示范宣扬下，佛教在西夏境内普遍流行，频繁地在敦煌莫高窟进行佛事活动。虽然当时莫高窟断崖上所开凿的佛窟，已经基本饱和，但西夏仍然在此继续修建寺庙，营造佛窟，朝山巡礼，诵经拜佛。其中，西夏时修建了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也是莫高窟所发现的所有窟前建筑遗址中，最大最宏伟壮观的窟前建筑遗址。

西夏初期在重新装绘第130窟窟内大部分壁画和甬道全部壁画的同时，在窟前修建了殿堂，增塑了四大天王像。其窟前殿堂阔5间，达21.6米，进深4间，达16.3米。地面全部用花砖铺盖，其纹饰为西夏时期流行的八瓣莲花纹和四角云头纹。

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是最集中并较有系统的西夏石窟建筑。这批洞窟中的建筑、彩塑及大量花砖和其它艺术作品，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不可分割的别具一格的、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艺术遗产。是考察研究西夏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形象资料。

蒙古族元代在敦煌莫高窟所开洞窟多半开凿在北段，给北段荒凉冷落的石窟增加了些神秘的色彩。元代洞窟的形制式样变化不大，只是佛坛安置在窟中心，作圆形阶梯式，四周饰有壸门彩绘，这种圆坛是元代的创造。这种主室方形有中心圆坛的洞窟，为敦煌藏密洞窟的典型形式，坛上再塑像，四壁壁画满绘密宗图像。另外，元代新开洞窟仍用前代方形覆斗窟顶和主室长方形后部有中心柱的形式。

三、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彩塑、壁画艺术

西夏和元代在敦煌莫高窟的塑像很少，主要是在前代洞窟中进行重塑、改塑。这一时期的造像艺术因开凿很少和文化艺术氛围

的变化，其艺术水平呈下降的趋势。

西夏时期彩塑现存作品有佛、弟子、菩萨等，还有释迦牟尼、多宝佛并坐说法像，其面貌丰润、衣纹流畅，犹有唐宋时代余韵。后来，考古发掘并认定的第491窟为西夏时期新开凿的洞窟。其供养天女像，额头宽阔，相貌朴实，着双鬟髻、大袖襦、云肩、长裙、蔽膝、两侧带旒的“褂衣”。造像风格如宋代，着装为当时中原贵族的礼服。从此窟中可见，西夏莫高窟的塑像制作，是以圆塑为主，衣纹、发纹刻画阴线，手指、衣带、花钿模制，粘贴于塑像上。塑像的敷彩比较简单，仅用土红、朱红、石绿墨、淡黄等色，尤以红、绿两色用彩居多。

1、佛像画（尊像画）

西夏和元代敦煌莫高窟洞窟壁画题材，在将近三百年间里尊像画尤显重要，其中一类是显教尊像画，如药师佛、观音菩萨、十六罗汉、水月观音等，另一类则是西藏式密教图像。

西夏时期第310窟西壁龛外北侧的药师佛，是较为典型的一幅。药师佛袒露前胸，身披袈裟，身材高大匀称，左手置于腹前托药钵，右手执禅杖斜倚肩上，脚踩莲花，面向龛内。其脸形饱满，鼻梁高直，修目细眉，具有典型的西夏时期人物造型特征。

第97窟西夏洞窟十六罗汉开始作为洞窟壁画的主题。南壁、北壁各绘画八身，共十六幅方形构图。图中罗汉面相各不相同，其中浓眉大眼、高鼻、深目和各种怪异神态者，颇具“狂逸”的写意风格。

第61窟甬道南壁的巨型炽盛光佛，是元代修建窟檐时所绘画，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炽盛光佛。佛像坐轮车上，右手以一指顶法轮，前有诸天导引；车后龙旗飘扬，金刚力士紧随其后，上空有众多天人及天宫诸星宿，建立了与窟内以文殊为主像的密切联系。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家，对千手千眼观音的表现不同，布局及其结构也不一致。莫高窟第3窟有千手千眼观音一铺，

画工精细，线条顿挫转折，劲利自然，表现了画家极高的技巧。观音十一面，人物较少，叠头如塔，千臂千手，摆列如轮。每手掌中有一慈祥美丽的慧眼。为了刻画出不同的质感，画家使用了多种线描，既使形象更加真切感人，也显示了元代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

另外，莫高窟蒙古时期，留下了风格迥异的西藏式金刚乘藏密图像。第465窟群画为萨迦派密教艺术，内容有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及各种明王愤怒像和双身合抱像，即所谓的欢喜天、欢喜金刚。其中的明王像面貌狞恶，裸体作舞蹈姿态，创作上比例适度、线描细腻，绘画及晕染立体感较强。这类壁画作品具有较明显的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等画风的影响，又有较多的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成份，在表现出萨迦派艺术独特风格的同时，显示了较高的壁画艺术的创作水平。

2、经变画

敦煌莫高窟自西夏以来，经变画品种越来越少，仅有西方阿弥陀净土变、东方药师经变等二三种。其艺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下降，画面呆滞板结，构图程式化，缺少变化，前代经变画中一些生动形象的楼阁栏杆、音乐舞蹈等均已少见。我们只能凭借佛的坐姿、手印以及化生童子是否出现等微妙的标志，来辨别是何种类经变。这充分说明，敦煌莫高窟的经变画，随着密教的广泛传播而趋向衰落了。自然，此时的整个莫高窟艺术创造时期也基本结束了。

3、供养人画像

敦煌莫高窟西夏、元代供养人画像大都是党项、回鹘和蒙古族等民族形象。

后来考古发掘第491窟是西夏原窟。西壁南侧的女供养人，长圆脸，双髻，褂衣，长裙，云肩，腰束蔽膝，结带下垂，足穿云头履，作捧物状。

第409窟的回鹘王及眷属供养像就是别具风格的肖像画。所画人物面相丰圆，王者戴花纹白毡高帽，穿团龙袍，长靿毡靴，腰

束革带；身后有仆从张伞扇，武士捧持兵器。女像头饰博鬓冠，穿翻领窄袖红袍。

西夏晚期出现了少数党项族女供养像，面形条长，戴步摇冠或毡冠，穿窄袖衫裙，着屐。

元代供养人画像仅一二例，面相宽肥，戴笠帽，穿窄袖袍，六合靴，这就是蒙古族服装。女供养人头戴顾姑冠，穿文绣衣，长袖曳地，身后有二女奴提携，反映了蒙古贵族妇女的装扮。

西夏和元代的供养人画像虽为数极少，但在人物造型和衣冠服饰上，却鲜明地表现出民族特色。

4、图案画

莫高窟晚期的装饰图案，在曹氏画院基础上加以发展，具有新的时代特点。首先，西夏装饰图案在整个洞窟中所占面积的比率，是历代洞窟之最。除了窟顶藻井图案之外，相当多数的洞窟覆斗形窟顶的四披、盝形龛的整个龛顶，以及甬道顶等都布满平棋图案或团花图案，各种说法图和经变画等的四周以及龛、甬道的边沿当然也都配置着花边图案。

西夏时流行龙纹。第16窟藻井中心纹样由一凤、四龙组成。凤居正中央，两翅自然而有力地展开，作飞翔之状，尾特别长，连同身体一起，蟠卷成圆形。凤外周为旋转式卷瓣莲花。井心四角各有一龙，向着顺时针方向作互追逐之势，造成旋转飞腾的生动气氛。

第330窟覆斗形四斜披上，以土红色勾描填绘火焰、卷云为纹饰，组成桃形的单位纹样，作品字形四方连续，形成较大面积有如团花的图案。

西夏新出现一种波状卷草式的云纹边饰。这种边饰广泛流行于西夏中、晚期，并延续到元代，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

第五节　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标志，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象征。"飞天"是佛经中的乾闼婆（天歌神）与紧那罗（天乐神）的合称，她们的职能是侍奉佛陀和天帝释，因能歌善舞，周身还发出香气，所以又叫"香音神"。飞天是敦煌壁画中一种优美多姿的艺术造型。

敦煌飞天从艺术形象上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它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这种佛教艺术中能够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天人，反映了古代人们渴求自由，希望征服太空的美好愿望，敦煌莫高窟艺术中创造了大量多姿多彩的飞天形象。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飞越了十几个朝代，历时千余年。

它经历了产生、发展和衰落等几个阶段：

兴起时期：从十六国北凉到北魏（公元336—535年）。莫高窟现存十六国北凉的洞窟第268窟就是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在窟顶平棋装饰方格外层岔角的飞天，和西壁佛龛楣上角的飞天，都是莫高窟最早的飞天。这个时期敦煌的飞天，受印度、西域飞天的影响，被专家们称为西域飞天。

莫高窟北凉时的飞天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作为窟顶藻井装饰，由于莫高窟初建，敦煌画师画工尚不熟悉佛教题材和外来的表现技法，处于摹仿阶段，运笔豪放，大胆着色，显得粗犷笨拙。其造型和艺术特点是：头有圆光，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头束

圆髻，或戴花蔓，或戴印度式五珠宝冠。北魏的飞天形象虽然大体还保留着西域飞天的鲜明特点，但在具体的形象上已发生了变化，逐渐向中国化转变。飞天的脸型已由椭圆为长条而丰满，眉平、眼秀、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谐调。身材比例逐渐修长。飞翔姿态也多种多样，有的横越太空，有的振壁腾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衣裙飘带的浑染和线条十分清晰。飞天的动势有力自如，姿态优美。

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西域式飞天和中原式飞天，最具有代表性的第249窟、第285窟。脸形条长，成小字脸，上体赤裸，双腿修长，腰系长裙，肩披飘带。一身双手持横笛，一身双手拍腰鼓，一身横空向右飞，一身横空向左飞，四周香花飘落，彩云旋绕，更加衬托了飞天优美的飞动姿态。

中原式飞天，人物形象完全是中原“秀骨清像”形，人体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

北周时期，鲜卑族在大西北建立了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较短，因它的统治者崇信佛教，通好西域，因而再度出现了西域式飞天。第428窟中的飞天，体态健壮，蛋形圆脸，上身裸露，腰系长裙，双手持竖笛，双脚倒踢紫金冠，长带在身下飘扬，四周天花飘落，其飞行动态身轻如燕。

隋代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时期之一，也是飞天处在融合、创新、探索的时期。脸型也不一，有清秀型，有丰圆型，人体的比例适度，身材修长，腰肢柔软，绰约多姿。服饰也有所变化，有上身半裸的，有着僧祇支的，有穿大袖长袍的，有穿短衬长袍的，其头冠发髻也不同。飞行的姿态也变的多种多样，有上飞的，也有下飞的，有顺风飞的，有逆风飞的，有单飞的，有群飞的。姿态比较自由舒展。最具有代表性的隋代洞窟有第206和427窟。

到了唐代，由于唐代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丰富繁荣的文化艺术、开放的国策，再加上不断吸收、创新、发展，使敦煌的飞天

达到了繁荣鼎盛的时期。前几个朝代的飞天，多画在窟顶藻井四周，而唐代的飞天多画在大型经变画中。一方面为大型经变画中的佛陀说法场面，散花、奏乐、歌舞作供养，另一方面表现大型经变画中佛国天堂—极乐世界的自由欢乐。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飘曳的衣裙、飞卷的舞带，给人一种豪迈有力、奇姿异态，变化无穷的飞动之美。唐代的飞天还有一个新特点，就是出现了双飞天。在初唐 321 窟和盛唐 320 窟中就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双飞天。眉目轮廓及肉体姿态线条十分清晰，身材修长，昂首挺胸，双腿上扬，双手散花，衣裙飘条随风舒展，由上而下自由飘落。人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有力，色彩丰富艳丽，是唐代飞天的精美之作。

莫高窟唐代后期（中唐、晚唐）的飞天，已无唐代前期那样激奋轻盈、自由欢乐的情绪了，在艺术造型上，衣饰已由艳丽变为淡雅，人体已由丰满变为清瘦，神态已由激昂变为忧思。第 158 窟的飞天，就具有这种代表性。《涅槃经变》图上层的菩提树宝盖飞旋的几身飞天，有的捧着花环，有的捧着璎珞，有的扬手散花，有的吹奏羌笛。但神情平静，并无欢乐之感。同时也反映出唐代后期的国力衰败，国人忧思之势。

自唐以后，艺术水平逐渐衰落。飞天造型千篇一律，完全失去了唐代飞天生动欢快的基调。第 327 窟是宋代晚期的一个洞窟。窟顶四披下沿画飞天一周，有的捧花，有的奏乐，为佛陀作供养。飞天身上，香花纷落，飞天身下，彩云飞旋，虽无唐代的气势，但其飞行动态表现了宋代的艺术水平。

随着时代的变迁，从鼎盛走向了衰落，飞天的艺术水平和风格一代不如一代。西夏时期的飞天，最大的特点是以西夏党项族的形象为模特画飞天形象。脸形长圆，两腮外鼓，深目尖鼻，细眉斜眼，身材健壮，多饰珠环，世俗性很强。第 97 窟是最有代表性的。

莫高窟元代开凿窟的洞很少。第 3 窟的四身飞天就具有代表

性，头梳长髻，脸形丰圆，长眉秀眼，裸露前胸，项饰璎珞，一手托莲花，一手执莲枝负在肩上，乘黄色卷云从空而降。身体沉重，飞动感不强。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形象、姿态以及意境、情趣和形式风格，都在不断地变化。一千年间敦煌飞天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演变发展的历史。

第六节　清代敦煌文化教育事业

清代敦煌建县修城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建立正规学校，改变原来只有个别私人开馆授生的私塾的局面甚为紧迫。

当时任敦煌知县的河北宛平人曾希礼，也深知“涵育人材，以养以教”的重要性，于是首先自捐俸银，积极倡导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后又得到全县农工商人等的资助，于 1760 年在县城周围建起东、南、西、北四所义学，部分农户和贫民子弟有了就学的机会。随后，曾希礼知县亲自督工兴建了地处县城北关僻背安静的东北角的鸣沙书院（以县南有鸣沙山而择其名）。

鸣沙书院建成后，即招生聘师，传文授经。曾希礼还积极提倡为书院建立膏火（助学）基金，并自己捐赠月薪大半，结果在地方人士广泛赞助下，得银千余两，充作助学基金。自此以后，敦煌城乡学校兴起，书院生徒增多，学风为之一振。乾隆己亥科，敦煌赵学诗首中举人，后又联捷拔贡。赵学诗博学能文，尤负诗名，士林器重，有“赵敦煌”之美称。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敦煌知县彭以懋效曾知县捐俸银 1200 串。嘉庆十四年（公元 1809 年），知县黄廷缓也捐俸金 1200，均以热心教育事业，作为助学基金。他们都为培养敦煌地方

人才，尽了“父母官”之责。

道光四年至十一年（公元 1824—1831 年），福建德化县举人苏履吉，两次出任敦煌知县，都以“振兴文教，奖掖后进为急务”，整修了鸣沙书院，并延请武孝廉曾元鲁担任主讲，同时增置义学，重修《敦煌县志》，对敦煌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外，在其任职期间，还新修了月牙泉观亭、庑廊，供游人观泉赏景，饱览“沙漠奇观”，故后人“钦为一时风雅吏”。

自苏履吉振兴鸣沙书院后，敦煌文风更上一层楼。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敦煌人雷起瀛就任鸣沙书院主讲，任教二十年，以培养地方士风为己任，勤诲不倦。一时间人材辈出，先后培养出举人张克宽、雷起鸿、祁士麟，王化通、拔贡王铤等。正如《鸣沙书院碑》文所述：自咸同至光绪，敦煌学生“明经拔粹，鉴贤书者颇不乏人”。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敦煌知县唐传柄，又倡议将百年鸣沙书院另行修建于城内东城角，为培养人才再做新的贡献。

第七节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及文化艺术的劫掠与破坏

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湖北麻城人，逃荒到肃州巡防营，后又流落敦煌，在莫高窟下寺当道士。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公元 1900 年 7 月 2 日）率人在第 16 号洞窟清理甬道积沙，清除完毕后，忽然“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

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奇物”[①]。

从此，秘室开启，宝藏现于世，该洞窟被称为“藏经洞”。这座蕴藏丰富、包罗万象的古文献文物宝库中，满贮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文献文物资料约五六万余件。其中有大量佛教、道教、儒学和其他宗教经典著作；还有大量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及水经、地志、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制糖、酿酒、棋经等，中华文化的精品珍奇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同时还有大量民间买卖契约、借贷典当、帐簿、户籍、信札、状牒等等。这些文献典籍的文字用汉文、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康居文等文字写成，汉文最多，藏文次之。文书中还有唐、五代、宋时期的印刷品。

除此之外，藏经洞还有绘画、佛像、刺绣及大批其它珍贵艺术品和丝织品。这批古文献文物资料的时限，上起三国时期，下迄赵宋王朝，最早纪年是苻秦“甘露元年”(公元 359 年)，最晚为南宋庆元二年(公元 1196 年)，延续时间长达 12 个世纪，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的历代文书典籍。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文物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我国北朝至宋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科技、宗教、史地交通、民族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民俗、音乐舞蹈等提供了其它史籍所未曾记载的珍贵资料。同时，也为了解和研究中古时期民族间在血缘和地域上的关系和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藏经洞被发现后，当时的敦煌县知事汪宗翰会同地方士绅前往检视。他们大致翻阅观览一遍，汪宗翰尚懂得这批文献文物的历史价值，嘱咐王道士善为保存，并向王道士索取一些画像、写经，当做官场交往的礼品送给他人。后首先对这批文献文物特别珍视的是甘肃学政叶昌炽，他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这批文献文物如数运

① 《重修敦煌县志》卷十《艺文志》下《王道士圆箓墓志》。

解省城兰州保存。被清政府以运费难筹为由推脱并下令就地封存。1904 年 3 月，敦煌县衙命王道士将藏经洞重新封闭，王道士乘封存之机又偷拿私藏一部分，私下盗卖和馈赠官绅。从此秘密宝藏流失关陇甚至北京，一时间遐迩闻名，风靡世界文化界。

二、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的劫掠与破坏

20 世纪初期，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中的文献文物遭受了空前的劫掠和破坏。那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游历者”、“考察者”，在“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的同时，疯狂地劫掠和破坏，摧残了这一世界的优秀的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

1905 年，帝俄勃奥鲁切夫探险队首先至敦煌，盗走古经卷一批。1907 年 3 月，英国人斯坦因(原籍匈牙利)随带翻译蒋孝琬至敦煌莫高窟，经三个月密谋策划，贿通道士王圆箓，盗走六朝至宋代经卷、写本共 24 箱，约万余卷，另有佛像绣品及绢画 500 余幅，偷运至伦敦博物馆。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原籍安南河内)来到敦煌，又贿通王道士，盗走珍贵文物 6000 余卷，并摄影数百帧，偷运回国。

为了掩盖自己的盗行，伯希和捡取少数经卷，于 1909 年在北京公之于众，中外震惊。中国北京学部遂于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命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尽数运至北京。自此敦煌官绅上下，惊诧异常，方知经卷之珍贵，争相捡取，共拿走约 2000 余卷，王道士又趁机暗藏一部分。当时，起运北京的经卷仅剩 8000 余卷，王道士暗藏偷拿的卷子，又陆续被外国人骗买劫掠而去。

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潜来敦煌莫高窟，先后四个月，从王道士手中，吉川骗买写经 100 余卷，精美彩塑两尊；桔瑞超骗买经卷 369 卷。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再次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去经卷 600 卷。同年，俄国人奥尔坦布鲁克也

盗走古经卷部分。1922年，白俄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率残部500余人，由新疆奔逃敦煌莫高窟。他们将洞窟和寺院中的门窗、匾对劈碎当柴烧，并在洞窟内架锅生火做饭。莫高窟壁画大片大片被烟熏火燎无法辨认。更有甚者，他们为了盗宝，将大量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掏腹，肆意破坏。敦煌莫高窟损失惨重，壁画彩塑破坏严重。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潜来敦煌莫高窟，他见藏经洞已空，深感晚来一步，面对精美的洞窟壁画遂下决心要“剥尽这里的一切而毫不动摇”。他用化学胶布粘走了唐代等精美的壁画26幅，并盗劫盛唐彩塑数尊。其间，斯坦因之后，伯希和之前以及其后，俄国“探险者”科兹洛夫、奥登堡等人，也来到敦煌，劫掠盗运走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

这场历时二十多年，参与者涉欧、美、亚洲的文化大劫掠、文明大摧残，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耻辱。每一位中国人，每一位爱好和平的人，都应当牢记这文明与文化史上空前悲惨的一页。

敦煌莫高窟分期表

时代	开凿窟数	洞窟编号(第　窟)	特　　　点
十六国晚期	7	267、268、269、270、271、272、275	窟内以弥勒菩萨、禅定佛、说法佛为主造像，反映了在战乱频繁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企盼"弥勒下生"的愿望。 在成排的阙形龛内塑着各种弥勒菩萨，大都沉思俯视，垂悯下界，其题材与形式时代特征明显。
元魏前期	8	251、254、257、259、260、263、265、487	窟型是有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窟。 壁画内容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
元魏后期	10	246、247、248、249、285、286、288、431、435、437	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 壁画艺术在反映时代特征的同时，融合东西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和突破。
北周	15	250、290、294、296、297、298、299、301、428、430、438、439、440、442、461	洞窟形制、绘塑风格，是西魏到隋之间的过渡。壁画里首次出现须阇提品、善事太子入海品，表明中国传统孝悌观念与佛教的结缘。

时代	开凿窟数	洞窟编号(第　窟)	特　　点
隋	70	56、59、62、63、64、206、253、255、262、266、274、276、277、278、279、280、284、292、293、295、302、303、304、305、311、312、313、314、315、316、317、388、389、393、394、396、397、398、401、402、403、404、405、406、407、410、411、412、413、414、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30、433、434、436、451、453、455、485	公元589年以前,属于北朝佛教艺术范畴,人物造型、内容布局、窟型、色彩和装饰纹样的选用,都与北周接近。 公元589年以后是隋代艺术极盛期,壁画上细致繁丽的风格和塑像衣褶彻底改变了阶梯式的作法而变为贴体流畅的衣纹。 窟型先有须弥山式中心塔柱,后多是西壁开龛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或人字披顶方形窟,又有了三面开龛的中心龛柱与前部三铺大像结合形式。 绘画出现了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壁画制作上出现了重染两颊、眉楞,突出额角、鼻梁、下颌的染色法,又有了浅染五官四周,甚至纯白面额的做法。 在原地方风格基础上,面临中原与西域两重熏染,准备了新的艺术繁荣期到来的基础。
初唐	44	57、60、68、71、77、96、202、203、204、205、209、210、211、212、213、220、242、244、280、283、287、321、322、328、329、331、332、333、334、335、338、339、340、341、342、371、372、373、375、381、386、390、392、448	有隋代的余绪,亦有如220窟的成熟艺术,长安新画风随着唐王朝进军西域而来,东西交通畅通,莫高窟艺术迅速出现了新面貌。 武则天时期,其佞信佛教,对西域用兵频繁,为莫高窟的发展推波助澜。

续表二

时代	开凿窟数	洞窟编号（第　窟）	特　　　点
盛唐	80	23、26、28、31、32、33、34、39、41、42、44、45、46、47、48、49、50、51、52、66、74、75、79、80、91、101、103、109、113、115、116、117、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9、130、148、162、164、165、166、170、171、172、175、176、180、182、185、194、199、208、214、215、216、217、218、219、225、264、319、320、323、374、384、387、444、445、446、458、460、482、484、490。	莫高窟艺术愈趋成熟，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敦煌本地画工和中原京、洛地区各派风格结合，新画风、新技法不断出现，甚或有内地匠师参与绘塑。 不同的绘塑艺术作品，反映了对佛教思想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受到当时信众的崇拜和景仰，其艺术成就也得到今天观者的称赏。
吐蕃时代（中唐）	44	21、92、93、112、133、134、135、153、154、155、157、158、159、179、186、188、191、197、200、201、202、222、231、236、237、238、240、258、357、358、359、360、361、365、369、370、447、469、471、472、474、475、478、479	吐蕃时代莫高窟艺术与盛唐时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窟形、龛形和壁画内容有显著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每窟经变数量增多。 洞窟制作考究，覆斗形窟顶，方整的四壁，盝顶帐形龛及佛床、壶门，无不严整、精巧；一壁之上，不仅画二至四铺经变，而且在壁画下面部分还画十二至十四扇屏风。屏风内所画各品比喻故事细节，与上方经变中盛大的法会场面相配合，收到了精致细腻的艺术效果。 吐蕃时代石窟艺术对后来晚唐、五代、宋、西夏的继续修造以深远的影响。

时代	开凿窟数	洞窟编号(第　窟)	特　　点
晚唐	60	8、9、10、12、13、14、16、17、18、19、20、24、54、82、85、94、102、104、105、106、107、111、114、127、128、132、138、139、141、144、145、147、150、156、160、161、163、167、168、173、177、181、183、184、190、192、193、195、196、198、221、227、232、241、336、337、343、459、470、473	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无重大的改变，主要是世家豪族(张氏、索氏、李氏)纷纷以“报恩”、“庆寺”为名，营造了不少洞窟。 个别洞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特别是张、李、索三姓与三个僧所开大窟，反映出河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比吐蕃时期有所加强。
五代	32	4、5、6、22、36、40、53、61、72、78、86、90、98、99、100、108、137、146、187、226、261、300、342、346、362、385、391、440、441、468、469、476	五代除了世族豪门继续修建了一些大窟，还在曹氏祖孙的支持下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加修窟檐、缩小甬道门，对保存壁画和塑像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同时，群众结社造窟也很普遍。 五代的艺术风格是晚唐的继续，特别是焦墨痕中略施微染的壁画画法被广泛应用，其色彩鲜丽、线条刚劲，代表了五代、宋初壁画的基本格调。但艺术表现的程式化也逐渐严重起来。
宋	43	7(宋修)、15、25、34(宋修)、35、55、58、65、67、73、76、89、94(宋修)、118、130、136、152、170(宋修)、174、178、189、230、235、243、256、264(宋修)、289、355、364、368、376、377、427(宋修)、431(宋修)、443、444(宋修)、449、452、454、456、457、467、478(宋修)	瓜、沙归义军政权心向中原，努力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留下的遗迹中，一些大窟的修建都是跨越了五代、宋两个时代。 五代、宋不但政治上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而且石窟艺术也是一脉相承，中原艺术的影响仍起着主导作用。

时代	开凿窟数	洞窟编号（第　窟）	特　　　点
西夏	82	6（重修）、16（重修）、27（重修）、29、30、37、38、69、70、78、81、83、84、87、88、97、140、142、151、164、165、169、206（重修）、207、223、224、229、233、234、239、245、246、252、263（重修）、265、281、291、306、307、308、309、310、324、325、326、327、328（重修）、330、339（重修）、344、345（重修）、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6、363、365（重修）、366、367、378、382、388（重修）、389（重修）、395、399、400、408、409、415、418（重修）、420（重修）、432（重修）、437（重修）、450、460（重修）、464、491	早期壁画酷似归义军时代后期的"绿壁画"，中期接近甘州和西州的回鹘风格，晚期受金、蒙古、南宋的影响。 早期改建了许多石窟，几乎没有开新窟。其画风与归义军时期相衔接。曹贤顺时代的画家及其后裔继留莫高窟作画，表现上愈趋程式化、简单化。 1036年以后，改绘了一批石窟。佛、菩萨与僧俗供养人像的造型都矮而丰腴，鼻隆颐满。由于制笔用长锋硬毫，线描匀洁，但笔端起落收敛变化较少。 藏式佛画流行，辽、金画风与南宋画风显示其影响。 西夏文化与汉、藏、回鹘、契丹、女真等各族文化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

续表五

时代	开凿窟数	洞窟编号（第　窟）	特　　点
蒙元	10	1、2、3、95、149、462、463、464、465、477	萨迦派的金刚乘流行全国，相应的密宗佛教艺术流行河西，汉密画派继续流传，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风行。

说明：此表是根据史苇湘先生《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中《关于莫高窟的时代》分期编制的，“是根据现存艺术品的份量与质量来决定的”，是“根据敦煌地方的历史特殊性，确定了敦煌的历史时代分期”的。

敦煌莫高窟彩塑造像表

内容 / 时代	佛像	菩萨像	弟子像	天王像	力士像	彩塑像	说明
北凉	2	7					1、佛像可又分为：释迦牟尼、释迦多宝并坐、涅槃、弥勒、阿弥陀、药师佛像和过去七佛像、三世佛像、千佛像及化佛像等。 2、菩萨像可又分为：弥勒、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胁侍、供养等菩萨像。 3、弟子像有迦叶、阿难两弟子像和十大弟子像等。 4、另有羽人、飞天像，地神、天女像，禅僧、高僧像及禽兽像和道教塑像等。 5、另外清代497身彩塑像未计其中。
北魏	62	143		1	2	468	
西魏	18	35				72	
北周	21	34	30		1	962	
隋	82	148	94	4	2		
唐	146	177	147	59	10		
五代	10	17	9	9	2		
宋	13	20	8	3	8		
西夏	14	13	4	4			
元	1	5		2			
合计	369	599	292	82	25	1502	总计 2869

注：此表根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胡同庆《敦煌石窟艺术概述》编制。

世界各国现存藏敦煌文献、文物统计表

国别	具体存藏地、收藏者	文献数量（卷、件）	文物名称数量	备注
英国	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	11297	不详	
英国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765	不详	均为藏文文书
英国	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	不详	不详	
英国	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	不详	不详	
法国	巴黎国立图书馆	6000余	不详	汉文4038，藏文2000余
法国	吉美博物馆	不详	绢画220幅	
俄罗斯（原苏联）	圣彼得堡（原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原亚洲民族研究所）	12000	不详	另有9000件黑城文献
日本	桔瑞超	429	不详	
日本	大谷大学	38	不详	
日本	龙谷大学	7	不详	

续表一

国别	具体存藏地、收藏者	文献数量（卷、件）	文物名称数量	备注
日本	中村不折	163	不详	
日本	其他私人（包括不知姓名者）	208	不详	
美国	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	不详	绢画 1 幅	
美国	哈佛大学联合艺术博物馆	不详	绢画 1 幅	
美国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2	不详	汉文写本
美国	国会图书馆	9	不详	汉文写本
美国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3	不详	汉文写本
美国	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	3	不详	汉文写本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3	不详	汉文写本
美国	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	1	不详	汉文写本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1	不详	汉文写本

续表二

国别	具体存藏地、收藏者	文献数量（卷、件）	文物名称数量	备注
丹麦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东方部	16	不详	
香港	个人收藏，姓名不详	1	不详	
德国	柏林科学院	不详	不详	6000 余件汉文文书，敦煌文献数量不详
韩国	汉城博物馆	不详	不详	2000 余件总督文书中，敦煌文献数量不详
日本		不详	不详	3000 件大谷文书中，敦煌文献数目不详
印度	新德里博物馆	不详	不详	藏文文书
瑞典	不详	不详	不详	
奥地利	不详	不详	不详	

注：此表根据 1962 年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其它有关资料编辑而成，随着地区和国家格局的变化，存藏地及收藏者也都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文物收藏情况很难统计了解，甚或有些已被毁坏无存，失去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我国各省地市收藏敦煌文献、文物情况统计表

省别	具体存藏地、收藏者	文献数量（卷、件）	文物名称数量	备注
北京	北京图书馆	10000余	不详	
辽宁	旅顺博物馆	189	不详	
甘肃	甘肃省图书馆	100余	不详	
甘肃	甘肃省博物馆	137	不详	
甘肃	敦煌研究院	367	不详	
甘肃	敦煌市博物馆	306	不详	其中汉文78卷，藏文226卷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	22	不详	
上海	上海博物馆	182	不详	
天津	天津艺术博物馆	300余	不详	
台湾	台湾中央图书馆	153	不详	
台湾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	20余	不详	
台湾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不详	不详	
台湾	私家存藏	不详	不详	
安徽	安徽省博物馆	不详	不详	
甘肃	河西各地、市、县博物馆、文化馆	不详	不详	

敦煌历史、文化艺术大事年表

60 **万年前**—2.5 **万年前（旧石器时期）**

在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新疆东部，内蒙古西南部，甘肃西北部的玉门、酒泉、嘉峪关等地先后发现和采集到旧石器时期人类的打制石器，证明其时已经有人类活动于敦煌及其附近地区。

2.5 **万年前**—5000 **年前（新石器及中石器时期）**

在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新疆东部，内蒙古西南部，甘肃西北部敦煌、玉门、酒泉等地先后发现和采集到公元前 4000—5000 年前后、公元前 3700 年前后的人类聚落遗址及大量牧畜狩猎型的细石器文化遗物。有磨制的石刀、石斧、石坠、石刮器等，还有陶纺轮、骨器、兽骨、灰坑和陶片等遗物。可证其时敦煌及附近地区人类的活动更加频繁，已进入人类氏族社会时期。

公元前约 3000 **年—公元前约** 1600 **年**

三危流沙地，羌戎所居，江淮三苗族迁于三危，敦煌及附近地区是各族人耕牧养殖之地。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遗址文化类型为其代表。

公元前约 1600 **年—公元前** 770 **年（夏、商、西周时期）**

羌戎与三苗融合，耕牧养殖经济进一步发展，与夏、商、西周王朝有战争发生。

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6 **年（春秋时期）**

瓜州地。《左传》昭公七年载："允姓之戎，居于瓜州"。秦穆公

“益国十二，遂霸西戎”。羌、戎、三苗进一步融合。

公元前 476 年—公元前 221 年（战国时期）

乌孙强大，驻牧敦煌地区。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二十六年）

乌孙、月氏相继驻牧生活于敦煌地区。

公元前 204 年（汉高祖三年）

大月氏居敦煌、祁连间，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公元前 174 年（西汉文帝前元六年）

匈奴冒顿单于破月氏，月氏西迁，匈奴人居敦煌祁连间。

公元前 138 年（西汉武帝建元三年）

汉武帝派遣张骞经敦煌第一次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经 13 年，于前 126 年返抵长安。

公元前 121 年（汉武帝元狩二年）

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击匈奴，置武威、酒泉郡，敦煌地域隶属酒泉郡。

公元前 120 年（汉武帝元狩三年）

暴利长遭刑屯田敦煌，渥洼池获“天马”献于帝，武帝特命司马相如、李延年作歌，颂其事。

公元前 119（汉武帝元狩四年）

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赴乌孙，前 115 年归。

公元前 115 年（汉武帝元鼎二年）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设官田，斥塞卒六十万军戎田之”。时，敦煌开设屯田。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元鼎六年）

汉王朝设置敦煌县，徙民以实之。

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元封三年）

赵破奴出敦煌虏楼兰王，破姑师（车师）。汉“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元封六年)**

汉封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昆莫,出塞路过敦煌。

公元前 104 **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贰师将军李广利出玉门关西伐大宛,未果,退兵敦煌。上书请奏罢兵,武帝怒,下令:"军有敢入者,斩。"贰师恐,遂屯兵敦煌。

公元前 102 **年(汉武帝太初三年)**

军正任文屯兵玉门关,援贰师二次伐大宛。翌年获胜而归,得汗血马三千匹,大宛人亦学得汉人掘井技法。

公元前 101 **年(汉武帝太初四年)**

李广利西征获胜,复经敦煌而还,封海西侯。从此自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往往起亭。

公元前 91 **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以太子为首发生宫廷政变,牵连者数万人,胁从者皆徙敦煌郡。

公元前 89 **年(汉武帝征和四年)**

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出敦煌,击败匈奴控制之车师(姑师)。

公元前 88 **年(汉武帝后元元年)**

汉王朝设置敦煌郡,郡治敦煌县。

公元前 72 **年(汉宣帝本始二年)**

汉派田广明、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军十五万,自敦煌西出,与乌孙五万骑,夹击匈奴获得胜利,自此匈奴衰败不振。

公元前 65 **年(汉宣帝元康元年)**

敦煌索劢屯田西域伊循城,推行井渠法。

公元前 64 **年(汉宣帝元康二年)**

龟兹王与夫人朝汉,官员、侍从和车骑浩荡,往返途经敦煌。

公元前 59 **年(汉宣帝神爵三年)**

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

公元前 53 年(汉宣帝甘露元年)

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军一万五千,出塞讨伐乌孙,至敦煌通渠积谷以备战,后未出塞而还。

公元前 15 年(汉成帝永始二年)

将作大将解万年,以治昌陵无功获罪徙于敦煌。

公元 9—23 年(王莽新朝时期)

改敦煌县为"敦德亭",广至县为"广桓"。

公元 16 年(新莽天凤三年)

西域叛乱不绝,丝绸之路阻塞不通。

公元 23 年(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

陇西成纪人隗嚣起兵反莽,尽有酒泉、敦煌等河西地。

公元 25 年(刘玄更始三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窦融据河西各地,自称五郡大将军,敦煌属之。

公元 32 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敦煌太守辛彤随窦融征隗嚣,被封扶义侯。

公元 73 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窦固、耿忠出酒泉,率敦煌诸郡兵击败呼衍王,取得伊吾庐地,留吏士屯田。

班超为窦固假司马,随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

公元 74 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

窦固、耿秉、刘张出敦煌西进西域,恢复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西域复通。

公元 75 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

车师、匈奴合兵进攻西域都护,敦煌、酒泉太守奉命率兵救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公元 76—77 年(东汉章帝建初元年—二年)

东汉王朝撤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劝留班超,班超遂留并再定西域。

公元 91 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

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贡内附。敦煌太守始主持进行了在西域各地的军事经济活动,敦煌遂成为统辖西域军政中心。

公元 102 年(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

班超奉诏自西域经敦煌东返洛阳。

公元 107 年(东汉安帝永初元年)

西域诸国频攻都护任尚、段禧,汉以"道路险远,难相应处",诏罢都护,遂弃西域并闭玉门关。

公元 119 年(东汉安帝元初六年)

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鄯善王来降附汉。旋即北匈奴来犯,索班全军覆没。曹宗诸兵西进,不果。

公元 120(东汉安帝元初七年、永宁元年)

班超建议在敦煌复置护西域副校尉,遣西域长史屯楼兰。

公元 123 年(东汉安帝延光二年)

敦煌太守张珰上书谏:"西域不可弃,西域弃则河西危。"于是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

公元 124 年(东汉安帝延光三年)

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营戍守。

公元 125 元(东汉安帝延光四年)

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兵大败匈奴伊蠡王,西域复通。

公元 127 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

班勇约期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兵三千,破焉耆。

公元 129 年(东汉顺帝永建四年)

于田杀构弥王,敦煌太守徐由上书,求讨于田,不果。

公元 132 年(东汉顺帝永建七年、阳嘉元年)

北匈奴呼衍王入侵车师后部，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往救。

公元 135 **年（东汉顺帝阳嘉四年）**

敦煌往救车师后部兵不利而还。

公元 137 **年（东汉顺帝永和二年）**

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五千败北匈奴呼衍王于蒲类海，后人“立德祠，以表万世”。

公元 151 **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

北匈奴犯伊吾屯城，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兵四千余进军蒲类海，驱逐北匈奴。

公元 152 **年（东汉桓帝元嘉二年）**

于田杀长史王敬，敦煌太守司马达欲率诸郡兵讨伐，不果。

公元 153 **年（东汉桓帝元嘉三年、永兴元年）**

敦煌太守宋亮，立车师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王。

公元 159 **年（东汉桓帝延熹二年）**

敦煌索靖出生。（索靖字幼安，为晋司空、安乐亭侯。惠帝太安二年卒，享年 65 岁。）

公元 168 **年（东汉灵帝建宁元年）**

凉州刺史孟佗率领敦煌兵五百人，会同西域长史张晏率焉耆、龟兹、车师兵三万余人讨疏勒，攻城四十余日，不克而还。

公元 221 **年（曹魏文帝黄初二年）**

曹丕下诏，封爵敦煌人张恭：“为关内侯，并任西域戊己校尉”。

公元 222 **年（曹魏文帝黄初三年）**

鄯善、龟兹、于阗遣使至魏，西域复通。

公元 227 **年（曹魏明帝太和元年）**

仓慈任敦煌太守，“抑挫权右”，“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打击豪强，抚恤贫民。

公元 231 **年（曹魏明帝太和五年）**

仓慈保护西域各国商旅，为其提供各种方便，西域各族称其德惠，敦煌成为胡汉交往之都会。

公元 249—250 年（曹魏齐王嘉平元年—嘉平二年）

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改进落后的耕作方法，推广犁耕耧种，致使“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公元 265—266 年（曹魏元帝咸熙二年，西晋武帝泰始元年—西晋武帝泰始二年）

敦煌和尚竺法护西游归，始译经典，为敦煌初期译经最多之德。其弟子竺法乘，于敦煌立寺延学。

公元 272 年（西晋武帝泰始八年）

敦煌太守尹璩死，凉州刺史杨欣令敦煌县令梁澄为太守。敦煌功曹宋质拒命，立令狐丰为太守。杨欣遣兵击之，反为宋质所败。

公元 275 年（西晋武帝咸宁元年）

敦煌令狐丰建造大型仓城河仓城，“古时军储在此”。

公元 276 元（西晋武帝咸宁二年）

敦煌太守令狐宏为杨欣所杀。

公元 295 年（西晋惠帝元康五年）

晋分敦煌郡宜禾、伊吾、冥安、渊泉、广至和酒泉沙头、新乡等十三县为晋昌郡。

公元 301 年（西晋惠帝永康二年）

凉州刺史张轨“兴农修武，保卫州境”。

公元 303 年（西晋惠帝太安二年）

晋代著名书法家、敦煌人索靖卒。

公元 320 年（东晋元帝大兴三年）

敦煌高隐索袭卒，年七十九岁。

公元 335 年（东晋成帝咸康元年）

前凉张骏分置敦煌、晋昌、高昌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治所敦煌，杨宜任沙州刺史。

公元 345 **年(东晋穆帝永和元年)**

前凉张骏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分统凉州、河州、沙州。

公元 353 **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

开始创建敦煌莫高窟。

敦煌人宋纤在酒泉南北开办私学,授业第子三千人。

公元 365 **年(东晋哀帝兴宁三年)**

敦煌人段灼,封关内侯。

公元 366 **年(东晋废帝太和元年)**

沙门乐僔行游仙岩寺,在敦煌莫高窟开窟。

公元 376 **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

苻坚讨张天锡,灭前凉。敦煌属前凉统辖。

公元 383 **年(前秦建元十九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前秦大将吕光由敦煌出玉门关,西征焉耆、龟兹等国。

公元 384 **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前秦徙江淮、中州一带户民一万七千余户至敦煌。

公元 386 **年(前秦太初元年)**

吕光由西域还军,占据凉州,建后凉。

西域高僧鸠摩罗什随吕光经敦煌东至姑臧。

公元 387 **年(后凉太安二年)**

吕光与酒泉王穆争战,敦煌郭瑀、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响应王穆。

公元 400 **年(东晋隆安四年)**

段业以李暠为敦煌太守。李暠旋称凉公,改元庚子,定都敦煌,史称西凉。

名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西行取经,道行至敦煌,留居数月,敦煌太守李暠供给渡流沙。

公元 405 **年(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凉建初元年)**

李暠迁都酒泉,敦煌由其子李让镇守。李让在敦煌建南子亭,

以御吐谷浑。

公元 410 年（西凉建初六年）

北凉沮渠蒙逊侵西凉，败李歆于马庙，蒙逊遂与李暠结盟而还。

公元 412 年（西凉建初八年）

北凉历法家、敦煌人赵𢾺制定《玄始历》

公元 417 年（西凉建初十三年）

西凉公李暠卒，世子歆继，改元嘉兴。

公元 420 年（宋武帝永初元年，西凉嘉兴四年）

李歆袭张掖，被沮渠蒙逊所杀。李恂据敦煌，改元永建，拒北凉。

公元 421 年（宋永初二年，西凉永建二年）

北凉沮渠蒙逊围攻敦煌，以水破城，西凉亡。

公元 423 年（北凉玄始十二年）

罽宾僧人昙摩密多到敦煌，“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

公元 433 年（北魏延和二年，北凉永和元年）

北凉沮渠牧犍好学，尊敦煌人刘昞为国师，命其官属从刘昞学习。

公元 437 年（北凉永和五年）

敦煌宿学北凉太史令赵𢾺著《七曜历数算经》；沮渠牧犍向宋文帝献《赵𢾺传》、《甲寅元历》。

公元 439 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

北魏太武帝重用敦煌学者刘昞、索敞等。

公元 441 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

敦煌太守唐儿反，沮渠无讳讨之，获胜复据敦煌，杀唐儿。

公元 442 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

沮渠无讳自敦煌西奔鄯善。臣服于柔然李暠孙李宝入据敦

煌。

公元 444 **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

李宝朝魏,留驻京师平城,被封敦煌公。

敦煌遗书中最早的纸本历日始写。

公元 442—452 **年(北魏太平真君正光中)**

太武帝平沮渠氏,废敦煌郡置敦煌镇。

公元 445 **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太武帝遣万度归西征,至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至鄯善,鄯善降。

公元 452 **年(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

北魏废《景初历》,行赵歐《玄始历》。

公元 456 **年(北魏太安二年)**

凉州都督尉眷,转敦煌镇将。

公元 466—470 **年(北魏天安、皇兴年间)**

征西将军、领护羌校尉尉多侯,为敦煌镇将。

公元 472 **年(宋明帝泰预元年,北魏延兴二年)**

柔然(蠕蠕)部帅无卢真率三万骑入塞围敦煌。

公元 475 **年(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

柔然(蠕蠕)再寇敦煌镇,将尉多侯大破之。

公元 481 **年(北魏太和五年)**

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

公元 483 **年(北魏太和七年)**

齐以氐帅杨炅为沙州刺史。

公元 485 **年(北魏太和九年)**

魏遣长乐王秦州刺史穆亮为敦煌镇都大将。

公元 507 **年(北魏正始四年)**

敦煌饥荒遍地,魏主下诏开仓赈恤。

公元 518 **年(北魏孝明帝熙平三年、神龟元年)**

敦煌人宋云与比丘慧生、法力等人，奉胡太后命，往天竺求取佛经。

公元 522 年(北魏正光三年)

宋云与慧生自西域取回大乘佛经一百七十部，并著有《宋云家纪》。

公元 523 年(北魏正光四年)

孝明帝下诏：敦煌人刘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

公元 524 年(北魏正光五年)

改敦煌镇为瓜州，魏东阳王元荣任刺史。

公元 525 年(北魏正光六年)

设立寿昌郡。

公元 529 年(北魏永安二年)

瓜州城民张保杀刺史成庆自立，晋昌民吕兴杀太守郭肆响应。

公元 542 年(西魏文帝大统八年)

元荣卒，其婿邓彦杀荣子康(刺史)取其位。

公元 546 年(西魏大统十二年)

瓜州主簿令狐整讨平张保、吕兴。

公元 559 年(北周武成元年)

北周并敦煌、鸣沙、平康、东乡为鸣沙县。

公元 564 年(北周保定四年)

废寿昌、效谷二郡入鸣沙县。

公元 584 年(隋文帝开皇四年)

敦煌莫高窟隋窟开凿，“莫高窟”名首出。

公元 605 年(隋大业元年)

复置敦煌郡，鸣沙县改为敦煌县。

公元 607 年(隋炀帝大业三年)

西域二十八国使节经敦煌出朝。

铁勒寇边，遣冯孝慈出敦煌击之，不利。

裴矩经敦煌出访西域各国。后著《西域图记》。

公元 608 **年（隋大业四年）**

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出玉门攻伊吾，克之。

公元 609 **年（隋大业五年）**

隋炀帝派闻喜公裴矩至敦煌，招致胡商至张掖举办西域二十七国交易大会。

公元 617 **年（隋大业十三年）**

凉州李轨起兵，称河西大凉王，改元安乐，敦煌归其统治。置龙勒府。

公元 619 **年（唐高祖武德二年）**

唐沿隋制，称敦煌为瓜州，李轨降唐，李世民封敦煌公。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割据敦煌两年。

公元 620 **年（唐武德三年）**

瓜、沙分治。以常乐县置瓜州，改敦煌为西沙州。

公元 622 **年（唐武德五年）**

敦煌人张护、李通杀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拥沙州别驾窦伏明为城主，割据沙州。

公元 629 **年（唐太宗贞观三年）**

遣李靖、薛万彻等六总管击突厥。

玄奘自长安经凉州、瓜州等地，出玉门关去天竺取经。

公元 633 **年（唐贞观七年）**

西沙州改称沙州，领敦煌、寿昌二县。

公元 641 **年（唐贞观十五年）**

唐遣侯君集统军伐高昌，沙州刺史刘德敏率军民从征，建立西州。置西域都护府于交河城。

公元 645 **年（唐贞观十九年）**

玄奘取经从天竺经阳关归，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

公元 647 **年（唐贞观二十一年）**

沙州刺史苏海政、行军长史薛万备率精骑，随安西都护郭孝恪破龟兹。

公元 658 年（唐高宗显庆三年）

以后，唐和吐蕃、西突厥争夺西域，沙州成为安西都护府的基地。

公元 705 年（唐中宗神龙元年）

唐置豆卢军（即归义军）于沙州。

公元 710 年（唐中宗景龙四年）

唐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

公元 729 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

瓜州都督张守珪和沙州刺史贾师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公元 742 年（唐天宝元年）

沙州改称敦煌郡。

公元 758 年（唐肃宗乾元元年）

敦煌再改为沙州，废寿昌县为寿昌乡。

公元 766 年（唐代宗永泰二年、大历元年）

吐蕃占领甘、肃二州。新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河西节镇沙州。

公元 767 年（唐大历二年）

吐蕃围沙州，刺史周鼎求救于回鹘。最后，经数年争夺，吐蕃攻占沙州。（吐蕃占沙州时间有 777 年、782 年、785 年、787 年等不同说法。）

公元 783 年（唐德宗建中四年）

唐与吐蕃盟约，河西全归吐蕃统治。吐蕃放回在沙州虏去将士僧尼八百余人。

公元 785 年（唐贞元元年）

沙州玉关驿户氾国忠等六人攻杀吐蕃节儿。

公元 848 年（唐宣宗大中二年）

敦煌张议潮率沙州军民起义，收复沙、瓜二州。之后，派人到长安告捷，唐授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

公元 851 **年（唐大中五年）**

唐在沙州置归义军，授张议潮节度使。

公元 860 **年（唐懿宗咸通元年）**

张议潮在敦煌莫高窟开窟为功德，使画工绘壁画。

公元 867 **年（唐咸通八年）**

张议潮奉命入朝，其侄张淮深以归义军节度留后，执掌瓜、沙政权。

公元 868 **年（唐咸通九年）**

敦煌遗书保存有是年成都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印刷技术已很成熟。

公元 872 **年（唐咸通十三年）**

张议潮病逝于长安，葬长安东南浐水之滨。

公元 890 **年（唐昭宗大顺元年）**

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及妻陈氏及六子以乱殒命。瓜州刺史索勋代守归义。

公元 892 **年（唐景福元年）**

唐任索勋为归义军节度使。

公元 894 **年（唐乾宁元年）**

张议潮十四女和其婿李振明，杀索勋一家，立议潮孙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李宏愿为副使。

公元 905 **年（唐哀帝天祐二年）**

张承奉在敦煌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金山国”立国另有 906 年、908 年之说。）

是年回鹘来寇金山国，败之。

公元 911 **年（后梁开平五年、乾化元年）**

甘州回鹘狄银率兵来寇金山国取胜，订立城下之盟，张承奉屈

结“父子之国”。

公元 914 **年（后梁乾化四年）**

张承奉卒，张氏后嗣遂无人，原吏部尚书曹仁贵执掌瓜、沙政权，去“金山国”号，复节度称。

公元 924 **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曹议金遣使入贡，被授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

公元 935 **年（后唐清泰二年）**

曹议金卒，曹子曹元德继任归义军节度使。

公元 940 **年（后晋高祖天福五年）**

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卒，其弟曹元深继掌军政。

后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海出使于阗，道经瓜、沙，曹元深等郊迎。

公元 945 **年（后晋出帝开运二年）**

曹元深卒，以瓜州刺史曹元忠为沙州留后。

公元 949 **年（后汉乾　二年）**

曹元忠遣步军教练使梁再通等，向朝廷献硇砂一十斤。

公元 964 **年（宋乾德二年）**

于阗太子三人至沙州礼佛，并献《法华经》。

僧继业等三百人求舍利与贝多页书，送经沙州往天竺。

公元 968 **年（宋开宝元年）**

曹元忠称敦煌王。

公元 974 **年（宋太祖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

曹元忠卒，侄延恭继为归义军节度使。

公元 976 **年（宋开宝九年，太宗太平兴国元年）**

曹延恭卒，其堂弟延禄继任归义军节度使留后。

公元 995 **年（宋至道元年）**

曹延禄遣使朝贡，制加“特进、检校太尉”。

公元 1001 **年（宋真宗咸平四年）**

宋封授曹延禄为谯郡王。

公元 1002 年（宋咸平五年）

曹延禄及其弟瓜州防御使曹延瑞为族子宗寿所杀。

宋授曹宗寿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押蕃落等使。

公元 1006 年（宋景德三年）

沙州敦煌王曹宗寿贡马及玉于辽。

公元 1014 年（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

曹宗寿卒，其子贤顺继任归义军节度使。

公元 1017 年（宋天禧元年，辽开泰六年）

曹贤顺朝辽。

公元 1019 年（宋天禧三年）

沙州遣使贡辽，辽封曹贤顺为敦煌郡王。

沙州永安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报恩寺、灵图寺、三界寺、莲台寺、大乘寺、圣光寺等二十五名僧人结社，在莫高窟造“天禧塔”一座。

公元 1030 年（宋仁宗天圣八年）

西夏进兵瓜、沙，瓜州以“千骑降于夏”。

公元 1036 年（宋景祐三年）

西夏占领沙州，结束瓜、沙曹氏的统治。

沙州回鹘掌握了沙州政权。

公元 1037 年（宋景祐四年）

沙州大使杨骨盖、副使翟延顺入贡于宋。

公元 1041 年（西夏延祚四年）

沙州镇国王子遣使于宋。

公元 1067 年（宋英宗治平四年）

西夏再次占领瓜、沙二州，敦煌进入西夏统治时期。

公元 1082 年（西夏大安八年）

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

公元 1093 年（宋哲宗元祐八年、西夏民安四年）

西夏主乾顺令瓜、沙诸州，严兵以待，以防于阗黑汗王来攻。

公元 1110 年（西夏贞观十年）

瓜、沙、肃三州饥荒，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汉民流亡者过半。

公元 1165 年（西夏天盛十七年）

西夏主李仁孝赴瓜、沙。

公元 1224 年（西夏乾定二年，蒙成吉思汗十九年）

蒙古兵攻沙州，不克。

公元 1227 年（元太祖二十二年）

蒙古遣军攻沙州，西夏守将婴城固守，日余城破，沙州隶蒙元拔都大王。

公元 1267 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宋度宗咸淳三年）

以瓜州、沙州鹰坊三百人充军。

公元 1274 年（元至元十一年，宋咸淳十年）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东游，途经沙州。

公元 1277 年（元至元十四年，宋端宗景炎二年）

元置沙州，并在瓜、沙设屯田。

公元 1280—1286 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至元二十三年）

河西营牙赤所部屯田军，与沙州居民共修城池。

公元 1292 年（元至元二十九年）

元朝廷迁瓜、沙二州居民往肃、甘二州交界处耕种，无力者给以牛具、农具，沙州户民锐减。

公元 1295 年（元成宗元贞元年）

罢瓜、沙等州屯田。

公元 1297 年（元大德元年）

总帅王惟和以所部军在沙州屯田。

公元 1303 年(元大德七年)

御史台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从之。

公元 1309 年(元至大二年)

元派驻屯军至瓜沙屯田,岁入粮二万六千石。

公元 1353 年(元至正十三年)

西宁王牙罕沙自四川还镇沙州。

公元 1372 年(明太祖洪武五年)

冯胜、傅友德出兵河西,直下瓜、沙二州。议以嘉峪关为界,弃敦煌。

公元 1397 年(明洪武三十年)

成立罕东卫。

公元 1404 年(明成祖永乐二年)

时酋长困即来势方强,为指挥使,与哈密罕卫、赤斤四卫屏蔽西陲。

公元 1405 年(明永乐三年)

困即来、买住率众来归,命置沙州卫,授二人指挥使,并赐印诰。

公元 1426 年(明宣德元年)

困即来以岁饥人困,遣使贷谷种百石。

公元 1436 年(明正统元年)

甘肃镇将任礼收喃哥部二百余户,入居甘州。沙州遂为罕东酋班马思结所有。

公元 1447 年(明英宗正统十二年)

废沙州卫,迁其众至内地。

公元 1479(明宪宗成化十五年)

吐鲁蕃族侵据哈密,明朝廷在沙州故城设立罕东左卫,授只克为都指挥使,与吐鲁蕃相抗衡。

公元 1486 年(明成化二十二年)

沙州岁饥,朝廷发粟五百余石令播种,并按人口月发口粮赈济。

公元 1496 年(明孝宗弘治九年)

吐鲁蕃又攻哈密,居民东逃于瓜、沙等州耕牧。

公元 1505 年(明弘治十八年)

瓦剌及安定部人,大掠沙州人畜而去。

公元 1516 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

吐鲁蕃复据哈密,威胁沙州。帖木哥、土巴居沙州,附属于吐鲁蕃多尔尹王。

公元 1522 年(明世宗嘉靖元年)

罕东左卫指挥使乞台部帖木哥、士巴率部五千四百人内徙,沙州遂为吐鲁蕃所有。

公元 1524 年(明嘉靖三年)

吐鲁蕃满速儿进围肃州,被击退。

封闭嘉峪关,沙州废,郭煌弃,旷无建置。

公元 1715 年(清康熙五十四年)

清军征西域,嘉峪关外渐次恢复。

公元 1723 年(清世宗雍正元年)

置沙州所。

公元 1725 年(清雍正三年)

置沙州卫,从甘肃五十六州县移民 2405 户,原临洮知府白讷建筑沙州城。

公元 1726 年(清雍正四年)

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至沙州,派汉兴道尤汶督理沙州屯田。

公元 1727 年(清雍正五年)

光禄少卿汪隆到敦煌,修官署,建兵房,扩建关厢城,置三堡。

公元 1731 年(清雍正九年)

沙州卫守备赵在熊督率户民，续修新城。

公元 1737 **年（清高宗乾隆二年）**

撰成《重修肃州新志》并刊刻。内有《沙州卫志》二册。

公元 1760 **年（清乾隆二十五年）**

改沙州卫为敦煌县，隶安西同知。置沙州巡防营，隶肃州镇，设参将统领。

公元 1819 **年（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

著名史地学家徐松考察敦煌莫高窟。

公元 1821 **年（清宣宗道光元年）**

徐松把其在敦煌莫高窟考察研究成果载入《西域水道记》第五卷。

公元 1829 **年（清道光九年）**

县教谕曾诚纂成《敦煌县志》四卷。

公元 1854 **年（清文宗咸丰四年）**

青海黑番数百人至敦煌县，兵民合御之，民众骡马财物被大掠而去。

公元 1865 **年（清穆宗同治四年）**

敦煌回民暴动未遂，分赴酒泉、新疆而去。

公元 1869 **年（清同治八年）**

敦煌牛瘟传染惨烈，死者十之六七。

公元 1870 **年（清同治九年）**

白喉症传染敦煌，患者九死一生，牛瘟再起，十患九死。

清廷调运军粮至新疆，安西、敦煌、玉门三县驼马皆空，民不堪其苦。

公元 1873 **年（清同治十二年）**

白彦虎率兵万余人围攻敦煌。左宗棠督战肃州，城破，敦煌撤围，彦虎窜新疆。

公元 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派员到敦煌修筑仓廒。

公元1877**年（清德宗光绪三年）**

左宗棠整顿酒泉书院。

公元1879**年（清光绪五年）**

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偕斯尼希地质考察至敦煌，莫高窟艺术被外国人窥探。

公元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西宁刘四福至敦煌，万余人与官军交战，大败，余部败逃罗布淖尔。

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又有1899年、1901年、1903年发现之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在德国汉堡举行国际东方学会议，洛克齐向英、德、法、俄等国学者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宏丽、精美，引起与会学者注意。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甘肃省政府下令："石室秘籍就地封存。"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俄国奥布鲁切夫探险队来敦煌骗取文献文物，盗运出国。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英国斯坦因探险队来敦煌，骗取大量文献文物，盗运出国。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法国伯希和探险队来敦煌，骗取大量文献文物，盗运出国。

1909**年（清溥仪宣统元年）**

伯希和在北京公开展示部分敦煌文献文物。

罗振玉发表中国学者最早的敦煌学论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蒋斧编印《沙州文录》，收入少量敦煌遗书。

敦煌县人吕钟、朱永镇考中拔贡生。

1910 年(**清宣统二年**)

敦煌知县奉命将莫高窟文书经卷文物移送北平。

敦煌喉症患者十九不治,死二千余人。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等潜来敦煌,盗走莫高窟文献文物大批。

北平存古学会辑录的《石室秘宝》,首次刊载了敦煌遗书的原件照片。

1912 年(**中华民国元年**)

敦煌抗粮斗争首领张鉴铭、李正贵等大赦出狱,谢文等死于狱中。

1914 年(**中华民国** 3 **年**)

英国人斯坦因再次来敦煌,从莫高窟盗走经卷约六百卷。

俄国奥尔坦布鲁克探险队盗走经卷一批。

民国政府捕杀哥老会。

1919 年(**中华民国** 8 **年**)

北京政府教育部派员至敦煌,寻求唐僧所译经卷。

1920(**中华民国** 9 **年**)

甘肃省教育厅会同敦煌县政府,清理地方文献。从莫高窟第 17 窟内清理出藏文经卷 19 捆,带夹板经书 11 打。

1922 年(**中华民国** 11 **年**)

白俄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率残部五百余人,由新疆奔逃敦煌驻莫高窟,洞窟壁画及佛像损失惨重。

1924 年(**中华民国** 13 **年**)

美国人华尔纳带探险队来敦煌,用化学胶布粘走莫高窟壁画 26 块,盗去盛唐彩塑数尊。

1925 年(**中华民国** 14 **年**)

华尔纳又至敦煌，妄图偷盗莫高窟文物，引起民众愤怒，将其及同伙驱逐出境。

1929 **年（中华民国** 18 **年）**

敦煌防兵连长张国民哗变。

肃州防兵排长吴廷章哗变犯敦煌。

1931 **年（中华民国** 20 **年）**

马步芳新九师分驻河西各地，其第一旅一部驻敦煌。

1933 **年（中会民国** 22 **年）**

马仲英来敦煌。

敦煌清真寺建成。

1935 **年（中华民国** 24 **年）**

英籍人巴慎思，自称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特约记者，潜莫高窟盗窃壁画，未遂潜逃。

1936 **年（中华民国** 25 **年）**

中共中央派邓发经敦煌和新疆赴苏联。

国府委员邵元冲参观莫高窟、阳关等文物古迹，随行高良佐著《西行随轺记》。

成立敦煌县民众教育馆。

马步芳急调刘呈德至肃州堵截西路红军。

1937 **年（中华民国** 26 **年）**

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到敦煌，考察莫高窟古代建筑。

1938 **年（中华民国** 27 **年）**

敦煌县卫生院成立。

盛世才驱逐新疆哈萨克族三千余人入敦煌。

1939 **年（中华民国** 28 **年）**

国民党敦煌县党部成立。

1940 **年（中华民国** 29 **年）**

中国著名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先后到敦煌莫高窟临

摹壁画，并撰文介绍敦煌莫高窟艺术。

国民党军阀马步芳派人到敦煌莫高窟盗掘文物，窃走宋天禧三年银塔及《造塔记》等珍贵文物。

1941 **年（中华民国** 30 **年）**

著名画家张大千偕夫人杨宛君、子张心智及学生孙宗慰等到敦煌，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并对洞窟重新编号。

历史学家向达在敦煌佛爷庙湾进行考古发掘。

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考察，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参与。

英国著名自然史科学家李约瑟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参观。

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到敦煌考察。回重庆后建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院，以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

1942 **年（中华民国** 31 **年）**

王子云率西北考察团来敦煌，何正璜、卢善群、雷震等临摹莫高窟壁画，在重庆展览，第一次公布洞窟内容。

蒋经国、蒋纬国来敦煌参观莫高窟、月牙泉等。

常书鸿来敦煌莫高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1943 **年（中国民国** 32 **年）**

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本，在成都、重庆、兰州展出。

改敦煌佛教居士林为中国佛教会敦煌分会。

敦煌、安西两县人民义务修筑安敦公路。

1944**（中华民国** 33 **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教育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

西北考察团又在敦煌佛爷庙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在翟宗盈墓中发现精美墓葬壁画。

1945 **年（中华民国** 34 **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展出壁画临摹品，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前去观看。

马步芳部团长马中骞驻敦煌哗变，抢掠商民逃往哈密。

1946 **年（中华民国** 35 **年）**

甘肃省科学教育馆举办敦煌艺术展览。

1947 **年（中华民国** 36 **年）**

敦煌县境党河与阿尔腾河间发现金矿。

1948 **年（中华民国** 37 **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上海举办"敦煌艺展"引起国内学术界对敦煌艺术的重视。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张治中来敦煌视察工作。

美国韦生特夫妇到敦煌，在莫高窟拍摄了大量彩色照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布敦煌和平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布命令"保护敦煌千佛洞"。

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派专家、拨专款维修敦煌莫高窟，抢救早期洞窟。

后记

聂锋

十余年前走进敦煌，就被她那神秘莫测、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所震惊而激动不已。总想试探着走进她那宽广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怀抱之中，为此多曾努力，苦研再三，终就了这薄浅的文字。

敦煌莫高窟艺术部分的内容，是由生长于鸣沙崖下、宕泉河畔三十余载的祁淑虹女士完成的。这样也才能不负父辈的期望和嘱托，自圆其敦煌莫高窟之梦。

在本书的编写著述过程中，曾得到了许多敦煌学学者、专家的多方指教，参阅了许多学者前辈的大量书稿文录；出版过程又得益于中共酒泉地委党校领导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敦煌历史文化艺术
作者=聂烽　　祁淑虹著
页数=329
SS号=10853859
出版日期=1996年12月第1版
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
尺寸=20cm
原书定价=16.80
主题词=敦煌学（学科：　文化史　学科：　研究）敦煌学　文化史
参考文献格式=聂锋，祁淑虹著．敦煌历史文化艺术．兰州市：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本书包括石器时代及汉以前的敦煌地区，西汉、东汉时期敦煌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建立和发展，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民族分割和民族融合等十章。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上编　敦煌历史
第一章　石器时代及汉以前的敦煌地区
第一节　旧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第二节　新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第三节　敦煌地区及其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原有历史的发展和三苗　迁敦煌的范围及其影响
一、火烧沟文化及　三苗　迁敦煌及附近地区
二、夏、商、周时期
第四节　古文献记载中的敦煌及相关地区
第五节　古今学者对敦煌与　三危　的各种注释与考证
第六节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的敦煌及其相关地区
第二章　西汉、东汉时期　敦煌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西汉初年敦煌地区的历史形势
第二节　汉武帝时期对敦煌地区统治权的确立和巩固
一、汉武帝初定河西及敦煌地区
二、汉武帝时期对敦煌地区的初步经营
西汉敦煌郡示意图
敦煌玉门关长城分布示意图
第三节　西汉王朝对敦煌地区的经营
第四节　西汉时期通过敦煌地区的中西交通交流
一、敦煌地区与匈奴及西域的初期关系
二、张骞出使西域
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中西交通交流
第五节　东汉时期敦煌地区的基本历史状况
一、东汉初期敦煌地区的形势
二、东汉敦煌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时期
第六节　东汉时期通过敦煌地区中西交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一、班超在西域的活动
班超通西域示意图
二、东汉通过敦煌的中西关系
第三章　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　敦煌地区的民族分割和民族融合
第一节　魏晋十六国南北时期敦煌地区民族分割和民族融合的基本概况
第二节　曹魏时期对敦煌地区的松散统治
第三节　西晋时期对敦煌地区的短暂统治
第四节　十六国时期敦煌地区的基本形势
一、前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二、前秦时期的敦煌地区
三、后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四、西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五、北凉时期的敦煌地区

东晋十六国五凉兴亡表
第五节　北魏时期的敦煌地区
第六节　西魏北周时期敦煌地区历史状况
第四章　隋、唐时期　敦煌地区走向自己封建时代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第一节　隋代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
丝绸之路示意图
第二节　唐初期敦煌地区形势及建置
第三节　唐前期敦煌地区与西域等的关系
第四节　唐代敦煌地区经济的发展
盛唐时期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示意图
第五节　唐代敦煌地区的商业发展与交流
盛唐时期敦煌西部地区示意图
第六节　吐蕃对敦煌地区的统治
第七节　张议潮领导的起义及张氏家族对敦煌地区的统治
归义军时期敦煌西部地区示意图
第八节　西汉金山国与甘州回鹘
第五章　五代、西夏、宋元时期　敦煌地区发展的延续和开始走向衰落
第一节　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曹氏政权
曹氏归义军时期（五代）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示意图
第二节　党项族西夏统治敦煌地区时期
第三节　蒙古族元代时期的敦煌地区
第六章　明、清、民国时期　敦煌地区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与进一步衰落
第一节　明王朝时期的敦煌地区
第二节　清王朝时期的敦煌地区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敦煌地区
敦煌地区建置沿革表
下编　敦煌文化艺术
第七章　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敦煌文化艺术
第一节　敦煌地区的石刻若画
第二节　汉代的诗词歌赋
第三节　侯瑾的辞赋　张芝的书法
第四节　氾胜之的农学
第五节　秦汉时期文化的传播
第六节　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初传
一、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二、佛教在中国的初传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文化艺术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文化概况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史地、天文、数学
一、西晋索靖的书法艺术
二、史地、天文和数学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
第五节　敦煌莫高窟的早期石窟艺术（北凉、西凉、北魏、西魏、北周时期）
一、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艺术概况

二、敦煌莫高窟早期建筑艺术
三、敦煌莫高窟早期彩塑艺术
四、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艺术
第九章　隋唐时期敦煌文化艺术
第一节　隋朝时的敦煌文化
一、佛教兴盛
二、裴矩的《西域图记》
第二节　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艺术
一、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艺术概况
二、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建筑艺术
三、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彩塑艺术
四、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壁画艺术
第三节　唐朝时的敦煌文化
一、书法艺术
二、民间文学和诗词
三、唐代《敦煌廿咏》
四、音乐舞蹈
五、吐蕃时期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四节　唐代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
一、唐代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概述
二、唐代敦煌莫高窟建筑艺术
三、唐代敦煌莫高窟彩塑艺术
四、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
第十章　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时期的敦煌文化与艺术
第一节　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
一、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概述
二、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建筑、彩塑艺术
三、五代、宋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
第二节　党项族西夏时的敦煌文化
第三节　蒙元时期的敦煌文化
第四节　西夏、蒙元时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
一、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概述
二、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建筑艺术
三、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彩塑、壁画艺术
第五节　敦煌飞天
第六节　清代敦煌文化教育事业
第七节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及文化艺术的劫掠与破坏
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二、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的劫掠与破坏
敦煌莫高窟分期表
敦煌莫高窟彩塑造像表
世界各国现存藏敦煌文献、文物统计表
我国各省地市收藏敦煌文献、文物情况统计表
敦煌历史、文化艺术大事年表
后记
附录页